出版说明

伊沃·安德里奇是南斯拉夫现代著名的作家，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写了好几部作品，包括三部曲«德里纳河上的桥»、«特拉夫尼克纪事»和«萨拉热窝女人»，前两部主要写南斯拉夫波斯尼亚的历史。

他的«德里纳河上的桥»是在国内国际负有盛誉的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追述十六世纪以后四百年间在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边境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它围绕一座大桥的兴建史，回顾了作者故乡波斯尼亚人民的苦难生活，并且反映了他们为争取自由的可歌可泣的斗争。

故事中的许多人物的命运，都和大桥的兴衰息息相关；他们经历过水灾、瘟疫和战乱，一个个相继死去，书中穿插了几个动人的斗争故事：如丞相穆罕默德巴夏幼年时作为"血贡"去服兵役；劳动人民拉底斯拉夫因为起来反抗而遭受惨痛的迫害，处以桩刑；无辜少女阿夫达吉娜为了逃脱逼婚而勇敢地从桥上跳河自尽。这是对当时异族统治和封建制度的强烈抗议。

南斯拉夫在十六世纪被土耳其人侵后的三百多年间，统治者横征暴敛，人民起义惨遭镇压；后来又被奥匈帝国占领，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德里纳河上的桥»可以说是一部南斯拉夫的苦难和斗争史，对于了解南斯拉夫的过去和现在有一定的意义。

作者伊沃·安德里奇生于一八九二年，童年是在波斯尼亚维舍格列城度过的。因此，他以深厚的感情描绘了这个边远的

波斯尼亚城市。一九一四年他因进行爱国活动而被逮捕入狱，一九一九年被大赦出狱。他曾数度出任南斯拉夫外交官。在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时，他曾任南斯拉夫驻柏林的公使。德国法西斯侵占南斯拉夫以后，他隐居在贝尔格莱德，从事写作。南斯拉夫解放后，伊沃·安德里奇曾任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作家协会主席多年，并担任南斯拉夫联邦会议代表；他于一九五六年来我国参加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会，回国后写有《鲁迅故居访问记》等文。他于一九七二年逝世。

本书根据法国巴黎普隆书店一九五六年版乔治·吕齐昂的法文译本转译。

编　者

一九七八年九月

第　一　章

德里纳河[①]大部分在崇山峻岭的峡谷和深涧中穿流，只有少数几个地段流经广阔的平原，在河流的一边或两边形成大片肥沃的土地。这些土地，有的一望无垠，有的起伏绵亘，是人们耕作和定居的好地方。维舍格列城[②]就在这样一个平原上。德里纳河离开布哥岭和乌扎尼沙山之间的深邃的峡谷后，在维舍格列突然峰回路转，由于河道转弯过急，使得两岸陡峭的山峰看来相距近在咫尺，几乎完全连成一体，德里纳河从那里流出来时仿佛是从一堵黑墙上决口溢出。随后，这些山峰忽然分开，形成一个参差不齐的盆地，从高处看，盆地最宽的地方不过十五公里。

在那青色的急流穿过黑色的峭壁奔泻而下的地方，矗立着一座壮丽的十一孔大石桥。由桥而下是一块扇形的起伏不平的谷地。维舍格列城及其郊区就在这里。谷地四周的山坡上，三五成群的房舍傍山而建。谷地的中央则是阡陌纵横的田野、牧

---

① 德里纳河是萨夫河的一条主要支流。它由两条小河组成，一条是比瓦河，发源于都尔弥道山；一条是达拉河，发源于哥莫维山。德里纳河由南向北流，全长333公里，河身陡峭，下游亦然，所以不宜于航行，但可以充分用来运输木材。人们在斯窝尔尼克附近建了一个大水电站，一九五五年开始发电。

② 维舍格列：德里纳河与撒夫河汇合处的一个大城镇，是中古时代的一个战略据点。

场和李树园，此外，还有随处可见的篱笆墙、小树林和零星的松林。所以，远远看过去，不仅德里纳河的碧绿河水从这座白石桥的大桥洞流出来，而且那一整块阳光灿烂，万物欣欣向荣的大地以及地面之上的天空也宛如从那里流出来。

市中心在德里纳河的右岸紧靠大桥的地方，土耳其人的商业区就建在平地上和山坡上。大桥的另一头，沿着河的左岸，是郊区马鲁金平原，房屋分布在通往萨拉热窝的大道两旁。因此大桥不仅使这条大路成为通衢，而且也把维舍格列的城区和郊区衔接起来。

这样说实在一点也不过分，正如我们说，太阳早晨升起为的是让我们能看见周围世界，从事日常工作，晚上落下则是为了让我们休息，消除一天的疲劳，一样恰当。

这座大石桥构造考究，外形美观，真是鬼斧神工的杰作，为其他更富庶更繁华的城市所望尘莫及。无怪乎从前有人说："这样的建筑物在奥斯曼帝国总共只有两座。"大桥是德里纳河中上游地区能够常年通行、安全可靠的唯一交通要道，是波斯尼亚到塞尔维亚和奥斯曼帝国的全国各地，乃至斯坦布尔的必经之地。位于交通要道和重要桥梁周近的市镇是一定会发达起来的。

维舍格列正是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桥两头的房屋和居民成倍增加。维舍格列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且象今天这样繁荣，完全是大桥哺育的结果。

为了使读者进一步了解该城的全貌及它和大桥的关系，我们还应当指出，维舍格列城内还有一条河，河上也有一座桥。这条河就是撒夫河，在远郊流入德里纳河，河上有一座木桥。绝大部分平民聚居的市中心就在两条河交汇的一条狭长的沙质土地上，郊区则分散在德里纳河左岸和撒夫河右岸。不过，在这个水

乡泽国，要是在人们的谈话中提出“在桥上”这几个字，那毫无例外一定指的是德里纳河上的大桥，而不是指撒夫河上的木桥。因为那座木桥构造既简陋，又没有什么地方可供人们闲谈，除了供人和牲畜通行外，别无其他任何意义。

大桥长约二百五十步，宽十来步，此外，在大桥的中部，沿车道两侧向外建了两座完全对称的平台，所以大桥这一部分的宽度增加了一倍。这两座平台人们叫做加比亚台。中央桥墩由下而上逐渐放宽，并在两边加了支柱，以支撑车道两侧的平台，使之雄伟地凌空屹立在咆哮的河水上空。这两座平台长宽各五尺，外侧围以石头栏杆，但没有加屋顶。从市区走过来，右边的平台叫做“沙发”，它比桥面高出两层台阶，四周有座位，栏杆当作座位的靠背。台阶、座位和栏杆都是用同一种浅色的石块砌成的。桥左面的平台，与“沙发”完全一样，只是没有座位。在桥栏杆的中央，砌了一方比人高的石墙。墙顶上竖了一块白色的大理石石碑，碑上刻了密密麻麻的土耳其文——一篇由十三节诗组成的碑文，上面记载着造桥的人名和年月。墙脚有一个喷泉，从一个石头做的龙嘴里喷出一缕细流。一个卖咖啡的小贩，带着咖啡壶、杯子和他那终年不灭的炭炉，在这座平台上卖咖啡，他的伙计则把咖啡送给坐在对面“沙发”台上的顾客。有关加比亚台的情况就是这些。

下面我们来谈一谈维舍格列城平民的生活是如何在大桥的加比亚台上及大桥的周围进行的。每当他们谈起个人、家庭或公共的事情时，常常提起“在桥上”这几个字。这也难怪，他们早在孩提时代就已经同大桥结下了不解之缘。住在德里纳河左岸的基督教徒的孩子，出世不几天，就有人抱着走过大桥到对岸教堂里去受洗礼。其他儿童，即便是住在右岸，或出生在穆斯林家

庭因而不必受洗礼，也象他们的长辈一样，在大桥附近度过了他们大部分的童年时代，他们或是在桥旁钓鱼，或是在桥洞下面捉鸽子。因此，他们在那时就已经看惯了这座轮廓优美，结构匀称宏伟的浅色多孔桥。他们对那些独具匠心的雕刻和关于大桥建造的故事和传说了如指掌。在这些故事和传说里面，许多出于想象、荒诞不经的情节，同真实的情况巧妙地纠缠在一起，分不清真假。这些东西他们早就不知不觉印入脑海，好象他们随身带来的，这同他们会祷告一样，如果问他们是由谁教会的，第一次听祷告在哪里，就是搜尽枯肠，也想不起来了。

他们说，这座桥是奉穆罕默德巴夏大丞相之命修建的，丞相的故乡就在大桥附近的山后面。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丞相能调动一切必需的人力和物力，把这座万古长存的宏伟大桥建造起来。（在这些儿童的心目中，丞相是一个本领出众，权力极大，但又令人望而生畏，敬而远之的人。）他们还说，大桥的建筑师是拉岱。他一定活了几百年，才终于在波斯尼亚的土地上矗立起这一光彩夺目、永世不朽的建筑物。其实，此人并不存在，这不过是他们根据自己的想象和愿望而编造出来的一位传奇人物。所以把石桥的修建归功于他一人，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费脑筋去听别的说法，也不愿意使自己在思想上去感激许多人。这些小孩还说，正象不管做什么事都会有人出来反对一样，河神对于大桥的修建曾竭力加以阻挠，每到夜间她就把白天造好的部分全部拆除。后来，从河水里发出一种声音，建议建筑师拉岱去寻找一对尚在襁褓之间的孪生兄妹，兄弟叫斯多亚，妹妹叫奥斯多，把他们放在中央桥墩里，这样，河神的破坏便会停止。人们于是立刻在波斯尼亚全境搜寻这两个小孩。谁要是能找到这一对婴儿，并把他们送来，还可以得到奖赏。

后来，警察在一个偏远的村庄找到了一对正在吃奶的孪生婴儿，于是倚仗丞相的权势用武力把他们抱走了。小孩的妈妈不甘心自己的亲生骨肉就此被人夺去，他们被抱走后，她呼天求地，不顾警察的辱骂与殴打，跌跌撞撞地跟在后面，一直来到维舍格列。到维舍格列后，她又不顾艰险，来到建筑师面前，向他哭诉。

据说，两个小孩后来还是被放进了桥墩，因为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但是，据说建筑师对他们起了恻隐之心，特意在桥墩上留了两个小洞，以便不幸的母亲由洞口给两个遭难的小家伙哺乳。这两个洞口虽然只有城堡上的枪眼那么大，但设计很精巧，今天成了野鸽出没的地方。现在唯一可以看到的，是桥墩的墙壁上几百年来一直往下流的乳汁。据说每年到一定的时候，乳白色的细流就从并无裂缝的石块之间接缝的地方渗出来，在石壁上留下一道深深的痕迹。(小孩们一想到妇女的乳水，就觉得那记忆犹新、淡而无味的东西，也如同他们对于丞相和建筑师的看法一样，是一种捉摸不定、神秘莫测，同时又令人心慌意乱、敬而远之的东西。)有人把桥墩上的白道道刮下来制成药粉，卖给产后缺奶的妇女。

在支撑加比亚台的中央桥墩上，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洞，洞口有小门洞，如同城堡上的大枪眼那么大。洞里，据说有一间黑咕隆咚的大房间，里面住着一个阿拉伯黑人。小孩都知道这件事，他们常在夜里梦见他，此外，在他们竞相编造的故事中，也总少不了他。据说，谁要是碰到他，就别想活命。孩子们迄今还没有一个见过他，因为他们一个也没有死。但是，有一天夜里，卡米突然在桥墩旁边死了，他是个苦力、酒鬼，又有气喘病，平常老是喝得醉醺醺的，眼睛里充满血丝。大家都说，他碰到了那个

黑人。事实上，他是冻死的，因为那天晚上，他喝得酩酊大醉之后，居然冒着零下十五度的严寒，跑到桥上去露宿。孩子们常常趴在这个黑魆魆的洞口上往里看，那心情如临深渊一样，既想看个究竟，心里又怕得要命。他们商定，大家都仔细瞧一瞧，看那个黑人到底有没有，谁要是发现什么情况就喊一声。于是，大家便怀着好奇的心情，张着大嘴，目不转睛地往里面看，心里七上八下，象小鹿蹦跳一样。后来，一个胆小的小孩，仿佛觉得里面有个布幔之类的东西在晃动，不禁犹豫起来，打算走开，再不然就是一个促狭鬼（每次都有这种人），不动声色地叫道："黑人来了！"一面装出要逃走的样子，大家这才一哄而散。气氛一乱，那些对于离奇的故事态度认真、讨厌恶作剧的孩子，再想看也看不成了，这使他们大为扫兴，牢骚满腹，因为他们相信只要仔细看是一定可以看到一点名堂，从而得到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一到夜间，他们当中许多人便做起梦来，梦见自己同命运的化身——桥墩里的那个黑人搏斗，后来更叽哩咕噜，手舞足蹈起来，他们的母亲不得不把他们叫醒，让他们醒醒神。有的母亲还给孩子喝杯凉水压一压惊，并叫他们祷告上帝，但他们白天玩得太累，马上又睡着了，因为他们这种年纪正是贪睡的时候，做恶梦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不会再持续下去的。

大桥上游，在两岸灰暗的巉崖上，每隔一定的距离，可以看到两个圆窟窿。据说那是自天而降的神马在岩石上留下的足迹；这些脚印首先出现在河流一边的山坡上，接着又出现在对岸，最后消失在褐色的庄稼地里。

夏天，整日价在河边钓小鱼的孩子们认为，那是很久以前古代出征的战士留下的足迹。他们说，那时候，石头还没有凝固，象泥土一样松软，能征善战的英雄们，个儿都很高大，他们的坐

骑也都是非常大的高头骏马，脚一落下去便留下一个深深的印迹。塞尔维亚的儿童则认为那是克拉里埃维奇·马尔戈[①]的战马沙拉的脚印。被囚禁在天上的马尔戈从那里逃出来后，就是乘着它沿山坡而下，然后一跃而过了德里纳河，因为那时候，河上还没有桥。然而穆斯林儿童认为，那个英雄不可能是克·马尔戈，（因为一个基督教徒、私生子哪有那样大的神通得到一匹神马？）而是吉尔则来·阿利亚，他骑的马。迅疾如飞，轻轻一跳，便可跃过一条大河，根本用不上渡船之类的玩意儿。这些小孩尽管看法不同，但彼此并不争论，因为争也没有用，谁都坚信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何况，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服对方放弃他的观点，也没有一个人改变自己的观点。

在这些宛如大石盆一般的又深又大的圆窟窿里，雨后积水久留不洩。孩子们把这些存满雨水的洞穴叫作水井，他们不分宗教信仰都把钓来的小鱼养在里面。

在河的左岸、稍微突出大道的地方，有一个孤零零的大土堆，土质坚硬而发灰，除了长一种象钢丝一般坚硬的带刺小草外，其他什么也不生长。这是孩子们在桥边游玩喜欢去的地方，也是他们到的最远的地方。有人说这是拉底斯拉夫的坟墓。据说他是一个塞尔维亚人的头领，力大无穷。丞相决定在德里纳河上建桥后曾派人来通知，大家都俯首听命，纷纷前去参加劳役。只有拉底斯拉夫不买账，他认为在德里纳河上造桥是异想天开，因此他拒不服从，同时他还鼓动大家起来抵制，并用强硬的语气要丞相放弃这项工程。丞相费了很大周折才把他干掉，因为他刀枪不入，绳索和铁链也对他一无所用，他不费吹灰之力

---

① 克拉里埃维奇·马尔戈：南斯拉夫塞尔维亚民间传说中的一个英雄。

就能把锁链挣断，可见他力气之大非同常人。要不是丞相的一个诡计多端的侍从用花言巧语从拉底斯拉夫的仆人的口中套出了他主人的弱点，这种局面如何发展就很难说了，说不定，丞相的建桥计划会成为泡影。后来人们乘他熟睡之际，来了个突然袭击，用丝织的绳子把他捆绑起来，然后把他勒死。因为他的护身符一碰到丝织品就不顶用了。妇女们都说，每年秋天，在圣母降生节和升天节之间的一天夜里，可以看见一道很亮的白光从天上直射到这个土堆上。孩子们不论相信与否，常守候在面向拉底斯拉夫坟墓的窗前，想看个究竟，但什么也没看到，因为一到深夜，他们就被睡魔征服了。可是有些夜间从乡下回到城里来的人，却在无意中发现过大桥后面的土堆上确有一道白光。

但是在维舍格列的土耳其人中，很久以来就流传说，一个名叫舍克·都尔加尼亚的穆斯林苦修僧为了捍卫伊斯兰教在这里牺牲了。他是个了不起的英雄，曾经守卫在这里，使得异教徒的军队无法渡过德里纳河。他们说，墓地上没有立一块穆斯林墓碑，那是苦修僧本人的意愿，因为他希望自己安葬的地方，不要留下任何标志，免得被人发现。这样，一旦异教徒的军队再度袭来，他可从土堆里出来，象过去那样拦住他们的去路，不让他们越过维舍格列桥一步。因此，除了天上不时射来的一道白光，这个土堆上什么也没有。

维舍格列的儿童就是这样在大桥下面和周近，在无忧无虑的游戏和天真烂漫的幻想中度过他们的童年。等到他们长大成人，他们生活的活动场就移到大桥上来了，更确切地说，移到加比亚台上来了。在这里，青年人的特性找到新的寄托，开辟了新的天地，但人生的烦恼、斗争和艰苦的劳动也随着从这里开始了。

青年男女之间的互相思慕、眉目传情、情思缠绵和窃窃私语

都是在加比亚台和周遭进行的。他们进入社会后办的第一批事务，做的第一批生意，也是在这里进行的，他们在这儿约会，洽谈生意。当然，争吵与和解是常有的事。小贩在加比亚台的石栏杆上摆着刚上市的樱桃和甜瓜，还有土耳其甜早茶和热气腾腾的上等面包。到这里来的还有乞丐和身有残疾或长着癞疮的人，此外也有身体健康的年轻人，他们到这里来不是闲逛，就是给至亲好友送点水果、衣服、兵器之类的礼物。一些地位显要的成年人也常到这儿来商谈公事或促膝谈心，但更多的是整天嘻嘻哈哈、说说笑笑的年轻人。历史上每当发生重大事件，在风起云涌的岁月当中，这里是张贴告示的地方（就贴在土耳其碑文和喷泉之间的石墙上）。一八七八年以前，因种种原因被处以死刑的人，他们的头颅就悬挂在这里，或插在木桩上示众。在这个边境城市，处死刑在动乱的年代是司空见惯的事，有时候，几乎每天都有。

参加婚礼的行列和出殡的行列，在桥上经过的时候，总要在加比亚台上停留一下。参加婚礼的人常常在这里聚齐，排成队列，到城里去。如果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他们就打开几瓶酒来互相传饮，一面唱起歌，跳起“科罗”舞来，因此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往往比预计的要长。至于送葬的行列从这儿经过时，杠夫们常把死者在加比亚台上停放一会儿，喘一口气，再说死者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在这里度过的。

如果说大桥是维舍格列城最重要的地方，那末加比亚台就是大桥最重要的部分。维舍格列人曾经接待过的一位土耳其旅行家，曾经在他的游记中这样写道：“他们的加比亚台是大桥的中心，而大桥则是维舍格列城的中心，每一个来访者都会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在前面的故事中已经讲过，古代的建筑

师们为了造这座大桥，曾经同河神以及形形色色的妖魔鬼怪进行过斗争，曾经不得不把婴儿活活地放到桥墩里，但加比亚台的设计显示了他们多么高超的聪明才智。他们造桥的时候，不但考虑到坚固、美观，而且考虑到实用、方便，使世世代代都受益不浅。一个外地人在看到维舍格列城的现实生活并加以思考之后，一定会承认，在整个波斯尼亚能够象维舍格列人那样——哪怕是他们当中地位最低微的——领略类似加比亚台的好处的人实在是不多的。

当然，冬季自当别论，因为到了冬季，河面上经常刮风，人们迫不得已才过桥，而在经过的时候，总是低着头在凛冽的寒风中快步前进，当然不会在光秃秃的加比亚台上停留。但在其他季节，加比亚台对大人和小孩都是一种享受。每个人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什么时候都能到加比亚台上去，坐在“沙发”上或在附近找个地方呆下来，谈生意、闲聊天。

这个石头“沙发”高于河面十五米左右，仿佛翱翔于碧绿潺潺的河水上空。从这里极目瞭望，三面是郁郁葱葱的群山，头顶是青天浮云，或是满天星斗；下游，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则可以看到一个不大的盆地环抱在万重青山之中。

试问，世界上有多少显贵和富翁能在这样一块地方赏心悦目，消愁解闷，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很少很少。可是若干世纪以来，在我们这些维舍格列人中，却不知道有多少人世世代代地坐在“沙发”上观看旭日的东升，聆听傍晚祈祷的钟声、或一直羁留到深夜，仰望着满天繁星，久久留恋忘返。许多人曾经坐在这里，双手托着腮，倚在整齐光滑的石块上，面对着万古不变的阳光所照耀的群山和浮云，解决了居民之间的种种纠纷。这些纠纷属同一类型，但每次出现的方式都不相同。很久以前，一个外

国人曾经很有风趣地说过，加比亚台，对于维舍格列城的命运和居民的性格有很大的影响。他认为，许多维舍格列人之所以喜欢沉思，喜欢作不切实际的幻想，就是由于他们没完没了地坐在加比亚台上，他们的性格中的独特之点之所以是那种悠然自得的态度，主要原因也在于此。

当然，必须承认，同其他城市的居民相比，维舍格列人是不太会过日子的，他们追求享乐，大手大脚。维舍格列地势优越，郊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所以每个人挣到的钱应该是很多的，但这些钱从来也不能在他们的腰包里存留多久。你要是在这里发觉一位老板能勤俭持家，经营有方，没有一点嗜好，那这个人一定是从外地迁来的。因为维舍格列的天时地利得天独厚，使得当地居民生来就不愁吃不愁穿，普遍染上了一种无忧无虑、挥霍浪费的恶习，他们的生活格言是："今朝有钱今朝花"。

据说，老诺瓦克因精力不济，不得不歇手不干，放弃他那剪径的营生①，到鲁马尼山中去打发残年，曾给接替他的小哥鲁义扎交待了下面几句话：

"你藏在道旁的时候，要注意观察过往行人。假如过来的人，穿着红背心，带着银徽章，裹着白绑腿，趾高气扬地骑在马上，那准是福恰地方的人。你就冲上去，不要迟疑，因为他身上和钱袋里一定有的是钱。如果过来的人衣着褴褛，低着头，伏在马鞍上，好象去讨饭的样子，你也尽管冲上去，因为那一定是罗加蒂扎地方的人。这些家伙吝啬、狡猾，可身上的银币哗哗响。但是

① 这里指的不是在大道上抢劫钱财的普通盗贼，而是为了逃避土耳其人的暴政遁入山林的人。他们往往对被压迫的同胞给以援助。许多民间诗歌都以斯塔里纳·诺瓦克和小哥鲁义扎为题材，讴歌他们仗义勇为。鲁马尼是萨拉热窝东边的一处多山的地区。

如果来人双腿盘在马鞍上疯疯癫癫地敲着鼓，唱着歌，那你就别管他，放这个无赖过去好了，免得玷污你的双手；因为他一定是维舍格列人，他身上不会有什么钱，钱财在他们家是留不住的。”

这一席话充分说明那个外国人的想法并非不正确，但究竟正确到什么程度，那就很难说了。象其他许多问题一样，在这个问题上也难以断定哪是因哪是果。究竟是加比亚台使维舍格列的居民变成了现在这样的呢，还是加比亚台在他们的心中早已存在，他们不过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习惯把它建成了？这个问题没有多大意义，也扯不清楚。任何一种建筑物都不能离开人类的环境，离开他们的需要，愿望和想法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正如在建筑学上，线条的布置和形状的设计都不是可以乱来的。但每一座壮丽、实用的大型建筑物的建成和存在，及其同所在地居民的关系，往往产生许多错综复杂、古怪离奇的故事。因此，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座大桥和维舍格列城居民的生活有着悠久的密切关系。二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任何场合都不能截然分开。因此关于大桥的建成和变迁的传说，也就是一部维舍格列城及其世世代代的居民生活的历史，这样，每当人们谈到维舍格列时，就必然要联系着十一孔大石桥这一主线，而桥上的加比亚台则是该城的一块不朽的丰碑。

第　二　章

现在让我们回溯到古代，那时候人们根本没有想到在这里造桥，更没有想到造一座现在这样的桥。

在那遥远的年代，当汗流浃背、疲惫不堪的旅客经过这里的时候，他们一定希望能够出现一种奇迹，使他们可以比较方便地渡过这条宽阔的急流，从而顺利地，迅速地到达目的地。因为开天辟地以来，当人们克服了路上的种种困难到达这里的时候，无疑会想到怎样在这里建立一条通道，正如外出远行的人总希望有好走的道路，有可靠的旅伴，和温暖的、适于过夜的客栈一样。不过每个人不一定如愿以偿，而且即使想到了，也不见得都有使它实现的决心和力量。

一五一六年的一天上午，当一个十来岁的小孩从他的家乡苏科罗维契附近的一个村庄，被带往遥远的煊赫一时、威震天下的斯坦布尔经过这里的时候，在他的脑海中闪现过一个关于这座大桥的初步构想，虽然这个构想当时还是模糊不清，但是后来实现了。

那时候，在这条碧绿的、有时也会变得很浑浊的山涧急流的两岸，是大片荒芜的沙石滩。当时维舍格列已经存在，只是位置与规模不同于今天罢了。在河流右岸的险峻山顶上，现在有一片废墟，那里曾经保存着一座古老的城堡。城堡及其周围的建筑群是波斯尼亚王朝全盛时期的产物，由碉楼、地道和城墙组成，是当时最有势力的一位王侯巴夫罗维奇建造的。城堡保护下的两侧，是美以当和比加瓦两个基督教区，和新近土耳其化的一个名叫杜切的村落。在山下面德里纳河和撒夫河之间的平原上，后来出现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城市，当时这里却全是田地，归城堡附近的居民所有。田地中间是一条大道，道旁有一个木板造的老式旅店，此外，还有几座水磨坊和几间茅屋。

在大道被德里纳河阻断的地方，有一条维舍格列著名的渡船。船是黑色的，年代也不少了，船夫动作迟缓，从来没有笑脸，

他名叫亚马克。你要叫他把船摆过来，即使他神智完全清醒，也比叫一个熟睡的人还要难。他体格魁伟，力大惊人，他参加过多次战争，屡建战功。此后，他的体力就大不如前了。他只有一只眼睛、一只耳朵和一条腿（另一条腿是木头做的）。他运送旅客和货物总是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慢慢吞吞，性子执拗。他对客人从不打招呼，老是板着脸，但是态度诚恳，为人可靠，因此他的讲信用和办事公道的声誉，也象他的动作迟缓和性情乖僻一样，广为流传。他同渡河的旅客既不交谈，也不拉关系。人们把付给他的铜币扔在船舱里，这些铜币就这样待在船底的沙子里和水里，到了晚上，他用木杓掏尽船底积水以后，才懒洋洋地把铜板拣出来，带回到岸上的茅屋里去。

渡船只是在河水的流速和水位不超过或略超过正常情况的时候才行驶。遇上浪高水急，或超过一定水位，亚马克就把大而笨重的渡船划过来，牢牢地系在河湾里。这样一来，德里纳河就成了难以逾越的汪洋大海。这时候，亚马克对呼唤摆渡的声音充耳不闻，有时索性到村子里种他的地去了。可是整天都有从波斯尼亚来的旅客，他们周身被雨水淋湿，冻得发抖，怀着一线希望，站在乱石嶙峋的河岸上，等待着船和船夫，一面对着汹涌浑浊的河水不时提高嗓门呼叫："呃——，亚马克！"

只要河水不落下去，你就休想会有人出来答话。这是郁郁寡欢、冷酷无情的亚马克自己决定的，没有商量的余地，也没有任何解释。

那时候的维舍格列，实在说来，不过是一个拥挤不堪的小镇。它坐落在德里纳河岸陡峭的山坡上，古城堡的废墟下面；它的占地面积和城市面貌同建桥后随着交通和商业的发展而引起的变化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

十一月的一天，一长列满载的马帮来到了河左岸，停下来准备过夜。这是土耳其帝国禁卫军的一个长官带领他的武装卫队，在波斯尼亚东部的农村征集到一定数目的基督教徒儿童以后，回到扎里格勒[①]去，这些被征集的基督教徒儿童是所谓“血贡”。

上一次征收“血贡”，距今已经六年了。所以这一次挑选比较顺利，而且有选择的余地，不费什么周折就征集到了足够数量的健康、聪明、五官端正的十至十五岁男孩。不过，仍有许多父母把孩子藏在树林里，叫他们装傻子，装跛脚，给他们穿破烂的衣服，把他们弄得蓬头垢面，有些父母甚至把亲生的孩子弄成残废，比如割去他们手上的一个指头，生怕土耳其长官看中。

人们用一长列波斯尼亚产的身量小的马匹组成的马队把选中的孩子送走。每一匹马驮着两只编筐，一边一只，象装运水果一样，每一只筐里装一个小孩、一个小包袱和一块圆糕饼，这是他们的父母给他们的最后一点温暖。筐子摇摇晃晃，发出有节奏的声响。这些用武力带走的孩子，为了透透气探出脑袋，露出红润的、惊恐不安的面庞。他们当中，有些沉着地由马背上面向远处眺望，想看看那远远落在后面的故乡，有些边吃边哭，有些则把头倚在马鞍上打瞌睡。

马队后面，相隔一定的距离，跟着一大帮人。他们是孩子们的父母或其他亲属，他们三三两两，上气不接下气地尾随在后面。因为这些一去不复返的儿童，到异乡以后，就要给他们行割礼，皈依伊斯兰教。他们将会忘记自己的宗教信仰、自己的故乡和家庭，终身在奥斯曼帝国的禁卫军服役，或许在更重要的机构任职。跟在马队后面的人多半是妇女，是被带走的孩子的母亲、祖母或姊妹。她们走近时，土耳其长官的卫队便用皮鞭把她们

① 扎里格勒，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塞尔维亚名称，后来亦简称为斯坦布尔。

赶走，一面狂叫着纵马向她们直闯过来。她们于是四向奔跑，躲藏到道旁的树林里，但过不多久，她们又在马队后面聚拢起来，极力想用那热泪盈眶的两眼，再看一看露在筐子外面被夺走的亲生骨肉的面孔。她们痛不欲生，象送殡一样嚎啕痛哭。她们袒露着胸脯，披散着头发，深一脚浅一脚，不顾一切地跟在后面奔跑。有的母亲几乎神经失常，象临盆时腹痛欲裂一样，呻吟不绝，高声喊叫。由于泪水模糊了视线，她们追赶着，撞在皮鞭底下。她们每挨一下皮鞭，都总要不加思索地问道："你们要把他带到哪里去？"有些母亲还口口声声地呼唤着自己的儿子，想用最简短的话语，再叮嘱他们几句，叫他们路上保重。

"拉岱，我的儿子，不要忘了你的母亲！"

"伊利亚！伊利亚！伊利亚！"另一个妇女拼命用眼睛寻找那亲爱的，熟悉的面孔，不停地这样叫着，好象要把这基督教的名字深深印入孩子的脑海中，因为几天以后这个名字就永远不再归他所有了。

但是路途漫长，坑坑洼洼，她们的体力是有限的，而且土耳其人又是那样凶悍无情。她们渐渐地停了下来。由于途中的劳累，皮鞭的抽打，一个个不得不放弃这种无谓的努力。即使最坚强的妇女到了维舍格列渡口，也不得不打消继续前进的念头，因为人们不容许她们登上渡船，又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过河。现在她们可以坐在河岸上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因为谁也不会再来驱逐她们了。她们木然地呆在这里，忘了饥渴和寒冷，想再看一看渐渐消失在对岸都布龙方向的马队，再一次在脑海中浮现一下渐渐从眼前消失的亲爱的孩子的身影。

十一月的这一天，在这些筐子里，有一个长着棕色头发，年纪不过十来岁，从苏科罗维契山里来的儿童。他默默无声地左

顾右盼，眼睛里没有一滴泪水。他那冻得发红肿的小手里拿着一把弯弯的小刀。他一面漫不经心地用小刀在筐子边上刻划着，一面环顾四周。他一定不会忘记那乱石遍地的河岸，岸上有几株枝叶扶疏的柳树，柳叶已经脱落；呈现出凄凉的冬天的景象；他更不会忘记那位魁伟的船夫和摇摇欲坠、四面透风、到处布满蜘网的水磨坊——孩子们曾经在这里过夜，第二天渡过浑浊的德里纳河。他们过河的时候，几只乌鸦呱呱地叫着，在河水上空盘旋。他感到身上有点不适，仿佛有一长条剧烈的创伤，时时要把他的胸膛撕裂，这使他非常痛苦。大路到这里被切断了，乱石嶙峋的两岸，满目荒凉，毫无生机。渡河是这样地艰难，代价高昂又不可靠。这一切定会同他身体上的病痛联系在一起，永远留在他的记忆中。在这个多山之乡，贫穷的景象触目皆是，令人不胜悲伤，百感交集。在这里，人们在强大的自然界面前束手无策，谁要是对这种无能为力感到羞耻，就不仅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痛苦和落后，而且还可以看到别人的痛苦和落后。

这个小孩在十一月的这一天所经历的一切，使他身上得了一种病，这种病后来一直没有痊愈，甚至在他改变了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改变了姓名和国籍以后，也一直在折磨着他。

装在筐里的这个小孩后来的情况，世界各国出版的历史书籍上作了很多介绍，在这广阔的世界上，人们对于他的了解比我们了解的还要多。若干年以后，他成了苏丹宫廷中的一个果敢有为的青年军官，后擢升为海军大将，当上了驸马，成为世界闻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的名字早已改为穆罕默德巴夏·苏格利[1]。他指挥了在三大洲进行的多次战争，这些战争大多取得了胜利。他拓展了土耳其帝国的疆界，对外保证了国家的安全，对

---

[1] 土耳其著名的政治家及军事家。

内治理有方。他在六十几年中，侍奉过三个苏丹，他所经历过的各种顺境和逆境，只有少数出类拔萃的人才有可能经历过。他的权力和势力大得难以想象，很少有人能够同他媲美，也很少有人能够在这种地位上呆那样久。这个人到了异乡之后起了哪些变化，我们无从揣度。他从故乡被人带出来的时候所留下的一切，他大概都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维舍格列的德里纳河渡口，荒凉的两岸，许多冻得发抖、来回徘徊的旅客，破旧不堪、划得很慢的渡船，体格魁伟的船夫及浑浊河水上空啼饥号寒的昏鸦，——这一切他无疑也早就没有什么印象了。不过，上述这一切在他身上造成的不适之感，却始终没有完全消失。相反，等他到了古稀之年，这种病痛——仿佛有一长条剧烈的创伤要把他的胸膛撕裂——的发作却越来越频繁了。他小时候得的这种奇怪的疾病和他后来生过的其他疾病迥然不同。每当这种病发作，丞相往往闭上眼睛等待它过去。就在这时候，他想到了根除这个痼疾的唯一办法：消灭那遥远的德里纳河上的渡口，因为那里的贫穷和种种不便越来越严重，而在这条险恶的河流上架一座桥，沟通险峻的两岸，使被切断的大道成为通衢，从而把波斯尼亚和东方，他的出生地和他后来生活的地方，永远牢固地连接在一起。因此，在他闭目忍受病痛的一刹那，他第一个在脑海中出现了将要在这里建造的雄伟壮丽的大石桥的轮廓。

根据丞相的命令，并且由他出资，德里纳河上的建桥工程就在这一年开始了。工程进行了五年。对于维舍格列乃至整个地区说来，这五年，一定是一个意义重大、非常活跃的改天换地的时期。可是，奇怪的是，在维舍格列，几百年来，人们一直在回忆和流传着各种各样的事迹（包括与大桥间接有关的），但工程进行的详细情况流传下来的却不多。

老百姓所记得的和谈论的，只是一些他们能够懂得，可以改编为传说的东西。其他的一切，由于种种无法弄清楚的、很自然的原因而无声无息地流逝了，没有在他们的记忆中留下什么痕迹，更不能引起他们的联想。在他们看来，这项工期很长的艰巨工程，是别人的事。只是当大桥经过艰苦的努力竣工以后，人们才开始回忆起详细经过，才开始用许多传闻的故事来对这座桥的诞生过程进行一番添枝加叶的描述，这些传闻故事是他们自己很巧妙地编造出来的，并且长久地留在他们的记忆中。

第 三 章

就在丞相作出决定的那年春天，他所派遣的官员及其随从来到了维舍格列，为筹建这座大桥，做一切必要的准备。他们人数很多，并且带着马匹、车辆、工具和帐篷。他们的出现，在这个小城及其附近的农村，尤其是在基督教徒当中，引起了恐惧和不安。

这支建桥队伍的人马是由丞相的心腹阿比达加领导的。关于这位阿比达加，在他来到之前，就已经纷纷传说，他是一个不顾别人死活、心毒手狠、非常厉害的家伙。他的副手是一位建筑师——多总埃芬蒂[①]。他们在美以当山下的帐篷里安顿好了以后，阿比达加就把当地的行政首脑和全体穆斯林绅士召来开会。会上没有讨论什么，因为只有阿比达加一个人讲话。出现在与会者面前的是一个身体结实、面孔红得不正常，眼睛发绿的人。他

① 埃芬蒂是奥斯曼帝国时代对文官、宗教职司和学者的尊称。

穿了一套扎里格勒流行的豪华外衣，蓄一撮赭红色的短须，嘴角上两撇修剪成匈牙利式的，又尖又细。性格暴烈的阿比达加对与会者发表的讲话比他的外表更使人惊讶不已。他说："毫无疑问，在我来到之前，你们已经听到关于我的种种流言蜚语。不用打听我也知道，那不可能是恭维话。你们大概已经听说，我要求人人都认真工作，绝对服从，工作吊儿郎当，讨价还价的人，我不是打，就是杀。我不知道什么叫'不能'或者是'没有'。在我这里由于一句不相干的话，就会叫他把命送掉。总之，说我是一个杀人不见血的恶棍。我现在要告诉诸位，这些话不是无中生有，也不是言过其实。我身上确实没有什么好处可言。我干了多少年，唯丞相之命是从，才获得这样一个美名。我是奉命为修建这项工程而来的，我信仰真主，我也希望这项工程能够完成。一俟工程竣工，我就离开此地。我希望在我走之前，会有比你们已经听到的更令人毛骨悚然的话，从这里传播出去。"

大家低着头，默默地听他作了一篇令人目瞪口呆的开场白。此后，他说这项工程规模很大，连最富庶的地区也没有搞过。工程要进行五年，也可能六年。这是丞相的意思，必须不折不扣地如期完成。随后他向人们介绍了哪些工作是当务之急，必须立即做起来。他还对当地的土耳其人和基督教徒提出了要求。

坐在阿比达加身旁的是多总埃芬蒂，一个身材矮小，面色焦黄，出生在希腊群岛的伊斯兰教徒。他是一个建筑大师，曾经在扎里格勒为穆罕默德巴夏建造了许多慈善设施。他泰然自若，无动于衷，好象根本没有听见或者没有听懂阿比达加的讲话。他眼睛老是望着自己的手，间或抬起眼皮来，露出一双乌黑明亮的大眼，一双美丽的近视眼。他眼里只有自己那份工作，至于人生和世上的其他一切，他不闻不问，也一窍不通。

参加会议的人从矮小闷热的帐篷里走出来的时候，都感到腰酸背痛，神色不安。汗珠在他们的节日盛装里面一滴一滴地往下流，他们个个心惊肉跳，忧心忡忡。

一场无法理解的大祸，一场看不到头的灾难就这样降临到维舍格列城和整个地区。首先是砍伐森林，运输木材。德里纳河两岸的木材堆积如山，令人们长久以来一直以为要建造一座木桥。随后是土方工程，挖掘桥基和在岩石上钻孔。这些工作大部分是依靠劳役来进行的。这样一直继续到秋末，随后工程暂时中止，第一期工程就此告一段落。

工地上的一切事情都是在阿比达加的监督下和他的绿色长棒的威逼下进行的。有人曾以这条长棒为题编了一首民歌。阿比达加如果发现有人工作拖拖拉拉，马马虎虎，他就用长棒向他一指，监工立即便向那人扑上去，拳打脚踢，把他打得遍体鳞伤，昏迷不省，然后用凉水把他浇醒，打发他再去干活。到了秋末，阿比达加就要离开维舍格列了，他又把该城的首脑人物和社会贤达召集到一起，告诉他们他冬天要到别处去，但是他的心耳神意还留在这里。在场的人要对他负全部责任。假使工程受到损坏，或者工地丢了东西，不论情况是否严重，他将惟全城是问。有人提出水灾也会造成损坏，他毫不犹豫地、冷冰冰地回答说：这是他们的地方，他们的河流，因此，水灾造成的损害也就是他们造成的。

整个冬季，人们象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守护着工地。春回大地的时候，阿比达加又带着他的助手多总来了。同时，有人称为“罗马技工”的达尔马蒂的石匠也来了。他们起初有三十来人，由一个叫作安端的乌尔清城的基督徒率领。安端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美男子，两只大眼炯炯有神，鹰钩鼻子，棕色的头发

披到肩上，穿着很讲究的西式服装。他的助手是一个道地的黑人，一个成天乐呵呵的青年，城里的居民和工人就叫他"黑人"。

去年运了那么多木料，人们曾经以为阿比达加要建造一座木桥，现在大家则认为他要在德里纳河上建一座新的君士坦丁堡。人们开始从距离维舍格列约有一小时路程的巴尼亚采石场把已经初步加工的石料运来。

第二年，维舍格列渡口迎来了不平凡的春天。每年到这个季节，照例是万类复苏，百花盛开，然而今年，除此之外，地面上有如雨后春笋一般又冒出来许多工棚。新修的道路和取水小径也应运而生。无数辆牛车和马车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从美以当和奥克里德可以看到，在山下河道附近，每天都有新来的忙忙碌碌的人群、牲畜以及大量建筑材料。

石工在两岸的巉崖上打石，掀起的尘土把附近地区染成了黄色世界。在稍远一点的沙质平原上，当地民工有的在用水浇石灰，有的则穿着满身白灰的破旧衣服，在石灰窑冒出来的白色烟雾中穿来穿去。超载的车辆把道路压得坎坷不平。渡船整天忙着在两岸之间运送木料、工人和监工。工人们在齐腰深的灰白河水里打桩，有些人则把黄土装进筐里，这些土筐将用来构筑堤坝，让河水改道。

世世代代在德里纳河渡口附近的山坡上过着恬静生活的居民在一旁观望。但是，他们这种日子是维持不了多久的，因为工程的规模越来越大，进度越来越快，不久便把维舍格列城及其附近的居民、牲口和物资都卷进了旋涡。开工第二年，工人的人数已经增加到同全城男公民的总数相等。牛车马车全被征用。总之，凡能动用的都被征用，有的给钱，有的强制服劳役。居民的收入确比以前增多，但物资缺乏造成的物价上涨，超过了人们收

人的增加，落到工人手里的钱往往仅值原来的一半。不过对他们来说，更沉重的负担还是由于各地来的工人大量增加而造成的担心受怕，以及社会秩序的混乱与不安全。阿比达加虽然规定了严格的纪律，但工人之间的斗殴和田宅的失窃仍然不断发生。穆斯林妇女即使到院子里去，也得带上面纱，因为随时都可能发现外来的或者本地的工人投来的目光。维舍格列的穆斯林都是新近加入伊斯兰教的，他们的父亲或祖父不久前还是基督教徒，因此对伊斯兰教教规遵守特别严格。由于这些原因，那些信奉土耳其礼教的老人公开地表示不满。他们对渡口两岸日益增多的乱纷纷的人群、牲口以及杂乱无章的木料、土堆和石块，感到非常厌烦，——因为这些工人、牲口和各种建筑材料损害了他们的田宅和道路。

起初，大家为本地出生的丞相能建造这种大型慈善设施感到自豪。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竟是现在这种样子，修建这个名垂青史的工程竟会造成这样大的混乱和不安，耗费这样多的人力物力。他们曾经认为，能加入正统宗教，能有一个同乡在斯坦布尔做丞相，能看到一座坚固、美观的大桥飞架德里纳河，确是一件称心如意的事，但是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全不是那么回事。他们的城市成了一座地狱，人们象着了魔一样跑来跑去，忙于各种莫名其妙的事情，闹得乌烟瘴气，尘土飞扬，喧闹不休。又随着光阴的流逝，工程确是一天一个样子，但是至今仍然没有眉目，更看不出何年何月才能竣工。眼前的情况说象什么都可以，就不象在建一座桥。

新加入伊斯兰教的人私下都这样想，他们承认，为了追求地位和荣华富贵，他们所受的牵累实在太大了。他们看不出丞相造的这座桥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一心祈求真主把他们从这场

灾难中解救出来，使他们在旧渡口附近继续过那种恬静、简朴的生活。

不但穆斯林这样想，全维舍格列城的基督徒都这样想，所不同的是，谁也不来听听他们的意见，况且他们是不能表示不满的。他们不取任何报酬，带了自己的牲口在这儿累死累活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除了他们以外，附近三个管区的基督徒也遭到同样的命运。阿比达加的巡逻队在城市和乡村到处拉夫，把他们带到工地上做工。巡逻队常趁他们熟睡的时候象抓小鸡一样把他们抓走。在整个波斯尼亚，旅行的人都不敢到德里纳河去，因为谁要是一不小心到了那里，巡逻队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捉住，强迫他至少做几天工。城里的基督教徒往往破费几个钱，使自己豁免。年轻的乡下人往往躲进树林，但巡逻队立刻到他们家里，抓人质顶替，这些人质常常是妇女。他们服劳役已经是第三个秋天了，然而工程迄无进展，这场灾难何日了结，仍然遥遥无期。转瞬之间，树叶已经脱落，道路泡在雨水中。德里纳河水位高涨，河水浑浊。成群结伙的乌鸦懒洋洋地在杂草丛生的荒野上空盘旋。可是阿比达加仍然不让停工。十一月的阳光微弱无力，乡民们推着车，运送木料和石块，他们有的赤着脚，有的穿着血迹斑斑的生皮制作的鞋，在泥泞中一跐一滑地前进。他们累得满头大汗，但寒风袭来，又冻得直打哆嗦。他们身上只穿了一条补了又补、却仍然千疮百孔、脏得要命的黑短裤。他们仅有的一件粗麻布衬衫，已被雨水、污泥和煤烟糟蹋得不成样子，但他们不敢去洗，怕一下水便成为碎片，所以只好撕成布条系在腰间。这些人时时深受阿比达加的绿棒的威胁。阿比达加每天都要到巴尼亚采石场和造桥工地走几趟。他对大家大发雷霆，因为剩余的时间越来越少，但工程进展不能象他预料的那样快。

他身上披了一件俄罗斯高级皮斗篷，脚上穿一双高筒皮靴，满脸横肉，在已经露出水面的脚手架上爬上爬下，在炼铁坊和工棚里进进出出。无论走到哪里，他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所有的人呵叱一顿，连监工和包工头也不幸免。

"天越来越短了。你们这些狗娘养的，我的面包喂狗啦。"

他咆哮如雷，好象天亮得晚，黑得早也是他们的罪过。日落之前，黄昏无情地在维舍格列长驱直入，四面群山的阴影向它笼罩而来，沉重的夜幕迅速而悄静地张开，世界好象已经到了末日。这时候，阿比达加的怒气冲冲，无法遏止，由于无处发泄，只好独自唉声叹气。他一想到有那样多的工作无法进行，那样多的人窝工，就辗转反侧，不能入寐。他恨得咬牙切齿，于是把监工叫来，同他们商量，从明天起怎样才能更好地利用白天的时间，发挥工人的效率。

这时，工人都在工棚和马厩里睡觉，以解一天的疲劳。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睡了，有些人还在弄弄这弄弄那，干着自己的事情。在一个宽敞干燥的马厩中央放了一个火炉，火已经燃烧完了，发暗的炉膛里只剩下一些余烬还在燃烧。空气中烟雾腾腾，夹杂着潮湿衣服透出来的刺鼻的汗酸气和三十多人身上发出来的气味。他们都是服劳役的回乡的平民、穷人、基督教徒和农奴。他们蓬头垢面，周身湿透，个个筋疲力尽，心事重重。这种毫无报酬、遥遥无期的劳役把他们的身体整个拖垮了，可是村子里的地还在等着他们去耕耘。他们有的人在炉旁烤裹脚布，有的在系鞋带，有的则向着炭火发楞。其中有个门的内哥罗人，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他是在路上被巡逻队抓来的，参加劳役已经好几天了。他不厌其烦地逢人便说，不应当把他们抓来干这种艰苦低贱的劳动，这有损于他的身份。

未睡觉的农民，主要是青年人，这时候都聚集在他的周围。他从羊皮背心的口袋里慢慢取出了一只单弦琴和一张短弓。单弦琴小得可怜，只有手掌大。一个乡民马上到马厩外面去守望，因为怕有土耳其人闯进来。大家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和他手上的单弦琴，好象不认识他。他把单弦琴竖在膝盖上，低下头来用下颏顶住琴杆，在弦上涂了点松香，然后对弓子吹了两下。弓子和弦因受潮而发软了。他旁若无人，神情安详、认真地做这些小事，大家在一旁观望他。琴声终于响起来了，时而高亢时而低沉。大家都兴奋起来。接着这个门的内哥罗人用鼻子哼着，试了试嗓音，然后调了调琴弦。一切都很好，预期下面的演唱一定很动人。果然不一会儿，他把嗓音和琴声大致调准以后，忽然猛地一下胸有成竹地仰起头来，露出他那细瘦脖颈上的喉结，火光里映现出他那瘦削的身影。他先发出一种闷长的声音："啊鞆啊啊啊——鞆鞆啊啊！"随即用一种响亮清脆的声音唱道：

塞尔维亚国王斯特凡，
在富饶的普里兹伦饮酒，
在一旁侍奉的有高龄长老，
这些年高的长老四个人，
还有九个主教
二十个高级将领，
以及按照等级排列的公子王孙。
侍酒官米爱罗斟酒，
他的妹妹康多姬，
胸上的宝石闪闪发光，
照耀着厅堂……

乡民越来越紧地围拢来，他们屏声静气，鸦雀无声。大家心旷神怡，眨巴着眼睛，仿佛有一种蚂蚁在爬的异样感觉，透过脊梁，于是直腰挺胸，眼睛里闪着光，十个指头伸开，随后又使劲紧握，上下牙紧闭。歌声由弱而强，由慢而快，表情也随着逐渐豪放，越唱越丰富，越唱越动人。那些服劳役的听众睡意全消，完全沉浸于音乐的享乐中，仿佛从悠扬的歌声中发现了自己光明的美好的未来。

在这些服劳役的乡民中，有一个人名叫拉底斯拉夫，他是维舍格列一个小村庄乌尼士得的人。他脸膛棕色，身材矮小，双目炯炯，后背有些驼，走起路来两腿劈开，头和肩左右频频摇摆，因而走得很快。他外表很穷，而且显出天真无邪的样子，其实不然。他姓柯拉克，家里有良田，人口很多。但是近四十年来，村子里的人几乎全都改奉了伊斯兰教，这使他受到很大的压力，感到很孤单。这个拉底斯拉夫虽然个儿矮小，沉默寡言，而且有点神经质，但他却在鼓动反抗，人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乡民中间，同他们单个地低声交谈。他讲的话大体是这样的："弟兄们，过这种日子我们受够了，我们应当起来自卫。谁都看得出来，这个工程会把我们的命断送，每一个人都不能幸免。就算我们当中有人能够活下来，孩子们也免不了要到这里来服劳役，受死罪。人们这样对待我们，完全是为着把我们搞死。我们这些穷光蛋、基督教徒要桥有什么用？土耳其人才需要桥呢！我们既不调动军队，又不做生意，有条渡船也就够用了。所以我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趁着黑夜，去把已经造好的部分尽量捣毁，然后放出谣言，说那是河神毁掉的，因为她不同意在德里纳河上造桥。当然，这样做对我们是不是有用，还要看下一步。不过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总得行动起来。"

有些人胆小怕事——这种人历来都有，他们认为这样做不会有成功的希望，理由是，土耳其人既强大又狡猾，是不会改变主意的。所以他们想，还是忍气吞声着干下去为好，不要把事情搞得更糟。可是，也有些人想，与其忍受残酷的虐待，眼看着由于艰辛的劳动，他们的衣服磨得破烂不堪，他们的体力因阿比达加的虐待而消耗殆尽，还不如孤注一掷，谁能够领导大家找到一条生路就跟他走。他们大多是青年人，但也有些已经成家当了父亲，处事比较谨慎，他们虽然同意干，但态度不是很积极，言语之间流露出忧虑的样子，他们说："好吧，那就让我们去毁掉这个工程，用我们的鲜血去把它淹没，免得它先把我们吞噬掉。但如果这样做无济于事……"

他们摇着手，对这项孤注一掷的决定，表示把握不大。

这样，秋天一开始，便在工人中间，随后在城里，传开了这样一个流言，说河神来干预造桥的事了，她在夜里把白天造好的部分拆掉，所以这座桥是造不成的。同时，在堤坝附近，甚至在石砌桥墩上，果然发现了原因不明的破坏。大桥两端的桥墩刚开始建造，泥瓦匠的工具就放在上面，现在这些工具也不翼而飞或是短缺，土方工程也发生裂缝被水冲走了。

谣言流传很广，穆斯林和基督教徒都在传播，相信的人越来越多。基督教徒拍手称快，不过他们只能悄悄地窃窃私语。当地的穆斯林曾为丞相的这项工程感到自豪，现在他们也开始另眼相看，流露出大失所望的神色。他们当中许多人，在改变了信仰，加入伊斯兰教后心灰意懒，依然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现在听到工程失败的消息都欣喜若狂，奔走相告。他们为那些大官没有实现如意算盘而感到称心。同时，已经在传说外地来的技工正在整理行装，准备离开了，因为从来没有过桥梁的地

方，是造不起桥来的，本来就不应兴师动众，耗费财力。这些纷纷传说的流言互相交织在一起，在当地居民中不胫而走。

不久，一些谣传故事便应运而生，故事传播很快。耐人寻味的是，这些谣传故事总是同现实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情况是这样的：夜里听单弦琴演奏的乡民中流传说：河神已经告诉阿比达加，如果把一对名叫斯多亚和奥斯多的孪生兄妹放在桥墩里，她就停止破坏。许多人并且声称，亲眼看到巡逻队在各村搜寻这两个小孩。（土耳其巡逻队的确在到处转游，不过并不是搜寻两个小家伙，而是奉阿比达加之命向居民打听谁是大桥工程的破坏人。）

恰巧这当儿，在维舍格列山上的一个村庄，有个说话口吃、傻呼呼的大姑娘怀了孕。她孤苦伶仃，在一个外地人家里当佣工。她不愿意说出来是跟谁怀孕的，或许她自己确实也不知道。一个未婚少女，尤其是这样一个呆头呆脑的傻丫头，居然会怀孕，而且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这倒是一件空前未有的新鲜事。消息很快传开。就在那几天，她在羊圈里生了一对双胞胎，婴儿一出世就死了。她是难产，邻里都赶来帮忙，把死婴埋在一个李树园里。没有福气当母亲的可怜女子第三天就下了床，她在村里到处寻找自己的孩子。大家告诉她孩子生出来就死了，而且已经掩埋，然而她不肯相信。为了避免她纠缠不休，人们索性用手比划着告诉她，孩子已被带到城里土耳其人造桥的地方去了。

这样，她身体虽然没有复原，精神也很沮丧，但仍然摇摇晃晃地来到城里，在工地上，脚手架旁转来转去，胆怯地盯着人看，嘴里叽哩咕噜说些谁也听不懂的话，意思是问她的孩子在哪里。被问的人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有时干脆把她撵走，免得妨碍工

作。她看到他们不明白她的意思，便解开她身上那件乡下人穿的粗布上衣，给他们看胀得发痛的两只奶，因为乳汁不停地涌流，奶头已经胀裂流血。谁也不知道怎样帮助她，使她明白她的孩子并没有放在桥墩里，因为尽管对她如何好言规劝，发誓担保，甚至于谩骂，恐吓，她总是呜呜咽咽地说个没完，同时用怀疑的、炯炯的目光到处搜寻。人们渐渐对她产生了同情，不再赶她，让她在工地上转，不过总是躲着她走，免得她纠缠不清。厨司常常给她一些从锅底刮下来的烧糊的玉米粥。他们叫她疯婆伊琳卡，这个绰号很快就被全城采纳。阿比达加从她身旁走过时，也不说她什么，只是露出一副嫌恶的样子扭过头去，让手下的人给她几个小钱。这样，这个疯得不太厉害的妇女便在大桥工地附近呆下来了。由于她的缘故，土耳其人曾经把两个小孩放入桥墩的传说，才流传下来。这个传说尽管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但是都在那里传播。

破坏大桥工程的事故继续发生，破坏的程度时大时小，同时，关于河神不让在德里纳河上建桥的谣传也越来越甚嚣尘上。

阿比达加怒不可遏。他傲慢不逊，以致待人严苛，现在居然有人把他的出名的威严不放在眼里而同他作对，这使他很恼火。他对这里的人，不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教徒，从内心感到厌恶，觉得他们干活疲疲塌塌，笨手笨脚，但耍起贫嘴来或者遇上什么有伤风化的事就来劲了，而且，若是碰到一窍不通的事，他们有本事说一些尖酸刻薄的话来替自己遮掩。

阿比达加在河两岸布置了岗哨。地面上的破坏因而停止，但只要不是月明之夜，水面上的破坏仍不断发生。阿比达加本来就不相信什么河神之说，他认为破坏大桥工程决不可能是没有根据的，不会从天而降。现在他对自己的看法更加坚信不移。有人

曾经认为这是乡民搞的鬼，他一直不愿相信，也不敢相信。现在他越来越觉得就是这么回事了。一股怒火蓦地涌上心头。但他马上想到必须冷静，必须有所克制，否则难以破案，难以尽快、彻底地消弭关于河神破坏和工程要下马的流言，因为这些流言如不马上制止，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于是把巡逻队长找来，此人面色惨白，弱不禁风。他是布勒夫列城人，青年时代是在君士坦丁堡度过的。

他们两人天性水火不相容，互相顶撞的事，层出不穷。不知为什么，他们常常流露出仇视，憎恶，惧怕和不信任的情绪。生性粗暴的阿比达加，对这个面如死灰、背叛基督教而加入伊斯兰教的人，从不掩饰自己的蔑视。他的一举一动没有一处不激怒阿比达加而对他加以训斥。他越是低声下气，阿比达加对他的厌恶就越是强烈。巡逻队长一开始就非常惧怕阿比达加。久而久之，这种恐惧心就变成了一场没完没了的恶梦，以致闹到走一步路，抬一下手，他都要想一想阿比达加对此会说什么，甚至在梦中也常常如此。他曾想尽一切办法低三下四地奉承阿比达加，想取得他的欢心，但是毫无结果，只要是他的事，阿比达加一概加以呵斥。因此，阿比达加对他的无缘无故的仇恨使他无所适从，反应也越来越迟钝，越来越笨拙。他认为总有一天会因为阿比达加的盛怒而丢掉饭碗、地位，以至脑袋。因此，他整天惶惶不安，同时，这种心境也激励他一反常态，自己本来萎靡不振，就劲头十足地大干起来。现在他面色苍白，直挺挺地站在阿比达加面前。阿比达加盛怒之下，嗓子有点嘎哑，对他说："听着，废物，你熟悉这帮畜生，你懂得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为人，可是你竟没有一点办法查出那些破坏丞相交办的工程的坏人。弄成这个样子，就是因为你同他们是一丘之貉，不过他们比你更坏。

你却得到了巡逻队长和监工头的美差，而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既然没有惩罚你，那末我会惩罚你。告诉你，我要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使你在阳光下不留一点影子，连根小草那么点影子也不会留下。三天以内，如果对工程的破坏活动不停止，如果你没有抓住肇事者，把关于河神和工程失败的种种荒唐流言制止，我就要把你活活处以桩刑，钉在脚手架的顶端，让大家都能看见你，感到害怕，而恢复理智。我用生命和真主的名义发誓，我一定要这样做，你总该知道，用生命和真主的名义发誓绝不是说着玩的。今天是星期四，到星期天以前的时间是你的。现在你给我滚吧，滚！滚！"

阿比达加即使不发誓，巡逻队长也不会把他的话当耳旁风，他在睡梦中都仿佛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的目光而吓得魂不附体。他从阿比达加那儿出来的时候，还心有余悸，惶恐万状，但是马上就鼓起劲儿行动起来，他要从绝路求生。他把手下的人全都召集来，刚才的惊恐不安，一变而为怒气冲冲地训斥他们。"你们这些瞎了眼的懒鬼！"他劈面对他们声嘶力竭地叫着，好象他已经被活活处以桩刑了，"你们就是这样守护皇家的财产吗？一到开饭时间，你们的动作是那样敏捷，跑得比谁都快，可是叫你们去执行任务，你们就磨磨蹭蹭，晕头转向。我替你们害臊。不用再同你们罗嗦了，懒鬼！告诉你们，我要把你们通通绞死在脚手架上。两天之内如果对大桥工程的破坏不停止，如果你们不抓住，不打死那些强盗，就甭想保住脑袋。我当着真主和《可兰经》向你们发誓，你们还有两天活头！"

他这样吼叫了很久。后来，他再也想不出更合适的话来吓唬他们，便朝着他们每个人的脸上唾了一口。这一通发作完了，他内心的恐惧也烟消云散了（因为恐惧已被盛怒取代），他立刻

拚命地干起来，带着他的人马彻夜在河岸巡逻。

有一次，他们仿佛听见在离岸最远的脚手架上有响声，便立即赶到那里。随后他们听到木板破裂和石块落水的声音。等到达出事地点后，他们发现脚手架折断了，桥墩也被捣毁了，但罪犯已无影无踪，没有留下一点痕迹。面对这种咄咄怪事，又加上夜深天寒，他们不禁感到心惊胆战，毛骨悚然。他们互相叫着名字，瞪大眼睛在黑暗中张望，摇晃着火把好壮胆，但都无济于事。新的破坏又出现了，破坏者依旧逃之夭夭，好象他们真的是来去无踪的神灵。

第二夜，巡逻队长考虑得更加周到。他在对岸也派了几个人。天黑以后，他在每一个脚手架上都埋伏了人，自己则带了另外两个人下到一条小船里，趁着黑夜悄悄地划到左岸。他们从那里只要划几下桨就可以到达两个桥墩中的一个。这样，他们就可以万无一失地对搞破坏的人两面夹攻，除非他能飞上天去或潜入水中，否则他将难以逃脱。

队长是躺在小船里度过这两个漫长的寒夜。他身上盖着一张羊皮，心中被种种烦恼折磨着，不断地出现这样一个问题：阿比达加会不会真的说到做到，把他的小命一笔勾销？他觉得，在这样的人手下工作，整天惶惶不安，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整个工地万籁俱寂，只有看不见的河水发出单调的奔流声。东方开始发白，队长冻得浑身冰冷，毫无知觉，他感到生命的火花正在他身上黯淡下去，很快就要熄灭似的。

到了第三夜，也就是最后一夜，一切照旧，人员的布置没有变化，他们依然提心吊胆地监视着。午夜之后，队长渐渐打不起精神来了。这时候传来了一种轻微的响声，接着是什么东西撞在河里的橡木桩上——上面搭了脚手架——的闷浊的声音，那

边立即响起了尖锐的哨音。队长的小船 开动了。他站在 船上，瞪大眼睛在黑暗中搜索，挥动双手，粗声粗气地叫道："快划，使劲儿划！"

那两个睡眼惺忪的巡逻队士兵拚命地划着桨，但是不早不晚船正遇上了一股急流，不但到不了脚手架，反而被冲下去了。如果不是偶然被一件什么东西挡住，就无法从急流中脱险，而且会被冲得远远的。

刚才是在旋涡中——那里既没有木桩，也没有脚手架，他们的船撞着了一大块木头似的东西，发出了闷浊的响声。就是这个东西把他们挡住了。他们这才发现脚手架上的巡逻队士兵正在同一个人搏斗。他们都是当地的伊斯兰教徒，在脚手架上齐声吆喝着。叫喊声此起彼落，互相交错，听不太清楚：

"抓住他，不要让他跑了！"

"卡克里芒，到这里来！"

"我来了。"

在这些吵嚷声中，队长听到一大块东西，好象一个人似的坠落到了水里。他瞬息之间没有省悟过来，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镇定下来后，立刻用一根带铁钩的长杆勾住了在水中撞着的木桩，把船逆水向上拉，终于离脚手架越来越近，到达栽有橡木桩的地方，于是兴奋得拚命大叫：

"火把，把火把点着！把绳子扔过来！"

起初没有人答理，因为大家在忙乱中什么也听不清。这样过了半天，脚手架上才点着一根小火把，火光微弱，摇曳不定。这第一道微弱的火光刺得人眼睛发花，分辨不清人、木料和在水中的倒影。随后又点燃一根火把，这才大放光明，大家恢复了镇静，彼此也都认出来了。一切很快就不言自明了。

在队长的小船和脚手架之间有一个用三根木杆编成的小木筏，简直同船夫用的大木桨差不多大，只是略短一些，小一些。木筏用一根核桃树皮编成的绳索拴在脚手架下面的一根橡木桩上，尽管急流不断地拍打它，不断地把它往下冲，但它就是这样安之若素地呆在那里。脚手架上的巡逻队士兵帮助他们的队长越过木筏，爬上了脚手架。大家都气喘吁吁，神色紧张。木板上躺着一个五花大绑的基督教乡民。他的胸部迅速地上下起伏，他斜眼望着别处，露出惊恐不安的神色。

四个士兵中年纪最大的一个，十分激动地向队长叙述了事情的经过。他们分头藏在脚手架上的几个角落，在黑暗中听到有划桨的声音，以为是队长的小船，但他们很机灵，没有马上跑出来，而是等着看一看。后来他们看见两个乡下人靠近木桩，费了好大劲才把木筏拴在一根木桩上。他们不去惊动这两个人，而让他们向上爬，等他们走近自己的身边的时候，才拿着斧头向他们冲去，把他们打倒在地，准备用绳子捆绑起来。其中一个头上挨了一斧，昏了过去，他们毫不费力就把他捆绑起来，但是另一个起初装死，后来很敏捷地从木板的空隙中翻滚到河里去了。

说到这儿，这个士兵突然害怕起来，立刻打住，队长也果真咆哮起来：

"谁把他放走了？你们说，是谁把他放跑的，我要把你们通通剁成肉泥！"

他们一声不吭，在摇曳不定的火光里眨巴着眼睛，队长一面好象要在黑暗中把那个逃跑的人找回来似的来回乱转，一面不断地用一些白天骂人时从来没有用过的污言秽语咒骂他们。他猛然间惊醒过来，如获至宝地俯身观看那被捆住的乡下人，哆哆

嗦嗦地从牙缝里发出一种低微的、近似哀求的声音说：

“看住他，好好看住他！婊子养的，你们如果让他跑了，就别想活命！”

他们于是又围着这个人忙乱了一阵；这时又有两个士兵由岸上穿过脚手架跑来帮忙。队长叫大家把他捆得牢牢的。随后他们象抬着一具僵尸一样，小心翼翼地、轻轻地把他抬到岸上。队长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后面，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他每走一步，就越觉得自己了不起，他现在才感到自己还活在世上。

岸上又点着了几个火把。这些火把跟着人群晃动，一会儿熄灭，一会儿又点着。那个乡下人被抬到一个马厩里，马厩里早已生着火炉，人们用绳索和从火炉上取下来的铁链把他捆在一根柱子上。

他就是乌尼士得村的拉底斯拉夫。

队长稍微安静了些，不再大声喊叫，也不再骂人了，不过他还是坐不住。他一会儿派几个士兵沿着河岸到下游去寻找那跳水的乡下人，虽然他明明知道，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那个人如果不淹死，也不可能抓回来；一会儿又发布别的命令，在马厩内外进进出出，忙得不亦乐乎，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他还打算着手审讯那个乡下人，随即又打消这个念头。他这样来回折腾，无非是要掩饰内心的焦躁不安，使自己镇定下来，因为事实上他只有一个想法：盼望阿比达加快点来。没等多久阿比达加也就来了。

阿比达加象平常一样睡完一觉后，午夜一过就醒了。他再也睡不着了，于是起身凭窗向黑暗中窥望。他的住房在比加瓦山坡上，白天站在阳台上，德里纳河谷地、建桥工地、周围的茅屋、磨坊和马厩，总之谷地中的一切，可以一览无余。现在，一切

已被黑夜吞没，什么也看不见。他愁绪满怀，陷入了沉思，他想，工程进展缓慢，困难重重，总有一天会传到丞相的耳朵里。这里肯定会有人给他通风报信。那个脸上一根胡子也不长，冷若冰霜，阴险狡诈的多总埃芬蒂，也许就是这号人。万一丞相得知这里的情况，他就会失去丞相信任。正是因为这一点，他辗转不能入寐，即使睡着了也睡不安稳。自从他想到自己可能失宠，便对一切心灰意懒了。他讨厌周围的人，感到生活非常可怕。他想了想，失宠对他说来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你将会被丞相摈弃，你的敌人会对你冷嘲热讽（啊！这件事可不得了！），你将人不象人鬼不象鬼，在大家的心目中——在你自己的心目中何尝也不是？——你不过是一个废物，一个可怜虫罢了。此外，你辛辛苦苦攒起来的财富将毁于一旦，即使你能保住这笔财产，你也只能流落他乡，在远离斯坦布尔的穷乡僻壤里苟且偷生。这样，你将成为一个被人遗忘的多余的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不，怎么都行，决不能落到这步田地！宁可再也看不到太阳，再也呼吸不到人间的空气，宁可倾家荡产永不为人，也决不能受这份罪！这些想法不断地绞痛着他的心，根深蒂固，无法摆脱，使他的太阳穴和头顶心每天卜卜地频频跳动。失宠给他带来的后果是这样可怕，可是现在这种可能性却与日俱增，因为一切都在把他往这条路上推，然而他只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战，同周围的所有人斗。这种情况已非一日，十五年来，自从他受到丞相的垂青，获得了权势后，一直如此。对于这种常年的烦恼，谁能忍受得了？谁能若无其事，高枕无忧？

秋天的夜晚又寒冷，又潮湿，但是阿比达加仍然打开窗户向黑暗中探望着，因为房间的门窗紧闭，他觉得透不过气来。这时候他发现脚手架上和河岸上有火光在移动。后来，火光越来越

多，他想一定是发生什么异乎寻常的事了，于是穿上衣服，叫醒仆人。正当巡逻队长找不出更肮脏的话来骂人，想不出还有什么事该做，总之不知道应该怎样打发时光之际，阿比达加来到了通明的马厩前面。

阿比达加出其不意地来到，使队长不知所措。队长本来十分盼望他到来，等到他来了，反倒不能象自己所盘算的那样充分利用一下这个良好的机会。由于激动，他叽哩咕噜不知说些什么，连那个用铁链捆着的乡下人也忘记提了。阿比达加轻蔑地朝他的头上瞥了一眼，立刻举步向那个乡下人走去。

马厩里炉火烧得很旺，连最偏僻的角落也照得通明，几个士兵还在不断地往里面添柴。

阿比达加站在那乡下人面前，他比他高出一头。也一言未发，面有沉思。大家都在等他发话，然而他还在考虑他的问题：我现在要同这个本来不是穆斯林的愚蠢的无耻之徒——巡逻队长较量了，我的地位和命运将在此一举，将取决于我能否战胜这个怙恶不悛、冥顽不化的基督教败类。他想到这里，马上不寒而栗，随即下令开审。

马厩里挤满了巡逻队的士兵，外面是从梦中惊醒的工人和监工的嘈杂声。给阿比达加担任翻译的是巡逻队长。

拉底斯拉夫起初一口咬定，他和一个青年商量好决定逃走，编好木筏后，他们就到了河里。阿比达加告诉他这种说法的荒谬可笑，因为在夜里，波涛汹涌、充满暗礁和沙滩的德里纳河是无法通行的，而且，既然要逃走，为什么又爬到脚手架上去搞破坏？他无话可答，只是轻蔑地说道：

“我现在在你们手里，你们想把我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

“好！现在我们让你来看看，我们要把你怎么办。”阿比达加

大声答道。

几个士兵把捆在他身上的铁链解下来，放到熊熊的炉火里去。铁链上有许多煤烟，他们的手上和身上都弄得很脏，那个乡下人的裸露的上身也留下了斑斑黑块。铁链快烧红了，茨冈人麦尔强走过来，用一把长钳夹住铁链的一端，一个士兵也如法炮制，夹住另一端。

巡逻队长把阿比达加的话翻译出来：

"你还是老实招认吧。"

"我有什么好说的？你们既然精明能干，还有什么不知道的？"

夹着铁链的两个人走过来，把铁链绕在乡下人的毛茸茸的胸脯上。汗毛被烧得发出吱吱的声音。他痛得呲牙咧嘴，颈项上青筋暴露，两肋向外扩张，腹部的肌肉一抽一松，恰如人在呕吐时的样子。他疼痛难忍，呻吟不绝。他狠命地挣脱，但是无济于事，于是把身体缩成一团，想尽量减少与烧红的铁链接触。他眨巴着眼睛，两道热泪滚在面颊上。人们于是把铁链拿开。

"这不过是小意思。不用刑，老实招来岂不更好吗？"

他从鼻子里深深呼了口气，但是仍旧一声不吭。

"谁是你的同谋？"

"他名字叫约凡，不过是哪一家的，住在哪个村子，我都不知道。"

铁链又拿过来了，他身上的汗毛和皮肤被烧得吱吱直响。他被烟呛得咳嗽不止。他疼痛不得了，只好结结巴巴地说起来。

他们只有两人参与此事。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对的，所以就做了，其他人谁也不知道，谁也没有参与。头两次，他们从岸上来到工地，搞了些破坏。后来发现脚手架上和岸上有人守卫，就

想了个主意，把三根木杆绑在一起编成木筏，悄悄地乘木筏接近工地。这是三天以前的事。头一天夜里要不是跑得快，他们差一点就被抓住了。所以第二夜没有出来。今天夜里，他们还是乘着木筏来了，接着就发生了刚才发生的事情。

"就是这些，经过情形就是这些。我们就是这样干的。现在，你们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

"不，我们并不想知道这些，我们想知道的是谁指使你干的。你要不说，就让你尝尝更厉害的苦头。"

"随你们的便吧！"

铁匠麦尔强拿着钳子走过来，就地跪下，用钳子拔他的脚指甲。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响。尽管他被牢牢地绑着，但他的下身，从脚跟到腰部，抖得很厉害，可见他遭受的疼痛是无法形容的。有一阵，从他的牙缝里露出了一点喃喃不清的声音。在一旁观察动静的巡逻队长，想弄到一点口供，焦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马上用手示意，让铁匠停一下，闯上来问道：

"什么？你说什么？"

"我没说什么。不过，我要以公正的上帝的名义问你们，为什么这样折磨我，白费时间。"

"说！谁指使你干的？"

"唉！谁会指使我？还不是魔鬼！"

"魔鬼？"

"是的，魔鬼。那还用说？就是让你们到这儿来造桥的魔鬼。"

他说得很慢，吐字坚定、清晰。

魔鬼！此时此地，一个人受尽百般痛苦，说出这两个字来，真令人毛骨悚然！魔鬼！这里确实有魔鬼，队长心里想，他挺直

身子，耷拉着脑袋，好象他同犯人调换了位置，受他审问似的。魔鬼这两个字打中了他的要害，立刻唤起了他前不久所经历的万分惊惶不安，似乎抓住这个乡下人并没有使他完全心情镇静。一点不错，阿比达加、大桥工程以及这个发疯的乡下人，都是魔鬼造成的。魔鬼才是万恶之源吧？他不禁哆嗦起来，要往后倒。就在这当儿，阿比达加的宏亮的愤怒声把他惊醒了：

"喂，怎么了？你这个无赖，你睡着了？"阿比达加吼叫起来，一面用短皮鞭抽右脚穿的高筒靴。

那个茨冈人还拿着钳子，跪在那里，他的一双乌黑明亮的大眼睛以恭顺、胆怯的神情望着身材高大的阿比达加。炉火熊熊燃烧着，火光把整个马厩照得通明，烤得暖烘烘的，显得庄严肃穆。一般说来，一所破旧的房屋到了夜间，就突然变得高大起来，完全变了样。马厩内外，笼罩着一片森严静谧的气氛，凡是用严刑逼供，决定人命运的地方，无不如此。在这个舞台上活动的主角是阿比达加、巡逻队长和那个乡下人，其他人则敛声屏气，一句话也不多说。大家都想远走高飞，置身事外，既然不可能，只好都抱着不闻不问的态度。

阿比达加见审讯进展缓慢，问不出什么结果，气得暴跳如雷，骂不绝口。他无可奈何地走出马厩，后面跟着巡逻队长和巡逻队士兵。

马厩外面天已大亮，太阳还未升起，天边已被万道霞光染红。山顶上飘浮着长条的紫红色云朵，云朵之间透出清澈蔚蓝的天空。浓雾弥漫着潮湿的大地，但果树的树梢仍然清晰可辨，稀疏的黄叶点缀枝头。阿比达加一面不停地用皮鞭抽打着自己的靴筒，一面作了如下交待：继续审讯那个罪犯，尤其是要弄清楚他的同谋，但用刑不要过度，不能让他死了；由麦尔强负责做

好一切准备，在当天中午时分执行桩刑：把他放在脚手架最高处，以便全城居民和两岸工人都能看到；派人通知全城，所有的男子，不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教徒，是老人还是小孩，到时都要来观看破坏大桥工程的人落到怎样的下场。

这一天是礼拜日，和平常一样照常工作，但今天连监工的都有点神不守舍。天还未大亮，消息已传遍各地说破坏大桥工程的人已被擒获，受了严刑拷打，正午就要处决。笼罩在马厩里的恐怖气氛迅速蔓延到整个工地。服劳役的人都默默地埋头工作，谁也不愿同别人的眼光相遇，好象已经到了世界的末日。

十一点钟，城内居民大都是穆斯林，就来到了工地周围。儿童们爬到还没有使用的大石块上。工人们围着狭长的木板领取自己聊以度日的圆面包。他们一面吃着面包，一面无声地望着周围，心头压着满腔怒火。不多一会儿，阿比达加来了，随他而来的有多总埃芬蒂、安端师傅和几个土耳其绅士。他们都站在大桥和那个马厩之间的一块干燥的高地上。阿比达加又到马厩去了一次，看到一切都已准备妥当：一根约有四土耳其尺①长的橡木木桩，削得很细，涂上了煤烟，尖尖的顶端包着铁头。脚手架上钉了两根木头，用以固定那根木桩。那里放了一把木槌，是把木桩楔入人体用的，此外，还有绳索和其他应用物件。

巡逻队长慌乱异常，面如土色，眼睛通红。直到现在，他还是不敢正视阿比达加向他瞥视的愤怒目光。

"好好儿听着，如果出一点纰漏，让我在大庭广众之前丢丑，你和狗屎不如的茨冈人就不要来见我，我要把你们这两只野狗

① 每一土耳其尺等于六十六厘米。

扔到德里纳河里淹死。"

随后，他转向吓得魂不附体的茨冈人，声调不怎么严厉地说：

"这六块钱是给你的报酬，要是你能让他活到晚上，再加六块。总之，一定要小心沉着！"

从市中心大清真寺的塔顶上传来了霍扎[①]的清脆的祈祷声，在人群中开始蔓延一种忧虑的心情。不久，马厩的门开了。十个巡逻队士兵五个一排，从两边簇拥着拉底斯拉夫出来了，他赤着脚，光着头，还象以前一样弯着腰走得很快，不过不再撇开两腿，也不再左右摇摆了。他步履艰难，样子很怪，好象在跳着走，他脚上的指甲被拔去后，留下了鲜血淋漓的伤口。他肩上扛着一根顶端削尖了的白木桩。麦尔强和另外两个给他做助手的茨冈人跟在后面。巡逻队长骑了一匹栗色马，不知道从哪里忽然钻了出来，走在队伍前面。其实，到最近的脚手架，不过是百来步的距离。

大家都踮起脚尖，伸长脖子，看这个敢于密谋反抗、对大桥工程搞破坏的乡下人。他外表猥琐，没有什么惊人之处，跟他们想象的迥然不同，这使他们大为诧异。其实，他们这些人，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奇怪地、一窜一跳地走着，谁也看不见他的胸部被铁链烫伤的一条伤痕，因为人们替他套了件衬衣和羊皮袄。所以大家觉得他不象一个气宇轩昂，能做出这等惊天动地的大事而遭到杀戮的大丈夫，也就不足为怪了。只有那根白色的长木桩使人觉得阴森可怖，引人注目。

这一帮人到了岸边土方工程附近，巡逻队长从马上跳下来，

---

① 霍扎是传授《可兰经》的教士职称。

神气十足地把缰绳交给仆人，随后和其他人一起在陡峭泥泞的堤坡上消失了。不一会儿，他们又照原来队形出现在河床底部的脚手架旁，开始小心翼翼地向上攀登。脚手架上用横木和木板搭成的过道非常狭窄，士兵们紧紧地围着拉底斯拉夫，防止他往河里跳。他们慢慢地走着，越爬越高，最后到了顶端。那里有一个用木板搭成的中等房间大小的平台，很象一个凌驾于河水上空的舞台。拉底斯拉夫、巡逻队长和三个茨冈人便在这里停下来，巡逻队的士兵则分散在四旁的脚手架上。

站在高地上的人距离这个平台不过百余步，能够看清上面的每一个人，但听不见他们的说话声，具体情况也看得不那么真切。左岸的观众离平台要远得多，所以想尽一切办法要看到点什么，听到点什么。但是他们什么也听不见，至于映入他们眼帘的，起初不过是平淡无奇、没有多大意思的情况，等到这场戏快要结束的时候，那情景非常可怕，大家都不由地把头扭过去，许多人甚至急忙跑回家中，后悔自己不该来。

人们叫拉底斯拉夫躺下来时，他迟疑了一会儿，随后不管那些士兵和茨冈人是否在场，象对待一位老朋友一样，亲热地走到巡逻队长身旁，低声嗫嚅了两句：

“喂，请你行行好，我死活都感激你，你一下子把我结果得了，免得我太受罪。”

队长暴跳起来，冲他大声嚷着，好象抗议他认错了人：

“滚你的蛋，你这个基督教徒！你既然胆大包天，敢破坏苏丹的财产，又何必摆出一副娘们气，苦苦哀求呢？一切将按照规定进行，这是你罪有应得。”

拉底斯拉夫无可奈何地低下头来。这时，三个茨冈人走过来，剥下他身上的羊皮袄和衬衫，露出铁链烫伤的泡痕。他再也

不吭一声，任人摆布，趴在木板上。三个茨冈人把他的双手反绑在背后，在他的每条小腿下方捆了一根绳子。两个茨冈人各执一根绳头，使劲向两边拉，把他的大腿分开。这时，麦尔强把那个木桩放在两根短圆木上，木桩的尖头对准他的胯下。随后从腰带上抽出一把宽刃的短刀，跪在他身旁，俯下身去割破他的裤裆，把裂口撕得很大，好让木桩由此插入体内。这部分最令人胆战心惊的场面，观众总算万幸根本看不见。他们所看到的只是小刀飞快地划破裤裆时，被捆绑的拉底斯拉夫全身直抖，他仰起上身，好象要站立起来，但是立即又扑通一声倒在木板上。这一切都办完之后，麦尔强跳起来，在地上操起一把木槌，开始慢慢地、轻轻地捶打木桩的下端。每打一下，他就停一会儿，先看看木桩插入人体的情况，随后又看看那两个茨冈人，叫他们慢悠悠地拉着绳子，劲儿不要使得太猛。拉底斯拉夫的身体本能地抽动起来；每打一槌，他的脊梁就往上弓起，但那两条绳子马上又把他的身子拉直。

河两岸寂静无声，每一槌及它在山崖上激荡过来的回声都听得清清楚楚。近处的人甚至可以听到他的上额碰撞木板的声音，以及一种令人瞠目的声音，这种声音既不象出自呻吟或者悲痛的呼喊，也不象临终前的喘气，总之一点也不象人发出来的声音。他的整个躯体由于绳子拉，木桩顶，产生了一种类似践踏篱笆或攀折树枝的嘎吱嘎吱的声音。每捶两下，麦尔强就走近他身旁，俯身看一看木桩是否偏离了方向，待他确信木桩没有戳伤拉底斯拉夫体内的任何要害部位后，便又回到原位，继续捶打。

这一切情景，河两岸的人只能听到一点声响，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但是人们个个两腿发抖，面色煞白，手指冰凉。

捶打后来停了一会儿，因为麦尔强发现犯人右肩胛骨上方

的皮肤隆起，肌肉绷得很紧，他迅速走过去在隆起的地方用刀切开一个十字。一缕淡红的血液从刀口流出，越流越多。他又轻轻地小心捶了两三下，只见切口处露出了木桩的包铁尖头。他又捶了几下，木桩尖头便与右耳并齐了。

拉底斯拉夫受桩刑如同用烤叉串小羊，不同的是，木桩的尖头不是从嘴里出来，而是从背上出来，所以对肠子、心脏和肺部都没有什么严重损伤。鲜血从木桩的进口和出口处一滴一滴地往下流，在木板上汪了一滩又一滩。麦尔强把木槌扔在一边，绕着木板上的血水观察一动不动的拉底斯拉夫。两个茨冈人把他翻过身来，用绳子把他的两腿捆在木桩的下部。麦尔强看了看他是否还活着，发现他的面部忽然变得异常胖大。他圆睁大眼睛，露出不安的神色，眼皮纹丝不动。他那发僵的两唇张开着，露出一副紧闭的白牙。显然，面部肌肉他已不能控制，因而失去了常态。他的心脏仍在微弱地跳动，肺部呼吸急促。两个茨冈人把他竖立起来，他们动作麻利，活象摆布一只串在烤叉上的羊。麦尔强一面大声嚷着，叫他们当心一点，不要晃动他的身子，一面从旁协助。他们把粗壮的木桩下端夹在两根已经固定在脚手架上的木头之间，用大钉子钉死，又用一根短木棒从犯人的背后支撑木桩的下端，短木棒的另一头则搭在脚手架上，两头都用钉子钉牢。

三个茨冈人做完这些事以后，便退到巡逻队士兵呆的地方。于是那里只剩下拉底斯拉夫一个人，他上身裸露，仰着头，挺着胸，固定在木桩上。人们从远处可以隐约看到木桩从他身上斜穿而过，两脚被绑在木桩上，双手反绑在背后，恰似一尊立于河水上空、靠近脚手架边上的塑像。

一阵骚动立即席卷两岸的人群，人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有些人低下头不敢看，有些人头也不回，快步跑回家去。大部分人一言不发地望着悬在空中的拉底斯拉夫的僵硬挺直的身影。他们心胆俱寒，两腿发软，但又不能不看。

疯婆伊琳卡也在人群中。她注视着每个人，想从他们的目光里看出她的孩子被埋在哪里。

这时，巡逻队长同麦尔强和两个士兵又走近拉底斯拉夫，再仔细看一看他。只有少量的血沿着木桩往下流。他还活着，神智清醒。他的两肋上下起伏，颈上血管的跳动清晰可辨，他的一双眼睛一直不停地、慢慢地转动着。从他那紧闭的牙缝中透出了喃喃的声音，只能听懂个别几个字：

“土耳其人……土耳其人……”他咒骂道，“造桥的土耳其人……你们不得好死……你们不得好死……”

三个茨冈人收拾起家伙，跟着巡逻队下了脚手架，然后向岸上走来。观看的人见他们过来，纷纷散去。只有爬在石块上和树上的孩子还在等着什么，他们不知道事情已经完结，可以回去了。他们觉得这个人呆在河水上空，很是奇怪，好象正要往河里跳而忽然停住了，下面应当怎样，他们想看个究竟。

巡逻队长走到阿比达加面前，向他报告一切顺利，完全是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拉底斯拉夫还活着，可能还会苟延一阵子，因为他的内脏没有受到损伤。阿比达加对他的话未置一辞，甚至连看也没有看他一眼；他打了个手势叫人把马牵来，一面同多总埃芬蒂和安端师傅告别。在场的人开始散去。这时，官方派出的人正在城里的大街小巷向大家宣布：破坏大桥工程的人已被处桩刑。谁要是胆敢效法他，必将遭到同样的下场，或是更严厉的惩罚。

巡逻队长心绪不宁，伫立在空无一人的高地上发愣。他的

仆人牵着马站在一旁，大兵们也在等待他下命令。他觉得自己应当说几句话，不过他感到五内沸腾，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忙于行刑而没有功夫答理的问题，现在又浮现在他的心头。他想起阿比达加曾经威胁他，如果不能把破坏大桥工程的人逮捕归案，就要把他处以桩刑。现在他总算躲过了一场大难，不过险得很，到最后一刻才得以幸免。就是脚手架上那个人，曾经费尽心机破坏大桥工程，使他的处境十分窘困，但是事与愿违，他自己反而得到了报应。现在他只要举目看看那个在河水上空苟延残喘的拉底斯拉夫，心中便不免感到后怕，同时也感到一种聊以自解的欢乐，大祸总算没有临到他头上，他安然无恙，四肢活动自如。想到这里，他感到由胸部到四肢全身热辣辣的，不禁想动动手脚，说说笑笑，似乎要以此证明自己确实安然无恙，活动自如，还能谈笑风生，引吭高歌，而不是被插在木桩上有气无力地骂一些无济于事的话，等待死神的来临。于是他不由自主地一面手舞足蹈起来，一面大声狂笑，而且还口中念念有词：

“哈哈哈！拉底斯拉夫，你这个山神，你为什么僵如死尸？你怎么不再去破坏大桥工程？你干吗骂个不休，呻吟不绝？喂，山神，唱吧！”

那些士兵被弄得莫名其妙，干瞪着眼看他们的队长一会儿伸开双臂又唱又跳，一会儿笑得前仰后合，嘴角流着白沫，说些不着边际的话。

他的栗色马也在一旁用惊恐的眼光望着他……。

第 四 章

在两岸观看行刑的人，在维舍格列城乡散布了种种骇人听闻的报道。居民和工人的心头萦回着难以形容的恐怖。人们渐渐弄清了十一月这短短的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拉底斯拉夫在刑架上受桩刑，仍然还活着，这成了人们谈话的中心。虽然人人都发誓不再谈论他，但是说了白说，因为心里总要往他那上面想，眼睛也不由自主地向他那边看。

驾着牛车从巴尼亚运石料来的乡下人，到达这里时，都低着头，轻声吆喝着牲口。在河岸和脚手架上干活的工人很少说话，即使偶尔交谈两句，也是声音很低。手里拿着核桃木棍的监工也比以前和气多了。达尔马蒂来的石匠面色苍白，一言不发，他们背向着桥，忿忿不平地用凿子狠命凿着石块，在一片静寂中，那敲打声如同一群啄木鸟在啄食一样。

时光过得很快，太阳下山了，工人们急急忙忙赶回住所，一心要尽快远离这个鬼地方。天傍黑之前，麦尔强同阿比达加的一个亲信仆人又爬上刑架，来到拉底斯拉夫身旁，发现他在受刑四小时后仍然活着，神智清醒。他在发烧，眼睛无力地慢慢地转动着。他看到麦尔强走来时，他叫得更厉害了。他一面呻吟，一面还在骂，不过只能听到个别几个字：

“土耳其人……土耳其人……桥……”

麦尔强和那个仆人心满意足踏上归途，赶往比加瓦山坡阿比达加住所，路上逢人便说拉底斯拉夫还活着，而且还能咬牙切

齿地骂人，话音清晰，看来可以活到第二天中午。阿比达加也很满意，叫人再给麦尔强一点报酬，这是事先答应给他的。

那天晚上，维舍格列和大桥工地附近的居民心中犹有余悸，进入了梦乡。说得更确切一些，能睡觉的只有少数人，大多数人根本睡不着觉。

第二天是星期一，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十一月一天清早。无论在城里还是在工地上，没有一个人不抬起眼睛看那木料纵横交错的脚手架。脚手架的边沿，赫然挺立着一个孤零零的人，如同一个人站在船尾一样。许多人早上一睁开眼，便以为昨天在工地上的所见所闻不过是一场梦，现在，他们呆若木鸡，惊诧失色，那不是一场噩梦，那是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一件真事。

工人们仍象昨天一样默默无言，懊丧满怀。城里的居民还在低声议论，惴惴不安。麦尔强同阿比达加的那个仆人又上了一趟刑架，在拉底斯拉夫身边逗留好久。他们交谈了几句，抬头看了一下他的面孔。麦尔强还扯了扯他的裤脚。他们回到岸上，路过工人身旁的时候，一句话也没有讲，大家由此断定拉底斯拉夫终于丧了命。基督教徒于是一致感到松了一口气，好象取得了一个无形的胜利。

大家现在举眼看刑架上的拉底斯拉夫，已经不再那么胆怯了。他们感到，在同土耳其人的肉搏战中，力量的对比已经转为对他们有利。对他们说来，同胞被害是最有号召力的。高压一直使他们不敢开口，如今，他们无所畏惧了。那些面色焦黄，胡子满颊，用松木撬棍从巴尼亚运大石块来的人，汗流浃背，浑身污泥，他们歇脚的时候便这样低声谈论着拉底斯拉夫：

“愿上帝饶恕他！”

“噢！他是殉难者！真叫人难受！”

"你们难道不认为他是成了仙吗？他是圣人，老伙计！"

每个人都在暗自描绘木桩上的拉底斯拉夫，觉得他好象正昂首阔步，率领一列队伍前进，觉得他巍然屹立，既不显得可怕，也不显得渺小。相反，大家都认为他无比杰出，无比伟大，认为他已超凡人圣，割断了尘缘，本身自成体系，不受人间任何羁绊，无忧无虑。谁也不再能把他怎么样，刀枪、谗言恶语乃至土耳其人的淫威都对他无可奈何了。

在他们看来，上身裸露，四肢被捆，头靠在木桩顶上的拉底斯拉夫的挺直的身躯，是不会腐烂的，他象一尊塑像，居高临下，不怕风吹雨打，永远屹立在那里。

工人们常丢下手头的工作，掉过头来，对着他偷偷在胸前画个十字。

美以当山区的妇女，也抓紧做饭的空闲，快步走出家门到邻舍絮聒几句，洒上几滴眼泪，然后又赶回家中，生怕炉上的饭烧糊了。有个妇女在圣像前点了一盏长明灯，大家立即如法炮制，都点了起来，并且把灯藏在房间的角落里。在一片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孩子们一面眨巴着小眼睛，望着微弱的灯光，一面听大人祷告，断断续续，对祷辞他们似懂非懂，只能领会几句："愿上帝保佑我们！""啊！上帝一定会认为这个殉难者功盖寰宇，好象建造了一座举世无双的大教堂！""救救我们，万能的上帝，把敌人消灭掉，结束他们的统治！"孩子们不厌其烦地问道："殉难者"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谁造了教堂？在哪儿造的？男孩子的好奇心尤为强烈，母亲们不得不应付他们几句：

"别说了，我的小心肝！别再问了，听妈妈的话，你一辈子都要提防万恶的土耳其人！"

第二天黄昏之前，阿比达加又巡视了一次工地，看到桩刑收

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他很满意，下令把那个乡下人从脚手架上搬走。

"把这条狗扔给野狗吃掉吧！"

这一天天黑得很早，空气湿润，气候温和，有点象春天的夜晚。工人们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闹腾起来了。以前一听到组织反抗和破坏的议论扭头就走的人，如今也准备豁出命去，什么都敢干了。大家觉得拉底斯拉夫的遗体极为重要，神圣不可侵犯。几百个工人，劳累了一天，受自己善良的天性、对死者的同情以及古老风俗的驱使，自发行动起来，进行活动，想把拉底斯拉夫的尸体弄到手，给他举行一个基督教葬礼，不让他受异教的亵渎。他们在工棚里秘密商量了一个办法，凑了七块钱，去收买麦尔强。

大家选了三个精明强干的工人去同刽子手交涉。他们也顺利地跟他搭上了勾。现在，这三个劳累了一天，浑身是汗的乡下人，正在转弯抹角，费尽心机同他讨价还价。年纪最大的一个皱着眉，搔着头，装出结巴的样子对麦尔强说："事情已经完了。他命该如此。不过你想，他究竟是个人，用句老话说，他是上帝创造的一个生灵，让野狗把他吃了，让畜牲去糟蹋他，总不太好吧。"

麦尔强心里明白，这是一笔送上门的买卖，他装出一副可怜相，但并不马上严辞拒绝。

"啊！不行！你们不要和我谈这些，这使我为难。你们难道不知道阿比达加是怎样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

那个乡下人觉得事情不太好办，不由得两眉紧锁，沉思起来：这家伙是个茨冈人，一无宗教信仰，二无道德观念，不可能指望他跟你拉交情，真心实意为你办事。他把右手伸进工装口袋，

把七块钱紧紧捏在手里。

“阿比达加是怎样一个人，这我们完全了解。我们也知道你不好办。不过我们不会让你吃亏的。你看，我们凑了四块钱为你添寿，数目不少了。”

“不行，不行，我可得看重自己的性命，不稀罕世上任何奇珍异宝。万一让阿比达加知道了，我就休想活命，这个人鬼得很，什么都瞒不过他。干这种事呀，我想也不敢想。”

“那么，给五块，咱们就说到这儿吧！这几块钱我们总可以弄到的。”乡下人接着说道，根本不管他那叫苦连天的样子。

“可是，我不敢呀！我不敢呀！”

“好，可是你接到命令，好象是叫你把……遗体扔掉喂狗，你尽管这样做好了，以后的事不用你管，谁也不会来问你了。你看，你扔掉以后，我们就把它弄走，然后悄悄地按照我们的风俗埋掉，谁也不会发觉。而你呢，第二天你可以说……遗体被狗拖走了。这样，你不用担一点风险，同时，还可干得一笔钱。”

乡下人说话时，字斟句酌，考虑很周到，不过每次提到“遗体”时，总要停顿一下，似乎有些碍口，而且总用“遗体”这个词，不用其他称呼。

“你们以为我会为五块钱拚一条老命吗？不行，不行！”

“那就六块吧！”那个乡下人不慌不忙地说道。

麦尔强站起身来，伸开两臂，摆出一副只有老实人才做得出来的一本正经、坦率耿直的样子，向乡下人求情，好象自己成了罪人，而对方却是刽子手似的。

“既然老天爷一定要我做这件事，我只好豁出老命来干，老婆孩子是不是会成为孤儿寡妇，我也管不了许多了。你们给我七块钱把尸首抬走吧，不过一定要做得风声不漏，无人知晓。”

乡下人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没有想到好不容易凑齐的七块钱，一文不少地全得送给这个无赖。而麦尔强也好象一眼看穿他手中攥了多少钱似的。

他们接着商量了一下具体步骤。麦尔强答应尸体从脚手架运到河的左岸以后，一到天黑就把它扔在大道附近的石堆上，让阿比达加的仆人和过路行人都能看到。三个乡下人预先藏在不远的灌木丛中，等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他们就把尸体弄走，葬在一个僻静的地方，不留一点痕迹，好象真让狗吃了。他们先付了麦尔强三块钱，余下四块钱待事成之后，第二天付清。

当晚，一切事都按部就班，进行得相当顺利。

夕阳西下的时候，麦尔强果然把尸体运来扔在大道下面的堤坡上。（这已经不是两天来人们所看到的昂首挺胸立在木桩上的拉底斯拉夫了，他已经恢复常态；身材矮小，背有点驼，不过血已流尽，生命已经终结。）麦尔强旋即同他的帮手踏上渡船，划往对岸城里去了。乡民们在荆棘丛中等待着。只有几个晚下工的工人和回家的土耳其人从这里路过。不久天色黑下来，四周一片静寂。他们听到有狗吠的声音，看到几只身材高大、长着癞疮的野狗跑来了，露出一副狰狞可怕和惊慌失措的样子。他们从灌木丛中扔了几块石头，这几只狗便夹着尾巴逃到离尸体稍远一点的地方，停在那里窥探动静，两只眼睛闪闪发光，在黑暗中清晰可见。夜深了，看来不会再有人来，他们于是扛着铲子和镐头走出来，把带来的两块木板叠在一起，放上死者，抬着向堤岸上走去。他们来到一个地方，那里有一小块凹地，是春秋两季的山洪灌进德里纳河时冲刷而成的。他们搬开大卵石，默默地、迅速地挖了一个深深的墓穴，把僵硬、冰凉、已经萎缩的尸体放到里面。

年纪最大的乡下人跟着跳进墓穴，小心地打了几下火石，点着一块火绒，随后从一个满是蜡油的布包里取出一支小蜡烛，用双手挡着风把蜡烛点着。他把蜡烛立在死者头前，很快地在胸前画了三个十字，一面高声祈祷："以圣父、圣子及圣灵的名义为你祈祷。" 留在墓穴上面的两个人也随着画了十字。那个乡下人在死者的身上做了两次倒酒的手势，同时低声虔诚地念叨着："求基督把你的仆人收为圣徒。"

随后他又喃喃地祈祷了几句，祷辞庄重严肃，墓穴上面的两个人也一直不停地画着十字。他祝祷完毕，上面两个人便把两块木板递给他。他把木板架成一个拱形搭在尸体上面，好象一个小房顶。他又画了个十字，吹熄蜡烛，纵身跳出墓穴。于是三个人一同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往墓穴里填土，把土夯得很平，直到看不出一点高出来的地方。接着，他们在新土上放了许多卵石，又画了个十字，然后踏上归途，故意绕了个大弯，在离墓很远的地方走上大道。

后半夜下了一场霏霏细雨，但是没有刮风，天亮的时候，整个山谷弥漫着很浓的白雾，空气湿润、温和。白茫茫的雾团飘忽不定，阳光很难照射到地面上来。一切都坠入烟海，虚无缥缈，令人感觉新奇。行人也在雾中时隐时现。一辆普通的马车，就在这天清晨，出现在市中心。车上有两个巡逻队士兵押着五花大绑的那个布勒夫列人，他昨天还是他们的队长。

前天，他看到自己活得很好，没有被插在木桩上，异常高兴，曾经当着众人疯疯癫癫地跳个不停，从那时以来，他一直没有恢复常态。他全身的肌肉都在颤动，坐立不安，精神上不断地受着折磨，总想设法证明自己安然无恙，四肢活动自如。此外，他一想起阿比达加（阿比达加是他心头的一块病，即使在快活的时

候，也不能消除），就立刻陷入痛苦的沉思。这种新的因素也强烈地促使他象疯子似的大肆活跃起来。可是过不多久，他又站起身，伸开两臂，跳起舞来，一面弹着手指头，一面妖里妖气地扭动身腰，花样翻新，动作激烈，他要以此证明自己没有受桩刑。他还气喘吁吁地说道：

“你们看，你们看……我能做这个动作，也能做那个动作，哪个动作都能做。”

他不吃不喝，要是有人同他谈话，他刚说上两句便又停下来跳舞，而且每跳一下，还要疯疯癫癫地加以指点：

“这样，你瞧，这样……这样！”

直到昨天晚上，人们才大着胆子向阿比达加报告了巡逻队长的近况，阿比达加只是冷冷地说了两句：“把这个疯子送回家去关起来，免得他闹得满城风雨。他根本不是当巡逻队长这块料。”

大家于是照阿比达加的意思办了。由于他仍旧不能安静下来，巡逻队士兵不得不去把他捆在马车上。可是他大哭大闹，拚命挣扎，不让人捆，嘴里还不住地喊叫：“这样，这样！”（他们于是把他的手脚也捆起来，让他端端正正坐在车上，恰如一满口袋小麦放在那里。）他既然不能动弹，便以为要把他拉去上桩刑了，全身扭动，使劲儿挣扎，拚命叫喊：

“不要抓我，不要抓我！你们去捉那个山神，阿比达加！”

由于还未出城，叫声被人们听到，大家赶紧从家里跑出来，但马车很快便消失在通往都布龙的大道上了，茫茫大雾遮盖了一切，连太阳也看不清楚。

巡逻队长突然被送走，他的悲惨结局，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大家开始议论纷纷，认为被处死刑的拉底斯拉夫是

无罪的，巡逻队长应当对他的死负责。在美以当山区的妇女当中，还传开了这样一种说法，说神仙把不幸的拉底斯拉夫埋葬在布哥岭山岩下面，夜里可以看到一道强烈的光自天而降，落到他的坟墓上，这道光如同千万支点燃的蜡烛，从天上到地下连成一线。她们说，她们透过泪眼亲眼目睹过。

各种各样的谣传都有人相信，在人们的悄悄议论中不胫而走，但恐惧心仍旧压倒一切。大桥工程有条不紊地迅速进行着。可是到十二月初，天气突然变得特别寒冷，连自命不凡的阿比达加也毫无办法。要不是这场寒潮，工程是不会中辍的。

十二月初就刮暴风雪，天气冷得要命，这是历来罕见的事。石头冻在地上，树木也冻裂了。工棚被覆盖一层皑皑白雪，到处是一片银白世界，可是第二天又狂风大作，把雪卷走了。工程自然而然地停了下来，阿比达加的淫威已经不起作用，大家谁也不怕他了。他起先还顶了几天，后来也不得不软下来，宣告工程暂时停止，让工人离开。他自己也带了随从骑着马，顶着风雪走了。他走的同一天，多总埃芬蒂和安端师傅也跟着各自登上归程。多总乘的是乡下人的雪橇，全身裹着被，埋在干草堆里。服劳役的工人也全都无声无息地自行解散，回到各自的村庄或深山里，好象水一样不知不觉地渗进地里消失了。这样，工程热闹一阵后，被抛在一边，无人过问了。

阿比达加临走前，又把土耳其绅士召集到一起。他为自己的无能感到沮丧，又重复了去年临别前那番话，说他把工地托付给大家，叫他们负责看管好。

“我走了，但我的心神还留在这里。你们要记住，对敢于搞破坏的人宁可格杀勿论，也不要让苏丹的财产受到丝毫损失。一到春天，我就回来，那时候你们要向我报告一切。”

绅士们象去年一样满口答应，随后忧心忡忡地穿起皮坎肩、外套，披上斗篷，分头回家，同时内心也十分感谢真主给人间送来了严冬和暴风雪，因为这对于强权的肆虐多少会有所限制。

但春回大地的时候，来的不是阿比达加，而是丞相的另一个心腹阿利夫贝，多总埃芬蒂也同他一起来了。阿比达加最害怕的事终于发生。不知是谁(此人对这里的情况深为熟悉，一定在这里呆过）向丞相提供了大量关于阿比达加在维舍格列所作所为的准确情报。丞相得知，这两年，每天有二三百人在这儿服劳役，没有任何报酬，甚至连吃饭也往往是吃自己的，阿比达加把丞相发下建桥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他所侵吞的总额已经一笔一笔查清。)这种事在生活中屡见不鲜，他心术不正，外表却装出一副积极奉公的样子，加以待人苛刻，弄得天怒人怨，不仅基督教徒，连土耳其人也对这个宏大的慈善设施没有一点感激之情。不但如此，从工程开工那一天起，他们便对这项工程，甚至对穆罕默德巴夏本人骂个不休。穆罕默德巴夏对于手下官员的徇私舞弊和为非作歹向来深恶痛绝，从不轻易放过，他勒令品行恶劣的阿比达加如数退回全部赃款，交出全部财产和私邸，立刻迁往阿那都里的一个小村庄，并不准托人为他求情，否则，罪加一等。

阿利夫贝到达后两天，安端师傅也带一批工人从达尔马蒂来了。多总埃芬蒂把他介绍给新来的阿利夫贝。四月的一天，风和日暖，春光明媚，他们三人来工地兜了一圈，确定了首批工程的方案。后来，阿利夫贝走了，多总埃芬蒂和安端在河岸上又逗留了一会。太阳照在身上暖烘烘的，多总却依然裹着那件臃肿的黑大衣，缩手缩脚。安端仔细端详着他的脸，一面说道：

"新来的这一位同他的前任截然不同，真要感谢上帝！不知道是哪一位有那样大的能耐和勇气，报告了大丞相，把那个畜生

撵走了。”

多总埃芬蒂眼睛看着前方，慢条斯理地答道：

“毫无疑问，这一位要好得多。”

“那个人一定很了解阿比达加的为人，并且能接近丞相身边，深得他的信任。”

“毫无疑问，这一位要好得多。”多总一面裹紧大衣，一面答道，低垂的眼皮一直没有抬起来。

工程于是在新任官阿利夫贝的领导下继续进行。

阿利夫贝确与他的前任全然不同。他个儿高得出奇，后背有点驼，脸上一根胡子也没有，颧骨高高突起，一双乌黑的眼睛总是眯缝着，显出笑嘻嘻的神情。老百姓立刻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木乃伊”。他下命令，分派工作，既不大声喊叫，挥舞棍棒，也不骂骂咧咧，虚张声势，相反，他总是和颜悦色，一点也不着急，好象他高高在上，对情况不太了解，其实不然，什么也逃不过他的两眼，他对什么事都一清二楚。对于丞相的意思和命令，他也要求大家积极热诚、一丝不苟地去完成，不同的是，他沉着冷静，为人正派，因此，无所畏惧，光明磊落，用不着让人怕他，弄得人家无所适从。工程的进度，一如从前(这是丞相自己规定的)。当然，谁要是犯了错，仍旧要遭到严厉的处罚，不过他一到任，强制劳役就取消了。工人们人人都能得到一定的报酬，诸如盐、面食之类的食物，应有尽有，所以工程进展之快，质量之好是阿比达加时代所无法比拟的。疯婆伊琳卡也已消声匿迹，她冬天到乡下去了，从此杳无音信。

工程一天一个样。同时，现在可以看到，丞相的慈善设施除大桥外还有一家旅店。远方来的旅客到达本地，如果碰上天黑，可以在旅店寄宿，他们的马匹和货物当然也不例外。阿利夫贝

来后不久，这个骡马店也开始破土动工。在商业区附近，离大桥二百步远的山脚下——通往美以当的山路便从这里蜿蜒而上——有一块平地，每星期三举行牲口集市。新的旅店，便选在这里。旅店的建造进展并不快，但从已经动工的规模来看，一定是一座占地面积很大，设备齐全，经久耐用的建筑物。不过，它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大桥工程上了。

德里纳河上现在已全面铺开，呈现出一片纷纭杂乱的景象，各种工作千头万绪，令人眼花缭乱，以欣赏自然景色的眼光在一旁观看的闲汉简直目不暇接，无法弄清其中的奥妙。伸向各方的堤坝和沟渠修了一条又一条，河水被拦腰切断，沿着新修的闸门，流入新开辟的河道。安端师傅这次从达尔马蒂带来不少专门编绳索的工人，当地产的苧麻早已被他预购一空。他让工人们用这些苧麻编了许多非常粗大结实的麻绳。他还和多总埃芬蒂设计了一种带轮的木制吊车，由希腊木工制造出来，装在木筏上，然后用粗麻绳把大石块吊起来运到造桥墩的地方。但即便如此，每一块巨石从岸上运到桥墩上还要四天之久。

那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一旁观看的人，渐渐失去了时间概念，抓不住建筑师的真实意图了。他们感到大桥工程不但迄无进展，而且辅助工程多如牛毛，十分繁乱，越来越不象是在造一座桥。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成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对待他人的劳动往往沉不住气，作出错误的判断。土耳其人现在谈起大桥，又开始挤眉弄眼，作怀疑的表情了。基督教徒依旧缄默无言，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内心深处没有自己的想法，其实他们怀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巴不得工程失败，他们对土耳其人办的一切事都取这种态度。坐落在普利勃伊附近的巴尼亚修道

院的院长，当时就在他那本《圣经》的末页上写了这样一段话："希望穆罕默德巴夏在维舍格列造桥的这一段时期，能为后人所知。阿加尼安人和繁重的劳役给基督教徒带来了莫大的灾难。他们还从海外招来许多工匠。他们搞了三年，白白花费了许多金钱。他们把河水切成两三段，但桥还是没有造起来。"

秋夏交替，冬去春来，光阴一年一年地过去，工人和工匠走了又回来了。现在，德里纳河上的木架密如蛛网。高大的木制吊车在拴得很结实的木筏上摆来摆去。河两岸还设有熔铅炉。人们把熔化了的铅水灌入石块之间的空隙中，使石块紧密无间地连接在一起。

第三年末，工地发生了一件重大事故，这是大工程所难以避免的。比别的桥墩略高、顶端略宽、用来支撑加比亚台的中央桥墩眼看就要完工了。用粗麻绳吊着的一个长方形的大石块，吊运到中央桥墩后忽然停在空中，下面站着许多工人。吊车没有把石块对准应放的地方。安端的助手"黑人"看得不耐烦了，他跑过来怒气冲冲地叫喊着，示意在水面上操纵吊车的工人把吊车的方向拨正(他满口南腔北调，这是近两年从四面八方来的工人那儿学来的)。由于全神贯注地同下面说话，他没有顾到上面。这时，不知什么原因，麻绳忽然脱落，石块的一角马上倾斜下来，然后一下落在他身上。说来也怪，石块不偏不倚正落在应放的地方，不过下落时碰倒"黑人"，把他的下半身压在下面了。大家立即呼喊着蜂拥而上。不一会，安端师傅也来了。"黑人"昏迷了一阵，这时已清醒过来。他咬着牙呻吟不绝，脸上露出绝望、惊恐的神色，眼睛盯着安端。安端师傅两眉紧锁，面色煞白，他叫大家拿撬棍把石块撬起来。但一切尝试都无济于事。"黑人"已全身躺在血泊中，气息奄奄，目光缭乱，半小时后就断了

气，一面还紧紧地抓着安端的手。

他的葬礼很隆重，长久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穆斯林全都赶来送殡，轮流抬着他的棺材走几步。棺材里装的是他的上半身，因为下半身压在石块下面了。安端师傅用上等石料在他的墓前立了一座很考究的墓碑。他的死使安端悲恸已极，因为他小时候生活十分穷苦，是安端把他从家里带出来的，那时候，乌尔清城住了几家偶尔流落到那里的黑人。不过，整个工程并没有因为他的死而告停顿。

第三年和第四年冬天并不冷，工程一直可以进行到十二月中旬。现在是第五年了，这个曾经到处都是木头、石块等建筑材料及各种器械的地方，开始逐渐萧条。

在通往美以当路旁的平地上，新的旅舍已经基本建成，脚手架已经拆除。这是一座用上等石料垒成的两层大楼。内部装修和外部清理还在进行，但已经可以看出，论气派之大，线条之优美和坚固耐用，这幢楼房是维舍格列有史以来所绝无仅有的。楼房用浅黄色石块砌成，房顶盖着深红色的瓦，此外，还有一排雕刻得很精致的窗户，其宏伟壮观使当地居民大开眼界，简直不敢相信这座建筑物将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觉得，丞相造的这座旅舍似乎只有达官贵人才有资格享用。

旅舍的内部也是富丽堂皇，别具风格，令人赞不绝口。

同时，水面上密如蛛网的脚手架已开始减少，透过脚手架已可以清楚地看到用巴尼亚产的上等石料建成的这座大桥的真正面目。工人们孤零零地一个人或三五成群，还在对某些部分继续加工，人们一直以为，这些部分同整个大桥似乎毫无关系，根本没有必要建造，现在，即使最孤陋寡闻的人也明白过来，工地上的每一环节，乃至每个人的工作都是根据一个无懈可击的

统一计划进行的。最先拆除脚手架的是紧靠河岸的最矮小的桥孔，随后别的桥孔的脚手架也相继拆除，这样，一座完美无瑕、富丽堂皇的十一孔大石桥便赫然出现在人们眼前，成为一种招引游人的美妙奇景。

既容易把事情想得很坏，也容易把事情想得很好，这是维舍格列人的天性。他们现在对自己过去一段时间没有根据地狐疑和缺乏信心感到十分羞愧。同时，他们对大桥的赞美和热情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桥上还不许通行，河两岸，特别是紧靠市中心商业区的右岸，聚满了人，他们在观看工人们在桥上走来走去，进行最后一道工序——磨光栏杆和加比亚台上的座椅。土耳其人也在观望，五年来，他们对这项别人出钱兴办的工程，骂了许多不堪入耳的话，并预言它要夭折。

"我一直对你们讲，"杜切村的一个矮小的霍扎非常激动地说，"苏丹什么事都能办成，这些聪明人一定会把桥造起来的。然而你们总是喋喋不休地说，他们做不到。现在你们看，难道不是造起来了吗？而且是一座多么壮观的桥。"

大家异口同声表示赞同，虽然说良心话，谁也想不起他说过类似的话，相反，他曾经同大家一起鼓噪过，这一点，大家还记忆犹新。不过，并没有人揭他的底，大家都陶醉于由衷的欢乐之中，不住口地发出啧啧的赞叹声：

"他们真是好人，哎！好人啊，给我们城平添了多么不平凡的事物呀！"

"丞相的威力和智慧之大，由此可见一斑。他只要往那里一看，那里就会出现一个慈善设施，给当地的人带来幸福。"

"你现在看到的还不算什么，"小个儿霍扎爽朗地接着说道，"过几天还会更好看呢。你们没有看见吗？他们在给大桥冲洗，

进行最后一道装饰。那股认真劲儿真象把马匹送到市上出卖以前，给它梳装打扮一样。”

他们就是这样热情奔放地竞相搜寻最新最美的辞句对大桥备加赞美。不过，也有人始终瞧不起这座桥，并对赞美它的人白眼相待，这就是爱财如命、整天愁眉不展的大粮商艾哈迈德阿迦①·史达。他身材细长，形容枯槁，一双黑眼贼溜溜的，两片薄嘴唇说起话来纹丝不动。他面对着九月的骄阳眨巴着眼睛，坚持过去的看法。（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有些人心里就是怀着无缘无故的仇恨，比任何人都要强烈。）人们满腔热情称颂大桥气派惊人，经久耐用，胜过任何城堡，他听了很表反感，轻慢地说道：

“除水灾而外，这是我们维舍格列最大的祸害了！你们别高兴得太早，还有好戏看呢！”

大家听了他的话，非常痛心，于是群起而攻之，驳斥他的无耻谰言，一面仍连声称赞为大桥立下汗马功劳的人，特别是阿利夫贝。大家夸阿利夫贝始终笑容可掬，落落大方，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一座妖娆多姿的大桥造成了。史达固执己见，寸步不让。

“你们说到哪儿去了，若没有阿比达加和他那根绿棒，若没有他规定严格纪律和那样大刀阔斧，我倒要问问，这个整天笑嘻嘻、倒背手迈方步、没有一点男子气的人能把大桥建成吗？”

他感到大家众口一辞地热烈赞美是对他本人的嘲讽，实在气愤不过，于是拔腿奔回店里，落在他日常的座位上。因为坐在那里，他可以既看不见大桥，也听不见人们欢腾的喧闹声。

象他这样的人毕竟是极个别的。因为，人们这种欢乐的心情遍布城乡。十月上旬，阿利夫贝搞了个盛大的庆祝会，庆贺大桥落成。由于他待人彬彬有礼，很少发脾气，极其厚道，他经手

① 阿迦是土耳其达官贵人的尊称。

的造桥费用，一个子儿也没有落腰包，他在人们心中的威信很高，人们对他的赞誉甚至超过了丞相。所以他举办的庆祝会搞得轰轰烈烈，丰富多采。

他给工人和监工每人颁发了一些奖品，有的给钱，有的给衣物。他还办了一个盛大宴会，不拘什么人都可以参加，一直进行了两天。席间，人们开怀畅饮，载歌载舞，共祝丞相健康长寿。此外，还组织了赛马和赛跑，并把肉食和糖果分给穷人。在介于大桥和市中心的广场上，有几口大锅专门煎着油香饼，趁热分给老百姓享用。这种甜美的食品，有些人就是在开斋节也难得吃到。市郊乡民也无例外分享到一份，他们品尝油香饼的时候，都祝愿丞相健康，大桥长存。有些小孩没完没了地到锅旁来索取，掌勺的大师傅认出来后，不得不挥舞木勺把他们撵走，因为有个小茨冈人就是由于吃得太多而撑死了。

这些事长久铭记在人们的记忆中，和诸如河神及斯多亚和奥斯多孪生兄妹等有关大桥建造的传说，一直代代相传，这是因为在后来的几百年中，慷慨解囊的丞相和公正不苟的办事官已不多见，以至类似的盛会逐渐减少，甚至完全绝迹了。

大桥通车后头几天，人们趁着庆祝活动的余兴，都到桥上来漫步，他们来回不知走了多少趟。儿童们在桥上欢喜雀跃，年岁较大的人一面在桥上聊天，漫步，一面环视四周别有洞天的景色。身有残疾、行走不便的人和四肢瘫痪的人也坐着担架来了，因为谁也不愿意错过良机而不能躬逢其盛。他们当中最微不足道的人也觉得自己的力量忽然之间增强了许多倍，好象现在没有什么人间奇迹是他的体力和有限的生命所不能做到的了，好象除了已知的三要素：大地、水和天空，他又发现了一种新的要素，好象由于某人做了一件好事，人们心中最殷切的期望和长期

以来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能驾驭河水和空间了。

年轻的土耳其人开始在煎油香饼的大锅周围跳起“科罗”舞来，后来又跳到桥上，因为在桥上跳舞，使人大有凌空飞翔的感觉。接着，他们又跳到加比亚台上，并用脚跟蹬着新铺的石板，好象要试一试大桥是否坚固。他们紧紧地围成一圈，一刻不停地跳着，许多儿童也在圈外跟着起舞，有的还钻过飞舞的年轻人的胯下，跑到舞圈中央站着。对于这些儿童说来，踏上这样一座已经谈了多年的大桥和加比亚台，这还是生平第一次，他们曾听说，那个不幸的黑人被埋在台下的桥墩里了，他的鬼魂常在夜间出没。黑人生前在桥上工作的时候，他们就非常怕他，因此，即使在观看“科罗”舞的兴头上，一想起他，心头仍不免卜卜直跳。他们觉得，站在这座雄伟的新桥上，似乎久已离别自己的母亲和家庭，来到一群黑人中间，目光所及是美妙无比的大桥和令人眼花缭乱的舞圈。他们的心总离不开那个黑人，但又不能就此走开，不看加比亚台上的“科罗”舞。只有出现别的什么新鲜事，才能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开。

一个有点呆傻的青年，忽然爬上了大桥的栏杆。他是奈左开人，出身仕宦之家，姓特弗尔科雄奇，名叫穆拉，外号叫哑巴，人们常拿他开玩笑。孩子们于是跟着喧闹起来，这使大人们惊呆了，嚷着叫他下来，但他毫不在意，伸开两臂，头往后仰，在狭窄的栏杆上一步一步向前走，面部毫无惧色，仿佛不是走在深邃的河水上空而是在参加一个舞会。一群顽童和闲人跟在后面起哄。他哥哥阿利阿加在栏杆的另一端把他扶下来，狠狠地揍了他一顿。

不少人还沿着河岸，向下游走上一箭之遥，来到加拉达或美扎里诺地方，从那里眺望这座青山环抱、洁白如玉的十一孔桥翼

然凌架在青色的激流上，风景十分宜人。

这时，有人运来一块白色大石碑，把它立在高出栏杆三土耳其尺、位于加比亚台上的淡红石壁上。

人们在碑文前停留好久，但什么也看不懂，这时往往会走出一位半瓶醋的穆斯林神学家或一位粗通文墨的年轻人，他们常接受一杯咖啡、一块西瓜作为酬劳，或干脆给大家尽点义务，半通不通地把碑文结结巴巴念上一遍。

那些日子，碑上的诗文每天不知被人念多少遍。这首诗出自君士坦丁堡一个名叫巴第的诗人之手，上面记载了造桥人的姓名、出身和官衔，并标明工程完工于穆斯林历九七九年，也就是耶稣纪元一五七一年。巴第为别人写过不少琅琅上口的即兴诗，要价很高，但他有办法使那些搞了点修桥补路的豪门，为了给自己留个芳名，不得不屈从于他。他的熟友对他多少有点忌妒，他们带着嘲笑的口吻说，只有天穹还没有刻上他的大作。不过，酬金虽然可观，他仍然穷愁潦倒，总是显出一副捉襟见肘的穷酸相。大凡诗人往往如此，仿佛是填不满的无底洞。

由于这里的人文化程度低，脑筋太笨，又容易想入非非，每一个稍通文墨的人，都不揣冒昧，对巴第的诗文作一些自以为是的解释。因为象别的文章一样，这篇诗文一旦公诸于众，就永远留在那块石碑上，只好任人解释，哪怕他是白痴，还是存心惑众之徒，那也毫无办法了。每个旁听的人也往往只留心同自己意味相投的诗句。所以这首诗虽然明明刻在顽石上，有目共睹，但一经辗转相传，常常弄得面目全非，令人哭笑不得。

碑文大意如下："当代最伟大的圣贤——穆罕默德巴夏，实现了自己的宏图，在德里纳河上建起了这座大桥。可是在这条水深流急的河上，前人则是一事无成。望真主保佑大桥坚固耐用，

保佑穆罕默德巴夏终身幸福，万事如意，他一生花了不少钱修桥补路，使人们受益不浅。凡此种种，我巴第本人亲眼目睹，当此大桥落成之际，特赋诗一首，愿真主保佑这座举世无双的大桥！”

久而久之，由于见得多了，人们在桥上流连忘返，在碑文前洗耳恭听的那股热情便逐渐淡漠了。他们象桥下转瞬飞逝的流水一样在桥上来去匆匆，低头想着心事，无心过问其他，当初那股热烈劲早已化为乌有，好象这座桥同他们走过的其他道路毫无不同之处。同样，那块石碑也无人问津，变为一般了。

现在，左岸的大道已同右岸平地上的那条大路连接起来。破旧不堪的黑色渡船和脾气古怪的船夫已无影无踪，只有两岸桥孔下面的巉岩峭壁依然如故。过去，人们在这里艰难地爬上爬下，隔岸叫着渡船，心焦如焚地等待渡船到来，但往往十等九空。这一切都随着滔滔河水被征服，象梦一样逝去了。如今，在这些巉岩峭壁上面，架了一座既宽又长、坚如磐石的大桥，人们在两岸之间来来往往，与渡船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马蹄走在上面发出得得的响声，仿佛大桥是用一整块薄石板铺成的。

那些用木板造的水磨坊和给旅客过夜的简陋房舍也已无影无踪，代之而起的是一座坚固、豪华的大旅舍，接待的客人越来越多。旅舍的大门设计别致，两侧各有一扇窗户，窗栏是用整块石头凿成的，而不是铁制的。门内是一个长方形的大院子，足可存放客人的货物与行李。楼下有三十六间房间，每间房门都向着院子。马厩设在店后面的山坡下，也是用石头造的，其讲究的程度不亚于皇宫的马厩，使人赞叹不已。从萨拉热窝到安德利诺堡，方圆几百里，很难找出类似的旅舍。旅客可以不化一个钱，带着仆人和马匹，在这里住上一天一夜，而且免费使用炉火和热水。

这两座建筑物是大丞相穆罕默德巴夏捐资建造的。他六十多年前生于附近深山里一个叫做苏科罗维契的村庄，小时候同一群塞尔维亚小孩作为“血贡”被带到斯坦布尔。旅舍的日常开支来自“瓦科夫”基金会的收入，这个基金会是穆罕默德巴夏用从最近被征服的匈牙利虏获的财富建立起来的。

大桥和旅舍建成后，旅客在德里纳河渡口所饱受的艰辛困苦和种种不便也就随着消失了。可以想见，丞相在童年时代从波斯尼亚被带走、经过维舍格列渡口时所得的那个奇怪疾病——好象有个创伤要把他的胸膛撕裂——大概也随着消失了。然而他命中注定不能摆脱这种病痛，也不能有更多的时日去享受维舍格列两座建筑物落成后给他带来的快乐。这两项工程建成之后，还没有正式动用，还没有为世人所知时，穆罕默德巴夏又一次受到这种创伤的折磨，不过，这是最后一次了。

一天，星期五，他带了一批人来到一座清真寺前，刚要进门时，一个衣衫褴褛、疯疯癫癫的苦修僧向他迎面走来，伸出左手向他乞讨。丞相回过头来叫人给他一点钱，这时，那人忽然从右手衣袖内抽出一把匕首，向丞相的胸部猛刺。丞相的随从立即把他乱刀砍死。这样，二人几乎同时丧命，并排躺在清真寺前的灰砖地上。刺客身体魁伟，浑身是血。他四肢张开，似乎那股行刺的疯狂劲还未停息下来。丞相躺在他身旁，长袍的前胸敞开，缠头巾滚在一边。他晚年身体消瘦，背也驼了，暮气沉沉，面部呆滞。他现在袒着胸，光着头，浑身是血，缩成一团，酷似一个苏科罗维契的老农，一点不象不久前还统治着土耳其帝国的丞相。

几个月后，丞相的死讯才传到维舍格列。但因为是私下流传，人们都不敢相信。要知道在土耳其帝国，即使是邻国发生的

不幸事件，也是不准随意传播的，更何况是本国的事呢。况且，对于丞相之死，谁也不愿多谈。他的敌人既已把他害死，便想为他举行一个隆重葬礼，从此把过去对他的恶念一笔勾销。至于穆罕默德巴夏在斯坦布尔的亲属、同僚和党徒，他们也觉得尽量少谈前大丞相为宜，希望能因此而得到新统治者开恩，宽恕他们的过去。

有些人死了，有些人活得很好，有些人倒下了，有些人青云直上，但德里纳河上的两座壮丽的建筑物却不管这些，它们对商业和交通的发展，对维舍格列城乡的发展，开始发生影响。维舍格列很快便由山上移到水边，以大桥和称做"石房"的旅舍为中心，向四周扩展开去。

这样，大桥及加比亚台建成后，维舍格列也跟着发展起来。此后，大桥对于该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的影响，一直延续了三百多年。因此，简直可以说，大桥的存在及其伟大意义是永恒的。它对于该城的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如同亘古不变的高山大河，始终如一。月亮圆了又弯，弯了又圆，人类也世代相传，繁衍不息，它却永葆青春，如同桥下流水年年如此。当然，它也会衰老，但在时间上(要比人的一生，甚至比好几代人长远得多)不易被人察觉。它诚然也有消亡之日，不过这一天非常遥远，很难推测何日来到，因此，使人感到它是永世不衰的。

第五章

一百年过去了。这一百年不能算短，这期间，人类几经沧桑，

许多建筑物已不复存在，但设计考究、基础牢固的大型建筑物却没有什么变化，大桥、加比亚台和附近的旅舍仍旧屹立在那里，雄姿不减当年。看来，随着四季循环不已，人类繁衍不息，这两座建筑物还会安然无恙地度过第二个一百年。但意想不到的是，遥远的地方所发生的事件却起到了漫长的岁月所起不到的作用。

十七世纪末，在波斯尼亚人唱的歌曲当中，在他们的谈话和私下议论中，经常提到匈牙利。土耳其军队占领匈牙利一百年后，正在从那里撤出。撤退当中，许多波斯尼亚领主为保卫自己在匈牙利的领地而成了异乡之鬼。这种结局对他们说来还算是幸运的，因为其他领主虽然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但两手空空。他们曾在匈牙利占有大片领地，过惯了享乐的生活，现在回到波斯尼亚，等待他们的是贫瘠的土地，只能勉强度日。这次撤退对遥远的维舍格列也稍有波及，虽然谁也没有料想到匈牙利这个得天独厚的国家，同维舍格列小城的日常现实生活会有什么联系。然而事实却是如此。这次撤退当中，没有运回帝国的财产，除其他一些东西外，还有“瓦科夫”基金，而维舍格列的大旅舍正指望这笔基金来维持。

一百年来，维舍格列小城的居民和远方来客，经常光顾这个石头旅舍，已习以为常，从来没有人考虑过它有哪些进项以及这些进项的来源。大家都在使用它，好象它是路旁的一棵无主的果树，树上果实累累，谁都可以享用。他们每次来旅舍寄宿，都要祝祷丞相的灵魂永远安息，这已成为一种陈规。可是，丞相已经死了一百年，他们从不想一想现在由谁在守护和经管皇家的土地和“瓦科夫”基金的财产。这也难怪，世界上的事情虽然相隔千里也还那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一点谁能想到呢？因此，

旅舍的财源虽已断绝，城里的居民谁也没去注意。旅舍照常接待客人，仆役也还在应付门面。有人以为应该来的钱可能因为某种原因耽搁了，这种事过去也发生过。然而等了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钱始终没有来。仆役因干不下去而告退了。当时的旅舍经理达乌霍扎·穆德维利奇[②]向各方打听，但毫无回音。旅客们只好自己动手打扫房间，但他们打扫的范围仅限于自己和马匹占用的地方，而且每人走后都要留下一些粪便，房间里的陈设也弄得乱七八糟，由后来者去打扫和整理，正如他们自己刚来时也替前人清理一样。不过，每人留下的废物越来越多了。

达乌霍扎想尽了一切办法来挽救旅舍，使之维持下去。他起初把自己的钱拿出来使用，后来不得不向亲属告贷。这样，每年昂贵的修缮费用花了他许多钱。有人说旅舍根本维持不下去，责备他不该倾家荡产于这种傻事，他却认为自己做得对，因为他把钱借给真主了，况且他是经理，别人都已不闻不问，他可不能撒手不管。

达个人乐善好施，倔强固执，明知这样做根本不顶用，可是谁也说服不了他，所以很久以后，大家都还想念他。他忠于职守，一向认为人生在世，应当同各种恶劣的环境作斗争，同死亡和衰败作斗争，即使取胜的希望十分渺茫，也要坚持到底。旅舍的衰败眼看已成定局，有人劝他不要太死心，有人埋怨他太傻，他却答道：

"你们不要埋怨我。死亡对于我们来说只有一次，但对于那些伟大的人物，却有两次。一次是他们本人离开人世的时候，一

---

① "穆德维利奇"，土耳其语，意即慈善基业会理事，由于称呼惯了，"穆德维利奇"便成了他的姓。

次是他们创造的基业衰败的时候。”

天长日久，他连短工也雇佣不起了，虽然已到了风烛残年，他仍不得不自己动手去拔除旅舍周围的杂草和干些修修补补的零活。一天，他爬上房顶准备换一块碎瓦片，突然一下栽倒，就这样丧生了。可见，大丞相所创造的基业既然由于历史的演变而到了衰亡之日，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教士想凭借自己微薄的力量扭转乾坤，那是万万办不到的。

达乌霍扎死后，旅舍急趋没落，到处是一片破败的景象。阴沟堵塞，臭气熏天。房顶漏雨，门窗透风，马厩里粪便堆积如山，杂草丛生。但从外面看去，这座鬼斧神功的石头建筑物，依然是那样丰姿秀逸，似乎根本不会倒塌似的。旅舍底层尖顶式的大窗户上安装的一根根很细的、用整块轻质石块凿成的窗棂，依然完好如初，但楼上光秃秃的窗户已经显出无人照管的凄凉景象和内部杂乱无章。

人们渐渐地不再到城里来过夜，有的人宁愿花几个钱到乌斯达穆奇旅馆去投宿。石头旅舍的客人因而越来越少了，虽然到这儿来住，他们无须付住宿费，只消说几句话，祝祷丞相灵魂安息就可以了。问题已经很清楚，钱是不会来了，也不会有人愿意接这个摊子，大家，包括新来的经理在内，只好于心坦然，不再过问，旅舍于是空空荡荡，杳无人迹，象一切无人居住、无人照管的房屋一样，每况愈下，四周野草丛生，荆棘遍地，房顶上乌鸦云集，成了它们的栖息之所。

这样，丞相的这幢石头旅舍，由于意料不到的原因，突然无人过问而中途歇业(类似的事几乎都是突如其来的)逐渐成为一片废墟。

旅舍虽然由于特殊的原因而中道衰败，但那座大桥却无须

照管和维修，它依然耸立在那里，继续沟通两岸的交通，桥上的车水马龙，也一如当年。

由于年代悠久，桥墩上出现了一些孔穴和缝隙，孔穴成了鸟雀栖息的地方，缝隙里长出了一簇簇小草。那浅黄色的轻质石块也由于日晒夜露而有点风化了，此外，由于从山谷两面吹来的风不断袭击，由于雨水冲刷和骄阳曝晒，石块的表面渐渐变得象羊皮纸一样灰蒙蒙的，夜间看去已不那么光采夺目。

经常爆发的洪水是维舍格列的一大祸害，不过对大桥并没有什么影响。水灾常发生在春秋两季，危害的程度也每每不同。德里纳河每年至少要泛滥一两次，这时常可看到滔滔的河水从沿岸的田野和森林席卷而来的篱笆、树叶、树枝和树根以及红棕色的泥浆穿过桥洞。靠近河岸的庭院和店铺也多少会受到一些损失，不过仅此而已。

但每隔二三十年，总要发生一场特大的水灾，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正如暴乱和战争一样令人久不忘怀，而且成为人们回忆事情，计算房屋的寿命和人的年龄的标志。（譬如说："那是在大水以后五六年"，或"大水那年"等等。）

每次大水都把德里纳河和撒夫河之间的那条狭长的沙质平原上的房屋冲得七零八落，所剩无几，整个城市因而倒退若干年。人们的后半生往往是在修复家园中度过的，而且直到临死之前，只要一谈到那场洪水就谈虎色变。他们都记得，在风雨交加的秋夜，大家如何借着几点微弱的灯光，急急忙忙把商店里的货物搬出来，运往美以当山区别人家去寄存。第二天早上天色阴霾，人们从山坡上看着自己心爱的城市发怔，汹涌澎湃的洪水向街上直泻下去，水头高过房顶，把房顶上的木板一块块冲走。有的房屋没有倒塌，大家都在推测那是谁家的。

这样，即使在宅神节、圣诞节或把斋节的夜晚，那些白发苍苍、老态龙钟、饱经风霜的老人，只要一提到水灾（他们一生中最重要最艰难的时刻）就激动不已，絮絮叨叨说个没完。他们经过十五至二十年的省吃俭用，虽然已经重建家园，但一想起水灾，那场浩劫仍然历历在目，而且心有余悸。这些还健在的老人，已经越来越少，水灾使他们彼此之间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因为没有比虎口余生所结成的患难之交，更为牢固了，而回忆往事又可使他们的友谊更为增进。因此，他们很喜欢回忆自己一生中所经历的那次最不幸的遭遇，每次谈起来，总是滔滔不绝，口若悬河，那浓厚的兴趣简直使青年人无法理解。他们还互相补充，互相提醒遗漏的部分。他们睁着昏花的老眼面面相觑，沉湎在青年人所无法体会的往事中。他们兴致勃勃，侃侃而谈，把当前日常生活的烦恼丢在一边，专心致志谈论那场早已成为过去的浩劫。

他们坐在以前遭受过洪水之害而今温暖如春的房间里，不厌其烦地叙述某些感人的场面和悲惨的故事。故事越是悲苦辛酸，他们讲得越是眉飞色舞。他们有的抽着烟，有的喝着清淡的水酒，故事常由于年代久远，记不真切，被他们添油加醋，面目全非，神乎其神。但谁也不出来纠正，不但如此，大家还赌咒发誓，说事实就是这样。这是因为故事被编得锦上添花，人人都有一份。

那些老人就是这样在往事的回忆中来打发他们的晚年。他们还不止一次地对青年人说，象以前那样大的灾难现在没有了，但修桥补路的事也没有人做了。

维舍格列有史以来所经历的最大洪水发生在十八世纪的最后一年，这次水灾长久留在人们的脑海中，成为人们在多种场合

的话题。

据老人们后来回忆，那时已经很久没有闹过大水灾，所以谁也不记得前几次大水是什么样子。现在霏霏秋雨整天下个不停，大家深知水火无情，都警惕起来。他们把靠河最近的店铺全部搬运一空，夜里提着灯笼在河岸巡逻，一边注意流水声的变化，因为据老人讲，从那不同的哗哗声里，人们可以判断出未来水灾的规模：象每年常见的那样只是给城市造成一些很小的损失，这是多年不遇的，把城市和桥梁全都淹没，把一切建造不坚固、基础不牢靠的建筑物冲毁无余。第二天，德里纳河水没有上涨，大家于是安下心来。由于前一天晚上过于紧张没有睡好觉，所以一到天黑，大家便沉沉睡去。他们上当了。因为这时搬夫河突然暴涨，咆哮的河水挡住了德里纳河水的去路，使之无法宣泄。两条河于是越涨越高，威胁着维舍格列。

城里有个名叫苏里阿迦·奥斯马那吉奇的穆斯林富商，当时他有一匹很值钱的阿拉伯栗色纯种马。在德里纳河水无法排泄开始向城里漫溢前两小时，这匹马突然嘶叫起来。叫声惊动了奥斯马那吉奇和他的仆人，他们把它牵出紧靠河边的马厩，马才安静下来。这样城中居民才大都醒了。人们冒着狂风暴雨，在黑夜中立即抢救一切能带走的东西，逃离河岸。他们顾不得穿好衣服在齐膝深的水里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前走，背上驮着的孩子已被惊醒，眼泪汪汪。牲畜也吓得嘶叫不止。这时不断传来隆隆的撞击声，那是德里纳河水从被淹没的森林里卷来的树干和树根撞在桥墩上发出来的响声。

美以当山区是洪水到不了的地方，各家已经把灯点着，灯笼还在摇曳，微弱的灯光划破了夜空。家家户户都大门洞开，接待灾民，这些人一个个周身淋湿，怨声载道，他们手里领着孩子，怀

抱着应用物品。马厩里也生了火，屋里坐不下的人就在这里烤干衣服。

商业区的负责人把人们安顿好以后（他们把土耳其人安置在土耳其人家里，把基督徒和犹太人安置在基督徒家里），便来到阿嘉·利斯达诺夫家楼下的大厅里。各区区长和管事人员都聚集在这里，他们把同胞们唤醒并作了安排，自己也浑身湿透，疲劳不堪。这样，土耳其人、基督教徒和犹太人便齐集一堂了。来势凶猛的洪水和患难与共的遭遇，使这些因宗教信仰不同而老死不相往来的人，特别是基督教徒和土耳其人，互相走到一起来了。他们当中有苏里阿迦·奥斯马那吉奇，有富翁皮埃尔·博达诺维奇和莫尔多·巴波，有膀大腰圆、说话很少、但很风趣的正教教士米爱罗，有身体肥胖、老板着面孔的维舍格列城的穆拉霍扎·伊斯美，以及犹太教教士埃里亚·雷维，他又名哈吉里阿周，因性情爽直，头脑灵活而远近闻名。此外，还有十来位重要人物和三大宗教的代表。他们面色惨白，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表面上似乎很镇定，一边抽烟，一边谈论已经采取了哪些抢救措施，以及还应当做些什么。几个浑身淋得象落汤鸡似的青年不时走进来报告，说所有还活着的人都已转移到美以当山区的城堡后面，安置在土耳其人和基督教徒家里，并且说，山下的水还在上涨，街道逐条地被淹没了。

长夜漫漫，好象山下不断上涨的洪水一样，永无止境，那些富商大贾和各区区长开始喝点咖啡和烧酒来暖和暖和身子。他们暖暖和和地紧紧围成一圈聊起天来，开始过一种实实在在的新生活，然而这种新生活又恰似梦幻一般，因为过去没有过，将来也不会再有，大家不过是为当前洪水所困，临时齐集一堂而已。大家越谈越有劲，彼此也好象有个默契，对水灾只字不提，

连过去听来的有关以往几次水灾的情况也避而不谈，而只谈和洪水毫不相干的事情。

大家虽然处境艰难，但都竭力做出若无其事、甚至轻松愉快的样子。遇事如何保持镇静而不失体面，这在富商大贾和商业场中，自古以来就铸成了一些不成文的人人都遵守的规矩，形成了一种固步自封的默契。因此，在大难当前的情况下，大家都很谨慎检点，至少外表不流露出忧心忡忡、惊慌失措的神态，他们只是说说笑笑，谈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他们这样聊着聊着，渐渐把洪水忘掉，恢复了平静，开始好好休息一下，因为明天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这时，几个陌生人把一个年青商人柯斯多·巴拉那带了进来。他全身水淋淋的，两条腿由膝盖而下全是污泥，身上的腰带也不知到哪里去了。灯光晃得他睁不开眼，及至看到满屋子人，他有点局促不安，不明白自己在什么地方，于是低下眼皮看着地下，一面用手抹着脸上的水。有人给他让了座位，递给他一杯拉基酒[①]，但他发抖得厉害，酒杯也举不到唇边。他刚才冒着生命危险跳到波涛汹涌的洪水里，去抢救仓库里的货物，这引起了举座的低声议论。

他不是本地人，二十年前，他被人带到这里当学徒，后来同一个殷实人家结了亲，很快便发了迹。他虽然来自乡下，见的世面不多，但做起生意来，唯利是图，胆子极大，这些年来很赚了些钱，真是扶摇直上，一下超过了不少大户。他在生意上没有栽过跟头，所以经不起风浪。今年秋天，他抢购了大量李子和核桃，因为买的太多，自己能力有限，不得不借了一点钱。他本想在今年冬天把这批货高价卖出，自己不但可以把债还掉，而且能大捞

① 南欧及近东人喝的一种葡萄酒。

一笔，他去年也正是这样干的。可是现在一切都完了。

这个人给大家留下的印象，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消除。因为要说这次水灾给大家带来的损失，每人多少都沾一点，但谁也没象他那样冒冒失失，有失检点。这完全是由于大家禀性稳重，不象这个暴发户把握不住自己。

这些德高望重的人于是又把话题岔开，天南海北地闲聊起来。他们谈了一些年代久远的逸闻，与今天把他们围困在这儿的洪水毫无关联。

大家一面喝着拉基酒，一面谈着从前在维舍格列发生的各种各样希奇古怪、令人捧腹大笑的事情。讲述故事中，在恪守不谈水灾的原则上，教士米爱罗和哈吉里阿周给大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因为人们在无意中又谈到了过去发生的一次水灾，他们两人马上把话题转过来，只谈那次水灾中出现的有趣插曲，或经过若干年后，现在已不显得那么严峻的方面，因而巧妙地回避了大家所忌讳的话题。

话题后来又转到一个叫作伊奥凡的教士身上。他以前曾经在维舍格列担任过主教，教徒都说他为人正直，但很不走运，因为他的祈祷总不灵验。

事情是这样的：每当夏天，苦旱无雨，禾苗面临枯死，他便带着一帮人游乡串垄祈求上天下雨，但没有一次灵验，相反，求雨之后往往旱得更厉害，热得更厉害。后来，有年秋天，干旱刚刚结束，德里纳河突然猛涨，眼看一场洪水即将来临，教士伊奥凡又带领教徒来到河边，祈祷上天不要再下雨，河水不要再上涨。一个名叫伊奥吉奇的游手好闲的酒鬼，看到他祈祷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这时便走上前来大声嚷道：

“你不要祈求上天不下雨了，我的神父，你还是象夏天那样

求雨吧，结果河水肯定会退下去。”

身体肥胖的伊斯美埃芬蒂接着也讲了一个前人和洪水斗争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许久以前，德里纳河水正在向两岸泛滥，维舍格列的两个霍扎于是走出家门去向上天祈祷，希望能消除一场灾难。他们两人，一个住在城里地势低洼的地方，家里已经进水，另一个住在洪水到不了的山上。山上的那个霍扎首先祈祷，但水势并不见退，一个淡冈人看到自己家已经被洪水淹没，有点急了：

“求大伙儿行个好，把城里的霍扎请来，他家同我们家一样也被水淹了。这个山上的霍扎名为祈祷，可哪有一点真心实意的样子？”

面色红润、总是笑嘻嘻的犹太教教士哈吉里阿周戴了一顶压得很低的小圆帽，圆帽下面露出一撮撮卷曲的白发。他听了这两个笑话后不禁咯咯笑起来，对在座的基督教教士和穆斯林霍扎说：

“你们别再谈这些求神停雨的故事吧！否则大家会从过去的事例中得到启发，不管外面的雨下得多大把我们三人推出去祈祷。”

他们的这些故事，本身并没有多大意思，别人也不大懂，只有他们自己和他们这一代人觉得津津有味，其实这些故事不过是他们所熟悉的关于维舍格列日常生活的一些天真无邪的亲切回忆。那平淡无奇的生活十分美好，同时也非常艰苦，正是他们自己每天经历过来的。这一切，与今晚迫使他们在这里枯坐的倒楣遭遇相去悬殊，早已成为过眼烟云，但仍深深印在他们的心坎。

因此，这些人德高望重，从小饱经忧患，意志坚强，在这“洪水之夜”毫不惊慌，虽然大难临头，他们仍能说说笑笑，不会被洪水吓倒。

但是，在这种强颜作笑的外表下面，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忧虑重重，愁绪满怀，耳际时时回荡着山下城里传来的洪水咆哮和狂风怒吼，他们的全部家当都还留在那里，这怎能不叫人心焦如焚？这样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从美以当山上看去，山下已是一片汪洋，房屋全部被淹，有的连房顶也看不见了，有的还有一半露在水面上。大桥也看不见了，这真是他们平生从未见过，以后也没有见过的事。平地涨水十来米，所以不但淹没了高大的桥洞，而且漫过桥面。只有桥上的加比亚台还留在水面上，急流从那里经过时，激起一片浪花。

两天后，洪水忽然退去，天空放晴，阳光灿烂，温暖宜人，正是这块肥沃的地方每年十月间常有的天气。可是，在晴朗的天空下，人们在维舍格列城所见到的却是满目凄凉，惨不忍睹。河边茨冈人和穷人的房子被洪水冲得东倒西歪，许多房顶已经荡然无存，墙上的白灰和黄土也已不翼而飞，只剩下那纵横交错的柳树枝编的黑色躯壳了。

富人的房屋也好不了多少，庭院的篱笆没有了，大门洞开，窗户倒塌，墙上留下一道道泥水的红色痕迹，标志着洪水到达的高度。许多马厩被冲走，仓库坍塌。在地势低洼的商店里，污泥没膝，未能抢救出来的货物被压在下面。街道上到处是被洪水不知从哪里卷来的整株整株的大树和横七竖八给水泡胀的牲畜的尸体。

这就是人们还得下山去继续过活的维舍格列城。但是，在被洪水淹没过的两岸之间，在汹涌澎湃的河水之上，洁白如玉的大

桥依然如故，屹立在阳光下。河水仍高过半个桥墩，远远超过平常的水位，使人感到大桥好象换了一个地方。沿着栏杆的桥面部分积了一层烂泥，这些烂泥已被晒干并露出裂纹，加比亚台上也有一层烂泥和树枝，但这一切丝毫无损于大桥的雄姿。只有它安然无恙地度过了这场洪水。

大家立即紧张地忙碌起来，一面设法维持生计，一面重修家园。谁也没有功夫去考虑大桥胜利地经过这场水患有什么重要意义。但大家在这个遭殃的城市里到处奔波时，目光所及到处是一片残垣断壁，只有大桥凭借它那神功鬼斧的坚固结构，依然原封未动，稳如泰山，令人不禁感到，生活中确有某种东西能够抵御任何自然灾害的袭击。

水灾之后，严冬接踵而来。可是，人们在庭院和仓库里精心储藏好的柴火、小麦和草料等各类过冬必需物皆已被洪水冲走。此外，住房、马厩和院墙也亟待修复，商店里的货物已被冲毁，只好赊购一批货来维持门面。那个利欲熏心、损失惨重的投机商柯斯多·巴拉那因悔恨交加，在这年冬天郁郁而死，身后留下几个年纪幼小、孤苦伶仃的孩子，以及他在四乡欠下的尚未还清的零星债务。大家感到他的悲惨结局是自不量力唯利是图的下场。

到了夏天，这次大水所造成的破坏便在老人的记忆中淡薄了，虽然按理说他们是不应当忘怀的，青年人仍坐在洁白光滑的加比亚台上谈笑风生，歌声不断，桥下的潺潺流水仿佛在为他们伴奏。他们早已把那悲惨的景象丢到九霄云外了。治好人们精神上的创伤，最好的办法是忘记过去，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歌声最有效，因为歌声一起，便会把人们带到美好的境界中去。

这样，人们在蓝天、绿水和青山环抱中的加比亚台上，一

代一代地学会了对德里纳河的水患泰然处之的态度，学会了维舍格列小城所固有的对任何灾患都采取无忧无虑的处世哲学。因为他们觉得人生不可测，虽然一天天似水流年，走向衰竭，但却象德里纳河上的大桥一样能经得起任何风浪。

第 六 章

对大桥和加比亚台起过危害作用的，除水灾而外，还有一些其他祸患，这就是历史事件和社会动乱。不过，这些历史事件和社会动乱对于大桥的损害比洪水还要小得多，更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

上一世纪初，塞尔维亚爆发了一次起义。维舍格列小城由于位于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的交界地带，所以和塞尔维亚情同手足，历来同那里发生的事件休戚相关，遥相呼应。维舍格列地区不管发生什么事，比如收成不好，瘟疫流行，社会上出现动乱，爆发起义，乌吉寨的居民必然会有所反应。反之，乌吉寨地区不论发生什么事，维舍格列的居民也不会无动于衷。不过，一件事发生之初往往显得很遥远，显得无关紧要，而不能引起足够重视。说它显得遥远，是因为事情发生在贝尔格莱德辖区的另一头；说它无关紧要，是因为暴乱这种事人们已经司空见惯，也就不足为奇了。从奥斯曼帝国奠基以来，暴乱就连年不断，可以说没有公开暴乱和试图推翻它的地下活动，一个政权也就不成其为政权了，正如一个人在生意上如果不受挫折，总是一帆风顺，那他也成不了富翁。但日子久了，塞尔维亚境内的起义对整个波斯尼

亚，特别是对距离两个地区的边界只有一小时路程的维舍格列小城的影响，便越来越大了。

随着战火在塞尔维亚迅速蔓延，要求波斯尼亚的土耳其人把越来越多的人送到军队里去，他们为维持军队的装备和给养而承受的负担也越来越重。开往塞尔维亚的军队和运到那里去的辎重大都要经过维舍格列，这就给小城的土耳其人和塞尔维亚人增加了负担，带来了种种不便和危险。特别是塞尔维亚人，他们在这几年因为受怀疑而遭到的盘问和罚款，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厉害。到了夏天，起义军绕过乌吉寨，直下维舍格列，来到距离该城只有两小时路程的地方。他们在那里用大炮摧毁了佛勒都伏地方的吕特维贝宝塔，烧毁了赤伦恰的土耳其人房屋。

城里的土耳其人和塞尔维亚人都说他们亲耳听到了卡拉乔治[①]的大炮发出的隆隆声（当然，他们说这句话时，内心的想法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说，关于城里能听到塞尔维亚起义军炮声的说法还不怎么令人置信的话——因为这可能是人们由于对起义军过于惧怕或迫切盼望而虚构出来的——那末起义军夜间在巴诺山顶燃烧篝火却是千真万确的。巴诺山位于佛勒都伏和高斯蒂里埃之间，山势陡峭，寸草不生，只有山顶有几棵粗大的孤松，从城里看去，凭肉眼都可以把这几棵松树数得出来。这几堆篝火，土耳其人和塞尔维亚人都看到了，岂但看到，大家还细心观察了一阵子，但表面上彼此都装出没有看到的样子。有的人怕被人发现，躲在窗户后而，或藏在庭院里的黑暗中，长时间监视着，从篝火开始燃烧，一直到熄灭为止。塞尔维亚妇女则在

---

① 卡拉乔治(Karajeorge, 1776—1817)，塞尔维亚起义军领袖，意即黑大汉乔治，1804年揭竿而起，反抗土耳其人统治。

黑暗中画着十字，她们内心非常激动，无可名状，眼泪夺眶而出。她们含着热泪观看起义军的篝火，此情此景与三百年前相仿，那时，她们的祖先也在这个美以当山上，透过泪眼看一道道强光自天而降，落在拉底斯拉夫的坟墓上。

夏夜，天空和山林浑然一色，这些大小不等的篝火散布在黑暗深处，使塞尔维亚人感到似乎是新出现的一群星斗，他们如饥似渴地注视着，从那上面发现了一些毫不隐讳的兆头，他们战战兢兢地进而预卜自己的命运和未来的事态。土耳其人则觉得这几堆篝火是一场漫天大火的兆头，这场大火席卷了整个塞尔维亚后，现在已蔓延到离维舍格列不远的山头上。在这夏天的夜晚，这两种人都在围绕着起义军的篝火默默地祝愿和祈祷，不过各有各的打算。塞尔维亚人觉得这大火，能为他们消灭一切灾祸，同他们心头久已郁积的仇恨的火焰并无二致，因而祈求上帝让大火烧到他们这边山上来。土耳其人则在他们的祷告中请求真主阻止这场大火蔓延，把它抵挡回去，把它扑灭掉，使异教徒颠覆帝国的企图不能得逞，使真主所保佑的旧秩序与和平得以恢复。虽然夜深了，但人们到处都在悄悄地发表激烈的议论，接二连三流露出种种大胆的希望和设想。但这些五花八门的希望和设想并无现实根据，所以碰到一起，经过不了几个回合便不攻自破，于是人们只好对着维舍格列上空深蓝的夜幕望洋兴叹。第二天天明以后，土耳其人外出忙于自己事务，和塞尔维亚人在路上相遇时，各自心头的一腔怒火已经烟消云散，面部表情也已恢复平静，他们彼此打着招呼，说一些外省常用的多不胜数的客套话。这些客套话在维舍格列流行已非一日，男女老少全都袭用，根本不值什么，可是对于人们建立感情却挺顶用。

过了圣爱丽节不久，巴诺山的篝火熄灭了，起义军被赶出了

乌吉寨地区、土耳其人和塞尔维亚人外表都若无其事,谁也不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很难说清楚他们各自究竟想些什么。其实,土耳其人看到起义军被击退很是高兴,他们希望起义的烽火从此全部熄灭,希望藐视真主的罪恶行径就此告终。然而他们的心头仍然蒙着一层暗影,不能纵情抒发自己喜悦的心情,因为他们面临的一场危险刚刚过去,要把它全部忘记是不可能的。很久以后,他们当中许多人即使在梦中还看到起义军的篝火,在维舍格列周围的山头燃烧,从老远看去,恰如一群繁星,还听到卡拉乔治的炮声,那声音并不象是远方传来的低沉的隆隆声,而是把一切都夷为平地的轰天巨响。

对于塞尔维亚人说来,起义军的篝火从巴诺山上消失,当然使他们五内俱伤,大失所望,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在那不可告人的最隐秘的心底,他们还在怀念不久前发生的事情,心想这种事既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可见,他们还在怀抱着一股强烈的希望,这是被压迫者的一个很大的长处,因为这将迫使那些压迫他人的统治者做事理智一点。否则,如果他们一意孤行,丧失理智,他们的统治就必然会急转直下,开始走上垮台的道路,因为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将大大发扬自己的反抗精神和视死如归的斗争热情,这是他们同压迫者不断进行时而公开、时而隐蔽的斗争所仅有的两件武器。

这期间,大桥的重要性变得更为突出了,因为它是往来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唯一可靠交通要道。城里现在长期驻着一支军队,在起义军被击溃,地方恢复平静后,这支军队没有复员,由他们在桥上担任守卫。为了少受风吹日晒之苦,更好地完成警戒任务,他们在大桥中央盖了一座木板碉楼。碉楼的外形,所占位置和所用材料,都很不雅观。世界上的军队常常不计其

他，只图自己的一时方便，造出许多不伦不类的房屋，可是一到和平时期，这种房屋就同市民的日常生活很不协调，显得格格不入。碉楼的上层用椽子和大块木板钉成，非常简陋，下层是通道，宛如一条隧道。碉楼由粗壮的横梁支托着跨越桥面，两头落在大桥左右两边的平台上。碉楼下面，行人和车马可自由通行；碉楼的楼梯装在外面，楼上终日有士兵值勤，随时可以监视过往行人，检查他们的身分证和行李，必要时，还可以不让他们通过。

碉楼使大桥完全变了样。它全部遮盖了美丽的加比亚台，横卧在几根木梁上，恰似一只奇形怪状的大鸟伏在桥上。

造成碉楼那天，新锯的木板散发出来的味儿还很浓，走在下面可以听到脚步声的空荡回音。守卫队立刻搬了进去，第二天拂晓就抓了一批对碉楼未加提防的行人。

这天早上，天刚亮，碉楼下面就聚集了一些士兵和几个带枪的土耳其人，他们是夜间协助军队在城郊站岗放哨的。这群人中，有个人坐在一根木头上，他是守卫队队长。队长面前站着一位身材矮小的老人，他的打扮象一个云游四方的虔诚的基督徒，但衣着过于简单，很象一个乞丐。他神态安详，外表虽然潦倒，衣着倒还干净，举止也彬彬有礼。他白发如银，满脸皱纹，但手脚还灵便，总是笑嘻嘻的。这个古怪的老人名叫耶里其埃，是察依尼切地方的人。多年来他总是和颜悦色，郑重其事地在各处奔走，参拜教堂和修道院，参加教徒的集会和宗教的祭日，虔诚地祈祷上帝，守持大斋。土耳其当局对他一向不怎么注意，认为他是一个憨痴的基督徒，因而任他在各地行走，不管他到什么地方去，也不管他说什么话，都不加过问。

可是现在时代变了，塞尔维亚起义的烽火方兴未艾，各项规定不得不严格起来。况且，这几天，从塞尔维亚逃来几家土耳其

人，他们的财产已被起义军全部烧光。因此，他们到处散布起义军的坏话，要求报仇雪恨。城里各要道口增设了岗哨，加强警戒。那些站岗放哨的当地土耳其人，人人积怨在心，复仇心切，心情很不好，脸上露出一脸杀气，对任何人都不愿轻易放过。

老人是从罗加蒂扎大道来的，倒霉的是正巧赶上碉楼盖好，守卫队刚驻进去。而且他来的也很不是时候，天还没有大亮，容易引起别人怀疑。他手上端端正正举着一根挺粗的手杖，象是举着一支点燃的蜡烛，手杖上刻了一些奇怪的图案和文字。他象一只苍蝇堕入了蛛网，被碉楼里出来的士兵团团围住。一场盘问开始了。他们问他叫什么名字，干什么职业，从哪里来的，并要他解释手杖上的花纹和文字。但他并不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泰然自若，侃侃而谈，根本不把这些凶恶的土耳其人放在眼里，仿佛站在他面前的是公正的上帝。他说他这个区区小老头，什么也不是，不过是尘世间的一个过客，一个此时此刻从此路过的行人，一个阳光下的黑影。他说，他已到行将就木之年，他现在正从一个修道院走到另一个修道院，他要走遍所有的圣地，慈善基业，以及塞尔维亚国王和王侯的陵墓，以祷告来打发自己的残年。至于手杖上的花纹和文字，他说，那是塞尔维亚历史上和未来的各个自由盛世的象征。接着老人含而不露地微笑着说道，塞尔维亚王国复兴的日子为期不远了，而且，根据史书的记载，根据天上和地上所显示的种种迹象来看，这一天甚至很快就会到来。罪已经受够了，一个建立在真理之上的天堂般的王国必将再度出现。

“老爷，我知道，我讲的这些话你们一定听不入耳，其实，那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当然，我本来不应当向你们透露。不过，你们既然抓住我，一定要我把真实情况全部讲出来，那我只好从

命了。上帝就是真理，而上帝只有一个，现在请你们放我走吧，我今天还要赶到巴尼亚'三一'修道院去。"

翻译官谢可的土耳其文很蹩脚，他费了很大的劲也找不出恰当的字词把这些抽象的话翻译出来。守卫队队长是阿那都里地方的人，成天病恹恹的，他迷迷糊糊地听着翻译官翻出来的话颠三倒四，罗里罗嗦，简直听不懂，不时用眼睛瞟着那位老人。老人倒无所畏惧，但也不想使坏，他看着队长，虽然自己并不懂土耳其语，却对谢可的翻译频频点头。队长心中很清楚，他觉得老人只是一个愚顽的基督教苦修僧，一个性情随和无害于人的笨伯。守卫队的士兵以为老人那根奇怪的手杖是空心的，里面一定藏有秘密信件，于是把它折成几段，可是里面什么也没有。他们觉得，根据谢可的翻译，老人的话有点可疑，因为话中政治味很浓，图谋不轨的意图溢于言表。守卫队长倒觉得这个头脑简单的家伙没有什么了不起，本可让他走开，继续赶他的路，可是，在整个盘问过程中，还有几个军人和站岗的市民在场，其中有他手下的一个班长，名叫达吉尔，这个人眼角老是长着眵目糊，阴险毒辣，已经好几次在上级长官面前中伤他，说他麻痹大意，玩忽职守。此外，当然还有谢可，他的翻译显然完全曲解了老人的原意，加了许多不实之辞。可是这家伙是个奸细，一遇机会便向上司告发，即使毫无证据，也能把事情说得活龙活现。除他们两人外，还有几个志愿参加放哨的当地土耳其人，他们总是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满脸杀气，随意刁难过往行人，并擅自干涉队长的事务。这些无恶不作之徒现在都聚到一起来了。何况几天来，他们心里闷得要命，正苦于无法发泄那种报复、迫害和杀人的癖好。他们既然没有本事去杀自己想杀的人，便只好拿别人来出气。队长不明白他们为何这样视人命如草芥，不很赞成他

们的做法。可是他知道，他们已经商量好要在碉楼落成的第一天找个人来开张，他担心自己如果反对他们这种无事生非，草菅人命的做法，就会受到牵连。他想，要是他挺身而出为这个痴呆的老头辩护，给自己招来麻烦，未免有点划不来。因为老人关于塞尔维亚王国的说法，实在是当地的土耳其人所不能容忍的，何况他们这些天正在气头上，象蜜蜂看到自己的蜂巢被捣毁一样闹得很厉害。事情弄到这步田地是老人自己造成的，因此，他的前途是福是祸，只好听天由命了……。

老人被绑起来后，队长由于不忍看这种惨无人道的酷刑，正准备离开，到城里去避一避，这时几个守卫队士兵和土耳其人又带了一个衣衫褴褛的塞尔维亚青年来了。他的衣服已被撕破，脸上和手上有许多伤痕。他叫米雷，孑然一身，在利埃斯卡山区的欧苏尼扎照管一个水磨坊。他顶多十九岁，身体很结实，长得粗壮如虎。

这天早上，太阳还未升起，米雷把要磨的大麦放到磨里，打开了大水闸，然后便到磨坊上面的密林深处砍柴去了。他挥动柴刀，毫不费力地把榛树枝一根根砍下来。清新的空气使他神清目爽，手里的柴刀不由地上下飞动，轻捷麻利。他的刀磨得很快，他的力气又是那样大，细小的树枝在他手上算不了什么，所以每刀必断。他胸中憋了一股劲，每砍一下就喊叫一声。后来，这喊声越来越密，最后便连成一片了。可是，象住在利埃斯卡山的其他人一样，他的耳朵听音不准，所以不会歌唱，然而他不管这些，在这密林深处扯开嗓子唱着，说得更确切一点，大声喊叫着。他万念俱无，甚至忘记了自己在什么地方，专心致志唱一首从别人那里学来的歌曲。

这次塞尔维亚大起义，老百姓曾做了一首民歌：

当阿利贝格是一个青年将领的时候，
一个年轻的姑娘为他举着大旗。

后来改成现在这个样子：

当卡拉乔治是一个青年将领的时候，
一个年轻的姑娘为他举着大旗。

几百年来，两大宗教在波斯尼亚展开了形式特殊的大规模斗争，这场斗争名义上是为宗教信仰而起，实际上为的是争夺政权和土地，为的是把自己对于生活和社会秩序的见解强加给对方。在这场斗争中，敌对双方不仅互相抢夺妇女、马匹和武器，而且在各方流行的歌曲和许多诗歌也成了珍贵的战利品，被对方拿来为己所用。

上面这首歌，就是塞尔维亚人最近常唱的一首，每逢重大节日，他们便躲在房间里，避着土耳其人，悄悄地唱着。有些人住在土耳其人一年也不去一次的遥远的草原上，那里人烟稀少，生活虽然清苦、孤单，但自由自在，唱起歌来用不着怕这怕那，所以他们也常唱这首歌。米雷这个磨坊主的雇工刚才唱的也正是这首歌，但那个树林的上方有一条小路，是欧陆阿克和欧拉科瓦克地方的土耳其人到城里去的必经之地。

黎明的曙光已经洒满山顶，可是米雷呆的地方，由于林深叶茂，依然是黑糊糊的。他全身被露水打湿，由于夜间睡得香，早上吃了热乎的面包，工作又很轻快，所以身上仍感到暖洋洋的，没有半点凉意。他举起柴刀，贴近树根猛的一下，只见细小的榛树弯曲一下，折断了，那样子恰似一个少妇弯下腰来吻老公公的手似的。从树上稀稀落落洒了他一身冰凉的露水，由于树杈太

密，树干歪斜着倒在地上。他于是切里咔嚓把树上的小树枝全部砍掉，一面大声唱着那首歌，歌词中的“乔治”，“年轻的姑娘”和“大旗”，他唱得特别起劲。虽然“乔治”是怎样一个人，他还一无所知，但他觉得他一定是一个胆略过人的英雄。“年轻的姑娘”和“大旗”，也是他从未见过的，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说来，这正是他所梦寐以求的：他盼望有一个年轻姑娘做伴，并由她举着大旗。总之，这几个词他唱得津津有味，使出全身的劲唱了一遍又一遍，越唱越有劲，越唱声音越高。

天还没有大亮，他就这样在树林中一面砍柴，一面引吭高歌。随后，他拖着打好的柴禾走下潮湿的山坡。磨坊前站了几个土耳其人。他们已把马匹拴好，仿佛在等候什么。他们有十来个人，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他忽然又回到了刚才去打柴时的样子，衣衫褴褛、举动笨拙，局促不安，什么“乔治”，什么“年轻的姑娘”，什么“大旗”，通通从他的脑际消失了。土耳其人等他放下柴刀，从四面向他冲上来，经过一场搏斗，他们用长长的缰绳把他捆住带往城里。他们一路不断地对他拳打脚踢，问他还想不想“乔治”，还想不想“年轻的姑娘”和“大旗”了。

天将拂晓，加比亚台的碉楼下面，那个疯疯癫癫的老人刚被捆好，守卫队士兵的周围已经站了一群城里来的人。他们当中有几个是从塞尔维亚逃到这里来避难的土耳其人。他们全都手持刀枪，凶相毕露，如临大敌。朝阳冉冉升起，地平线上，高勒士上空飘浮着一片片淡红的云朵。他们越来越怒不可遏。在他们的眼中，这个惊恐失色的年轻人简直成了起义军的首领，虽然他一贫如洗，衣不蔽体，虽然他来的地方——德里纳河左岸——并没有起义军的足迹。

住在欧拉科瓦克和欧陆阿克的那几个土耳其人，对年轻人

的胆大妄为感到非常愤怒，他们一致证明他藐视土耳其当局，刚才在路旁唱了一首歌颂卡拉乔治和基督教起义将士的歌曲。根本不相信他这样做是事出无心。说实在的，他并不象一个会做出来什么惊天动地事业的乱世英雄。他战战兢兢，遍体鳞伤，身上穿着露水打湿的破衣裳。他脸色惨白，因为精神上受到突如其来的打击，目光有点呆滞，他望着守卫队队长，好象希望他能搭救他一把。他很少进城，不知道桥上已经建了一个碉楼，因此，环顾四周，觉得一切都很奇怪、陌生，以为他是在做梦，梦见自己到了他乡，遇到了一群无恶不作的歹徒。他眼睛看着地下，叽哩咕噜地说他只是一个在一家磨坊里帮工的穷伙计，什么也没唱，从未冒犯过土耳其人的尊严，刚才去砍了点柴，不知为什么被人带到这里来了。他很害怕，全身发颤，确实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记得不久前自己还在山溪旁呼吸着新鲜空气，怡然自得，后来不知怎么忽然被人拳打脚踢，五花大绑，给弄到加比亚台上，成了众矢之的。一大群人围着他，要他回答问题。他自己也记不清是不是真的唱过什么，哪怕是最一般的歌曲。

那几个土耳其人一口咬定，说他刚才的确唱了起义军歌曲，他们是从那里路过时听到的，后来他们去捆绑他时，他还顽抗呢。他们每个人还向守卫队长赌咒发誓，说这件事千真万确。

“你敢向真主发誓吗？”队长问道。

“我向真主发誓。”他们一个个答道。

“一点不错吗？”

“一点不错。”

他们这样往返问答了三次，队长便让米雷紧挨耶里其埃老人站着，一面派人去把还在睡懒觉的刽子手叫来。米雷呆若木鸡，不知所措，他眨巴着眼睛，流露出腼腆的样子，因为大白天，

在众目睽睽之下，自己孤身一人站在大桥中央，实在还是有生从来没有过的事。老人看着他，一面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米雷。”他低声下气地答道，好象还在答复那些土耳其人的问话。

“米雷，孩子，我们来亲个吻。”老人垂下那满是银发的白头，落在他的肩上。“我们来亲个吻，画个十字，以圣父、圣子及圣灵的名义，祈祷。阿门。”

老人要画个十字，为米雷祈祷，不过他双手被捆，十字是画不了的，只是用嘴说了一下，而且说得很快，因为刽子手已经走过来了。

刽子手是一个普通士兵，很快便把两条人命结果了。这一天恰逢赶集，所以最早从山里出来赶集的人经过大桥时，可以看到两颗头颅赫然挂在碉楼旁新立的长木杆上。他们被斩首时溅在桥上的鲜血已用石子盖了起来。

碉楼就是这样“开张”的。

从这一天起，凡在边区地带或在桥上被掳获的起义人员和可疑分子，都被带到加比亚台上来审问，行刑。被带到碉楼下面来的人，只要一给捆起来审讯，便很少有生还的希望。这些参加起义的人或不知怎么落在那班老爷手中的人便在这里砍头示众，砍下来的头颅就挂在碉楼四边的木杆上。至于他们的尸体，如果没有人花几个钱前来认领，抬去埋掉，就从桥上扔进德里纳河里。

在这烽火连绵的年代，遭到这样的厄运，被扔到德里纳河的人真是不少，据说这样做可以“让这些无头尸到水里去重找一个比较理智的脑袋”。那两个无辜的一老一少——象他们这

样的人，在无知的广大人群中比比皆是——完全是由于自己说话考虑欠周，行事不慎这种非常偶然的因素，成了最先的牺牲品，后来接二连三，连续不断，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是这样被卷人时代的大风暴，一头栽了进去，结果丧了性命。小伙子米雷和老人耶里其埃这一对亲如手足的兄弟，在同一个地方被同时处决，他们的头颅首先成了加比亚台上守卫队碉楼的点缀品，后来，在起义军的烽火全部平息之前，这种陈设一直没有间断过。这两个默默无闻的无辜的牺牲者长久铭记在人们的记忆中，印象非常深刻，长久不衰，远远超过了那些被处决的知名人士给人们留下的印象。

由于作恶多端、声名狼藉的碉楼占据了加比亚台，人们再也不到这儿来聚会聊天，台上原先的歌声笑语早已绝迹。土耳其人到这里来时也觉得索然无味，没有多大意思，塞尔维亚人更不用说了，他们只在迫不得已时才从桥上经过，而且总是低着头匆匆而过。

天长日久，碉楼的板壁成了灰黑色，四周很快笼罩了一种长期驻扎军队的营房所固有的气氛。士兵在横梁上晾晒衣服，每天把粪便、脏水、废物以及营房里一切污秽不洁的东西倒进德里纳河里。所以洁白的中央桥墩上留下了一道道细长的污痕，从远处看去清晰可辨。

担任刽子手的人，一直是那个普通士兵。他是阿那都里人，身材魁梧，棕色头发，眼睛发黄，浑浊不清，嘴唇很厚，满脸是肉，略带土色。他总是笑呵呵的，心里毫无牵挂，十分轻松。他叫阿兹路了，很快便名扬全城及边区一带。他很乐于干这一行，并且有点沾沾自喜，因为不管怎么说，他在这方面确实非常内行，每次都做得干净利落。城里的居民说他的手行刑时比理发师穆沙

纳还要麻利。他的名字老少皆知，每次听人谈到他，人们都不寒而慄，一面也唤起一种不可思议的好奇心理。如果天气晴朗，他便整天坐或躺在碉楼下面的荫凉里，不时站起来在挂着人头的木杆周围转上一圈，好象园丁在观看自己的瓜果长得怎样，随后又踱回荫凉下的木板旁。由于呵欠连天，两眼发涩，于是伸伸懒腰，象一条牧羊人的老狗一样，懒洋洋地两腿一伸躺在木板上。一群顽童躲在大桥一端的墙壁后面，胆怯地看着他。

但他行刑时，就不象这样无精打采了，相反，他动作非常敏捷，全力以赴，一点也不走神。他不愿意旁人插手。可是，随着起义的烽火越烧越烈，这往往是不可避免的。有一次起义军一把火烧光了维舍格列附近的几个村庄，土耳其人怒不可遏，他们不仅把参加起义的人、起义军的暗探及他们认为嫌疑犯都抓来交给守卫队队长处决，而且在狂怒之下，纷纷要求参加行刑。

一天天刚亮，维舍格列敏区的教士米爱罗的头颅也被挂在大桥的木杆上了。他在大水那年还面对滔滔的洪水毫不惊慌，同犹太教教士和穆斯林霍扎开过玩笑呢。可是现在他竟成了土耳其人与塞尔维亚人不共戴天的牺牲品了。几个小茨冈人还把一支雪茄插在死者的嘴里。

这种听任别人随意行刑的事，阿意路丁一向坚决反对，极力阻挠。

后来，胖子阿意路丁突然被煤气熏死，一个比他大为逊色的新手接替他继续干了一时期。在塞尔维亚的动乱平息前的几年内加比亚台上每天总挂着两三个人头。可是在那动荡不安的年代，人们的意志已磨炼得十分坚强，加上这种事已是司空见惯，所以每次从人头下走过时，谁也不大惊小怪，谁也不去注意，有时甚至全然忘却为什么要把这种血淋淋的、阴森可怖的东西

挂在那里。

塞尔维亚和边区的局势安定后，碉楼存在的意义也就自然消失了。虽然行人早已在桥上自由通行，不受盘问，但守卫队依旧还呆在碉楼里。军队里的事，处理起来向来是慢腾腾的，这种情况在土耳其军队中尤为突出。如果不是一天夜里人们忘了吹熄蜡烛造成了一场大火，这种不伦不类的局面还不知道要拖到哪一天为止。由于碉楼是用易燃的木料建成，加上天气炎热，烤得很干，所以一把火烧得精光，只剩下加比亚台和桥上的石块没有烧掉。

人们从城里遥看那熊熊大火，不禁暗暗称快。火光不仅把洁白的大桥照得通明，而且也照亮了周围的山岭，在水面上形成了纷乱的倒影。第二天早上，几年来把加比亚台盖在下面的那个笨重的木头房子已经无影无踪，大桥又恢复了原来的面目。桥上洁白的石块由于烟熏火燎而有点发黑，但很快就被雨雪冲刷干净。这样，碉楼以及与之有关的那些冤案便只剩下一些辛酸的回忆还残存在人们的脑海中，这些回忆后来也越来越淡薄，不久就随着这一代人的相继去世而完全消失了。此外，只有一段烧剩的橡木桩还残留在加比亚台阶梯的石缝里。

加比亚台在维舍格列城的地位又恢复到了当年的样子。小贩又带了他的炭炉和杯盘器皿，在大桥左边的平台上卖咖啡了。大桥唯一遗憾的是喷泉不流了，因为喷水龙头被弄坏了。人们又到“沙发”上来停留，在那里闲聊天，谈生意或打瞌睡。夏天的夜晚，年轻人三五成群在那里放声歌唱。有些青年由于失恋，由于迫于某种情势的需要而要远走他方，或生活中遇到了异常重大的问题——这种情况的出现往往是由于他们的生活圈子过于狭小——也常到加比亚台来枯坐，借以排遣心头的苦闷和不舒

畅的心情。

上述事件过了二十来年，新的一代又出现了，人们在桥上载歌载舞，谈笑自如，他们已经不记得那奇形怪状的碉楼，也不记得守卫队在夜间如何粗声粗气盘问行人，甚至对阿意路丁那个刽子手及其高超的杀人绝技也没有任何印象了。

只有几个老妇，在追逐一群偷了她们的桃子的顽童时，还厉声骂出这样的话来："愿上帝把你送到阿意路丁那儿去砍掉你的脑袋！让你母亲到加比亚台上去认领！"

小孩跳过篱笆逃走了，他们不可能懂得这句话的真实含意。当然他们也明白那决不是一句好话。

人们在大桥附近一代一代繁衍生息。尽管人们由于行事考虑欠周，往往只图一时之快，因而在桥上留下了一些污垢，但这些污垢很快便荡然无存。这样，大桥的雄姿一如当年，它是万古不变的。

第 七 章

光阴流逝，大桥和这个城市又经历了多少岁月，几十年又过去了。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几十年功夫，土耳其帝国就象犯了慢性寒热病那样逐渐衰落下去。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些年代虽然有过忧虑和恐惧，遭受过水旱灾害，发生过致命的瘟疫，出现过各种动荡，但总的说来还是比较宁静和安乐的。不过，所有这些事件都是缓慢而逐渐地发生，只是在长期平静中的短暂波动而已。

波斯尼亚和贝尔格莱德两个巴夏辖区①的界线，恰好穿过这个城市的山岭。这些年来，这个界线越来越分明，从表面上和实际意义上都成了两个国家之间的边界。这种情况改变了波斯尼亚整个地区以及这个城市的生活状况，对于商业、交通、人们的思想以及土耳其人与塞尔维亚人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影响。

年老的土耳其人皱着眉头，眨巴着眼睛，对这一切变化不愿相信，仿佛在希望这种不如意的情景烟消云散；他们怒气冲冲，咬牙切齿，一起商量研究，想借此在几个月内忘掉这种情景，直到不愉快的现实重新唤醒他们，使他们又感到惶恐不安的时候为止。

春季里有一天，从边界下来了一个佛勒都伏的土耳其人，坐在加比亚台上，情绪十分激动，对聚集在那里的一些土耳其贤达讲述佛勒都伏发生的情况。

这位佛勒都伏人对他们说：去年冬天，鲁阳地方的一个声名狼藉的军事长官，名叫伊奥凡·米契奇，率领一支武装队伍，从阿里尔来到他们村庄上面的高地，在那里察看边界，并进行丈量。当人家问他到这里来的目的用意，他用傲慢的语气回答说，他的目的来意，用不着告诉任何人，更用不着告诉波斯尼亚的反基督徒。如果非知道不可，那就明说了吧，他是米罗什亲王派来的，看看边界应当划到哪里，塞尔维亚的疆土应当扩展到哪里。

这位佛勒都伏人接着说：我们当时以为这个基督教徒喝醉了酒，在那里胡言乱语。我们早就认识他，是个十足的歹徒，寡廉鲜耻的家伙。以前我们把他当作一个蠢货而置之脑后，不屑

① 巴夏是土耳其等国高级文武长官的尊称，每一个巴夏管辖一定的地区。

一顾，没想到时隔不到两月，他又出现了，而且这一次还带着米罗什亲王的一大队宪兵和土耳其苏丹的一个代表，这个代表是斯坦布尔人，脸色苍白，软弱无能。我们当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是，那个代表对我们证实了一切。他羞惭地低下眼皮，然而斩钉截铁地说：根据帝国政府的命令，米罗什代表苏丹，统治塞尔维亚，并让我们来确定他的管辖区四至的边界。当那个代表的手下人沿着特布勒比查下面的山坡栽上木桩的时候，米契奇跟在他们的后面把木桩一根根地拔掉。这个基督教徒（但愿这家伙喂狗去吧！）大发雷霆，朝那个代表扑上去，象叱责仆人一样对他咆哮如雷，并且恐吓要把他处死。他说边界不是在这里，边界早就由土耳其苏丹和俄罗斯沙皇确定过了，并就此事给米罗什亲王下过诏书；这个边界现在经由兰河①直达维舍格列桥，然后顺着德里纳河划下去；所以这块地方完全属于塞尔维亚。他还说这只是暂时的，因为以后还要把边界再向前推进。那个代表极力劝说了他一番，好不容易才把边界确立在佛勒都伏的山岭上。事情至少暂时不了了之。不过，自从那时候起，我们心里总是七上八下，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们曾经和乌吉寨的人谈到这些问题，但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以及结局如何。那位年老的左科霍扎曾经两次到过麦加圣地，今年已经九十开外了，他曾断言，用不着一代人的时间，土耳其的边界会远远退到距此十五站地的黑海边上。

维舍格列的那些土耳其社会贤达听了佛勒都伏人的叙述，表面上似乎若无其事，然而内心都感到惶惶然。佛勒都伏人的话使他们坐立不安，他们用手紧紧抓住石凳，仿佛有一股无形却

① 德里纳河的支流。

强有力的水流在冲击和摇撼着他们身下的大桥似的。他们一面抑制着自己的情感，一面找一些话来宽慰自己，降低这个事件的严重性。

他们不爱听不好的消息，不喜欢想不愉快的事情，不愿意谈严肃而且伤脑筋的话题，但是他们自己预感到来势不妙，凶多吉少。他们不能否认那个人所说的话，但也不知道如何安慰他，鼓励他。所以他们只希望这个乡下人回到他的佛勒都伏高地去，把他带来的坏消息也一起带回去。这样，忧虑固然并没有减少，但是至少已远离此地了。当那个人真的走了以后，他们很高兴，还象过去一样，安详地坐在加比亚台上，不再去谈那些使人难受和瞻望前途不寒而慄的问题，至于山后发生的严重事件，就让时间去把它冲淡吧。

时间居然完成了它的任务。表面生活一点不变。不过，自从那次加比亚台上的谈话以后，过了三十多年，土耳其苏丹的代表和鲁阳的军事长官在边界上所竖立的木桩已经根深蒂固，而且结出了晚熟的果实，这些果实对土耳其人来说是苦涩的，因为土耳其人不得不放弃他们在塞尔维亚最后的几个城市。夏季有一天，维舍格列桥上挤满了从乌吉寨跑出来的一大帮可怜的逃难者。

那时天气炎热，但夜色宜人，由商业区来的土耳其人熙熙攘攘，聚集在水上的加比亚台。驴子驮来了一筐筐甜瓜。这些成熟的甜瓜和西瓜，白天经过冰镇，到了晚上，人们没事，就到“沙发”台上来买瓜吃。往往两个朋友彼此打赌，猜西瓜里面的瓤是红的还是白的，当场切开，输的人出钱，然后一起吃瓜，高声谈笑。

夕阳西下，石砌的平台余热未消，河水却散发出一股凉气。河中闪闪发亮，两岸柳树成荫，郁郁葱葱。夕阳把周围的山坡

染成嫣红，色调有深有浅。在山岭上空，从加比亚台上一眼就可以望到的西南半部，是一片夏日浮云，色彩变幻无穷。这些浮云是加比亚台的夏日美景之一。每当天刚放曙，红日升起的时候，山背后就浮起一朵朵银色、白色、灰色的密云，形成光怪陆离的幻景，又象华屋上面大大小小、五光十色的穹顶。这些云彩不断麕集成了厚云，终日不散，一直停留在被太阳染红的城市周围的群山上空。因此，黄昏时分，坐在加比亚台上的那些土耳其人，老是看到这些云彩，宛加苏丹的白绸营帐，使他们隐约又看到了当年南征北战的情景：何等不可一世，穷奢极侈。当暮色遮没了城市周围的夏云，这时候，天空中的星光月色，交相辉映，又形成了新的幻景。

加比亚 台上的这种奇异景色只有在夏天，而且只有在黄昏这个时候才显得更加美丽。当你举目远眺，犹如置身于魔术师的秋千板上：既能在地上行走，也能在水上航行，又能在空中飞翔，而且始终稳坐在自己的城市和自己的白色房屋之中，房屋周围还有自己的花园和李树园。这里的许多普通市民基本上都有这样一所房子，此外在市区中还有一个小铺子，他们在这种时刻一边喝咖啡，一边抽烟，感到世界是富有的，上帝的恩赐是无穷的。所有这一切，只要一座巨大建筑就能给人类提供，而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这座建筑必须是富丽坚固，设计适时，地点得当，顺利完工。

我们经历过这样一个夜晚，居民们彼此之间或者同过路人尽情谈笑。

有一个年轻人，身材矮小，体格健壮，外貌奇特，大家最喜欢同他开开玩笑，人们叫他独眼龙沙尔科。

独眼龙是一个吉卜赛女人和一个阿那都里的士兵或军官生

的儿子。这个军人以前曾在这个城市里服过役，但他不想要这个孩子，因此，在独眼龙出生以前，他就离开这个城市。不久以后，独眼龙的母亲也死了，这个孩子举目无亲，是全城的人把他抚养大的，所以他是属于大家而又不属于任何一个人。他在商店里和市民家里替人干些杂活，别人不愿干的活他都干，清掏沟渠，掩埋废物或水里冲来的一切脏东西。他从来没有自己的家，也没有姓，更没有一定的职业。他在哪里找到吃的东西，就在哪里站着或走着吃，他睡在屋顶的阁楼上，穿的是人家给他的五颜六色的破烂衣服。他幼年就失去了左眼，外表虽然古怪，却是一个老实人，生性快活，又很能喝酒；他为全城效劳，既替人干活，又供人开心。

独眼龙身边围着几个年轻人，他们都是些商人的子弟，嬉皮笑脸，对他开些粗俗的玩笑。

空气中散发着熟甜瓜和烤咖啡的香味。这时，夕阳虽然已经西下，但是，莫利夫尼科上空还看不见那颗闪闪发光的巨星。事情本来极为平常，但人们却预感到可能要发生令人震惊、非同小可的大事，果然，就在这个时候，桥上出现了乌吉寨的第一批逃难者。

大部分男人都是弯腰徒步，满身灰土仆仆，妇女们骑着小马，蒙着头纱，瞪着眼睛，小孩则拴在包裹或者箱子上面，时或看见一个比较显要的人物，骑着一匹比较象样的马，但是，同样也走得很慢，垂头丧气，如丧考妣，明显使人看出他们身遭不幸，流落他乡。有的人用绳子牵着唯一的一只母山羊，有的人手里抱着一只小羊羔。大家都不说话，小孩也不哭。人们只听到马蹄声和行人的脚步声，以及快要压垮的马背上的铜器木器相撞而发出的单调声。

出现这些疲惫不堪、颠沛流离的人，使加比亚台顿时黯然失色。老年人坐在石凳上不动，年轻人却一个个站起来，在加比亚台两边形成了两道人墙，目睹他们鱼贯而行。这个城市的人，有的只是心怀同情，一声不响地望着这些流离失所的人，有的对他们表示欢迎，请他们停下来吃一点东西，然而，那些逃难者对人家递给他们的东西连看都不看，对人家欢迎他们的话，几乎也不答理。他们一味赶路，要在天黑以前赶到奥克里德去歇脚。

他们总共有一百二十户左右。一百来户准备上萨拉热窝，那里大概会有安身之处；还有十多户就留在这个城市，这十来户一般在这里都有家。

这些困顿不堪的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在加比亚台上停留了一会，看来是一个无家无业的穷汉，他停下来喝了许多水，并接受了人家给他的一支雪茄烟。他满身尘土，眼睛火红，不停地东张西望。他一面拚命地抽烟，一面目光闪烁，令人烦厌地四下张望。有些人怯生生而有礼貌地向他问话，他也不回答，只顾用手拂拭他的长胡子，简短地道了谢，显出疲劳不堪的样子，流露出背井离乡的辛酸心情，然后，他用黯然神伤的目光突然向大家一望，说了几句：

"你们坐在这里玩乐，你们不知道斯这尼土瓦出了什么事。我们现在到土耳其土地上避难来了，但是轮到这块地方的时候，你们同我们又往哪里逃呢？谁也不知道，你们这些人没有一个想到这件事。"

那个人突然停住不说了。他所说的话，对这些不久以前还是无忧无虑的人，已经够多了，但对他自己，又嫌太少了，他满怀愁思，不能不说，而又不能尽所欲言。最后，还是他自己打破了

这种痛苦的静默，向大家告别道谢，然后，急急忙忙去追赶大伙。加比亚台上的人都站立起来，向他高声祝福。

这一天夜晚，加比亚台上完全笼罩着一种沉闷的气氛，一个个颓然若失，默默无言。那个独眼龙坐在一个石头台阶上，也一声不响，呆若木鸡。他把打赌赢来的西瓜都吃光了，身边扔满了瓜皮。他用手托着头，眼帘低垂，神情沮丧，若有所思，仿佛不是在看他眼前的石头，而是在遥望茫茫的前途。桥上的人陆续走开，提早散场。

可是，一到第二天，一切又和往常一样，因为，这个城市的人不愿意去回想不幸的事情，更不愿意杞人忧天。他们的内心深处这样想：实际生活不是平安无事地过来嘛，干吗还要打破平静去追求另一种实际不存在的更稳定的生活，这岂不是发疯，而且徒劳无益。

十九世纪中叶二十五年时间，萨拉热窝发生了两次瘟疫和一次霍乱。那时候，这个城市按照传统习惯，遵循穆罕默德对信徒们在瘟疫流行时所规定的信条："不要去瘟疫流行的地方，因为可能被传染；如果你的所在地发生瘟疫，也不要离开自己的地方，因为你可能把疾病传染给别人。"其实，如果当局不采取强制措施，即使求助上帝使者的权威，人们往往也不遵守这些极为有益的信条。所以每逢瘟疫流行，当局往往限制或者完全禁止旅客和邮件的通行。在这期间，加比亚台上的生活面貌完全改变了：不管忙人或者闲人，不管是俯首沉思或低声歌唱的人，什么人都不见了，在荒凉的"沙发"台上，同动乱和战争时期一样，重新设置了岗哨。卫兵们拦阻从萨拉热窝来的旅客，对这些旅客挥着枪，高声喊叫，要他们折回去。那些卫兵小心翼翼地接过驿卒送来的邮件，在加比亚台上点起"香木"，让它冒出白色浓

烟。然后，用钳子把一封封信件夹起来，放在烟里熏，这样经过消毒的信件立刻往远处递送。至于货物一概不收。当然，他们的主要任务不是处理信件，而是对付行人。每天总有一些人要过桥，旅客、商人、信使、流民都有。桥头就守着一个卫兵，老远看见有人要过来，就对他们打手势，不许他们再向前走近。有的立刻停步，有的却竭力申辩，都说自己非进城不可，都保证自己象眼睛一样健康，因为霍乱是发生在萨拉热窝某个地方，让它见鬼去吧，自己与霍乱毫无关系。旅客们一面解释，一面渐渐走到了桥中央，靠近加比亚台。那里的卫兵也过来搭腔；由于彼此相隔几步远，所以争辩的时候，声调很高，并且还带比划。他们之所以大声喊叫，还有另一个原因，因为驻守在加比亚台上的卫兵整天喝酒，吃白葱头，这两样东西一般认为能抵抗瘟疫，值勤时可以享受这种权利，他们也就尽情享受。

有许多过客，向守桥士兵苦苦哀求，想说动他们，但没有达到目的，只好垂头丧气地从奥克里德大道返回去。不过，也有些善于坚持和周旋的人，在加比亚台呆上几个钟头，窥伺时机，心存侥幸，希望卫兵一时疏忽大意，或者趁某种意外机会。假使偶然遇到城里的守卫队长沙尔科·艾多在那里，过客们就大倒其霉了。艾多不仅确有实权，而且又忠于职守，不管人家如何求他，他既不看一眼，也不好好听，只是按照现行法令规定给对方以恰如其分的安排和处置。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等到任务执行完毕，他更是一句话也不说。过客对他的哀求或恭维都是白费力气。

“将军，我很健康……”

“那么好吧，你还回到你原来的地方，祝你健康。走吧，见鬼去吧！”

同艾多是没有商量余地的。但是他的部下还是比较好办事。只要那些过客呆在桥上不走，和这些士兵吵嚷，同他们搭讪，向他们讲述自己的不幸遭遇：为什么非要过桥，以及身世中遭遇到的其他不幸事件。这样就和他们亲近熟悉起来，使他们越来越感到自己不是一个霍乱患者。最后，会有一个士兵自告奋勇，替过客到城里去跑一趟，把事情办了。这是初步的松动。但是，过客们知道，事情通过中间人是办不好的，况且这些守桥士兵老是喝得醉醺醺，都有几分醉意，神志不清，往往把话传错了。所以后来过客就纠缠不走，再三要求，进行贿赂，并且呼天唤地，乞求他们发发善心。这样，一直等到加比亚台上只剩下一个认为最好商量的士兵的时候，事情也就基本上差不多了。只见那个好心肠的士兵转过头去，面向墙壁，装作正在读墙上的碑文，两手放在背后，张开右手。过客把商定好的钱如数塞到士兵手里，他向左右张望一下，然后快步穿过桥的那头，钻进了城里。那个士兵于是回到了他的岗位，嚼起白葱头，再喝上拉基酒，顿时心旷神怡，感到保护这座城市免遭霍乱，充满信心和力量。

当然灾难不是漫长无限期的（正如欢乐也是有尽时的）；灾难或者过去，或者至少有所变化，最后被人遗忘。时过境迁，加比亚台上的生活总是不断变迁，而这座桥，不管多少年，多少世纪，人类生活中出现多少悲欢离合，它始终依然如故。千秋世事，从桥上掠过，就象潺潺的流水从桥下光洁完美的桥孔流过一样。

第 八 章

大桥引起沸腾动乱并使加比亚台的正常生活暂时中断的原因，除了战争、瘟疫和大迁徙以外，还有其他一些不寻常的大事，这些大事长久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人们还把当年发生某件大事叫某某大事年。

加比亚台左右两边的石栏杆显得特别光滑油亮。多少世纪以来，乡下人每当过桥歇脚时，都把包袱往那里一搁；有些闲汉倚着加比亚台两边的栏杆，一边聊天，一边在等人；有些人孤独无聊，也斜倚着栏杆，俯视深渊，桥下水流湍急，浪花飞溅，层出不穷，而且循环不已。

不过，从来没有象那年八月最后那几天，桥上涌现那么多闲荡好奇的人，凭栏凝望水面，好象在审视什么似的。虽然夏天未过，河水却已经被雨水搅浑。桥底下的旋涡冒起白色的泡沫，泡沫还夹杂着碎木片、小树枝和草梗。那些倚着栏杆的闲人，手托下巴，实际上并不是在观尝这条久已熟悉相对不语的河流，而是想从水面上，从交谈中，对最近发生的一件悽惨的悲剧找出一条清晰的答案，因为这件悲剧一直使他们感到困惑惆怅。

当时加比亚台上发生了一件绝无仅有的事情，不但前所未闻，大概今后德里纳河上还有一座桥和一座城市，这种事情也不会再发生。这件事象轰动世界的新闻一样，震动了全城，传播到远方各地。

事情发生在维里芦和奈左开两个小村庄。这两个村庄位于

城市的两侧，遥遥相对；城市依山构筑，四周青山环抱。

位于山谷东北的斯特拉伊士特是离城最近的一个大村镇。这个村镇，房屋、田地和园圃分散在几个山坡上，山坡之间的山沟里。在这些山丘的一块凸包上，有十多座房屋，房屋周围是一片李树园和田野，这就是维里芦小村落，是个坐落在高地上美丽富饶而又幽静的土耳其居民区。这个小村庄属于斯特拉伊士特镇，但是它离城比离镇更近些，从维里芦到城里商业区只要走半小时。村人象城市居民一样，都在商业区开设铺子，从事经商。他们和维舍格列城里的居民没有什么两样，如果有的话，不同之处就是他们的财富更加稳当可靠。因为他们的地势较高，阳光充足，没有水灾之患，而且村里的人比较朴素，地方比较偏僻，没有沾染城市的恶习。维里芦的土地肥沃，山青水秀，人也长得很漂亮。

维舍格列城的奥斯马那吉奇家族的一个分支也住在这个村庄。虽然这个家族住在城里的人为数较多，也比较阔绰，但一般人都认为这些人已经堕落了，真正的奥斯马那吉奇后裔是那些住在维里芦村的人，那里是这个家族的发祥地。这是个很体面的家族，他们对自己的出身很感自豪。他们拥有当地最大的房屋，从远处可以望到这所房屋的侧面，雪白一片，房屋就在山顶下面，面向西南，经常用白灰粉刷，房顶上的茅草已经发黑，有十四个玻璃窗。来往的人，无论从大路下来要上维舍格列，或者从城里返回来，老远而且一眼就可以看到这所房屋。当从雷士当山峰背后快要夕阳西下时，它的余辉总是在这座白净光洁的房屋上面恋恋不去。很早以来，城里的人就喜欢在黄昏时候，观尝奥斯马那吉奇家窗户上的夕照，眼望窗户上的余辉忽明忽灭；往往太阳已经下山，城里灯火未明之时，这些窗户的最后一个窗户

还有一点从云雾透射过来的斜晖，宛如一颗巨大的红星，闪烁在这黑暗的城市上空。

这所房屋的主人，阿夫达加·奥斯马那吉奇也是这个城市德高望重的人物；他在生活上或经营方面都表现出非常有魄力而果断。他在商业区里有一个货栈，又低又暗，木板上和苇席上摆满了玉米、李子干和松子。阿夫达加只做批发生意，所以他的货栈不是每天开门，集市的日子，非开不可，其他时间就看情况而定。阿夫达加总是留个儿子在店里，而他自己经常坐在店铺前面的板凳上，同顾客或熟人谈话。他身材高大，体格魁伟，脸色红润，但须髯皆白。他的嗓子粗哑。气喘病已经患了多年，而且还相当厉害。说话时，稍一激动，提高嗓门，往往一大阵咳嗽使他一下子说不出话来，这时，脖子上青筋暴露，脸憋得通红，眼睛里含满泪花，胸部吱吱呼呼地发响，活象山谷中的暴风雨声。一阵狂咳过去以后，他立刻恢复常态，深深地吸一口气，然后把打断的话头又接下去，不过声音变得细弱了。城里和周围的人都知道他说话尖刻，慷慨端庄，富有胆量。他干什么都是这种脾气，做生意也是这样，所以常常亏损。有好几次，他一句话就大胆地把李子或玉米的价格降低或抬高，有时甚至毫无道理，只是看到吝啬的村民或贪婪的商人而一时表现冲动。虽然大家都知道他偏激、主观，但商业区的人一般都听他的话，接受他的意见。阿夫达加从维里芦来到他的货栈门前的时候，他很少是一人独坐，因为人们喜欢听他的谈话，希望听听他的高见。他心直口快，别人认为最好是保持缄默的事情，他却敢说。尽管气喘和剧烈的咳嗽随时打断他的谈话，但奇怪的是，这并不影响他说话的效果，反而加添了他的说服力，使他说话时显出严峻忍痛的神情而令人敬畏。

阿夫达加有五个成年的儿子，都已经结了婚，只有一个女儿，是最小的一个，年已及笄，名叫花姐，姿容俊俏，遐迩闻名，而且酷似她的父亲。城里的人都瞩目她的婚事，渐渐又扩展到城郊一带。自古以来，我们那里有一种习俗，就是把一个美丽少女的姿容、品德和高雅编成故事和歌谣，世世代代传为佳话。这些年来，她成了人人朝思暮想而又可望不可及的人儿；她的名字令人神往，男子们对她无限钟情，妇女们又对她不胜妒忌。她的美色已经到了给自己种下祸根的程度。

阿夫达加的这位姑娘不但容貌和表情象她的父亲，而且她的脑筋清醒、善于词令，这一点也象她父亲。那些在婚礼和交际场合中，用粗俗的献媚和大胆的挑逗，企图征服她，拥抱她的小伙子，在这方面知道得最清楚。她那伶俐的口齿丝毫不亚于她那美丽的容貌，有歌词为证（对于绝代佳人，赞歌总是应运而生）：

俊俏的花姐阿夫达吉娜，

你是多么聪明，你是多么美丽呀！

无论在城里或郊区，人们到处这样歌颂，谈论，但是很少有人敢于向维里芦村这位少女求婚。当那些追求她的小伙子一个个被拒绝以后，花姐立刻惹来了羡慕、怨恨和嫉妒，有的甚至对她存有淫秽念头，伺机等待；这些坏家伙，对那些天生丽质，往往很难幸免。这些天生佳丽让人传颂，但红颜薄命，她们很快就让特殊的命运所葬送，到头来一场空，只留下关于她们的颂歌和故事。

我们这里，被人称道不已的年轻姑娘，正因为如此，往往没有人敢向她求婚，最后成了“老姑娘”；而各方面远远不如她的其

他年轻姑娘，反而容易找到对象，很快就结了婚。花姐却还算走运，因为居然有一个人向她求婚，这个人既有胆量提出，而且手段灵巧，坚定不移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在方圆不均的维舍格列盆地里，与维里芦村遥遥相对的就是奈左开村。

离桥不到一小时路程的上游高处，那里是崇山峻岭，象一道褐色的围墙，德里纳河就发源于此，经过一个大拐弯，急转直下。在这一带多岩石的河岸上，有一条狭长肥沃的土地，它是河水和陡峭的布哥岭上的急流冲积而成的。这里田园密布，旁边芳草缤纷，草地直指山颠，与茂密的灌木林相衔接。整个村子都是名门望族阿姆吉奇，又叫多尔哥维奇家的产业。半个村庄住的是五六家佃农，另一半是阿姆吉奇家弟兄的房子。他们的家长是穆斯大义贝。这个村庄完全处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朝北背阳，既没有阳光，也没有风，盛产水果和草料，其次才是小麦。这个村庄的周围尽是崇山峻岭，因此，白昼的大部分时间都不见阳光，而且总是寂静无声，只要牧人叫一声，或者牲畜颈上的铃铛一响，就会从山上发出连续响亮的回声。从维舍格列到这个村庄，大小只有一条路。如果你从城里出来，过了桥，出了右边那条沿河大道，一直走到河边，你就踏上大桥左边的一条石头小道，这条小路穿过一大片荒芜的陡坡，沿着德里纳河畔通往上游，它象一条白练，镶嵌在蜿蜒入河的褐色山坡上。假如有个人在这条小路上骑马或步行，从桥上看去，小路犹如抛在河与山之间的一根细树干，这个人就象在树干上走一样，他的影子一直映入碧绿而平静的河面上。

这就是从城里通往奈左开的道路，但从奈左开再往前就没有路了，因为没有任何地方可通，也没有一个人再往前走过。只

是在房屋上方，陡坡上有稀稀落落的几处树林，树林中间有两条很深的白色山沟，牧羊人上山寻找羊群时，就从这两条山沟爬上去。

那里有阿姆吉奇家最年长的穆斯大义贝的白色大厦。这所房子不比维里芦村奥斯马那吉奇家的房子小，所不同的是它深筑在山窝里和树林中，从德里纳河畔根本看不见。这所房子周围长有十一棵大杨树，排成半圆形，这些树摇动时和发出的飒飒声，使这块闭塞而不容易到达的地方，经常增添一些生气。这所房子下面是阿姆吉奇家另外两个兄弟的房屋，样子比较小而且比较简陋。阿姆吉奇家的兄弟们都有许多孩子，全是些标致高个儿的白面后生，沉默寡言，温文尔雅，但是彼此团结，积极肯干，而且素来爱护财物。他们同维里芦村里的富裕人家一样，在城里也有货栈，他们在奈左开村里的收获全都送到货栈去。他们和自己的佃户，年年月月象蚂蚁一样忙忙碌碌地往来奔走于德里纳河畔的狭窄石子路上。有的把货物送到城里去，有的做完生意，把钱拴在腰间，回到他们那隐没在半山腰的村庄。

穆斯大义贝·阿姆吉奇住在小路尽头的白色大厦，偶尔来客喜出望外。穆斯大义贝有四个女儿和一个独生子，名叫纳义尔。纳义尔也是早就看中维里芦村的花姐。在一次婚礼中，他从一个半开着的门缝里，不停地欣赏她的美貌，旁边还有许多钟情的小伙子挤成一团也在张望着。后来又一次他看见她身边围着许多女伴，他竟大胆地对她开玩笑说：

“愿上帝和穆斯大义贝给你少妇的称呼。”

花姐冷笑一下。

这位激动的年轻人，透过狭窄的门缝对她说：“不要笑，奇迹总有一天会实现。”

“那要等到沧海变桑田，维里芦村移到奈左开村的时候才会实现！”那位年轻姑娘回答以后，又报之一笑，并且骄傲地挺直身子，这种举动只有象她那样的少女，象她这样的年龄才会做得出来，而且比她的言词和冷笑更加意味深长。

秉赋殊异的人物往往这样胆大而不加思索地向命运挑战。她回答小阿姆吉奇的那句话，就象她在其他地方的一言一动一样，立刻传开，成为佳话。

阿姆吉奇一家并不是一遇困难就停滞不前，灰心丧气。即使对其他比较次要的事情，他们都不立刻罢休，也不草率从事，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更是如此。城里亲戚曾出面进行一次试探，但没有成功。于是那位老穆斯大义贝为儿子的婚事亲自出马。他同阿夫达加早已同舟共济。由于阿夫达加脾气暴躁而且自负，最近在经营方面亏损很大，一时难以开交。在这种情况下，穆斯大义贝助他一臂之力，而且慷慨大方，二话没说，毫无条件；商业场中，在遇到难关时，只有讲义气的人才会这样互助互援。

在这些阴凉灰暗的货栈里以及在货栈门前的光滑石凳上，不但解决那些有关银钱和生意的问题，而且还解决人的一生命运的问题。阿夫这加和穆斯大义贝之间是怎样商量的，穆斯大义贝怎样为他的独生子纳义尔提出迎娶花妲的要求，而阿夫达加那样坚硬傲慢的人，又怎样会把他的女儿“许配”给他的？这一切，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同样，别人也不清楚在山上的维里芦村里，父亲对这样美丽的独生女儿究竟又是怎么说的。当然，在女儿方面，不存在违抗的问题。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她充满痛苦的神情望了父亲一眼，作出她独有的那种骄傲姿势，随后默然无语地顺从了她父亲的意愿。我们这里，不管什么地方，过去一向是遵从父命，现在还是如此。达位年轻姑娘，如在梦幻

中，开始晾晒、增添和整理她的嫁妆。

奈左开方面也是一点不漏风声。因为谨慎小心的阿姆吉奇一家不希望别人对她们的成功风言风语。他们已经如愿以偿，也就感到心满意足了，过去遇到顺心事也是如此。他们用不着任何人来分享他们的欢乐，同样，遇到挫折或失败时，他们也从来不需要别人对他们表示同情。

尽管如此，别人对这件事还是议论纷纷，绘声绘色，毫不隐晦。全城内外到处都在议论阿姆吉奇家怎样如愿以偿，阿夫达加的美丽、高傲、聪明的女儿，在波斯尼亚全境找不到一个配得上她的人，竟然如何受人摆布而终于屈服，以及花姐既然公开说过“维里芦村移到奈左开村”是办不到的，怎么现在也居然办到了，如此等等。因为人们喜欢议论那些趾高气扬、青云直上的人物如何一败涂地，蒙受羞辱。

整整一个月，这件事情一直被传为笑谈，对于花姐将如何受到羞辱，大家如饮甘泉，更是津津乐道。整整一个月，奈左开和维里芦方面，也在进行种种筹备。

整整一个月，花姐和一些女友，亲戚以及佣人一起在准备她的出嫁衣裳。青年姑娘们在歌唱，她也跟着唱。她毕竟还有勇气这样做。可是她一面听自已唱歌，一面心里却在转她的念头。因为她每缝一针就心想（甚至自言自语），她所绣的东西连同她自己，永远不会见到奈左开村。这种念头，时刻未断。当然，当她在做针线活和唱歌的时候，觉得维里芦和奈左开之间距离遥远，一个月的时间为时尚长。在夜里，她也是这样想。这些夜晚，她常常借口要完成某种活计，独自一人，极目远眺，展现在她眼前的世界是多么富有，充满光明和欢乐。

维里芦的夜晚，天气虽热，然而凉爽。星斗低垂抖动，闪烁

着白色亮光。花妲站立窗前，眺望着这种夜晚的景色。她的全身具有一种沉着、充沛、柔和的力量，并且觉得她身上每一部分：腿部、臀部、胳膊、颈项，尤其是胸部，都是力量和欢乐的一个独立源泉。她的乳房肥大丰满，向前直挺，乳头顶在百叶窗上，使她站在这里感到整个山丘及其房屋田地也在热烈、均匀地深呼吸，并且与蓝天和夜空随着呼吸而上下起伏。百叶窗的薄片也跟着呼吸忽上忽下，一会儿碰到她的乳头，一会儿远远离开，然后又回来再碰到她的乳头，又离开了，就这样来回不息。

白天，维舍格列的山谷暑气逼人，几乎可以听到布满山谷的成熟麦穗的响声；整个城市，雪白一片，四面青山环抱，中间绿水穿流，大桥优美多姿，这时候，你会感到世界确是辽阔雄伟。但是，一到夜里，仅仅在夜里，当蓝天再现，群星灿烂的时候，更使人感到世界广漠无垠，力量无穷，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往往晕头转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不知道走过哪里，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应当做什么。此时此地，人们才真正生活着，安静而长久地生活着；此时此地，没有一句话可以把你一辈子死死地约束住，没有置人死命的诺言，也没有期限短促无情而走投无路，终究只有一死或受屈辱的事。的确，它不同于白天，因为在白天的生活中，往往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而此时此地，一切都是无拘无束，无穷无尽，无名无姓并且无声无息的。

这时候，她听到楼下有一种痛苦深沉的声音："啊啊啊啊，咳咳咳！啊啊啊啊，咳咳咳！"声音象是从远处传来似的。

这是阿夫达加在楼下同他夜间发作的一阵阵咳嗽进行搏斗。

她不但熟悉这种声音，而且她仿佛清楚地看见她的父亲正坐在那里吸烟，受尽咳嗽失眠的折磨。她仿佛看到她父亲的一

双褐色大眼睛，这是她父亲身上最可爱的地方，这双眼睛和她的眼睛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因为年老而显得不那么明亮，而且浸润着泪花，但仍然放出含笑的光芒，当她父亲告诉她已经把她许配给阿姆吉奇家的人，让她作好一切准备，迎接一个月以后的喜事，她第一次从她父亲的眼色里面看到自己的命运已经注定了。

“咳咳啊，咳咳啊，咳咳啊，啊啊咳！”

几分钟以前，她对美丽的夜景，伟大的世界感到神往的这种感情顿时消失了，大地的芬芳也闻不到了。她的乳房轻轻地抽搐起来。星斗和太空已经昏暗无光，只剩下了命运，就是她那种冷酷无情，无可挽回，转眼就要实现的命运，这个命运将随着时间，在一片麻木空虚的寂静中一步一步地实现，最后是木已成舟，无可奈何。

楼下又传来了一阵低沉的咳嗽声。

这是他的声音，一点没错，她听得很清楚，而且好象还看见他就在自己的面前。自从她懂事以来，他就是自己亲爱的父亲，威严的、唯一的父亲。她同他父亲亲密无间，息息相关，就是使她父亲感到痛苦的那种咳嗽，她也感到心疼似的。当然，她说“不行”的事情，他嘴里却说“行”；但是，总而言之，她和他是一体的，就是关于这件事也是如此。她觉得他说“行”就行，不管自己同意不同意，照他所说的就是了。所以她的命运骤然起了非同小可的变化，而且就要成为现实。她看不出有别的出路，之所以看不出，因为实在是没有出路。她只知道一件事情：由于她父亲说“行”，就把她自己和她自己所说的“不行”拴住了，她将不得不同穆斯大义贝的儿子在当地的长官面前举行仪式，否则，岂不是阿夫达加不遵守诺言，那简直不可想象。但是她很清楚地知道，并且很肯定地相信，她绝不会到奈左开去的，否则，她岂不是自食

其言了，这也是不行的，她也是奥斯马那吉奇家的人，怎么能自食其言呢。这就是她的"不行"和她父亲的"行"，以及维里芦和奈左开之间的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在这无法解决的关头，又必须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她目前正在想这个问题。她想的不是辽阔富饶的世界，也不是维里芦到奈左开之间的整个路程，而是从麦其麻礼堂[①]到桥头的一小段悲惨的道路，因为在这个礼堂里，地方长官将要为她和穆斯大义贝的儿子证婚，而从桥头顺着陡坡走下去就是通往奈左开的小路，她已下定决心不去踏上这条山路，她的思想象穿梭一般不断地在这一小段路上来回掠过。她的思想从麦其麻穿过半个市中心，经过市场到了桥的尽头，然后，仿佛看见了一个深渊似的，立即又折回来，再经过这座桥，穿过市场和市中心，又回到麦其麻。她的思想就这样去而复返，返而复去，她的命运就在那里来回穿梭，不停编织。

她搜索枯肠，也终究找不到一条出路。她的思想经常停留在加比亚台上，停留在这个颜色清淡悦目的石"沙发"台上；这里，人们经常坐着聊天，青年人唱着歌，下面是碧绿湍急的河水滚滚地流着。想到这里，她对这样一条出路感到毛发悚然，她的思想好象就要掉进地狱一般，但又旋即升起，又在路上来回飞跑，最后还是找不出别的办法，只好又停留在加比亚台上。于是，每天夜晚，她的思想越来越常留在这个地方，而且滞留的时间越来越长。总有一天，她不是思想上，而是真正要身临这条道路，而且在到达桥头以前，还得找出一条出路；只要想到这一天，她就感到死亡的恐怖，以及由于羞辱而使生命凋零的可怕。在痛苦绝望、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她感到这种思想所产生的恐怖会推到遥

① 地方长官合法证婚的公共场所。

遥无期，或者至少往后推迟。

然而，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不快也不慢，很有规律，而且无法阻挡。最后，结婚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八月最后的一个星期四（这是预定的日子），阿姆吉奇家的人骑着马来迎娶新娘。她蒙着一块很厚的新头纱，象披着盔甲似的，让人扶上，带到城里。同时，在院子里，人们把装着新娘嫁妆的箱子分装在几匹马上。在麦其麻礼堂里，地方长官主持了婚礼。阿夫达加把他女儿嫁给穆斯大义贝的儿子的诺言就这样履行了。随后，这一伙人马就奔往奈左开，那里已经准备好隆重的结婚仪式。

他们通过了市中心和市场，也就是说通过了花姮思想上不知闪过多少次但没有找到出路的一段道路。这是一条坚固结实、经常走惯的路，是一条生活中的真实的路，人在上面走比思想在上面奔驰似乎更容易些。既看不见星斗，也看不见太空，听不见她父亲低沉的咳嗽声，也不希望时间过得快一些或者慢一些。当他们到了桥上，这位少女象在那些夏夜伫立窗前一样，又一次十分明显地感到她身上的每一部分，尤其胸脯，好象裹着盔甲，在轻轻地抽搐。然后到了加比亚台。这时，按照她在那些夜晚反复思量过的，她倾着身子，对骑着马跟在身畔的小哥哥耳语几句，要他把马镫放高一些，因为他们现在走近那段陡坡，从这里由桥上下去，就是通往奈左开的小石路。他们兄妹二人先停了下来，在他们后面略远一些的宾客也跟着停下来。这是毫不足为奇的。因为参加婚礼的宾客在加比亚台上停留片刻，这并不是破天荒的事，同样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当她的哥哥脚着了地，绕过他的马，把缰绳挎在胳膊的时候，她把马一夹，让马靠到桥边；这时，她把右脚放在石栏杆上，然后，象飞鸟那样轻盈，纵身

一跃，越过栏杆，跳进了桥下滚滚的大河。她的哥哥急忙从她后面扑上去，把整个身子都趴在石栏杆上，但已经来不及了，他的手只碰到了她那条张开了的头纱，没有能够把她拉住。其他宾客都跳下马来，大声惊叫，沿着栏杆，呆呆站着，不知所措。

当天，黄昏的时候，下了一场滂沱大雨，而且非常寒冷，在这季节是罕见的。德里纳河的河水上涨，而且浑浊了。第二天，浑浊的洪水把花姐的尸体冲到了加拉塔附近的一个浅滩上，让一个渔夫发现了，他立刻跑去报告警察长。不多一会，警察长带着区长、渔夫赶到现场，独眼龙沙尔科也跟着来了。因为遇到这类事情，独眼龙总是到场的。

那尸体躺在又湿又软的沙土里。波浪不时溅到尸体上，有时浊水把它完全掩盖住了。没有被水冲走的黑色新头纱让河水掀起来，盖在她的头上；头纱和她那又长又密的头发搅在一起，在年轻姑娘雪白美丽的身躯顶上形成了漆黑的一团东西，因为流水把新妇身上穿的薄衣裙都冲走了。独眼龙和渔夫满面愁容，咬紧牙关，走进不大深的水里，抱起赤裸裸的少女。然后，他们把她当成活人似的，小心翼翼而又不好意思地把她抬到了河岸上，放下以后，他们立刻用那条浸透了泥水的头纱把她盖住了。

当天，死者就被收殓埋在最近的土耳其公墓里，这个公墓靠着河岸，在维里芦村的山坡下面。傍晚的时候，那些游手好闲的人不怀好意而且带着可憎的好奇心，在郊外的小酒店里围住渔夫和独眼龙。抱有这种好奇心的，主要是那些生活空虚、缺少美德、幸灾乐祸、少见多怪的人。他们请这两个人喝酒抽烟，想对死者尸体和安葬情况打听一些细节。但是毫无用处，烧酒并没有使这两个人开口。就是独眼龙也什么都不说。他不停地吸烟，

那只炯炯发光的独眼，凝视着从他嘴里死劲吹得老远的烟雾。渔夫和独眼龙两个人只是不时相对看一眼，两人同时举起杯来，似乎不约而同在碰杯，然后一饮而尽。

这件极不平常、前所未闻的事情就这样发生在加比亚台上。维里芦村没有移到奈左开村，阿夫达加的女儿花姐没有成为阿姆吉奇家的媳妇。

阿夫达加从此不再进城；就在当年冬天，因咳嗽窒闷而死，至于什么心事使他忧郁致死，他却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一句。

第二年春天，穆斯大义贝给他儿子另娶了一个媳妇，是布朗科维奇家的一个女儿。

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人们还一直在盛传这件事，后来渐渐把它忘了。关于这位绝顶聪明、美丽无双的少女只留下了一首歌词，好象她永远还活在人间。

第 九 章

卡拉乔治起义以后，过了七十年左右，塞尔维亚地方战事又起，边疆地区立刻起来响应。日里埃伯、高斯地里亚、迟尔契奇和佛勒都伏等处高地上的土耳其人和塞尔维亚人的房屋又被焚毁了。多少年没有见过斩头示众，现在，当日出的时候，在加比亚台上又见到了被杀的塞尔维亚人的首级。这些首级都是些干瘦的乡民的头颅，头发剪得很短，后脑扁平，瘦削脸庞，胡子很长，同七十年前示众的人头一样。但是，这一切情况并没有持

续很久。土耳其和塞尔维亚之间的战争一结束，大家又安定下来。这当然仅仅是表面上的安定，骨子里还是忧虑万状，有的人激昂慷慨，有的窃窃私语，感到不安。人们越来越具体、公开地谈论奥地利军队如何开进波斯尼亚。一八七八年夏初，从萨拉热窝撤至普利勃伊的土耳其正规部队，已经开过了这个城市。人们肯定土耳其苏丹没有抵抗就把波斯尼亚交出去。有若干户人家准备逃亡到桑甲克去，其中有几户是因为不愿意在塞尔维亚人的统治下生活，十三年前从乌吉赛迁来，现在又准备逃避另一种新的统治——基督教的统治。但是大多数的人都留在这里，静候事态的发展，内心充满了痛苦与惶惑不安的情绪，而表面上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七月初，布勒夫列的伊斯兰教教长来到这里，他带的人很少，但是抱着很大决心要在波斯尼亚把人们组织起来抵抗奥地利人。这个人神情严肃，金色头发，表面沉静，心里却是火热的。他在夏天一个晴朗的日子，在加比亚台上，召集了这个城市中的土耳其首要人物，想激励他们起来抵抗奥地利人。他向大家保证，大部分正规部队，将不顾官方的指示，留在这里同人民一起反抗新的侵略者，他号召全体青年立刻加入他的队伍，并把粮草给他送到萨拉热窝去。那个伊斯兰教教长固然知道维舍格列的居民对打仗一向不感兴趣，他们宁愿痛快地活，也不愿痛快地死，但是他万万想不到他们对他的反应却如此冷淡。由于他不能久留，于是他就威胁他们将受到民众的制裁和上天的谴怒，然后把他的助手奥斯曼·卡拉芒利亚留下来，继续说服维舍格列的土耳其人，使他们认识到必须起来参加总体战。

当大家和伊斯兰教教长进行争论的时候，反对最强烈者，就是伊斯兰教的阿里霍扎·穆德维利奇。他出身于这个城里最悠

久，最受人尊重的一个家庭。这一家的人并不是因为有巨大的财富而出名，而是因为他们为人忠厚坦率而见称。人们一向认为，他们虽然生性固执，但是绝对不受威胁利诱，不喜欢谄媚，没有任何坏心眼。二百多年来，这个家庭中最年长的成员，始终是这个城市中穆罕默德巴夏慈善基金会的监护人、保管人和理事，而且还经营桥梁附近有名的石头旅舍。我们曾经谈到在匈牙利丢失以后，这个旅舍怎样丧失了维持费的来源，它怎样由于各种环境的巧合而最终成为一片废墟，以及在丞相所缔造的基业中，只有这座桥——它作为一项慈善基业，不需任何维持费，也没有任何收入——如何能够巍然独存。世世代代以来，这个家庭忠实执行了基金会的职务，给自己留下了穆德维利奇这个姓[1]，作为一种引以自豪的纪念。事实上，自从达乌霍扎·穆德维利奇在他为维修石头旅舍而丧命以后，这种职务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他们还是存在着自豪的心理，由于这种心理，穆德维利奇家的人自然而然地习惯于认为：在护桥方面，谁也比不上他们，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这座大桥的命运的负责者，因为至少从建筑观点来看，这座大桥是他们所经管的伟大壮丽的“瓦科夫”基金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这个基金会的收益早已涸竭，基金会也因此可惜地消失。他们的家庭还另有一种从远祖传下来的习惯做法，就是穆德维利奇家每一代至少有一个人从事研究教理充任圣职，现在这一代充任圣职的就是阿里霍扎。此外，他们家的人数和财产都比过去少多了，只留下几个佃农和在商业区里一家自古开设的铺子，这家铺子就在桥边广场上，地势最好。阿里霍扎的两个哥哥在战争中牺牲了，一个死在俄罗斯，一个死在

---

① 见第72页注释。

门的内哥罗。

阿里霍扎尚属年轻，动作灵敏，脸色红润，常带笑容。他不愧是个穆德维利奇家的人，对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见解，并且坚持固执地为自己的见解辩护，绝不放弃自己的意见。由于他固执己见，性情耿直，因此常常和当地的传教师以及上级意见不和。他虽然有霍扎的等级和尊称，但并不担任任何具体职务，而且他的尊称并不给他带来任何收入。为了尽量能够独立生活，他亲自经营他父亲遗留给他的铺子。

阿里霍扎同维舍格列的大多数伊斯兰教徒一样，反对武装抵抗，他并不是出于怯懦，也不是对宗教不热心。他象伊斯兰教教长或任何起义者一样，对外来的基督教势力和可能随之而来的一切，感到深恶痛绝。但另一方面，由于看到苏丹真的把波斯尼亚断送给德国佬，加上他对同胞也很了解，所以，他反对人民无组织的抵抗，因为这样只能招来失败，甚至带来更加深重的灾难。一旦他的头脑里抱定了这种见解，他就公开表示，并且极力为自己的见解辩护。这一次他仍然提出了许多责难的问题，还提出一些精辟的看法，使伊斯兰教教长感到特别窘迫。他就这样并非出于本愿地支持不热心抗战不愿意牺牲的维舍格列居民，公开反对伊斯兰教教长的主战意图。

当奥斯曼·卡拉芒利亚留在维舍格列和当地居民继续辩论的时候，他发现反对他的就是阿里霍扎一个人。而那几个贝伊①和阿迦却含胡其词，吞吞吐吐，实际上完全同意阿里霍扎的意见；他们让直率而性急的阿里霍扎替他们说话，让他去同卡拉芒利亚单独交锋。

---

① 贝伊是前土耳其高级军官和官员的称号。

黄昏时，维舍格列的土耳其社会贤达，盘着腿坐在加比亚台上，按照他们的地位高低，围成一个圆圈。同他们坐在一起的有奥斯曼，身材瘦高，脸色苍白。他脸上的肌肉很紧张，双目炯炯，上额和两颊有许多伤疤，象癫痫病人的脸一样。站在他面前的就是阿里霍扎，他的脸红红的，身材虽不高然而气宇轩昂，精神旺盛，他用尖锐的嗓音不断提出一些新问题："有多少武装？""开往哪里？""有什么装备？""怎样干？" "目标是什么？""如果失败，会带来什么结果？"阿里霍扎谈论这个问题时，显出博学多才的样子，语带冷嘲而近乎尖刻，其实是为了掩盖他内心的忧虑和痛苦，因为他看到基督教徒和土耳其人众寡悬殊，而且后者又混乱不堪。然而那个性情冲动、脸色阴沉的奥斯曼看不出也不理解这种情况。他生性暴戾，偏激，还带有神经性的狂热，因此，他很容易失去忍耐和冷静，每遇到有人表示怀疑或犹豫时，他就把他当作德国佬一样，给以迎头痛击。阿里霍扎使他感到气恼，他忍着怒气，言简意赅又语带夸张地回答他的问题："应当到哪里就到哪里，有什么装备就用什么装备。""主要是不要不战就让敌人进入我们的国土，提出许多疑问的人，妨碍事业的实现，等于帮助了敌人。"最后，他完全忍不住了，带着不加掩饰的蔑视一一回答阿里霍扎提出的问题："是死的时候了"，"我们要献出我们的头颅"，"我们要一个不剩地去死"。

"不过，"霍扎打断他的话说，"照我看，你们是为了把德国佬赶出波斯尼亚，所以才要联合起来；如果只是为了去死，那不用你这个埃芬蒂，我们自己也知道怎样去死，因为没有比死更容易的事。"

"但是我看你不是在朝死的路上走。" 卡拉芒利亚粗暴地打断他的话。

"我看，你，你是在向死路上走，"阿里霍扎用锋利的口吻回答他说，"不过，我不懂你为什么要别人去陪你干这种蠢事。"

于是谈话变成了真正的争吵，奥斯曼把阿里霍扎骂作肮脏的基督教徒和叛逆者，叛逆者和基督教徒一样，他的头就必须血淋淋地挂在加比亚台上，至于那位阿里霍扎，他还是不慌不忙地详谈细论，坚持要求摆事实、讲道理，对那些恐吓辱骂装作没有听见似的。

的确，很难找到两个比他们更糟糕、更伤脑筋的辩论者。他们的争吵只能加深大家的不安情绪，只是增添了一个纠纷。这是遗憾的事，但也无可奈何，因为当一个社会处在动荡时期，发生一些不可避免的重大变化的时候，总有这样一些人挺身而出，但由于他们的思想不正常、不健全，因此倒行逆施，把人们引入歧途。这完全是混乱时期的一种现象。

不过，这种毫无结果的争吵，对那些达官贵人来说，却是求之不得，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参加抗战的问题就暂时挂起来了，用不着他们立即表态，去多费一番口舌。第二天，奥斯曼怒气冲冲地高声威吓，然后带着他手下几个人，离开这里去见伊斯兰教教长。

从本月内收到的消息，越来越证明那些达官贵人认为应当保护城市和家园的意见是对的。八月中旬，奥地利人进占了萨拉热窝。不久以后，哥拉西那高地打了一仗，牺牲惨重，这一仗就成了整个抗战的终结。战败的土耳其残余部队从利埃斯卡山上的险路下来，经过奥克里德，开始来到了这个城市。这里面混杂着当地的起义者和正规军士兵，这些士兵是不顾苏丹的命令冒死参加抗战的。士兵们只要些面包和水而已，除此而外，就是打听到乌瓦去的道路，但是那些起义者是些坚强善战的人，并不

因为失败而灰心。这些人的脸晒得黝黑，满身尘土，衣衫褴褛，用尖刻的语气回答维舍格列城毫无斗志的土耳其人所提出的问题；他们还准备挖掘战壕，保卫德里纳河上的大桥。

阿里霍扎又一次发表他的高见：他很自然而毫不厌倦地证明这座城市是无法设防的，而且当"德国佬已经在波斯尼亚境内长驱直入的时候，防守是毫无意义的。"起义者自己也明白这个，但是他们不肯承认，因为这些丰衣足食的人，这些守着自己的家产而明哲保身，不敢反抗和斗争的人，使他们感到恼怒。正当这个时候，那个奥斯曼又来了，他象疯了似的，脸色更加惨白，人显得更瘦，对战斗更加狂热。他是那种不怕失败的人。他只是强调，不论在任何地方，任何代价都要进行抵抗，都要准备牺牲。看见他那种着魔似的狂热，除了阿里霍扎之外，谁都退避三舍，溜之大吉。阿里霍扎毫无幸灾乐祸的想法，他对咄咄逼人的奥斯曼，冷静而又毫不留情地指出抗战已经发生了转折，这一点正是他一个月以前就在加比亚台上所预言的。他劝卡拉芒利亚尽快带着他的人回到布勒夫列去，不要加剧局势的发展。他现在对待卡拉芒利亚的态度比较缓和了，而且还带着痛苦而感慨的神情，象对待病人那样对他表示关切。因为这位霍扎表面上虽然激昂，但在内心深处，对于迫在眉睫的灾祸却感到忧心如焚，痛苦万状。他看到外来的力量步步近逼，势不可挡，在这种力量面前，伊斯兰教的旧秩序就为时不久了，所以他感到心如刀割，只有看到这种形势的穆斯林才会有这种感情。他的言语里也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他这种内心的痛苦。

对卡拉芒利亚的一切辱骂，他痛心地回答说："埃芬蒂，眼看那些德国佬进犯国土，坐以待毙，你以为我感到好受吗？好象我们就看不到我们将来的命运如何，将来是什么日子……我们

知道我们的痛处，知道我们失去了什么，这一点我们很清楚。你如果是为了向我解释这一切，你就用不着再跑一次，而且，天啊，你更犯不着从布勒夫列跑到这里来。因为我看得出来，你不懂得权衡这些利弊。你如果知道这些利弊，你就不会那样做，也不会那样说。亲爱的埃芬蒂，痛苦超过你的想象，我现在还找不出一条出路，但是我认为你所指出的也不是一条拯救的道路。”

然而，奥斯曼对一切不符合他那种深切的抗战热情的言论都听不进去，他痛恨这个霍扎就象痛恨他所反抗的德国佬一样。一个行将灭亡的社会，当优势的敌人逼境，自身面临惨败的时候，内部总是出现这样一些仇恨和分裂。奥斯曼没有别的话可说，老是称阿里霍扎为叛徒，并且带讽刺地劝他在德国佬到来以前去接受洗礼。

阿里霍扎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我的祖先没有受过洗礼，所以我也不会去洗礼。我的埃芬蒂，我既不愿意让德国佬为我举行洗礼，也不愿意同蠢人打仗。”

维舍格列的土耳其贤达们都同意阿里霍扎的意见，但是，他们都认为，无论如何不应当采取这样粗暴，直率的方式说出来。他们不但害怕浩浩荡荡的奥地利人，而且也害怕卡拉芒利亚，因为他带来了一班人马，已经成了这座城市的主子。因此，他们闭门不出，或者隐居在自己郊外的庄园里。当他们和卡拉芒利亚以及他手下的人不得不会面的时候，他们总是目光躲闪，说话含糊，而且总是找个最恰当的理由和最稳妥的办法让自己溜之大吉。

卡拉芒利亚从早到晚，老是在石头旅舍废墟前面的一小块平地上开会。那里经常来来往往有各色各样的人：卡拉芒利亚手下的人，偶然路过的行人，专门来向城市新主子求教的人，

以及那些起义者或多或少硬拉来听他们领袖讲话的人。卡拉芒利亚不停地在讲话。当他对个别的人说话时，也是大叫大嚷，好象是在对几百人讲话似的。他的脸色变得更加惨白了，一双眼睛乱转，眼白明显变黄了，而且嘴角上满是白沫。城里有一个居民对他谈到当地穆斯林对都尔加尼亚教长的迷信，说古代这位教长为了阻止异教徒的军队越过德里纳河，就在这里牺牲了性命，他现在安息在大桥上游对岸的陵墓里；但是，只要哪个异教徒染指这座大桥的时候，他一定会再起来抵抗。卡拉芒利亚立刻狂热地抓住了这个圣徒传说，加以渲染，说成这位圣徒真的会给予意外的援助。

"弟兄们，这座桥是大丞相的慈善基业。这上面写着异教徒的武力不许越过这座桥梁。不光是我们在保卫这座桥，而且这位刀枪不入的'圣徒'也在保卫着它。当敌人到来的时候，他会从坟墓里出来，张开两臂，直立在大桥中间；那些德国佬看见他的时候，他们会双膝发软，突然失魂落魄，惊恐万状，不能逃命。土耳其弟兄们，你们不要走掉，同我一起，都到桥上来吧！"

卡拉芒利亚在集合的人群面前，就这样大声疾呼。他穿着黑色的旧长袍，张开双臂，直挺挺地立着，做出圣徒站立的姿势，整个身子就象戴着一顶土耳其帽的细高的黑十字架。

维舍格列的土耳其人知道这件圣徒传说，并且比卡拉芒利亚知道得更清楚，因为他们每一个人在童年时代都听见过，以后也都无数次向别人讲述过，可是他们丝毫不愿意把现实生活和圣徒传说混淆在一起，也不愿把这件任何活人都无能为力的事情，去指望死人的帮助。阿里霍扎没有离开他的商店，当人们对他诉说在石头旅舍前面所听到的话和经过的情形，他只是带着忧伤而怜惜的神情，做出不赞成的手势。

“我早就知道这个蠢人不会让活人过安静的日子，也不会让死者得到安宁。愿真主保佑我们！”

至于卡拉芒利亚，他对真正敌人无能为力，却把全部怒气转移到阿里霍扎身上。他威吓，喊叫并且发誓要在离开这座城市以前，把那个顽固的阿里霍扎象一只獾子那样钉在加比亚台上，让他就那个样子去迎接德国佬的来临，因为他既不愿意对他们作战，又不让别人这样做。

奥地利人出现在利埃斯卡山岭上把这些喋喋不休的争论打断了。人们终于看出这座城市确实无法防守。卡拉芒利亚最后离开了这个城市，走的时候，他把带来的两尊铜炮丢弃在石头旅舍前面的小广场上。但在撤退以前，他把自己的恐吓践诸实行。他命令手下的一个仆人，这个仆人是个铁匠出身，身体魁伟、头脑简单，叫他把阿里霍扎捆绑起来，绑好以后，用钉穿过他的右耳把他钉在那根橡木梁上，这根橡木横梁是古碉堡残留下来的，被夹在加比亚台上两级台阶之间。

在集市广场和大桥周围的气氛是一片的混乱嘈杂，人心惶惶，大家都听到了这个高声发出的命令，但是没有一个人想到了这个命令真会如实执行。因为在这类情况下，什么话说不出来呢？什么狂言乱语、破口大骂的声音听不到呢？现在也是这种情况。乍一想，完全不象真会有这种事。只能把它当作恐吓辱骂之类来看。阿里霍扎也没把这件事看得太严重。就是奉命执行这件事以及正忙于装钉铜炮的那个铁匠，他似乎也在迟疑考虑。然而要把阿里霍扎钉在加比亚台上的事情已经宣布了，这时候，那些彷徨不安的人都在脑海中盘算：对这样一种罪过处刑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会执行的……不，不会执行……起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件事情实在是毫无意义，令人恶心，是不可能

的。但是在群情激昂下，总得采取一些措施，一些重大措施，非常的措施，所能够办到的，就只有这件事。不会执行吗……不，会执行的……这种可能性越来越明显，而且时间和行动越来越证明这种可能性自然会成为现实性。为什么不可能呢？只见两个人揪住阿里霍扎，而他也不怎么抵抗。他们把他的手反绑了。这一步离开疯狂可怖的一着固然尚远，但是却渐渐地迫近了。那个铁匠似乎对自己的软弱、犹豫突然感到羞耻，于是不知道从哪里抽出了他刚才用来钉钢炮的那把锤子。他想，德国佬可以说已经到这里了，距离城市只不过半小时行程，这一念头使他下了决心，促使他把这件事真正干到底。阿里霍扎同样也痛苦地想到这些，所以他对任何事情都坚决置之度外，甚至对别人加在他身上的那种不应有的疯狂的、屈辱的惩罚也无动于衷。

在每一个别的时刻认为不可能、想象不到的事情，就在短短的刹那间内，居然发生了。尽管没有一个人认为这种行动是可取的、可以容忍的，然而每一个人对促使这个阿里霍扎在桥上被穿透右耳钉在加比亚台的橡木横梁上这件事，多少应当负一部分责任。当德国佬进城时，大家都早已四散奔逃了，而阿里霍扎却被留在桥上，一动也不动地跪着，样子怪异，痛苦而可笑，只要略微一动，就疼痛难忍，而且有拉掉耳朵的危险，他感到这只耳朵象一座沉重的大山似的。他喊叫着，但是一个人也没有，谁也听不见，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他从这种狼狈中解救出来，因为所有活人都躲在家里或分散在各个村庄，他们既害怕已经到来的德国佬，又害怕撤退的起义者。这座城市象一座死城，桥上满目凄凉，仿佛死亡席卷了一切似的。阿里霍扎的头紧贴着横梁，痛苦地呻吟，一动也不动地缩成一团，独自一人跪在加比亚台上，没有一个人在保护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心里还在盘算要提出一

些新的论据来反驳卡拉芒利亚。

奥地利人渐渐逼近了。他们的先遣部队从对岸看见大桥旁边的石头旅舍前面有两尊炮，于是立刻停止前进，等待他们的山炮。近午的时候，他们从一个小树林内对准被遗弃的石头旅舍扔了几颗手榴弹，使已经摇摇欲坠的旅舍进一步摧毁，并且把窗户上用整块软石雕琢得非常美丽的栅栏也炸毁了。等到奥地利人打翻了那两尊土耳其炮，发现这两尊炮是没被撤走的废炮，而且发现没有人还击的时候，他们才停止射击，开始小心翼翼地向大桥和城市推进。匈牙利的步兵端着枪缓缓前进，到了加比亚台。他们在缩成一团的阿里霍扎面前惊奇地停下步来。这位阿里霍扎由于受到了在他头上乱晃的手榴弹的惊吓，一时竟忘掉了他耳朵的疼痛。当他看见那些可憎的士兵举着枪并弄得喀喀作响的时候，他开始长吁短叹，痛苦呻吟，心想这是一种每一个人都能懂得的言语。幸亏这样，匈牙利的军队才没有开枪。有一部分士兵继续在桥上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另有些士兵停留在他旁边，仔细观看，但都莫名其妙。等到一个随军护士到了以后，才拿出钳子，小心翼翼地把钉子拔了出来，原来是根钉马掌用的钉子，这才把阿里霍扎解救出来。阿里霍扎疲惫到了极点，一下子倒在石头台阶上不断呻吟叹息。这个随军护士在他受伤的耳朵上，上了一些消毒药水。阿里霍扎如同在奇梦中一样，眼泪汪汪地望着那护士左臂上的白色大袖章和袖章上用红布做成的整齐的十字。一个人只有发烧时候，才会有这样令人恶心可怕的恶梦。这个红十字象一个特大的幽灵，恍恍惚惚地映入他的泪眼，并且遮住了他的整个视线。那个护士替他包扎了伤口，还替他戴好白布帽。阿里霍扎等他把头部包扎好，然后，疲惫不堪地站了起来，倚着桥上的石栏杆歇了一会。他这才慢慢地镇定下来，

清醒一些。

在对面的加比亚台上，一个士兵就在刻有土耳其文的石碑下面粘贴一大张白纸。阿里霍扎虽然整个脑袋还在痛得嗡嗡响，但他却抑制不住内心的好奇，不由自主地望着那张白色布告。这是菲利普维奇将军用塞尔维亚文和土耳其文写的布告，在奥地利军队进占波斯尼亚时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居民所颁发。阿里霍扎的右眼由于让绷带遮住了，所以他读土耳其文布告时，只能看清那些用大字写的词句：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居民们！

奥地利皇帝一匈牙利国王的军队越过了你们国家的边界。这支军队不是作为敌人用武力来征服你们的国土，而是作为朋友来平乱的，因为骚乱已经持续许多年了，不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不得安宁而且也扰乱了奥匈帝国的边疆地区。

…………

皇帝一国王不能再长久坐视他的国土周围充斥暴乱，不能坐视他的国境遭受穷困与苦难。

他曾提请各国列强对你们的状况予以关注，所以某次国际会议曾一致决议由奥匈帝国出面恢复你们久已失去的安定与繁荣。

关心你们幸福的苏丹陛下，感到应当把你们置于他的强有力的朋友皇帝一国王的庇护下。

…………

皇帝一国王命令：这个国家的全体臣子根据法律享受同等权利，一切生命、信仰和财产均受保护。

…………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居民们！请你们放心把自己置于奥匈帝国的光荣旗帜的保护之下。你们应当把我们的士兵作为朋友来欢迎，你们应当服从当局的命令，安居乐业，你们的劳动果实一定会受到保护。

阿里霍扎断断续续，逐字逐句地读着，他并不字字理解，但是每字每句都使他感到痛苦；而且这种痛苦不同一般，和他受伤的耳朵、脑袋、腰部所感到的痛苦完全不同。现在从这些语言，“皇帝的语言”，他才清楚地看到，他自己、他的同胞和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完结了，而且永远完结了，不过完结的方式特别一些：那就是眼睛在看，嘴在说，人继续在生活，但是真正的生活没有了。一个外国的皇帝统治着他们，一种外来的信仰把他们征服了。这一点从这些冠冕堂皇的字句，暧昧不明的命令里就可以看得清楚，而且由于内心受到人世间的剧痛简直无以名状、煎熬难忍，就这一点看得更加清楚。对于这种情况，即使有成千上万象卡拉芒利亚这样的蠢人也无济于事，不会有所改变。（阿里霍扎这样反复地思量着。）“我们早晚都得死！还不如现在就死！”在这国破家亡之秋，弄得人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成，只能象埋在土里的木杆那样慢慢地腐烂，只能任其支配，身不由主，再彼此争吵有什么意思呢？这种地地道道的大苦难是卡拉芒利亚之流所看不到和无法理解的，而且由于他们的无知使苦难更加深了，更增添了耻辱。

阿里霍扎陷于沉思，缓步走出桥头。他甚至没有注意到那个随军护士在陪伴着他。他耳朵上的痛苦远不如读了“皇帝之音”以后心中所产生的痛楚。他缓缓地走着，觉得从今以后再也不会到对岸去了，他想到这座大桥使全城引以为荣，而且从建造以来就和他的家庭紧密相联系，他自己也在这桥上和桥边成长和生活着，现在觉得桥中心，在加比亚台地方，好象突然被炸毁了；他觉得那一张奥地利布告的大白纸，是一种无声的爆炸，把大桥拦腰切断，造成了一条鸿沟，尽管切断处的左右还有几根孤立的桥墩，但已经无法通行了，因为大桥已经不把两岸沟通一起了，

现在人在哪一边，就得永世待在哪一边。

阿里霍扎慢慢地走着，脑子里却在翻江倒海。他好象身受巨创，步履蹒跚，老是泪水盈眶。他又好象一个有病的乞丐，行动艰难，第一次通过这座大桥，进入一座陌生的城市似的。

人声使他惊跳起来。有些士兵从他身旁经过，在这些人里面，他又看到了那个臂戴红十字，为他起钉的随军护士，带着一张和善幽默的大脸庞，老是笑咪咪的，这时指着他包扎的伤处，不知问了些什么，因为他根本听不懂他的话。

阿里霍扎以为这个护士又要帮他什么忙，所以他立刻全身紧张，发起愣来：

“我自己能办，我能。我用不着任何人帮忙。”

于是他毅然决然加快脚步，回到了家里。

第十章

第二天，奥地利军队才浩浩荡荡地正式开进这座城市。

就记忆所及，这座城市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死寂。店铺全部关门，而且时当八月下旬，烈日当空，天气炎热，各家各户门窗都紧紧地关闭着。小巷里杳无人迹，院落和果树园里也鸦雀无声。土耳其人的家庭笼罩着沮丧和惶惑的气氛，而基督徒也怀着谨慎和怀疑的情绪。实际上，所有的人都提心吊胆，进城的德国佬怕遇到埋伏；土耳其人惧怕德国佬；塞尔维亚人既怕德国佬又怕土耳其人。至于犹太人，他们对任何人都害怕，因为任何人都比他们厉害，尤其是在战争时期。人们的耳边似乎还在响

着前一天隆隆的炮声，个个人心惶惶。这一天，本来谁也不敢露头，但是，人往往要受其他因素所支配。前一天进入这个城市的奥地利军队，找到了警长和一些警察；指挥这支队伍的军官把自己的军刀交给了警长，责成他继续执行他的职务，维持全城的秩序，并且告诉他，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团长就要到达这里，让当地的贤达们，也就是说三种宗教的代表，在团长进城的时候前去迎接。那个半醉的警长，忍气吞声，马上通知了穆拉·伊布拉伊姆，神学院院长于赛恩阿迦，正教教士尼古拉，犹太教教士大卫·雷维并且告诉他们，要以"宗教界代表和社会贤达"的身分，于第二天中午在加比亚台上欢迎奥地利指挥官，代表民众向他致敬，陪同他进入市中心。

宗教界的四个代表，按规定的时间，大大提前到场，他们聚集在杳无一人的集市广场上，然后缓步走上加比亚台。警长的助理沙尔科·艾多，在一个警察协助下，已经在加比亚台铺上了一条颜色鲜艳的土耳其长地毯，盖在石头台阶和准备让奥地利指挥官就座的台中央座位上。他们庄严肃穆地在那里站了很久，后来看看从奥克里德下来的白色道路上还没有指挥官的影子，于是他们相视默然，不约而同地在未铺地毯的那些石头座位上坐了下来。教士尼古拉取出了他的皮制大烟袋请大家抽烟。

他们象年轻时代那样聚集在"沙发"台上，那时候他们无忧无虑，和其他青年一起在加比亚台上消磨时光。现在他们都已经多少上了些年纪。正教教士尼古拉和穆拉·伊布拉伊姆已经是老头了，神学院院长和犹太教士也都是些中年人了。现在他们身在这里，穿着节日的盛装，但内心却对自己和亲人忧心忡忡。在夏季的烈日下，他们相顾良久，发现每个人都比实际年龄显得苍老憔悴。每个人都在回忆坐在身边的人：他们的青年或童年

时代；每个人都和自己的同辈，象郁郁青松，在这座大桥附近一同成长，现在不知道这棵青松将会发生什么遭遇。

他们吸着烟，嘴里谈的是一件事，心里想的却是另外的事，眼睛不时向奥克里德方面望着，因为指挥官将首先在这里出现。现在，一切都操在这个指挥官手中，他可以给他们，他们的同胞和全城带来好处，也可以带来坏处，可以带来安宁，也可以带来新的危险。

在这四个人里面，毫无疑问，正教教士尼古拉显得最安详、最镇静，至少他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他已经年过七十，然而还是精神矍铄，身体健壮。他的父亲是有名的正教教士米爱罗，就在这座桥上让土耳其人斩了首，所以尼古拉的青年时代是不平静的。他为了避开一些土耳其人的仇恨和报复，曾经好几次逃到塞尔维亚。他那种不肯屈服的性格和他的品行使他成为仇恨与报复的目标。波折的年代终于过去了，教士米爱罗的儿子接管了他父亲的教区，结了婚，定居下来。当然，这些年代已经过去多年了，人们也早已遗忘。（教士还有时带开玩笑地说："我的性格早已变了，我们的土耳其人也早已变得和善了。"）五十多年来，教士尼古拉一直主持着他的教区，这个教区面积辽阔，而且分散在边界地区，管理不便。但他稳稳当当，谨慎小心地管理着，所以他的教区除了生活本身所发生的变迁和不幸以外，一直平安无事；他管理教区既有仆人那种忠心，又有王子那种尊严，对待土耳其人，普通百姓和自己的上级始终公平正直。

任何阶层，任何教会，都找不到一个人象这位教士受到所有百姓——不分信仰、性别和年龄——那样普遍的尊敬，那样高度的推重，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全城的人都一直称他为"老爷爷"。在全城和全区心目中，他代表着塞尔维亚教会，也就

是人们公认的所谓基督教。更重要的是，他被看作在这个城市，在当时环境下人所公认的标准教士和模范领袖。

他是一个身材高大、气力非凡的人，他的文化不高，但心地善良，头脑清醒，光明磊落，富有胆量。他的笑容能使你怒气顿消，心平气和，也能使人鼓起勇气。这种笑容是从一个身体强壮、慷慨大方、对己对人都平心静气的人所流露出来的，既无法形容，又难以评价。他的一双碧眼圆睛，有时眯成两道褐色细缝，徐徐闪出金光。他一贯如此，到老不变。他披着狐皮长袍，满脸胡须，长达胸部；虽然年事已迈，但须鬓几乎未白，头发稠密，还编成一条大辫子，盘在脑后，外加宽大的僧帽。他就这样通过商业区，使人看来他不仅是五十年来一直是这座背靠大桥的城市以及这里整个山区的正教教士，也不仅是自有正教以来，而是有史以来，从洪水时代开始（当时世界还没有象现在这样划分为几个宗教，几个教会），他一直就是正教教士。马路两旁的商人，不论他们信仰什么宗教，都从他们的店铺里向他致敬。妇女们闪在一旁，低着头，等候“老爷爷”走过去。孩子们（包括小犹太人）都暂停游戏，停止叫嚷。年纪大一些的孩子则战战兢兢，神色庄重地凑近“老爷爷”的手，老爷爷用他那粗大的手在孩子们剃光的脑袋和玩得通红的脸上比划着，并且用洪亮愉快的声音为他们祝福：“愿上帝保佑你长命百岁！愿上帝保佑你长命百岁，我的孩子！”

这种对“老爷爷”的尊敬是先辈留下来的习惯，也可以说是世代遗传的，因为每一代人生下来就有这种习惯。

不过，教士尼古拉在生活上却笼罩着一层阴影，因为他结婚以后没有过孩子。这当然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不管是从他自己还是从他的妻子那里，谁也没有听过一句怨言，连他

们的眼睛里也看不到有一点苦恼的神色。可是他们家里至少总有两个小孩，是他们从乡下亲戚那里领来的。他们把这些小孩一直抚养到结婚成家为止，然后他们又再收养别的孩子。

坐在教士尼古拉旁边的是穆拉·伊布拉伊姆，他是个干瘪瘦高的老头，须髯稀疏，两撇小胡子向下低垂，年龄并不比尼古拉小。他的家里人口众多，父亲给他留下一份丰厚的遗产，但他自己却不修边幅，加上形容消瘦，一双碧眼，象小伙子那样灼灼有神还带着几分怯懦的样子，所以他象一个隐士或一个穷苦虔诚的朝圣者，而不象出身于名门的维舍格列城的霍扎。穆拉·伊布拉伊姆说话结巴得很厉害。（人们开玩笑地说：要等自己完全空闲的时候才能找他谈话。）然而，穆拉·伊布拉伊姆乐善好施，几十里内外，无不闻名。他的性格温和开朗，只要和他一接触，对他的外表和口吃就很快忘掉了。他对那些遭受疾病、穷困或其他苦难的人，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引力。住在偏远村庄的人都跑来向他请教，因此，他的住宅前面老是有人在等候。向他求教或请他帮忙的男男女女，往往在路上把他拦住。他从不拒绝任何人，也不象别的霍扎，只是给人出些费钱的主意，或者只是给人家一些护身符而已。他总是立刻找个阴凉地方或一块石头靠旁边坐下来，别人低声向他诉说自己的苦衷。穆拉·伊布拉伊姆满怀同情，注意倾听；最后他用好言安慰，总是找出最好的解决办法，或者他把细长的手臂伸进长袍的深口袋里，等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掏出几个铜子放在对方手里。他帮助任何一个穆斯林都丝毫不感到困难，也不感到厌烦，而且更不会感到毫无办法。对这种事，他总是有充裕的时间，总能设法弄到钱。遇到这种情况，他并不因为口吃而感到说话不便，因为当他同求助于他的信徒耳语时，他连自己的口吃病都忘掉了。登门求助的信

徒即使不是人人都满意而归，但至少内心暂时宽慰一些，感到有人真正为自己分忧。他老是操心别人的忧患，而从来不为自己着想，所以他很健康、愉快、舒服地度过了这个世纪，至少他自己觉得是这样。

维舍格列的神学院院长于赛恩阿迦是一个身材比较矮小的人，虽还年轻，但已发胖，穿着华丽讲究。他那短小的黑胡须，修成一个整齐的椭圆形，环绕在他那白里透红的脸庞上，一双眼睛又黑又圆。他是个读书人，博学多才，大家都知道他很有学问，而他对自己学问的估计，比别人的估计还高。他喜欢演讲，而且喜欢人家听他的演讲。他自信很会说话，所以一说话就滔滔不绝。他说话讲究修词，矫揉造作，还有精心推敲的架势：两臂略为举起，两手平放，一双手又白又嫩，短黑的茸毛衬出粉红色的指甲。他讲话时，好象是对着镜子在装模作样似的。在这个城市里，数他收藏的书籍最多。他有一只箍着铁皮、关闭得很严实的书柜，里面装满了他的老师——大名鼎鼎的阿拉普霍扎——生前给他遗留下来的书籍，他不但把这些书保护得很好，免受尘土和蛀虫的侵蚀，而且出于节约爱惜而很少去读这些书。当然，这么多有价值的书本，使他在不知道书本为何物的人们面前增添了威望，而他自己也因此觉得身价百倍了。大家都知道他在撰写这个城市的重要大事记。这件事情使他在群众中间博得学者才子的美誉，因为人们认为这个城市以及每一个人的声望都操在他的笔下。事实上，这种大事记既不详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这位神学院院长撰写大事记，写了五六年，在一个小本子上总共才写了四页；因为他认为城市中大部分事情都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不配载入他的大事记。所以他的大事记象个骄傲的老处女似的，果实不丰而且空洞无物。

第四位“宗教界的代表”就是维舍格列的犹太教教士大卫·雷维，他是有名的犹太老教士哈吉里阿周的孙子，这位老教士给他留下了姓氏、司铎的职位和财产，但是这位老教士的智慧和爽朗性格，丝毫没有遗传给他。

他是一个瘦弱苍白的青年，一双棕色和善的眼睛流露出愁苦的神情。他的怯懦寡言超出人们一切想象之外。他还没有提升到教士的地位就结了婚。为了使自己显得魁梧强壮些，他穿着一件宽大华丽的厚呢衣服，脸上还留了一些胡须，但是，人们可以想象到，在这宽敞的服装里面，是一个羸弱的身躯。透过稀疏的几根黑胡须，一眼可以看到这是一张年轻带病的长圆脸。当他要到社会里去同人们讨论并且商决一些问题的时候，他感到非常苦恼，因为他总觉得自己矮小孱弱，比别人略逊一筹。

这时候，他们四个人坐在这里，烈日当空，还穿着他们的礼服，自然都汗流不止，使他们并非所愿地显得更加紧张，更加不安。

“得，我们每人再抽一斗烟吧，我们还有得等呢，他妈的！这个鬼东西不是一只鸟，他总不会一下子就飞到这座桥上来。”教士尼古拉说。他早就学会了用玩笑来遮盖他的真实思想、掩盖他自己和别人内心的愁思。

他们朝着奥克里德方面望了一下，随后又抽起烟来。

他们的谈话慢条斯理，谨慎小心，话题老是围绕着如何欢迎指挥官的问题。大家都一致推举教士尼古拉向指挥官致敬，表示欢迎。这位教士一声不响，朝三个人注视好久，眯缝着眼睛，上下睫毛碰在一起，形成了两道深色的细缝，里面闪出了金光，仿佛在微笑似的。

那年轻的犹太教士害怕得要死。他甚至于没有力气把烟雾

吐得远一些；所以一圈一圈的烟雾都滞留在他的胡须里面。那位神学院院长心里也并不太安稳。他那雄辩的口才、学者的尊严，这一天上午都突然消失了。他自己也估计不出来他心慌到什么地步，恐惧到什么程度，连个大概也估计不出来，因为他的自负使他不相信自己竟会心慌意乱到那种程度。他想要试一下他那文绉绉的演说，加上他那些有节奏的、绘声绘色的姿势，但是他的一双手又垂了下来，落在大腿上，而且他的话也说不清楚，说不下去了。平素的尊严究竟到哪里去了，他感到奇怪，极力想把它拉回来，可是毫无办法，真象一件早已司空见惯的东西，但当你最需要的时候，它却无影无踪了。

穆拉·伊布拉伊姆虽然沉着镇静，但脸色也比平日显得稍微苍白一些。他同教士尼古拉的目光不时相遇，这好象就是他们之间进行通话的一种方式。如果在这个时候，土耳其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还可以谈得上友谊的话，那么这两个人可以说是老相识，是童年时代的老朋友了。教士尼古拉在他青年时代同维舍格列的土耳其人曾有过纠纷，不得不逃亡隐匿起来，当时穆拉·伊布拉伊姆由于他的父亲是这个城市中很有势力的人，曾经帮过尼古拉的忙。后来，城市中的情况不象以前那样混乱了，两个教会之间的关系也不是水火不相容了，这时候他们两个人已经是壮年了，于是交往甚密。他们开玩笑地互相称为"邻居"，因为他们的房屋分别在城市的两头，正好遥遥相对。每当这个地方遭到了水旱灾害、流行病或其他天灾人祸的时候，他们同心协力，为本教区的居民消灾除难。他们不时在美以当山上或奥克里德相遇，彼此都互相致敬；一个正教教士和一个霍扎之间这样互相致敬，互相问候，在任何地方都是见不到的。教士尼古拉往往乘此机会用长烟管指着下面沿河的城市，半正经半玩笑地

说：

“对这下面所有会呼吸、会爬行、会说人话的生灵，你和我都负有责任。”

“是啊，你说得对，邻居，”穆拉·伊布拉伊姆结结巴巴地回答说：“我们真是要负起责任。”

（所以那些对任何事情都喜欢开玩笑的市民，一谈到有人相处密切时就形容说：“他们象正教教士和霍扎那样互相敬爱。”这个口头语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这时候，他们彼此虽然没有交换过一句话，但两个人都能心照不宣。教士尼古拉知道，目前的事对穆拉·伊布拉伊姆是多么痛苦难忍，而穆拉·伊布拉伊姆也知道，对这位教士也是很不好办。所以他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这种情况，在他们一生无数的场合中不知道遇到了多少次；他们两个人对这个城市所有的两腿动物都好象负有责任，一个要对画十字的人负责，另一个要对匍匐在地的人负责。

这时候传来了马蹄声，一个卫士骑着一匹可怜的瘦马跑来了。他气喘吁吁，惊慌失色，象一个报子似的，从老远就嚷着：

“指挥官来了，他骑着他的白马来了！”

这时候警察长忽然出现了，和平常一样镇静可爱，沉默寡言。

从奥克里德过来，只见一路尘土飞扬。

这些生长在十九世纪土耳其衰败时期的人，自然从来没有机会见过强国的军队，一支真正有组织有力量的军队。他们直到现在所看到的只是些不完备的土耳其苏丹的军队，这些军队给养不足，服装褴褛，发饷不定期，更糟糕的是那些强征入伍的波斯尼亚散兵游勇，毫无纪律，毫无斗志。这时候，他们才第一

次看到了一个帝国的真正力量，这一支军队所向披靡，出类拔萃，充满自信。这支军队使他们眼花缭乱，张口结舌。一看到战马上的鞍辔和每一个兵士军服上的钮扣，人们就感觉到在这些身穿华丽军服的步兵、骑兵后面，存在着一个辽阔强盛的内陆国家，存在着一个强大有力和井然有秩的繁荣世界。这真使人大吃一惊，并且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走在最前面的是两个骑着灰白色骏马的号手，后面跟着一队乘着黑马的轻骑兵。这些马都洗刷得很漂亮，疾驰起来象少女一样，碎步轻盈。轻骑兵戴着没有帽檐的红军帽，胸前垂着金黄色的丝缘，他们全是些年轻人，皮肤晒得又红又黑，卷着两撇小胡子，一个个神采奕奕，好象刚从兵营里出来似的。他们的后面是六个军官，都骑着马，为首的那个就是团长。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他所骑的马比别的马高大，身上有斑点，马的头颈特别长，略为弯曲。离军官后面不远，跟着一连步兵，身穿绿色军服，皮军帽上带有羽毛装饰，胸前交叉着白色皮带。他们把地平线都遮住了，仿佛是一片在移动的森林。

号手和骑兵在教士们和警察长面前列队而过，在集市广场上停了下来，排列在广场两边。

那四个人，站在桥中央的加比亚台上，脸色苍白，心情紧张，望着那几个到了跟前的军官。一个年轻军官纵马追上了团长，对他说了几句话。其他军官都放慢了步伐。到了离“宗教界代表”只几步远的地方，那团长突然停住，下了马，别的军官好象得了信号似的，也都下了马。有些兵士跑了过来，牵着马，往后退了几步。那个团长一下了马，他的神气就好象变了样。这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人，其貌不扬，精神疲惫，样子凶猛，令人生厌，好象所有的人中间只有他一个人在为大家奋战沙场。他究竟是个

什么模样，现在看得很清楚，只看见他穿着很简单，很不讲究，甚至有些不修边幅，和他的那些皮肤雪白、衣服笔挺的军官比起来成了明显的对照。他给人一种奋不顾身、鞠躬尽瘁的形象，他的面孔晒得黝黑，满脸胡须，眼睛焦急不安，头上的高顶军帽略为歪斜，瘦小的身躯裹着绉褶的军服，脚上穿一双软统褪色的马靴。他挥动着他的马鞭，撇着腿走过来。一个军官指着站在他面前的人，对他说了几句话。团长用阴森可怕的目光对这些人扫了一眼，这是肩负重任、出生入死的人惯有的锐利目光。人们立刻就明白他总是这样看人的。

这时候，教士尼古拉以平静深沉的声调开始讲话。那个团长抬起头来，注视着这个仪表堂堂、身穿黑长袍的人的面孔。这位教会长老的宽宏安详的容貌，一时之间很引人注目。他可能听不懂，或者可能装作听不见这位老教士所说的话，但对这位教士的容貌总不能视而不见。

教士尼古拉讲起话来很流利自然，他与其说在对团长致词，不如说是在对担任翻译的青年军官说话。他代表在场的各种宗教的教士向团长保证，他们和人民愿意顺从进驻者的善良旨意，并竭其所能，按照新的当局的要求来维持好治安与秩序。他们请求军队保护他们及其家属，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

教士尼古拉讲话简短，霍然结束。性情急躁的团长还是耐心听他讲完，但他却不等那青年军官翻译完，就挥动着他的马鞭，用斩钉截铁而又高低不匀的声调打断了青年军官的话：

“行了，行了！所有安分守己的人都会得到保护。但是必须把治安和秩序一律维持好。否则，他们想要得到保护是不可能的。”

他摇了摇头，说完这些话以后，又向前走，既不招手致意，也

不看一眼。教士们闪开路，团长从他们面前走过去，后面跟随着一些军官和马夫。谁也不管那些单独留在加比亚台上的“宗教界代表”。他们都很失望，因为他们一夜都没有睡好，从昨天夜里到今天早上，他们一直在反复揣摩，加比亚台上欢迎帝国军队指挥官的情景究竟会是怎样。他们根据自己的本性和智慧作出各种各样的猜想，而且作了最坏的打算。他们有的估计会被遣送或流放到遥远的德国去，再也见不到他们的家园和这座城市。有的回想起人们讲过阿意路丁，这个人以前就在加比亚台上杀了许多人。他们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和这位军官会面的实际经过，竟是如此；此人虽然身材瘦小，但却刚愎自用，他活着就是为了打仗，既不想他自己，也不考虑别人，他把周围的人和土地只是当作战争的目标或手段，他好象是为这个目标或手段而战，以这个目标或手段的名义而战。

他们呆在那里，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不知道如何是好。每一个人的目光都在无声地提问：“我们还活着吗？最坏的结果真的过去了吗？”“还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们呢？”“怎么办呢？”

警察长和正教教士首先恢复了神志。他们最后作出结论说：他们代表宗教界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各自回家，并劝告大家不用害怕也不用逃避，当然必须安分守己。其他人都面无血色，毫无主意，他们接受了这个结论，即使还有什么别的结论同样也会接受，因为他们自己根本提不出任何建议。

遇事不慌不忙的警察长办他的公事去了。卫士把那条五彩缤纷、没有福气接待指挥官的长地毯卷起来，站在他旁边的是沙尔科·艾多，象命运之神一样，对此无动于衷，冷若冰霜。那些宗教界代表也各自请便，各走各的。那犹太教士拔腿飞奔，想尽

快回到家里，去同母亲和妻子团聚，享受家庭的安逸和天伦之乐。那位神学院院长陷入沉思，步伐较慢。现在既然一切都出乎意外地顺利过去了，他觉得根本没有理由再担惊受怕，况且他有生以来似乎从来没有怕过谁。他心里在估量，这一事件在他的大事记中有多大意义，应该占多少篇幅：可能二十来行就够了，也许只要十几行或者更少些。他越走近他的家，行数就越减少。每节省一行，他感到他周围一切事情的意义就减少一分；至于他这个神学院院长，在自己眼里，却是越来越了不起，越来越伟大。

穆拉·伊布拉伊姆和教士尼古拉一路同行，直到美以当山下。他们一言不发，对这位团长的举动行为感到惊讶沮丧。他们两人都急于回到家里同家人团聚。分手时，两人停了一会，相对无言。穆拉·伊布拉伊姆瞪大了眼睛，嘴唇蠕动着，仿佛在反复咀嚼同样的话，可始终没有说清楚。教士尼古拉又恢复他那种眼闪金光的微笑神情，这种神情对他本人和霍扎都具有鼓舞作用。于是他发表了个人看法，其实也是霍扎的看法：

“这支军队干的是血腥的勾当，穆拉·伊布拉伊姆！”

“你你你说说说说得对，血血血血腥的！”穆拉·伊布拉伊姆举起两臂，口吃地说；说完这话，他点头致意，并且面带微笑地向他的朋友告别。

教士尼古拉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了他在教堂对面的家。他的妻子出来迎他，但什么话也不问。他浑身是汗，马上脱下靴子、长袍，并且摘去了盖在棕灰色头发编成的大辫子上面的僧帽，然后在低矮的长沙发椅上坐下来。沙发椅的木头扶手上已经放好了一玻璃杯水和一小块糖。他喝了水，点了一支雪茄烟，觉得身体疲倦，于是闭上了眼睛。但是眼里不断地出现那个性

情暴躁的团长，象闪电般耀眼，遮住了人们的全部视线，所以总是看见他，可又是总看不清楚。那教士叹了口气，把烟雾吐得远远，并且轻轻地自言自语说：

“啊！多么可恶的家伙！……啊，婊子养的！”

从城里传来了步兵联队的隆隆的战鼓声和响亮的军号声所汇成的生疏旋律。

第十一章

这座大桥旁边的城市生活中所发生的大动荡，其经过就是这样。在这次大动荡中，除了阿里霍扎以外，没有任何人遭受到痛苦。几天以后，生活又恢复正常，似乎也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阿里霍扎也恢复了常态，同其他商人一样，他在桥跟前的商店也开门了；不过从那时起，他把包头巾略为向右边歪斜，借以遮盖他耳朵上的伤疤。在他看到匈牙利士兵袖章上的红十字和用泪眼读了“皇帝谕言”的时候，他胸中好象钻进了一颗“铅弹”，这颗“铅弹”的确还没有消失；不过它已经收缩得象一颗念珠那样小，所以他带着这颗“铅弹”还可以生活下去。其实，心灵里怀有这种“弹丸”的人，何止他一个人。

在军队的占领下，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这种新时期虽然无法阻挡，但大家心里都在想，这不过是暂时的。在占领开始那几年，什么东西不从桥上通过呀！一长列一长列的黄色军车从桥上隆隆穿过，运载着过去从未运过的食物、服装、家具、工具以及各种军需品。

最初，只看见军队、士兵们从各个角落，从小树林里象地下水那样冒出来。集市广场上尽是士兵，城里也到处都是。不时可以听到妇女在自己的院子或屋后的李树园中由于突然落到士兵手里而发出的惊叫声。这些士兵经过两个月行军和战斗，饱经风霜，侥幸生存，贪图逸乐，他们穿着暗蓝色的军服在城里和郊外到处游荡。桥上任何时候都有士兵。市民很少到加比亚台上去，因为那里总是让士兵挤满了。这些士兵坐在那里，唱着各种语言的歌曲，开开玩笑啊，买水果啊，他们戴的是遮阳的蓝皮军帽，黄色铁皮的帽徽上面还刻着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的缩写名字。

一到秋天，军队开始陆续撤走，数目不知不觉地减少了，只留下了几个宪兵分队。这些宪兵队各分管一片，准备长期驻守。这时开始来了一些官员、大小职员及其家属和仆人；接着来的是当地还没有的某些行业的手艺人和技术员。这里面有捷克人、波兰人、克罗地亚人、匈牙利人和德国人。

起初，人们以为是一阵风偶然把他们吹到这里来的，以为他们只是暂时来和我们共同生活一段时间，通过文官统治把军事占领再延续一个时期。然而，时间慢慢过去，外国人却与日俱增。最使这个城市的人感到奇怪，惊讶甚至怀疑的，不仅仅是这些外国人的人数，而且还有这些人的庞大而愚蠢的计划，以及他们的不懈努力和为完成这些计划的毅力。这些外国人一刻都不闲着，也不让别人闲着。好象他们决心要用一套法律、规章和命令无形之中但又越来越明显地把整个生活，包括人、畜和物全部束缚住，而且要把他们周围的一切——市容、风俗、习惯等，从摇篮到坟墓，来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他们对这一切不慌不忙地在进行，不说空话，不用暴力，也不强迫，因此谁也没有理由反对

他们。如果他们偶然遇到有人不理解，或者碰到一些阻力，他们就立刻停下来，暗中进行磋商，只是把他们的工作方针和方法加以修改，但总的决定还是不变，照样进行到底。他们所做的一切看来都是毫无意义，甚至是荒诞的，例如丈量一些荒芜的土地，把森林里一些树木标上记号，检查粪坑和阴沟，检查牛马的牙齿，审核度量衡，调查人民所患的疾病、果树的数量和名称，母羊和家禽的种类等。他们简直是在闹着玩，在当地居民的眼里，这些事情简直不可理解，毫无意义，徒劳无用。他们那样热情专注地进行的这一切事情，忽然不了了之，也没有留下一点踪迹，似乎已经彻底消灭了。但是几个月以后，往往是整整过了一年以后，人们已经把这些事情完全忘了，这时候，人们早已遗忘、表面上毫无意义的那些措施突然又有了下文。各区区长被召集到市政府，聆听各种新颁发的命令，这些命令牵涉到砍伐树木，消灭伤寒，经营水果、糕点或有关牲畜通行证等等规定。每天都有一种新的规章，而且每颁布一种规章，大家不是感到个人的自由受到了部分的限制，就是感到个人应承担的义务增加了；另一方而整个城市、所有乡村和全体居民的生活领域开阔了，范围越来越扩大了。

不过，无论是土耳其人还是塞尔维亚人，家庭生活却毫无变化。人们还同过去那样生活，劳动，娱乐；还是在盆里揉面，在炉子里烧咖啡，在桶里煮衣服，妇女们还是用刺痛手指的碱水洗衣服，用织布机纺纱织布，用绷子刺绣。节日和结婚的传统习惯完全保存下来；至于那些外国人带来的新俗例，大家只是议论一番，感到是不可思议的奇风异俗。总而言之，绝大部分家庭里的生活，劳动仍然一如既往，今后也还仍然如此，即使占领者在这里还继续呆十五年甚至二十年。

与此相反，城市的面貌却明显迅速地起了变化。那些在家里保持着旧传统方式不想加以变更的人，对于城市中所发生的变化倒是可以接受，只是有些怨言，而且在一定时期还有些惊疑罢了。当然，新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总是新旧混淆，在类似的历史情况下，不管什么地方都是如此。旧思想、旧观念和新思想、新观念互相冲突斗争，新旧有时候互相结合，或者同时并存，仿佛要等着瞧，看哪一个能继续存在下去。当时，人们算帐时，既按土耳其货币单位，也按外国和德国的货币单位计算；量衡时，既按土耳其的量衡单位计算，同时也采用公尺、公斤和公分等单位；规定付款和交货日期时，既根据新日历，但更多的是沿用旧的传统习惯，譬如把日期定在圣乔治节或圣地米特利节的时期。根据自然规律，人们往往反对新事物，但是这种反对并不能坚持到底，因为对大部分人来说，实际生活总是比形式更加重要，更加不可抗拒。只有个别例外的人，才使自己陷于新旧事物的斗争中而不能自拔，因为在他们看来，生活方式与生活本身密切联系，而且是绝对分不开的。

赤伦恰地方的申西贝克·布朗科维奇就是属于后一种人，他是这个城市中最富裕最有名的一个贝伊。他有六个儿子，其中四个已经结了婚。他们的房屋构成一个完整的村落，周围都是田地、李树园和小树林。申西贝克沉默寡言，要求严格，是这个大家庭无可非议的家长。他的身材高大，由于上了年岁，背略有些弯，头上戴着一条白色金边大头巾，他只是每逢星期五才进城上清真寺作祷告。自从被占领的第一天起，他在城里哪儿也不停留，对谁也不说话，也不左右张望。谁也不敢把新式东西带到布朗科维奇的家里，哪怕一件新式衣服、一双新式鞋子、一件新式工具、一句新鲜名词。他的儿子没有一个人担任与新政权有

关系的职务，没有一个儿孙辈上学读书。全家对这种作法都感到受不了。尽管儿子们对老头子的顽固都感到不满，但是谁也不敢吭声，甚至也不敢流露出一点不同意的神色。商业区里与那些外来者有工作关系并和他们混在一起的土耳其人，在申西贝克经过市区时默然向他致敬，心里都怀着恐惧、敬仰和不安的情绪。这个城市中德高望重的土耳其人，象朝拜圣地一样，常常到赤伦恰去和申西贝克促膝谈心。聚会的都是些决心抵抗到底的人，他们不惜任何代价，绝不向现实低头。实际上，在这些长时间的聚会中，彼此之间谈得很少，最后也没有任何具体结论。

申西贝克不分冬夏总是穿得整整齐齐，系好钮扣，他坐在小红地毯上吸着烟，周围都是他的宾客。他们很有自尊心，经常谈论占领当局的一些无法理解、令人厌恶的新措施，或者议论那些越来越迎合新形势的土耳其人。在这个严酷而自负的人面前，大家都感到需要把自己的痛苦恐惧和惶惑不安向他倾吐。每次结束总是这些话："这种形势要把我们引向哪里？发展到哪里为止？这些外国人不停顿，不间歇，没有范围，没有止境地干，到底是些什么人呢？他们要干什么？他们来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哪儿来这么多的需要，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他们究竟准备怎么办呢？他们为什么老是坐立不安，好象厄运在驱使着他们，促使他们去进行这一切没有止境的任务和事业呢？"

申西贝克只是朝着大家看，大部分时间都不说话。他的脸色阴暗，倒不是太阳把他晒黑了，而是出于内心深处的忧郁。他的目光凝滞，神思恍惚，眼睛浑浊，眼珠周围有一圈灰白，象老鹞鹰的眼睛一样。他的一张大嘴紧紧闭着，嘴唇轮廓不太明显，嘴里在轻轻蠕动，好象老在推敲同样一句话，但始终没能说出来。

不过，大家从他家里出来的时候，都有轻松愉快之感，他们

并不是得到了什么安慰，也不是受到什么劝解，而是让他那种毫不妥协的死硬精神所激励。

每当星期五，申西贝克到商业区的时候，他总是从人们身上或建筑物上面发现了上星期五还没有的某种新的变化。为了避免看到这种变化，他眼睛朝地，但是从马路的干土中他又看到了马蹄的痕迹，发现在土耳其马的整个圆形蹄铁印旁边，德国马的弯形两头尖的蹄铁印越来越多。所以他的眼睛就是在地上的泥土里，也同样看到了他在人们的脸上和周围的事物上而所看到的那种无情的判决，人们无法左右的时代的判决。

申西贝克感到从此以后哪里也不能看，因此他干脆再也不进城了。他完全隐居在他所住的赤伦恰村中，作为一个沉默寡言而又墨守成规的家长，他待人很严，待已更严。那些德高望重的土耳其人继续去拜访他，好象去朝拜一个活死人似的。（这些人里面有阿里霍扎·穆德维利奇等。）到了占领的第三年，申西贝克竟无病而终。这个老头始终没有说出他嘴边不断打转的那句辛酸话，而且也没有再踏进面目全非的商业区就与世长辞了。

的确这座城市突然变了样，因为那些外国人把树木砍了，又在别处种上新树，他们整修旧路，又另辟一些新路，挖修沟渠，建筑公共房屋。最初几年，他们拆毁了市区里参差不齐的一些商店，说实话，这些商店不拆也决不碍事。这些装有木头百叶窗的旧商店拆了以后，他们又另外建立了一些地基坚固的商店，屋顶用的是瓦或铁板，门上安装了铁栅栏。（阿里霍扎的商店本来也在拆除之列，但是他坚决抵制，提出控告，竭力周旋，所以他的商店终于原封不动。）集市广场比过去加宽而且铺平了。还盖了一座宫殿式大厦，将来法院和政府机关就设在这里。至于军队，只顾自己，干起来速度更快，比行政当局的顾虑少一些。他们修

筑简易营房，开垦土地，种植树木，使山丘的面貌焕然改观。

年老的市民对这种情况毫无办法，老是表示惊愕。每当他们以为这种无法理解的劲头就要到此结束了，这时候，那些外国人又开始进行一项更难理解的新工程。房民们也停下步来看看这些工程的进行，但是，他们并不是出于小孩的那种好奇心，想看看大人在干什么，相反的，而是象大人有时候也站在一旁，看看小孩在玩些什么游戏。这些外国人老在进行营造拆毁、修筑挖掘，改天换地，老是在对自然界的破坏力量作出预测，进行防患或者设法对付，这里的人对此一窍不通，也无法估量其意义。相反，所有的居民，特别是老年人，认为这一切都是不正常的现象，是一种不祥之兆。按照他们的想法，这座城市应当永远保存一切东方式小城市所特有的面貌：旧的可以加以修理，要倒的加以支撑，除此以外，谁也认为没有必要为了规划和预防而大兴土木；他们既不想触动一点地基，也不想改变上帝给这座城市所塑造的外貌。

然而，那些外国人按照他们所精心设计而别人所不了解的计划，迅速而有成效地把他们的工程，一个一个地完成了，使这座城市的市民越来越感到惊奇。

现在，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地轮到了这座被人遗忘、已经破落的石头旅舍，这座旅舍在三个世纪以前还是那座大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老实说，所谓石头旅舍早已成为废墟。旅舍的门都已腐烂了，窗户上的软石栅栏都已破碎了，房顶也已经塌落了；旅舍里面长出了一棵大槐树，一大片小树和乱七八糟的杂草，但是这座建筑物外面的围墙还是完整的，围墙是用白石砌成，呈长方形状，角度整齐协调。在市民眼里，他们始终认为这不是寻常的废墟，而是大桥的组成部分，和他们自己的家宅一样，都是这

座城市不可分割的部分；除了时间和自然界使这座古老旅舍慢慢剥落和损毁以外，从来没有一个人想到，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人去碰它，会对它加以任何改变。可是居然有一天也轮到它。开始是一些工程师在废墟周围丈量了很长时间，随后来了一批技工和小工，把石头一块一块拆下来，把栖息在那里的各种小鸟和小动物都轰走了。大桥旁边的集市广场上面的那块平地，很快地被打扫一空，而这座旅舍只剩下了一堆安放整齐的完好石块。

一年多以后，在当年的白石旅舍所在地，建立了一座二层楼的高大营房，外面涂上浅蓝色，屋顶是灰色铁板，周围筑有枪眼。士兵们整天在加宽的场地上操练，他们象牺牲品一样，在下级军官咆哮如雷的指挥声中，不停地挥舞四肢，或者象可怜虫似的，把头栽在尘土里。到了夜晚，从这座丑陋建筑物上面的各个窗户，传出了莫名其妙的战歌声，还有口琴伴奏声，一直持续到吹号为止。军号响过，所有的声音都停息，窗户的灯光也全部熄灭，但这种凄惨刺耳的军号声却引起全城的狗此起彼伏的狂吠。大丞相壮丽的慈善基业就这样烟消云散了，面这座和周围环境完全不协调的营房，就这样在大桥附近的空地上开始生存着，可是当地的人，由于习惯势力，仍然把这座营房叫作石头旅舍。

现在，这座大桥完全成了孤零零的设施了。

实际上，当地的旧习惯同外来者及其政权当局所带来的新事物之间，就是在这座桥上发生直接冲突的，冲突的结果，一切旧事物，一切当地的习惯不得不节节败退，让位给新事物。

在当地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桥上的生活还是竭力维持不变。不过，可以看出来，现在加比亚台上随时随刻都有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而且越来越多，越来越无拘无束，不象以往那样顾

虑土耳其人，照顾他们的习惯和考虑他们的特权。白天时间，活跃的中间商人整天坐在桥上，专等乡村妇女，向她们采购羊毛、家禽和蛋类；在他们身旁，是一些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人，这些人从早到晚，从城市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到了傍晚时候，其他一些市民、商人和工作人员也到桥上聊聊天，或者在那里默默地观赏这条大河以及两岸的小柳树和沙滩。到了夜晚，桥上成了年轻人和酒鬼的世界。

桥上夜晚的生活，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发生了些变化，从而造成了一些不愉快。最初那几年，新当局就在城里安装了照明设备，在主要街道和十字路口的绿杆子上挂了路灯，里面点的是煤油灯。（这些路灯由大个子费尔卡负责擦洗、加油和点燃。费尔卡是个穷苦人，家里有许多小孩，一直在民政部门充当仆役，他的差使是，例如斋戒节的时候负责放鞭炮诸如此类的事情，工钱不固定，也没有保证。）桥上有好几处，包括加比亚台，也是这种照明设备。加比亚台上挂路灯的杆子就钉在旧城堡遗留下来的橡木梁上。这盏路灯需要同各种人的习惯势力进行长期斗争，有的人对一切都不在乎，有的人喜欢在黑暗中唱歌，抽烟，聊天，还有的年轻人，本来就有一种破坏性，再加上失恋，孤寂，酗酒，心情不佳，总想发泄。这种闪烁的灯光刺激了这些人，所以有好多次灯笼和抽灯被砸得粉碎。这盏路灯成了许多人遭到罚款或判刑的原因。因此，有一个时候，专门派了一个警察在那里站岗。这样，加比亚台上的夜游者反而多了一个比那盏路灯更加讨厌的活证人。当然，时间慢慢起了作用，因为新的一代一代人渐渐地习以为常了，在市政当局安装的路灯的微光下，照样可以尽情发泄他们夜间的情兴，因此不是动不动就用石块木棍或信手拈来的东西把路灯击碎。人们越来越适应这种环境，尤其是每当月

明星稀、加比亚台上游人众多的时候，那些路灯往往也都不点了。

每年桥上只有一次大放光明，就是八月十八日的前夕，为了庆祝皇帝的寿辰，政府当局在石桥上装饰了一串串小树叶和一排一排小松树，当夜幕降临时，路灯都点着，再加上一连串小油灯，这是用几百只军用白铁罐头作成的，排成长列，里面装满了树脂和蜡，在石桥两旁闪闪发光。这些灯光照亮了桥中间部分，至于桥头和桥墩还是淹没在黑暗中，所以照亮的部分仿佛在悬空飘荡着。每一盏灯很快就燃完了，盛典也算过去了。到了第二天，桥上又和过去一样。大桥给这一代孩子只是留下最近所见到的这种不平常的景象：它沉浸在辉煌灯火之中，虽然象梦幻那样顷刻即逝，但是场面热闹，印象深刻。

除了固定的照明以外，新的行政当局还整顿加比亚台上的清洁卫生，更正确地说，符合新当局要求的清洁卫生。石头桥面不再是整天撒满了果皮、瓜子、核桃和榛子壳，只等风雨来冲刷。这些东西，每天早上有一个市政清道夫专门负责打扫。这项措施终于没有使任何人感到不方便，因为不要求当地人来保持清洁，因此尽管清洁卫生不是当地人的习惯和需要，他们照样可以接受。

占领后还有一种新鲜事物，就是自从有加比亚台以来，破天荒第一次看见妇女们也到这里来。政府官吏的妻子和女儿带着她们的女仆和保姆也到台上来聊天，或者遇到节日，由文武护卫陪同到台上来闲坐。这种情况虽不常见，但已经使那些到桥上安安静静抽着旱烟管的老头感到扫兴，使青年人感到神魂颠倒。

当然，加比亚台同城市中的女性始终存在着某种关系，这种关系仅仅是年轻小伙子对过桥的姑娘说几句献媚的话，或者诉

说他们的爱慕之情和内心的苦闷，或者到这里来解决因女人引起的争吵，或者谈论他们对女人的怨恨，以及想治愈心头的创伤。有许多孤单寂寞的人只是为了得到心灵上的安慰，几小时甚至几天坐在这里低声歌唱，吸着烟或者只是默然凝望着湍急的水流，企图以此来排遣心中激情所带来的相思债，这种债几乎人人都背过，幸免者能有几个。许多青年情敌的命运在这里决定了，许多爱情的计谋也在这里筹划。在这里，人们谈了许多关于妇女和爱情，也作了许许多多的美梦。有许多欲望在这里燃烧起来，也有许多欲望在这里熄灭了。过去，不管怎么样，无论基督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作为女人，从来没有一个在加比亚台上闲坐过，甚至停留过片刻，可是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完全改变了。

星期日和节日，在加比亚台上可以看到一些脸色绯红的女厨娘，腰肢紧束，再加上紧身上衣，把腰部上下的皮肉勒得紧紧地突起，她们连呼吸都感到困难。她们的军曹站在旁边，军服刷得很干净，金属钮扣闪闪发光，在漂亮的军服的胸前还佩带有红色绒球。傍晚时候，官吏和军曹在工作之余，带着他们的妻子出来散步，在加比亚台上停下来休息，谈话聊天，别人也听不懂，他们放声大笑，非常逍遥自在。

大家对这些闲极无聊、放浪形骸、嘻嘻哈哈的女人都看不顺眼，感到吃惊和讨厌，但是很快就习惯了，正如其他许多新玩意儿一样，尽管开始不能接受，但后来也都习以为常了。

一般地说来，桥上所发生的这一切变化都是无关紧要，表面而短暂的。至于大桥周围发生的许多重大变化，例如市民的思想和习惯以及城市外貌的变化，并没有损害这座大桥的一根毫毛。三百年来，就是在新皇帝的统治下，这座古老洁白的大桥始

终依然如故，多少人从它上面走过，也没有留下任何踪迹或伤痕；它曾战胜历次特大的洪水，每次都战胜浑浊的狂流，始终保持洁白完整，同样，对于外来者所卷来的这一股新事物、新变化的洪流，它也会把它战胜。

第十二章

这一下子，加比亚台上的生活变得更加活跃，更加丰富多采了。整个白天，甚至夜晚相当一段时间，台上总是熙熙攘攘，来往行人络绎不绝，有本地人也有外国人，有年轻人也有老年人。每个人都是出于个人的原因跑到加比亚台上来，有的是出于某些心事的驱使，有的是出于某种情趣和欲念的支配。因此他们丝毫不注意过路的行人，而这些行人也各有各人的思虑和烦恼，因此，他们过桥的时候都低着头，若有所思，既不东张西望，也不去注意坐在加比亚台上的人。

在这些行人里面当然少不了奥克里德地方的米兰·哥拉辛恰宁先生，他是一个身材高大、干瘪驼背、面色苍白的人。他的身子单薄轻飘，只是脚跟很重，所以走起路来弓着背，摇摇晃晃，活象教堂里合唱团儿意迎神时所举的旗幡。他的须发斑白，象个老头，眼帘总是低垂着。他就这样似醒非醒地从这里走过，没有发现加比亚台和人们身上已经起了变化，而那些坐在加比亚台上的人，有的在沉思、歌唱，有的在做买卖，有的在聊天或消磨时间，对他几乎也毫不在意；老年人把他忘了，青年人想不起他，外国人不认识他。可是，至少根据城里所听到的，以及十年、十二

年前关于他的传闻就可以知道，他的命运曾经和加比亚台息息相关。

米兰的父亲尼古拉·哥拉辛恰宁老先生是在塞尔维亚兵荒马乱的时候到这座城市定居的。他在奥克里德购置了很大一份产业。人们一直认为他是在别处发了一大笔横财以后逃到这里来的。对这件事谁也没有证据，所以大家半信半疑，可是谁也没有完全放弃这种假想。他曾经结过两次婚，但也没有增添多少子女。他只养了米兰这个独生子，并且把他的一切，包括浮财和别人看不见的财产全都留给了这个儿子。米兰也只有一个儿子，名叫皮埃尔。米兰唯一无二的嗜好，而且十分强烈，这就是赌博，如果没有这个嗜好，他的财产足够享用一辈子，甚至死后还可以留下一部分。

真正维舍格列人的本性并不好赌博。我们曾经提到过，他们另有一些完全不同的嗜好：那就是沉湎女色，喜欢喝酒，唱歌，闲逛或者坐在河畔胡思乱想。然而人的能量究竟是有限的，就是对嗜好也是如此。因此，一个人不可能对所有嗜好都兼而有之，它们互相排挤，往往某种嗜好压倒其他嗜好。但并不是说这个城市没有一个人喜好赌博，不过比起别的城市来，这种人实在不多，好赌博的大部分都是些外国人或外地迁入者。不管怎么说，米兰是属于迁入户。他从少年时候起，就整天醉心赌博。如果城里找不到必要的赌棍，他甚至到附近的乡村去，回来时，他或者象一个从集市上回来的商人那样腰缠万贯，或者囊空如洗，甚至连怀表、表链、烟包、戒指都输掉了，而且不管输也好，赢也好，每次回来总是面色苍白，形容憔悴，就象生了一场大病似的。

他常去的地方是维舍格列商业区尽头的乌斯达莫维奇酒

店。在这个酒店里面有一个小房间，没有窗户，就是白天也点着蜡烛；这里面总有三四个人，赌博对这些人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更有吸引力。他们关在这里面，沉浸在烟雾和恶劣的空气中，两眼通红，喉咙发干，双手发抖，夜以继日地象殉难者那样，把自己献身于他们的嗜好。米兰就在这个房间里度过了他的大部分青春，并且把他大部分的精力和钱财都牺牲在那里。他三十岁刚过，一下子出现一个突变，大多数人都不知为什么，这个变化把他从恶习中永远解救出来，同时使他的生活起了一个根本转变。

大约十四年前的一个秋天，酒店里来了一个外国人。这个人既不老也不年轻，不美也不丑，是个中年人，中等身材，说话不多，只有一双眼睛露出微笑。他是一个商人，到这个城市来办事的，就住在酒店里。黄昏时候，他闯进了这个小房间，赌棍从下午一开始就在那里聚赌了。他们对这个外国人先是感到不信任，后来看他表现得很安详，很知趣，所以对他也就毫不介意，这时候，他也凑上去，对一张牌押了少量赌注。他输得多，赢得少，只见他皱着眉头，局促不安，小心翼翼地从衣服里面的口袋取出了几块银币。他已经输了不少钱，这时候，大家才把牌交给他让他也来分牌。起初他还谨小慎微地分牌，随后越来越快，越来越随便。他这时大胆放手地赌，显得很不在乎，而且要一赌到底。他面前的钱堆得越来越高。赌棍一个个地退出了。有一个押了一条金链子，可是这个外国人冷冷地拒绝了，声称这里只赌现款。

到最后祈祷的时刻，赌博就收场了，因为谁都没有赌本。米兰是赌到最后的一个人，但是他也不得不退出。那个外国人很有礼貌地道了歉，然后回到了他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他们又在一起聚赌，那个外国人又是有输有赢，但总

是赢得多输得少，所以这个城里的赌棍又一次把现款输得精光。他们看着他的手，注意他的衣袖，从各方面观察他，换了新纸牌，彼此又调换了铺有毯子的座位，然而毫无用处。他们打的是"三十一点"①，这种赌法简单，但是名声较臭，他们从小就很熟练，可还是看不出那个外国人到底玩了什么手法。有时候他拿到二十九点，甚至于三十点，有时候他得了二十五点就不再拿牌。他每次都把大小赌注赢到手，对某些赌徒搞的那些小动作装作没看见，只是对那些很明显的犯规举动才当场指出，而且神情自若，一语带过。

这个外国人使米兰感到非常难堪、恼火。这几天来，他更觉得昏昏沉沉，四肢无力。他决心不再赌了，然而还是继续干下去，一直输到最后一文钱，然后又气恼又羞愧地回到家里。第四天或第五天晚上，他居然能管住自己，留在家里。他把钱准备好以后就穿上衣服，觉得头沉甸甸的，呼吸也短促不匀。他三口两口匆匆地吃完了晚饭，自己也不知道吃的是什么。然后他几次走出了家门口，抽着烟，散散步，乘着秋天明朗的夜晚，俯望脚下寂静的城市。他已经散步了很长时间，忽然在路上看见了一个模模糊糊的人影在晃动，这个人在他的院墙门前缓下步来。

"晚安，邻居！"那个不相识的人高声地说。他听出了那人的声音：就是酒店里的外国人。很明显，这个人是来找他的，要和他谈话。米兰只好往院墙走过来。

"今天晚上你怎么没有到酒店里来？"那个外国人好象是路

---

① 这是土耳其的一种赌博，它的赌法是谁有三十一点或者谁最接近三十一点就算赢。人们可以随便要多少张牌，但是如果超过三十一点就输定了。所以，譬如说，已经得了三十点，再要一张牌就很冒险，因为他不一定能得么点而操胜券。所以越接近三十一点，再想多要一张牌就很冒险。

过这里似的，漫不经心地问。

“我今天不高兴到那里去。别的人都在那里吧。”

“现在那里一个人都没有了。他们比往常散得早。走吧，我们俩一块上那里去吧。”

“说真的，现在已经晚了，没有地方可去。”

“我们到加比亚台上去坐一会。月亮就要升起来了。”

“可是，这还不是到台上去的季节。”米兰表示反对说，但他的嘴唇都发僵了，仿佛他的话不是自己说的而是别人说的。

那个外国人站在那里等着不动，好象他已经看准他必然跟着走的。米兰尽管抵挡了一阵，内心对这个外国人也着实感到厌恶，尽管在口头上、思想上都试图摆脱这种不能自拔的诱惑力，而且在竭力挣扎，但是最后还是开了园子的大门，同他一道走了。

他们两人很快走下了奥克里德的陡坡。一轮皎洁的明月已经从斯达尼士瓦山峰后面升起。大桥宛如悬在虚无飘渺间，因为桥的两头让乳白色的浓雾所笼罩，下面的桥墩沉浸在黑暗中。桥墩和桥孔的一面分外明亮，另一面是一片漆黑。这些阴阳面出现许多光暗明显的线条，所以整个大桥就象是月光一时变幻出来的一幅奇异的图案。

加比亚台上一个人都没有。他们坐了下来，外国人拿出纸牌。米兰似乎还在说这里太不方便，纸牌和钱钞都看不清楚，那个外国人根本不去理会他，于是赌博开始了。

起初，他们还交谈几句，后来一进入紧张阶段，两个人谁都不说话了。他们只是卷着烟，一根接一根地吸着。两个人轮着抓了几次牌，最后该那个外国人抓了。这时，石头上已经有一层薄薄的露水，钱掉在上面，一点声音也没有。这是关键的时刻，

米兰很清楚这时候外国人已经有二十九点了，会再凑上两点，或者有了三十点再凑上一点。他觉得喉咙完全梗塞，目光也模糊了。而那个外国人，只见他的脸在月光下显得比平时更加平静。不到一个钟头的功夫，米兰的钱输光了。外国人建议他回家再去拿钱，而且还陪他一起去。他们取完钱又回来继续赌。米兰象个瞎子哑巴在那里赌钱：他用脑子猜牌，用手势要牌。放在他们两人之间的纸牌几乎变成引起这场至死方休的决斗的一种媒介和起因。等到米兰的钱又输光了，那个外国人命令他再回家去取，他本人却留在加比亚台上抽烟，觉得没有必要再陪他去，因为米兰决不会不听他的话，欺骗他而把自己留在家里。米兰果然听他的指使，没有二话地走了，而且又乖乖地回来。这时候运气忽然转变了。米兰把他输的钱赢回来了。他由于激动，喉咙越来越感到透不过气来。外国人把赌注加了一倍，随后加上二倍。他们赌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凶。在他们两人之间，纸牌乱飞，象穿梭般发出响声，交织成一匹匹金银缎。他们两人都不说话，不过米兰的呼吸感到困难，在这万籁俱寂、月色皎洁的夜晚，他一会儿浑身是汗，一会儿全身冰凉。他下赌注，分牌，然后就把自己的牌掩盖起来，不露声色；他并不是喜欢这样作，而是不得不这样。他感到这个外国人不但把他的钱一块一块地吸走了，而且把他的骨髓和血管里的血也一滴一滴地抽掉了，所以他每输一次，他的气力和意志就减弱一些。他不时瞟了他的对手一眼，本想会看到一张魔鬼似的面孔，呲牙咧嘴，凶相毕露，但却相反，在他面前，外国人还是平常那张脸，表情严峻，象一个天天操劳的人，急于要把手头一件棘手而又不称心不愉快的事情办完似的。

米兰又把他的现款很快就输光了。于是外国人建议拿牲畜、

房屋和土地来做赌注。

“我拿四块匈牙利现金硬币做赌注，你押上你的栗色马加上鞍辔。你同意吗？”

“同意。”

那栗色马就这样输掉了，接着又是两匹载货的马以及母牛和小牛。那个外国人象一个细心而稳健的商人，把米兰家里所有牲畜的名称一一罗列出来，而且对每一头牲畜作了准确的估价，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就是在这个家庭里诞生长大的。

“我拿十一块金币和你赌那块叫‘小家当’的田地，你干吗？”

“干！”

外国人撅着嘴。米兰拿了五张牌，共合二十八点。

“还要吗？”外国人很平静地问。

“再来一张。”米兰咕噜着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他全身的血液都涌上了心头。

外国人轻轻地把那张牌翻了过来。这是一张“2”，多好的牌。米兰不动声色地从牙缝里哼出了一句：

“够了！”

他很紧张地把他的牌拢在一起，掩盖起来。他的声音和脸部表情极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让他的对手猜不透他有多少点。

这时候，外国人开始给自己抓牌，并且把牌都亮出来。当他得了二十七点，他停住了手，沉着地望了望米兰的眼睛，米兰的眼皮垂了下来。外国人又翻了一张牌。这是一张“2”。他短吁了一口气，几乎没让人感觉出来。他似乎要在二十九点上停住。米兰觉得胜利在望，高兴得血都涌上头来。可是那外国人忽然跳了起来，挺起胸，仰起头，额头和眼睛在月光下闪闪放光，

他又翻了一张牌，还是一张“2”。三张“2”的牌会一张紧挨着一张，真是不可想象，然而事实却是如此。米兰在那张翻开的牌上看见了他那块耕耙过的地，在春光里显得更加娇娆多姿。他感到头晕目眩，田垅在他周围旋转，这时，外国人平静的声音使他惊醒过来。

“三十一点！那块地属于我的了。”

接着又轮到了其他几块地、两所房屋以及奥索伊尼察的小橡树林。关于这些东西的估价，两个人都是一致同意的。有时候米兰赌赢了，他贪婪地把几块金币赶紧拿过来。他心中唤起的希望就象金币那样在闪闪发光。但是经过两三次手气不好以后，手头的钱又输光了，又得拿财产做赌注。

当赌博象一股激流把所有的东西都洗劫干净以后，这两个赌棍歇了一会儿，并不是为了休息，因为可以说两个人都怕休息，而是为了考虑还可以拿什么东西来做赌注。外国人还是保持着冷静，他象一个专心致志的工人，把一件活计干完第一部分，休息一下就急于要完成第二部分。而米兰却坐在那里呆若木鸡，感到耳朵在发烧，石凳在不断升降。这时候，外国人开始说话，声音单调，令人厌烦，而且带鼻音地说：

“朋友，你知道我们下一步怎么弄吗？让我们再来摊一次牌，不过这一次要孤注一掷。我押上今天晚上所赢的一切，而你呢，拿你的生命作赌注。如果你赢了，所有的东西：钱币、牲畜、田地还象以往那样都属于你。如果你输了，你就得从加比亚台上跳到德里纳河里去。”

他带着商人的口气说了这些话，每句话都显得无动于衷，就好象是两个正在埋头赌博的赌徒之间随便在订立一条极其普通的规则而已。米兰心里想，这是到了生死关头了，他极力想站起

来，企图逃脱这股莫名其妙的激流，因为这股激流把他的一切都冲走了，现在又要把他本人也卷进无法抗拒的旋涡里面去；但是那个外国人只是对他望了一眼就把他降服了。于是米兰低下头，伸出手来要牌，好象现在要赌的和以前在酒店里那种三四块钱赌注没有什么区别。

他们每人选了一张牌。外国人拿了一张"4"，米兰拿了一张"10"。所以应当由米兰来发牌。这使他充满了希望。他发牌的时候，外国人总是要了又要。

"再要一张，再一张，还来一张！"

那个人要了五张牌才说："够了！"米兰也跟着拿了牌。他到了二十八点以后就停了一会，望了望外国人手里的一把牌以及他那莫测高深的面孔。米兰猜不透那人有多少点，但是很可能会超过二十八点；一则因为这天夜里他的总点数都比较高，要是低了他总不要休，二则因为他手里有五张牌。米兰用尽最后的力量又翻了一张牌。这是一张"4"。这样一共是三十二点，也就是说他输了。

他望着那张牌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他觉得一下子一切都完了，这怎么可能呢。这时，他的全身从头到脚都在发烧，耳朵轰轰作响。忽然他对一切都明白过来了：生命的可贵，人生的价值，以及他和自己的朋友赌，和外国人赌，甚至自己一个人或者和周围任何一个人赌那种该死的、难以解释的赌博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从赌钱直到输光，这一切犹如白昼，犹如大梦初醒那样清楚明白，而且这一切都是铁的事实，无法挽回，无法补救。他想说几句话，痛苦呻吟，叫人帮忙，哪怕是叹一口气，但是他全身连这一点气力都没有。

那个外国人在他身旁等待着。

河岸上一只公鸡忽然咯咯啼鸣起来，声音又大又清楚，叫了一次又叫第二次。它离得这么近，连拍翅膀的声音都听得见。与此同时，散乱的纸牌好象被一阵狂风吹得四处乱飞，钱钞也到处飘扬，加比亚台连根基都摇晃起来。米兰吓得闭上了眼睛，心想最后的时刻已经来临了。当他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只剩下他一个人。他的对手早已成为泡影，不知去向，石面上的纸牌和钱钞也无影无踪了。

地平线上挂着一轮橙色的残月，凉风阵阵吹起，河中浊浪翻腾。米兰小心翼翼地摸摸所坐的石凳，想恢复一下神智，看看到底坐在什么地方，想想到底怎么回事，过了一阵，他挣扎地站了起来，身子好象架在别人的腿上，不由自主地向自己在奥克里德的家走去。

他一面呻吟，一面蹒跚地走着，刚到家门口就象一个身受重伤的人倒了下来，身体沉重地撞在门上。他家里的人都被惊醒了，当下把他抬到他的床上。整整两个月，他一直发烧，说胡话。大家都认为他不久人世了。教士尼古拉来为他举行临终洗礼。想不到他又好起来了，但是他却完全换了一个人。他变得来老先衰，性情孤僻，深居简出，很少说话，极力避免与人往来。他的脸上看不见笑容，神情非常紧张，不断流露出内心的痛苦。他只照管自己的家，忙于自己的事，至于他那帮朋友，好象他从来就不认识。

他在病中曾经把那天夜晚在加比亚台上的全部经过告诉了教士尼古拉，后来他又把这件事向他的两个好朋友讲了，因为他觉得不把心里的隐情说出来，简直无法生活下去。一般人对这件事也知道一些，但是觉得事实知道得确实太少，于是画蛇添足加了许多细节，以后，时过境迁，大家把注意力转移到别人的命

运上，终于把米兰和他的奇遇忘掉了。因此，这个只剩下昔日形影的米兰，和其他居民一样生活，劳动，经历各种世事的变迁。年轻的一代只看到他目前这个样子，怎么也想不到他以往和现在截然不同。他自己的一举一动也仿佛把以往的一切都忘掉了。所以，每当他离开家要到城里，带着沉重迟缓的步伐，似醒非醒地穿过大桥，从加比亚台经过的时候，他竟毫无感触，麻木不仁。他甚至想不起这座备有白石座位、上面坐满无忧无虑的人的“沙发”台与世界上这块可怕的地方有过什么关系，想不起他在这块可怕的地方，一夜之间曾经作最后一次赌博，把自己的一切，甚至他本人，他的生命和灵魂都押在这张要命的牌上了。

米兰常常在揣想，那天夜里加比亚台上的全部奇遇也许是他在家门口昏倒时所做的恶梦，是他患病的结果，而不是致病的原因。老实说，教士尼古拉和他的两个朋友听了他的话以后也都认为米兰所讲的是一桩怪事，恐怕是他发高烧时所见到的一种幻象。

实际上，这三个人里面没有一个相信魔鬼会打“三十一点”，并且会把一个人引到加比亚台上去要他的命。问题是我们所叙述的奇遇往往说得太玄了，内容也令人十分难受，所以无怪乎人们把魔鬼也引进故事情节里面，这样可以把故事说圆了，至少令人容易接受一些。

现在看来，不管有没有魔鬼在里面，不管是幻梦还是事实，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一夜之间米兰在失去了健康、青春和一大笔钱财以后，居然象奇迹般地永远戒掉了自己的恶习。可是这还没有完，还有一则故事和米兰的故事是紧密相联的，故事起因于加比亚台，叙述的是另一个人的命运。

那天夜里，米兰在加比亚台上（梦中或者实际上）进行了最

后一场可怕的赌博，第二天，正是星期六，秋高气爽，阳光普照。每逢星期六，维舍格列的犹太商人带着他们的孩子都聚集到加比亚台上来。他们的样子消闲而庄重，个个穿着绸缎袴、毛背心，戴着深红色的平顶帽，一本正经地在那里度过安息日。他们沿着河岸散步，好象在寻找什么人似的，不过大部分时间是坐在加比亚台上，用西班牙语高声热烈地谈话，只是骂人的时候才用塞尔维亚语。

这一天早上，布古·龚是第一个到加比亚台上来的，他是穷苦、老实而虔诚的理发师阿布拉罕·龚的大儿子，虽然已经十六岁了，但还没有个固定的工作和职业。这个年轻人不同于龚家任何人，有些异想天开，不能安分守己地去从事某一项职业，随时随地都想占点便宜，捞点好处。当他想坐下来的时候，先看看石头座位是否干净，这时候，他瞧见两块石板缝里有一条黄色的细丝在闪闪发光。这是迷人的金子发出来的亮光。他再仔细看了看。毫无疑问，有人掉了一块金币在里面。布古向周围望了一下，看看有没有人注意他，并且想找个什么东西，好把石缝里那块向他微笑的金币剔出来。但是他立刻想到这是星期六，干什么活都见不得人，而且是一种罪过。他心里痒痒，不知道怎么办好，一直坐到中午还不站起来。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所有的犹太人不论老少都回家去了。他突然发现一根比较粗的大麦梗，于是什么罪过、什么安息日全都忘掉了，小心谨慎地把石缝里的金币剔了出来。这是一块完好的匈牙利金币，薄薄的，只有一张枯叶那样重。他回家吃午饭的时候已经迟了。一家十三口（十一个孩子、父亲和母亲）围桌而坐，他父亲把他训了一顿，骂他懒汉，游手好闲，连吃午饭都不按时回来，他对这些都置若罔闻。他感到耳朵轰鸣，眼花缭乱，一向梦寐以求的穷奢极侈的生活竟

要成为现实了，简直好象太阳都已经装进自己的口袋里了。

第二天，布古并没有再多加考虑就带了这块金币到乌斯达莫维奇的酒店里去了，他钻进了那间昼夜不分地围赌的小房间。他早就梦想干这一行，由于没有足够的赌本，所以始终不敢进去试试运气。现在竟可以如愿以偿了。

他在那里呆了几个小时，焦灼不安，跃跃欲试。起初，人们对他报以轻蔑和怀疑，随后看见他兑换那块匈牙利金币，大家马上想到这块金币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最后大家还是让他押上赌注。（因为如果赌徒都想弄清每个钱的来历，那就永远也赌不成了。）当下，对这个新手开始了种种新的考验。当他赌赢了，血都涌上头来，热气和汗水把眼睛都弄模糊了。当他输得惨一些，似乎呼吸停止心不跳。这天晚上，他经过了多少次痛苦不安，每次都感到大势不妙，可是想不到最后从酒店出来的时候，口袋里竟然还有四块金币。尽管激动之下象挨了一顿打似的，全身酸痛发烧，但他还是直起胸膛，阔步向前。在他那火红的目光前面，已经发现了远大光明的前景，将使他的穷苦家庭增添异彩，使这座城市天地翻覆。走起路来，如醉如痴，神气十足。他生平第一次不但可以欣赏金子的光辉和声音，而且还可以掂掂金子的分量。

就在这个秋天，布古虽然年轻无知，但却成了流浪汉和职业赌棍，离开了自己的家庭。龚老头为大儿子羞愧忧郁，形容日益枯瘦，整个犹太大家庭也都把这件事看作是自己的不幸。最后，布古离开了这座城市，混迹江湖过着赌徒的悲惨生活。从那以后，十四年过去了，从来没有人再提起他。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据说是由于他在加比亚台上发现并在安息日把它剔出来的那块“魔鬼的金币”。

第十三章

到了占领的第四年，在某种程度上，各方面都安定下来，而且上了轨道。如果不能说土耳其人的歌舞升平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至少可以说社会秩序按照新观念正在日趋巩固。可是这时候地方上又发生了一些骚乱。军队突然又开进城市，加比亚台上又有卫兵站岗放哨。事情的经过是这样：

这一年，新政权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推行征兵制度，在居民中，尤其是在土耳其人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五十年前，当苏丹决定仿照西欧的服装、配备和训练方式组织正规军的时候，土耳其人举起了反抗的旗帜，进行了武装斗争，虽然规模不大，却是流血的战争，因为他们不愿意穿异教徒的军装，胸前还挎着皮带，这是令人憎恶的十字架的象征。然而现在又要披上这套他们所鄙弃的瘦小军装，去替外国的异教君主卖命。

占领后的第一年，当局就开始着手进行房屋编号和人口普查，这些措施在土耳其人中间引起了怀疑情绪和极度不安。

维舍格列城最知名、最有学问的土耳其人采取过去遇到类似情况的作法，他们暗中集合在一起，对这些措施的意义所在以及他们应持的态度等问题上统一认识。

五月里的一天，这个城市的显要人物装作在加比亚台上偶然相遇，随后就在“沙发”台上坐下。他们一方面安然地喝着咖啡，左顾右盼，另一方面低声谈论着当局这些可疑的新措施。他

们对这些措施都感到不满，因为这些新措施与他们的思想和习惯根本不合，认为这是当局在干涉他们的个人事务和家庭生活，是一种过分的，毫无道理的侮辱。人口普查的真实用意究竟何在，他们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也想不出如何抵制这项措施的办法。

和他们坐在一起的有阿里霍扎，他一般很少到加比亚台，因为只要一看见"沙发"台下的石头台阶，他就感到耳朵又痒又痛。

维舍格列的神学院院长于赛恩阿迦是个健谈的学者，他好象非常内行，对于房屋为什么要钉门牌以及对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为什么要进行户口登记，作了如下一番剖析：

"这恐怕是异教徒的一贯作法。三十年前，也许还要早一些，特拉夫尼克有一位大臣，他是斯坦布尔人，名字叫达义巴夏。这个人虽然改信伊斯兰教，但并非真心，而是一片虚伪，心底里始终信奉基督教。据说他身边有一个铃铛，每次叫唤仆人时，就象基督教士一样，摇晃铃铛，一直到他的仆人答应为止。对特拉夫尼克的房屋实行编号，并且在每一所房子上面钉上一块号码牌，这一措施的创始人就是这位达义巴夏，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钉工'。老百姓都起来反对，把这些门牌摘下来，放在一堆，用火烧掉。眼看就要演成流血事件，幸亏斯坦布尔方面知道了这件事，把这位大臣从波斯尼亚召回去。但愿他永无踪迹！现在的作法与那时候的作法同出一辙。德国佬对什么东西都要登记造册，甚至对我们这些人也要登记。"

大家一面眼望前方，一面倾听着那位神学院院长的高谈阔论。大家都知道他喜欢漫无边际地追述古人，而不去对当前发生的事情，简明扼要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阿里霍扎总是首先感到不耐烦，他禁不住说：

"这和德国佬的信仰无关，而是关系到他们的利益，院长埃芬蒂。他们并不是闹着玩，也不是在消磨时光，即使睡觉也是如此，他们是有目的在这样作。目前还看不出来，但是再过几个月或者一年，事情就可以看清楚了。已故的申西贝克·布朗科维奇说得对：'德国佬的地雷引线是很长的。'依我看，他们搞这种房屋编号和人口登记是为了征收某种新税，要不然就是为了征召大家去服劳役或服兵役。也许二者兼而有之。如果你们问我应当怎样办，我的意见是：如果我们立刻起来反抗，我们没有军队，不能这样做。这种情况，上帝知道，大家也都清楚。但是我们不能对一切都唯命是从。谁也不要保存门牌，也不要说出自己的出生年月，让他们去猜吧。如果他们超过限度，威胁到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幸福，我们就不能让步，应该起来自卫，并求真主保佑！"

他们对政府这些令人恼火的措施又讨论了很久，不过，总是停留在阿里霍扎所提出的办法上面：消极抵抗。于是，大家都隐瞒自己的年龄，借口自己是文盲，说谎造假。对于妇女，谁也不敢过问，因为这是一种严重的侮辱。人们不顾政府的告诫和恫吓，把门牌钉在看不见的地方，或者反过来钉，或者立刻把房子刷上白灰，而且装作无意似的，把门牌也用白灰盖上。

这种反抗尽管还没有表面化，但它却是从内心深处爆发出来的。鉴于这种情况，当局采取宽大为怀的态度，不采取不顾一切后果硬性推行的办法，避免一触即发的冲突。

这些事情发生以后，又过了两年，清查户口所引起的焦急不安也过去了，这时候才正式开始征兵，对象是年轻人，不分宗教信仰，也不管家庭出身。为了反对征兵，黑塞哥维那东部爆发了武装起义，参加起义者除了土耳其人，还有塞尔维亚人。起义领袖设法和国外取得联系，尤其是和土耳其联系；他们认为占领当

局超越了柏林会议所赋予的权力，它无权在占领区内部实行征兵，因为这些地区还是属于土耳其的主权范围。波斯尼亚还不存在有组织的抵抗，但是福恰和哥拉岱的起义已经波及到维舍格列地区的周围。分散无组织的起义者或战败的残余小部队都试图通过维舍格列桥跑到桑甲克或塞尔维亚去。随着兵荒马乱，匪盗也开始猖獗起来，历史上总是如此。

于是，隔了那么多年，这时加比亚台又重新设置了日夜岗哨。虽是寒冬腊月，大雪纷飞，加比亚台照样还是两个宪兵不分昼夜在站岗，对那些陌生可疑的行人进行拦阻盘查。

两星期以后，一支机动部队开到这个城市，来接替加比亚台上的宪兵。这支机动部队是在叛乱如火如荼的时候组织起来的，是一支流动的突击部队，由志愿人员组成，经过挑选，待遇很高，专门在险要地带进行作战。这些人里面有些是随占领军同时进驻的第一批后备兵，他们不愿意回去，就留在这里参加机动部队；也有些是从宪兵队里挑选出来，编入机动部队的；最后，还有些本地人也吸收进来，作为亲信和向导。

在整个漫长严寒的冬季里，加比亚台一直是由机动部队的两个士兵守卫，其中经常是一个外国人和一个本地人。他们不象土耳其人对待卡拉乔治领导的塞尔维亚起义那样，在桥上建立碉堡，也没有发生杀人和砍头的事情。可是，和过去加比亚台实行封锁的时候一样，这一次也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事件，给这个城市留下了斑斑血迹，因为动乱时期不可能不给某些人带来惨祸。

在加比亚台上轮流站岗的机动部队士兵里面，有一个东加里西亚的俄罗斯青年，名字叫哥雷戈亚·费杜纳，年仅二十三岁，他身材高大，心灵却象小孩那样纯洁；气壮如牛，但腼腆得象个

少女。在服役期间，他的所在团被调到波斯尼亚，曾经参加马哥拉伊和哥拉西那战役，后来在波斯尼亚东部各地驻防，历时一年半。当他服役期满的时候，他不愿意回老家——高罗麦亚的加里西亚城，因为家里除了许多小孩，其他几乎什么也没有。就在这个时候，号召参加机动部队充当志愿兵的命令公布了，他所属的团正在贝斯特地方。费杜纳由于参加过在波斯尼亚进行的几个月战斗，熟悉这个地区，因此立刻被批准充当志愿兵。他一想到又要重见波斯尼亚地方的那些森林地带和小城市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他曾经在那里度过了时而欢乐时而艰苦的岁月，现在回想起来，那些艰苦的日子比欢乐的日子显得更加美好，更加扣人心弦。他想象当他第一次领取志愿兵的高津贴汇给家里，他的父母弟妹收到他的汇款以后，会是怎么样一种表情啊！想到这里，他不由得感到美滋滋，踌躇满志。尤其幸运的是，他不是被派到黑塞哥维那东部去，因为那里还在同起义者进行艰苦的战斗，而且往往有生命的危险，而是被派到德里纳河畔的一个城市，这里的任务只限于巡逻和站岗放哨。

他在这里度过了冬季。在晴朗严寒的夜晚，他常常一连几个小时在加比亚台上踯躅着，不时向手指呵着热气。这种时候，石头都快冻裂了，城市的上空是阴霾一片，巨大的星斗变得象可怜的小蜡烛。他就在那里迎接着春天，就在加比亚台上观察着春天的先兆：德里纳河上的冰块发出沉闷的爆裂声，震动着人们的肺腑，从大桥上游的漫山枯树中，又响起了一阵阵彻夜不停的风声。

这个年轻人站岗的时候，感到大地和河流散发出来的春意慢慢渗人他的肌肤，遍及全身，使他心神荡漾。他一边站岗，一边唱着故乡的乌克兰歌曲。春天一天一天地过去，他站在这块春风

送暖的地方，越来越盼望遇上一个心爱的人儿。

三月初，司令部警告守桥部队要加倍注意，因为根据可靠情报，有名的大盗亚可夫·捷珂利亚已经从黑塞哥维那窜到波斯尼亚来了，现在潜伏在维舍格列附近，他很可能设法从维舍格列逃往塞尔维亚或土耳其边界。机动部队的士兵还接到关于捷珂利亚这个大盗的相貌特征的介绍：此人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身体强壮，富有胆量，而且非常狡猾，曾经几次混过巡逻队的包围，最后成功地脱逃了。

费杜纳从报告中听到这个警告以后，十分认真对待，他对任何正式通令都是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但是，老实说，他又觉得未免过于夸大，因为不能想象一个人能够通过这座宽仅十余步的大桥而不被发现。因此，他日夜在加比亚台上若无其事地站了几个小时。他的确也加倍注意，但不是注意这个亚可夫可能在桥上出现，因为天晓得他在什么地方，而是着迷于加比亚台上那些带来春意的自然景象。

一个已经二十三岁的人，正是精力旺盛，春心荡漾的时候，而且周围又是春光明媚，鸟语花香，他的心思怎么能专注在一件事务上。山沟里的雪在融化，河里的水在奔流，水面象熏成灰色的玻璃一样，西北风吹来了山中积雪和山谷中嫩芽的香味。费杜纳如醉如痴，心猿意马，在台上来回踯躅；夜间守卫时，他靠着墙，迎风低唱俄罗斯小调。他总是盼望遇上某个人儿，这种欲念昼夜不熄，既甜蜜又恼人，水上、大地和天空散发出来的春意，使他的情思更深切更浓厚。

有一天午饭时间，从岗哨旁边走过一个年轻的土耳其姑娘。她虽然还不到蒙面纱的年龄，但已经不能象过去出门那样完全抛头露面了，她用一条宽大的细披肩把整个身子、胳膊、头发、

下巴和上额全部包住，仅仅露出一部分面孔：眼睛、鼻子、嘴巴和两颊。这是童年和成年之间的一个短暂时期，在这个时期，穆斯林少女还可以天真烂漫，愉快活泼地显露出她那妩媚动人的脸儿，略带稚气，而又已经显示出女性的青春美，可能到第二天，她就要永远蒙上土耳其面纱了。

加比亚台上一个行人都没有。和费杜纳站同一岗的叫史德望，是普拉恰地方的农民出身，他也加入了机动部队。这个上了年纪的人喜欢喝烧酒，这时候违规地坐在石"沙发"台上打瞌睡。

费杜纳谨慎而羞怯地望了年轻姑娘一眼。她身上那条五颜六色的披肩随着她的步态迎风飘荡，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十分动人。披肩紧紧地包着她那副文静秀丽的脸儿，一双眼睛低垂，但却滴溜溜地乱转。她就这样从他旁边走过，在市中心消失不见了。

费杜纳更加起劲地在加比亚台上踱来踱去。他老是朝集市广场的方向望着。现在，他觉得已经遇上自己所盼望的人儿了。半小时以后，桥上仍然是中午时分的静穆气氛，那位年轻的土耳其姑娘从市区回来，又从这个神魂颠倒的年轻士兵面前走过。这一次他大胆地盯着她一会儿，说也奇怪；她也偷偷地向他很快地溜了一眼，毫不羞怯，而且还带着调皮的神气对他嫣然一笑，这种天真无邪的神气是孩子们作游戏互相作弄时所常有的。她缓步而行，步态婀娜多姿，但很快就走过去了，那条宽大多褶的披肩，不断抖动起伏，随着少女丰满的身影，也完全消失了。她那东方式装束以及那披肩上的鲜艳色彩在对岸的房屋之间还长时间地映人人们的眼帘。

这时候费杜纳才惊醒过来，原来他还象刚才她从身旁走过

的时候那样，站在原地不动。他惊醒过来以后，摸了摸他的枪，若有所失地环顾左右。三月里的阳光多么喜人，史德望正在那里打盹。费杜纳感到他们两人都有罪过，因为如果这时候有一排军队从他们面前经过，他对自己、对别人都说不出这支队伍究竟有多长，总共多少人。他一时脸上发烧，猛然把史德望叫醒，于是两人又继续站着岗，一直到换班为止。

整整这一天，无论是休息时间还是站岗时候，那位土耳其姑娘就象幽灵似的，在他脑海里不知道出现了多少次。第二天，又是中午时候（这是市场和桥上人最少的时候），她果真又从桥上走过。费杜纳好象逢场作戏，又向那张包着五颜六色头巾的脸儿看了一眼。一切经过和昨天一样，不过，相互对看的时间更长一些，她的目光也更加大胆，更加脉脉含情，看来落花固然有意，流水也非无情。史德望还依旧在石凳上打瞌睡，事后他又象平时那样赌咒发誓，说他没有睡着，甚至夜里在床上也没有合眼。那个姑娘回来时，几乎在费杜纳面前停下步来，并且两眼直盯着他的眼睛；他对她说了两句，含含糊糊，不知所云，费杜纳这时感到浑身酥软，全然忘记自己身在何地。

一般只有在梦中才敢这样放浪无羁，因此，等到那个姑娘在彼岸又一次消失的时候，费杜纳害怕得哆嗦起来。一个少女竟敢对一个德国兵眉目传情，真是不可想象的事。这种闻所未闻、史无前例的举动只有在梦中或者在加比亚台上春意绵绵的时候才能做得出来。再说，在这个国度里，象他这种地位的人，最遭人非难、最为危险的莫过于勾引一位穆斯林女人，这一点他也很清楚，因为过去夜军队里，别人曾经对他说过，现在在机动部队里也有人对他说过。触犯这种科律，那是要受到严惩不贷的。有些人因此而掉了脑袋，让那些受污辱而震怒的土耳其人活活杀死。

这一切，他心里面完全明白，也愿意循规蹈矩，然而做起来却又背道而驰。倒霉人的不幸就在于，有些事情对他们来说，本来是办不到的而且不允许，一下子成了可以办到，而且不费吹灰之力（至少表面看起来是这样）。然而到了欲罢不能的时候，这些事情的本质又重新表现出来：办不到而且不允许；同时让这些非分强求的人自食其果。

第三天中午时分，这位土耳其姑娘又从这里走过。又是如人梦境，一切都顺乎这个年轻人的心愿，而且神不知鬼不觉。史德望又是在那里打瞌睡，他总是自信而且还要别人相信他没有合眼。这时，加比亚台上连一个行人都没有，小伙子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那位姑娘缓下步来，也含含糊糊、羞羞答答地回答了他几句。

这种不可想象的危险把戏还在继续进行。第四天，那位姑娘经过加比亚台，趁台上没人的时候，对那个欲火正旺的小伙子，低声问他下一次值班是什么时间。他回答说是黄昏时候，也就是穆斯林作第四次祈祷的时刻。

"我准备把老祖母领到城里去过夜，然后我独自一个人回来。"那位姑娘低声细语，头也不回，但却向他瞟了一眼，秋波萦转，意在不言中。她说的那两句虽是寻常话，但言短情长，每一个字都包藏着她又要同他相会重逢的喜悦。

六个小时以后，费杜纳又同那个好打瞌睡的伙伴到了加比亚台。雨后初晴，暮色苍茫，行人越来越少，真是老天爷在作美。这时候从奥索伊尼察来的大路上出现了那位年轻土耳其姑娘的身影，她的披肩颜色在黄昏中已经模糊不清。在她旁边，有一位土耳其老太太，蒙着一条很厚的面纱，弯腰驼背，走起路来，几乎要趴在地上似的，她右手拄着拐棍，左手拉着年轻姑娘的胳膊。

她们就这样从费杜纳身旁走过。老太太步履维艰，那位姑娘为了搀扶她，自己也只好放慢步伐。在朦胧的暮色中，那姑娘睁大着眼睛，这时毫无顾忌地大胆直盯着费杜纳的眼睛，显出难舍难分的神情。当她们走进城里以后，费杜纳打了一个寒战，他坐立不安，仿佛若有所失地在台上来回不停很快地踱着。现在，他是怀着既激动又害怕的心情在等待那少女回来。史德望还是在那里打瞌睡。

这位年轻人心里在翻腾："她回头会对我说些什么呢？而我又对她说些什么呢？也许今晚她会约我到一个隐僻的地方去幽会！"一想到这种甜美的滋味和大胆的激情，他不禁浑身颤抖起来。

整整一个钟头就这样在等待中过去了，接着又是半个小时，那姑娘还不见回转。然而，就是这样等待，他的心里也是甜滋滋的。这种甜蜜的情绪随着黑暗的降临越来越浓。最后终于来人了，但不是那个姑娘，而是来换班的哨兵。

这一次，不只是两个来换岗的士兵，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副官德拉日诺维奇也亲自和他们一起来了。这个人留着短小的黑胡子，对人对事都很严格。这时，他声色俱厉地命令费杜纳和史德望回到兵营以后就在宿舍呆着，没有命令不许离开。费杜纳意识到自己也许犯了什么罪，他的血液顿时涌上头来。

宿舍宽敞冷清，里面空无一人，只有十二张床整整齐齐地摆在那里。宿舍里的人都到城里去了，有的还在吃晚饭。费杜纳和史德望焦急不安地等待着，同时仔细思量为什么副官今天这样突然，这样严厉地把他们禁闭起来，想来想去，还是想不出个所以然。一个小时以后，有些士兵开始回宿舍准备睡觉，这时，门外又响起了一阵很重的脚步声，进来的是个班长，他双眉紧

锁，厉声喝令他们两人跟着他走。从周围这些迹象来看，这两人感到这种严厉态度是对着他们的，大势委实不妙。他们一走出宿舍就被分开，并进行个别审讯。

夜渐渐深了。城里最后的灯光也熄灭了，可是兵营的窗户还是灯火辉煌，不时听到门铃的响声，钥匙的转动声以及沉重门扇开关时发出的响声。传令兵不停地进进出出，匆匆地穿过夜深人静的城市，往返于兵营和指挥部之间，指挥部的楼上同样是灯火辉煌。从这些表面现象就可以猜出城里一定发生了什么惊人的大事。

十一点钟左右，费杜纳被带到参谋处，他感到从加比亚台回来到现在，似乎已经过了多少天，甚至多少个星期了。桌子上点着一盏带绿瓷罩的金属煤油灯，边上坐的是克其马参谋。灯光照着他的两臂直到两肘，至于胸部和头部却在暗处，因为绿灯罩把光线挡住了。费杜纳认识这副洁白丰满而且近乎女性的面孔，颏下无须，两撇小胡子也不大明显，一双灰色的眼睛周围有两个黑圈。这位军官身材肥大，温和沉静，动作迟笨，说话慢条斯理，士兵们畏惧他如害怕火。很少有人能够长时间经受住他那一双灰色大眼睛射出的目光，也很少有人回答他的问题时不紧张结巴，尽管他问话的时候轻声慢语，但字字句句，抑扬顿挫，清楚明白，就象在课堂上讲课或者在戏台上道白一样。离他略远一些，站着副官德拉日诺维奇；他的胸部也在阴暗处，只看见他一双毛茸茸的手轻轻耷拉着，一只手指上还戴着一颗硕大的金戒指，在灯光照耀下闪闪发光。

德拉日诺维奇开始审问：

"告诉我们，从五点到七点，你同机动部队的助手史德望·加拉仓在加比亚台上值勤，这段时间你是怎么度过的？"

费杜纳觉得脸上一阵发烧。他们两个人对这段时间可以说各得其所，每个人都各尽其情，然而谁也想不到过后还要在铁面无私的法庭面前受审，交代事情的始终经过，一切细微末节和内心的隐秘。真是谁也想不到，尤其是一个二十三岁，在春意绵绵的加比亚台度过这个时刻的小伙子，当然更是想不到。回答些什么呢？这两小时岗哨，他是象以往那样度过，和昨天前天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这种时刻，他不能罗列一些千篇一律，鸡毛蒜皮的事情去敷衍搪塞。在他的脑海里，只是思索一些有关违规的事情，这些事情对任何人都是难免的。但是绝不能对上级暴露，譬如说史德望按照平时的习惯打了一下瞌睡，至于他，费杜纳，他曾经和一个不相识的土耳其姑娘交谈了几句；后来，在夜幕降临的时候，他又满怀激情，轻轻地哼着故乡的歌曲，等待那姑娘回来；如果当时那姑娘回来了，相见之下，一定会干出一些风流韵事。啊！这怎么说得出口，尤其是怎么能一五一十全都说出来！可是对某些细节不说出来，又怎么过得了关呀！时间过得很快，不允许迟迟不说，越拖越心慌意乱，如坐针毡，况且他已经沉默了多半天了呀！

“那么？”那位参谋说。大家都熟悉他的声音，“那么”这两个字说得清脆、响亮、有力，象是从一部构造复杂、性能良好、转动润滑的机器里发出来似的。

费杜纳一开始，就象一个罪人那样，心乱如麻，语无伦次。

夜已深了，但兵营和指挥部的灯光都还没有熄灭。审讯、记录和对质接连不断地进行着。被传讯的还有同一天在加比亚台站岗的其他士兵以及几个过路的行人。很明显，问题越来越集中在费杜纳和史德望身上，对他们的审讯也越来越围绕着那个少女所搀扶的那个土耳其老太太。

费杜纳意识到，由于自己一时想入非非，他将承担一切可怕而又无法解脱的责任。天亮以前，他和史德望二人互相对质。史德望这个乡下人眨巴着眼睛，露出狡猾的神气，说话时声音很低，装模作样，老是声称自己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乡下佬，老是称他的同伴为“这位费杜纳先生”，在这个称呼背后，他把一切责任都推卸掉。

“现在，该自己说话了。”费杜纳想。这时，他饿得发慌，紧张得发抖，然而他始终不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不知道他究竟失职在哪里，究竟犯了什么罪。到了清晨，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这一圈人折腾了整整一夜，中心人物就是那位冷酷无情的参谋。他自己安然不动，沉默不语，却不许别人也跟他一样。从他的作风和外表来看，他不象一个寻常人，而象一个天职的化身，一个铁面无私的判官；他从不心慈手软，儿女情长，具有超人的毅力，甚至可以不吃饭，不睡觉，不休息。天亮的时候，费杜纳第二次又被带到参谋面前。在办公室里面，除了参谋和德拉日诺维奇，旁边还站立着一个武装宪兵和一个女人，费杜纳一下子以为是眼睛看花了。这时，油灯已经熄灭。那间朝北的房间又冷又暗。费杜纳感到惊讶不已，怎么昨天夜里的迷梦还在继续，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还不黯然失色。

德拉日诺维奇问那个女人：“是不是这个人站的岗？”

这时候费杜纳心里十分难受，仔细端详着那个女人。这分明就是昨天那个穆斯林姑娘，但是不戴披肩，光着头，两条粗大的棕色辫子有些散乱。她穿着花花绿绿的土耳其长裤，其他衣服：衬衫、腰带和背心都象维舍格列高原的塞尔维亚农村姑娘一样。她不戴披肩，显得年纪大些，身子更壮实些。她的容貌完全变了，嘴巴已经不是樱桃小口，甚至还显得有些泼辣，眼皮通红

但眼睛清澈明亮，昨天晚上的那层阴影仿佛完全消失了。

“是他！”她用一种生硬淡漠的声调回答说，这种声调和她现在的外貌一样使费杜纳感到新奇。

德拉日诺维奇继续审问她；问她是怎样通过大桥的，一共有多少次，她对费杜纳说了些什么，费杜纳又对她说了些什么。她基本上回答得很精确，但是表现出漫不经心和傲慢的神气。

“伊琳卡，你最后一次过桥的时候，他对你说些什么？”

“他说了几句，但是我不知道他究竟说的是什么，因为我没有注意听，我一心只想如何让亚可夫顺利通过。”

“你想的是这个吗？”

“是的。”那个女子勉强回答说，她显然十分疲乏，不愿意多说话。但是副官抓住不放，要她把第一次在指挥部审讯时说过的话全部重述一遍。他说话的时候，语带威胁，咄咄逼人，使对方感到非直截了当回答不可。

她竭力为自己开脱，对她第一次说的话，有些东西她就简略了，有些干脆不说，但是他根本不让她跳过去，总是用巧妙尖锐的问题把她再拉回来。

整个真相渐渐大白了。她名叫伊琳卡，住在上利埃斯卡，是达吉奇家里的人。去年秋天，大盗亚可夫·捷珂利亚窜到这块地方，在村子上面一个马厩里度过了冬天。这位姑娘家里的人给他送食物和换洗衣服，常常又是让她送去；这样，彼此发生了感情，而且订了婚约。当冬雪开始融化，机动部队加紧搜捕的时候，亚可夫决定到塞尔维亚去，哪怕付出一切代价也在所不惜。可是，每年这种时候，德里纳河即使没人看守也很难渡过，何况现在桥上昼夜还有人站岗。他决定从桥上通过，而且计划如何混过岗哨。她决心帮助他，陪他过去，宁可牺牲性命也心甘情愿。他

们先从山上下来，到了利埃斯卡，随后就躲在奥克里德上面的一个山洞里。事先，亚可夫在哥拉西那克山上的茨冈人家里弄到了土耳其妇女的服装：头纱、长裤和腰带。按照他的旨意，让她先开始行动，趁土耳其人不多的时候从桥上走过，免得他们有人怀疑这位陌生姑娘是何许人，同时也让桥上哨兵先和她面熟一下。这样，她就接连三天从桥上来回走过，最后把亚可夫也带过去。

“那末，为什么你恰好在这个士兵站岗的时候带他过去呢？”

“因为我感到他最软弱。”

“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是的。”

在副官的催迫下，那个女的又接着说下去：一切准备停当，亚可夫蒙着头纱，扮成她的老祖母，她就趁夜幕开始降临的时候，领着他从这两个哨兵身边经过。这两个人都毫不察觉，因为年轻的一个，即费杜纳，他只是盯着那个姑娘看，根本不注意那个老太太，至于比他大的那位伙伴，正坐在“沙发”台上，在打瞌睡。

当他们到达商业区以后，没有直接从市中心穿过去，而是出于慎重起见，走边上的小路，这样就出了问题。由于对城里不熟悉，迷失了方向，他们并没有走到撒夫河上的桥，然后从那里再走上通往国境的大道；反倒走到了一家土耳其咖啡馆前面，而这时恰好从里面走出来几个人。这些人中间有一个本地出身的土耳其宪兵，见了这个蒙着面纱的老太婆，旁边还有一个年轻姑娘陪着，而这个姑娘又是从来没有见过；他感到形迹可疑，于是就尾随在后，一直跟到撒夫河。他到了那里，就走过去，问她们是什么人，要到哪里去。亚可夫透过面纱，密切注意宪兵的一举一动，认为事不宜迟，必须立即逃跑。他扔下面纱，使劲儿把伊琳

卡推到宪兵身上，使这两个人几乎都倒在一块（他虽然瘦小，身材不高，但是力气无比，而且胆量过人）。至于她，正如她自己所坦白交代的，她死劲抱住宪兵的两条腿。趁宪兵正在挣脱她的时候，亚可夫已经越过了撒夫河，尽管河水没过膝盖，但他却象穿过小池塘似的，很快钻到对岸的柳树林里。她被带到了指挥部，那里对她进行拷打、威吓，但她没有什么可说的，而且也不愿意说什么。

副官对她间接提问，好言相劝，甚至威迫利诱，企图从这个姑娘那里捞取更多的材料，以便了解亚可夫的同谋者，受他指使的人和他下一步的意图，但是毫无结果。所有这些手段对她都不起作用。她愿意说的，就说个没完；不愿意说的，即使德拉日诺维奇拚命逼她，她也不吐一个字。

"你不如现在就把你所知道的一切对我们说出来，免得亚可夫受审拷打，因为，可以肯定，我们现在已经在边界上抓到了他。"

"抓到谁？他？呀！"

那个姑娘带着怜悯的神气看了副官一眼，认为他在信口开河，因此撅起上嘴唇的右角，对他表示轻蔑。她上唇撅起这种动作就象蚂蝗在蜷缩似的，每当她的语言不能表达她内心的愤怒、轻蔑或傲气时，她往往就作出这种动作。

她这种撅嘴的动作使她那副美丽端正的容貌一下子变得痛苦难堪，令人生厌。这时，她向窗外望了一眼，脸上流露出一种地地道道的孩子气，和颜悦色，和刚才那种痉挛难看的动作成了鲜明对照；她现在的神气就象农民在播种以后，站在地头，翘首望天，察看天情一样。

"愿上帝保佑您！现在天已经大亮了。从昨天夜里到现在，

他完全可以越过波斯尼亚全境，而不仅是越过边界，因为边界离开这里才一两个小时的路程，这一点我很清楚。你们可以拷打我，把我杀死；我同他一起走，就是准备豁出性命，至于他，你们再也见不着了。嗨！你们休想！”

她的上嘴唇又抽动起来，右角又向上撅，她的面孔忽然又变得苍老、丑陋、老练和傲慢。等到这片嘴唇放松下来，她的脸上又恢复那种孩子气、天真烂漫、放荡无羁的可爱神气。

德拉日诺维奇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看看那位参谋，这时，参谋示意把这个姑娘带走。于是他们又开始审讯费杜纳。这当然不用耗费许多时间，而且也不用费多大劲儿。小伙子一切都承认，不知道如何为自己辩护，连德拉日诺维奇有意提醒他的问题，他也麻木不仁。参谋的话里表示他将受到无法挽回的严厉惩处，这种严厉程度连参谋自己在说话的时候都流露出痛苦的神情，可是，这样严重的话，也未能使费杜纳清醒过来。

克其马用德语对他说：“我当初把你当作一个老成持重、恪守本分、生活目的明确的年轻人，我曾经想过，你有一天会成为一个完好的士兵，成为我们部队的骄傲。然而你对第一个从你面前经过的女性就一见倾心到了迷糊程度。从你的表现可以看出你是个意志不够坚定的人，是一个不堪重托的人。我不得不把你送交法庭。不管法庭如何判决，但是可以肯定，你将受到极其严重的惩罚，因为你辜负了我们对你的信任，而且在紧要关头，你没有象一个普通人，象一个士兵那样坚守自己的岗位。现在，你走吧！”

连这些简单清楚而语重心长的话也没有给这个年轻人产生什么新的启发。他心里早已明白这一切。那个妇女，大盗的情人的出现和她所说的话，史德望的态度以及这次短短审讯的经

过，使他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在加比亚台上所作的竟是这样一场轻佻、天真而不可饶恕的春梦。参谋所说的话不过是一种官样文章，但又都是法律和秩序的某些不成文的要求，而且永远不可缺少的要求，这些话对参谋比对费杜纳本人更加需要。这个年轻人忽然发现在他面前有一幅广阔无边的图景，使他看到：当你处在一个危险的岗位，而又正好在一个危险的时刻，自己忘乎所以，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但是，话又说回来，即使是处在加比亚台这种危险岗位和时刻，如果事情没有败露，那么这种一时忘乎所以又有什么了不起：这只不过是年轻人一个小小的艳遇，可以留到以后夜间巡逻无聊时向身边的伙伴讲述一番就是了。当然，如果从具体责任这方面去估计的话，那么这种一时的忘乎所以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其意义比死亡更甚。它意味着一切都完了，简直毫无价值，令人饮恨而终，对自己，对别人都永远无法完全正确地加以解释。高罗麦亚地方再也不会来信了，家里的照片再也收不到了，再也不会自豪地给家里寄邮政汇票了。一个自欺还加上受骗的人就这样完了。

这就是为什么他对参谋一句话都不说。

他们对费杜纳并没有加以严格监视。人家给他送来早点，他虽然吃了，但是食而不知其味。随后，叫他收拾个人的东西，交出武器和公物。十点钟的时候，将有一个宪兵护送他乘邮车前往萨拉热窝，把他送交驻军法庭。

当这个年轻人从他床上的架子上面取下东西的时候，宿舍里的几个同伴都蹑手蹑脚地走了出去，并且小心谨慎地把门轻轻关上。他周围的气氛越来越显得寂寞清静，一个遭受不幸的人就象一条有病的牲口，人们总是躲得远远的。他先从钉子上把那块黑板摘下来，黑板上面用德文漆着他的名字、军阶以及他

所在部队和单位的番号；他把黑板放在膝上，有字的一面朝着地，在黑板的背面用粉笔很快地写了几行小字："请把我身后留下的一切东西寄到高罗麦亚，交给我的父亲。我向全体同事致敬，并请上级原谅。——哥·费杜纳。"

然后他向窗外望了一眼，在这样有限度的视线范围内，在短短的一刹那间，他对世界上所能见到的一切很快扫了一眼。接着，他把枪摘下来，装上一颗粘满枪油的大子弹。他脱了鞋子，用小刀在右脚袜子的大拇指处挖了一个小口，随后躺在自己床上，用两手和两膝抱住枪，枪口紧紧地对着下颏，缩起右腿，让袜子上的小口正好钩住枪上的扳机，猛一伸脚，发出了一声巨响，枪声响遍了整个兵营。

只要横下一条心，任何事情都简单好办。医生来了，官方验明，死亡属实。验尸记录副本也附在费杜纳的审讯案卷里面。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埋葬。德拉日诺维奇奉命去拜访教士尼古拉，同他商量这个问题。费杜纳属于自杀，能不能埋葬在公墓里？教士尼古拉对一个自杀的正教徒会不会同意给以赦免？

去年一年，教士尼古拉突然变得衰老多了，开始感到两腿无力；因此他请教士伊欧苏到他那个大教区充当他的副手。伊欧苏沉默寡言，但是好动，他又黑又瘦，象一根烧焦的木棍。近几个月来，所有的宗教事务以及城乡的宗教仪式，他几乎一个人全部担当起来。至于教士尼古拉，由于他行动困难，一般只能呆在家里或者在离家不远的教堂里干些力所能及的事。

德拉日诺维奇奉参谋的命令到教士尼古拉家里。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躺在床上接见他，教士伊欧苏站在他旁边。德拉日诺维奇对这位老教士讲述费杜纳之死，并提出要为他举行葬礼，这两位教士听了以后，沉默片刻。伊欧苏看到尼古拉不开口，就

首先表态，口气模棱两可，左右为难，他说："这件事情非常特殊，按照教规和惯例都有些困难。只有证明死者在自杀的时候已经精神失常，我们才好这样办。"

这时候，教士尼古拉从他那张又窄又硬、铺了一条旧毯子的小床上坐了起来。他的身子直挺挺的，真象一座雕像，每当他经过市中心，两旁的人向他致敬时，他也是这副姿势。他那张宽大的脸庞，老是红光满面，两撇大胡子和须髯连成一片，两道褐色浓眉向上翘起，几乎已经变成斑白；从这张面庞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生来就会独立思考的人，而且又善于诚恳表达和极力维护自己思想的人。这时，他开始说话了，一开口就立刻显出容光焕发。

他毫不犹豫也不矫揉造作，直接回答教士和副官说："不幸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没有法子再加以证明。精神正常的人谁会自杀呢？把他当作一个无宗教信仰的人，随便埋葬在某一垛墙后面，而且没有教士在场，这个责任谁负呢？先生，祝你健康，你快去下令把死者装殓起来，好让我们尽快把他安葬。他就葬在公墓里，而不是别的地方。我会给他举行赦免祈祷。以后，万一有一个和他信仰同一宗教的教士认为还有那些地方作得不太合适的话，那就让这位教士去补救更正好了。"

德拉日诺维奇走了以后，他又转过身来朝着惶惑不安的教士伊欧苏说："我怎么能拒绝一个基督教徒埋葬在公墓里呢？为什么我不给他举行赦免祈祷呢？他生前薄命难道还不够吗？就让上天去追问他的罪过吧，将来上天同样也会追问我们每个人的罪过。"

这个在加比亚台上犯了一次错误的年轻人就这样永远在这个城市里安息了。第二天早晨，他就埋葬了，老教士尼古拉，在

教堂的堂役狄米特利协助下，为他举行了赦免祈祷。

机动部队的士兵从墓穴前面列队走过，每个人都向墓穴撒下一小把土。当两个掘墓人正在堆土的时候，这些士兵们还在坟墓周围停留了一会，好象在等待什么命令似的，一面望着对岸兵营附近向上升起的一股白烟。沾满费杜纳的鲜血的草垫正在兵营上面的绿色高地上焚毁。

这个年轻士兵在加比亚台上由于一时疏忽和感情冲动使自己丧了命，后来人们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他的悲惨遭遇却成了这个城市的一件大事，城市居民长期怀想而且经常谈论这件事。加比亚台上实行岗哨的时间，远不如这个多情而不幸的年轻人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时间来得长。

到了秋天，黑塞哥维那的起义者就四散逃亡了。几个有名的土耳其人和塞尔维亚人首领逃到门的内哥罗或土耳其去了。在这一带还留下了几个大盗，这些大盗同反对当局实行征兵而举行的起义，实际上没有什么真正的联系，他们只是为个人在打家劫舍。后来，他们也一个一个被拿获或者流散了。黑塞哥维那土地上又恢复了平静。波斯尼亚人虽然应征入伍，没有进行反抗，但是第一批年轻士兵出发时，可费了很大的力气。

全城征集的青年只不过一百来人，但是他们在指挥部前面集合的那一天，乡下征集来的人都带着旅行包，少数是城市居民，他们带的都是木箱，那个场面就好象城里发生了传染病和警报似的。许多应征的人从一清早起就把各种酒搀在一起狂欢豪饮。乡下人穿着很干净的雪白衬衫，几乎没有人不痛饮一杯，他们靠着墙，坐在行李中间打瞌睡。大部分人都很兴奋，因为酒力发作，周身通红，加上烈日蒸晒，所以个个浑身冒汗。同村子的小伙子，三三两两，互相搂着肩膀，头挨着头，象一排排活动的

小树那样摇摆着，而且旁若无人地放声高唱粗俗冗长的情歌：

“噢！姑娘啊，噢噢噢！噢噢噢！”

这些人简直闹翻了天，但是还比不上这些年轻人的母亲、姐妹和三姑六姨，那才热闹呢：她们来自遥远的村庄，为的是给他们送行，想多看看他们一眼，尽情地洒一把眼泪，流一把鼻涕，临别的时候，再亲手献上一点好吃的东西，最后温存地爱抚一番。集市广场上女人云集，她们呆呆地坐在那里发愣，好象在等待判决似的；或者互相交谈，不时扯着围巾擦擦眼泪。事先在村庄里，当局曾经当众宣布，这些年轻人并不是抽调去打仗，也不是去强迫服劳役，而是到维也纳去为皇帝效劳，他们会吃得很好，衣服鞋袜也挺象样，服务两年以后就可以回家；况且帝国所有地方的青年都得服兵役，而且还得服役三年。尽管这样宣布，还是不行。妇女们把这些话都当作耳边风，当作完全不可理解的奇谈怪论。她们只是按自己的本能来行事。这种千百年来遗传下来的本能，使她们哭得象泪人儿，泣不成声，而且牢牢缠住他们，难解难分。对于自己心爱的人，比自己的生命更加可贵的人，现在眼看就要让一个陌生的皇帝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不知道要吃什么苦，受什么罪，她们自然肝肠欲断，想最后看一眼，再看一眼。指挥部的宪兵和官员们现在分头到妇女中间，劝说她们大可不必这样伤心，不要妨碍交通，不要在大道上追赶应征者，不要扰乱秩序，因为这些人都会平安无事地回来，如此等等，但是这一切解释枉然无用。妇女们乖乖地听着，好不容易刚悟出一点道理，她们又一个个哭了起来，而且哀声震天。她们疼爱自己所哭的人儿，同样也喜欢洒眼泪和长叹息。

启程的时候到了，当青年们按照惯例，四人一行通过大桥的时候，马上就挤撞乱跑起来，使最沉着的那些宪兵也难以保持冷

静。妇女们挣脱宪兵们的手，开始跑了起来，都想挨近自己亲爱的人，她们互相推撞，甚至推倒在地。喧嚣声、叫唤声、哀求声以及最后的叮嘱声混成一片。有几个妇女甚至跑到领着应征者队伍的那四个宪兵前面，倒在这些宪兵的脚下，捶着敞开的胸部，大声喊叫：“从我的身上过去！从我这个薄命人的身上踩过去吧！”

宪兵们很吃力地扶起来她们，他们小心翼翼地才把皮靴和马刺从她们散乱的头发和衣裙下面抽出来。

有几个年轻人感到羞惭，生气，他们也动手去推这些妇女，让她们回家去，而大多数应征者却唱着歌，小声喊叫，这就显得更加嘈杂混乱。有些居民激动得脸色发白，他们按照这个城市的方式，齐声合唱：

> 萨拉热窝和波斯尼亚等地，
> 母亲们伤心悲戚，
> 目送儿郎，
> 去为皇帝当兵服役。

这首歌引起了人们更大的哭声。

应征者的队伍在桥上纠缠了一阵，最后好不容易过了桥，踏上了通往萨拉热窝的大道，两旁站列着城里的人，他们出来给应征者送别，对他们寄以哀怜，好象他们要押去枪毙似的。这些人里面有很多妇女，她们也毫无例外地都哭了起来，尽管这些走的人里面没有一个是她们的亲人。因为每个人想哭都有理由，尤其是趁别人悲伤的时候哭，更觉得好受些。

站在两旁的人渐渐少了。乡村妇女们一个个跟着走了。最固执的是那些当母亲的人，她们好象十几岁女孩，围着队伍乱

转，在路边的沟渠上面跳来跳去，企图躲开宪兵，尽可能挨近自己的孩子。那些青年人自己看了也急得脸色发白，感到有些别扭，他们转过身来喊道："我不是对你说了，你回去吧。"

尽管如此，那些母亲们还是跟着走了半天，除了远行的儿子外，她们什么也看不见，除了自己的哀声外，她们什么也听不见。

这些乱哄哄的日子终于过去了。人们各回各的村庄，城里也就安静下来了。以后应征者开始从维也纳寄来书信和照片，心情毕竟好受多了。尽管妇女们对着这些书信和照片还哭了很久，但不是那样放声大哭，悲恸欲绝。

机动部队被遣散，并且离开这座城市。加比亚台上早已没有岗哨，人们又象以往那样悠闲地在台上坐着。

两年终于很快地过去。这年秋天，第一批青年士兵果然回来了，一个个整齐干净，头发剃光，红光满面。大家都聚拢在他们周围，听他们讲述军队生活和他们所见到的那些大城市，谈话里还夹杂一些奇怪名字和外国词句。从第二批应征兵员起，出发时候的那种啼哭就已经少见了。

总的说来，现在什么事情都好办多了，习以为常了。年轻人都长大成人，他们对土耳其人统治时代的印象已经淡薄，没有留下多少回忆，而且在许多方面还接受了新的生活方式。但是，对于加比亚台上的生活，他们还仍然保持这个城市的传统习惯。这批年轻人除了穿的衣服，干的职业，办的事情和过去不一样，其他就无异于这个城市以往历史上的居民，也喜欢在加比亚台上闲聊，这种闲聊，过去和现在一直是那些居民在思想感情上的一种真正需要。

现在，应征者出发的时候，没有出现反抗和挤撞现象。至于那些大盗，除了老年人讲述往事的时候才提到以外，已经没有人

再谈起了。机动部队也跟当年加比亚台有碉堡时的土耳其哨兵一样，早已被人遗忘了。

第十四章

大桥旁边的城市生活越来越繁华，越来越井井有条，丰富多采，而且各方面发展协调，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稳定局面。任何地方，任何时代，人民都希望过稳定生活，但是这种愿望很少能实现，最多只能部分或暂时地实现。

十九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时光，在那些遥远陌生的城市，也就是在遥控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的本土，出现了人类关系和社会历史中短暂罕见的稳定局面。正如在遥远的海湾能够感到茫茫大海的平静一样，人们对这些遥远地方的稳定局面也同样有所感觉。

这里指的就是弗朗茨·约瑟夫式的相对繁荣和表面稳定，这种太平盛世持续了二三十年，当时，许多欧洲人都以为已经找到了有效的法宝，可以使人类几百年来梦寐以求的自由和进步得到尽善尽美的发展。十九世纪在千百万人面前展现了无数虚假的繁荣，而且造成人人可以享受廉价和分期付款，从而生活舒适、安定和幸福的假象。但是，十九世纪这种生活给波斯尼亚这座边远城市只是带来一点微波，影响极小，其影响的程度及采取的方式，都是限于这个落后的东方社会所能接受、所能理解和实行的范围。

经过最初那几年的怀疑、观望、犹豫、动摇以后，现在这个城

市已经开始走上了新的轨道。城市居民感到秩序井然，社会安定，生活保障。这些就足以保证这个城市的生活，至少公开的生活走上不断完善和进步的道路，其他都可以暂时被人置之脑后。当然，各个种族、各种宗教、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们心潮起伏澎湃，因为他们的固有感情和不可摧毁的信念，表面上已经消逝，并且被埋葬，实际上却在为未来酝酿着各种意想不到的巨变和灾难，各国人民尤其是这个国家的人民似乎都在劫难逃，很难倖免。

新政府经过初期的误会与冲突以后，现在明显地给人们留下了这个政权是稳固持久的印象。（这个政府本身也充满着这种信念，因为，如果没有这种信念，要建立一个持久的、强有力的政权是不可能的。）这个新政府不是直接出面，而是间接行使权力，因此，它比以往的土耳其旧政权容易被人接受。这个新政府的残忍贪婪的本质都用庄严、光荣的传统形式加以伪装，因此，人们犹如面临疾病和死亡那样害怕这个新政权，而不是象面临凶恶、苦难和残暴那样害怕得直打哆嗦。新政府的代表人物，无论文官或武官，大多数都不熟悉这个地方的地理民情。这些人固然无足轻重，但是从他们的一举一动可以看出他们是一部大机器里面的小齿轮，每一个人的背后还有一连串各级领导人物和组织机构。因此，这些人就有一种远远超过他们本身所具有的权威和魔力，很容易使人俯首听命。虽然这些人并不受人欢迎和爱戴，但是，由于他们在这里身居要职，由于他们的作风沉着冷静，而且还有一套欧洲的生活习惯，因而他们能够获得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人民的信任和尊敬，而没有引起妒忌和诽谤。

另一方面，既然这些外国人生活在这个独特的东方社会，因此，经过一个时期以后，他们也不能完全不受这个社会的影响。

他们的孩子让这座城市的小孩学到了一些外国名词和字句，在桥下教他们玩一些新游戏，让他们看一些新玩具，反过来，他们的孩子也从这个城市的小孩那里很快学会了当地的歌曲、土话、骂人的话、旧的游戏，如“跳羊”，等等。成年人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也带来了一些特殊的术语和生活习惯，同时，在语言和生活习惯方面，他们每天又从本地人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实际上，我们的人，尤其是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在服装和举动上越来越摹仿占领以后侨迁来的外国人，而这些外国人本身也不能不受当地生活环境的影响。这些官吏中间，有许多是刚毅的马扎尔① 人和傲慢的波兰人，起初，他们生活在这个城市，就象浮在水上的几滴油，同别人格格不入，每次过桥，显得无可奈何，每次进城，也怀着厌恶情绪。可是几年以后，他们居然也到加比亚台，而且在那里往往坐上几个小时，带上粗大的琥珀烟嘴在那里抽烟，象当地的老居民那样，凝望着吐出来的烟雾在蔚蓝的天空下，在黄昏的静止空气中徐徐消失；或者他们同我们的绅士和贝伊在一起，面前还摆着一小束藿香草，坐在绿油油的高坡上等待夜幕的降临，他们一边海阔天空地慢慢闲聊，一边喝着酒，吃点东西，活象真正的维舍格列人。在这些外国人里面，有些官吏或手艺人在我们的城市结了婚，决心不再离开这座城市。

这种新的生活既不是这座城市任何居民所固有的，也不是历来所期望的；相反，所有的人，不管是穆斯林还是基督教徒，虽然置身于这种新生活，但都对它持各种绝对保留态度。当然，这些保留态度还是内心的、隐蔽的，而新生活却是公开的，有目共睹的，而且具有强大的威力，显示出新的远大前景。经过一定时

① 匈牙利的主要民族。

期的犹豫以后，大多数人都被这股新的潮流卷了进去，他们也做起生意，购置产业，按照新思想新方式生活着，这种新思想新方式给每一个人带来了更加广阔的天地，更多的发展机会。

新的生活丝毫不比土耳其人统治下的旧生活少附带些条件，或者少受些束缚，不过这种生活比较容易接受，比较合乎人情，而且这些束缚和条件目前是由远处巧妙地遥控，所以没有直接的感觉。相反，每一个人似乎觉得周围的生活更加宽阔，更加自由，多样化和繁荣。

新的政权依靠它那一套完善的行政机构，不需要采取粗暴手段，就让人们缴纳各种捐税，而且还不使人感到痛苦，也不引起任何反抗，不象以前土耳其人是用粗鲁的、不合理的方法迫使人民缴纳捐税，或者干脆采取抢劫手段。新政权榨取的钱并不比以往少，甚至更多，而且搞得更快、更稳当。

首先进入这座城市是军队，继军队之后是宪兵队，继宪兵队之后，派来了官吏，官吏之后又出现了商人。人们开始砍伐森林，随之也来了一些外国承包商、工程师和工人，给老百姓和商贩带来了各种赚钱的机会，也带来了新的生活习惯，在居民的服装和语言方面，也引起了一些新的变化。第一座酒家建起来了，这个下面再谈。此外，过去所没有见过的一些饭馆和店铺象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除了几百年来一直生活在这里的西班牙的犹太人，这些人差不多在德里纳河上建桥的时候就在这里定居了，现在又来了加里西亚的犹太人。

货币象鲜血一般，开始大量在当地流通，而且数额之多，是前所未见的，更重要的是这些货币在民间肆无忌惮地公开流通。在这些金币、银币和有价证券大量流通的时候，谁见了都不能无动于衷，每个人都可以财源广进，至少可以饱饱眼福，即使

穷光蛋也不免心存幻想，认为自己的穷困只是暂时的，因此可以忍受一时。

钱财和富翁过去也存在，但仅仅是少数人，而且那些阔老阔少把钱财都隐匿起来，就象毒蛇把自己的爪子隐藏起来一样；他们拥有贵族称号，作为自己的权力手段，自己享受，别人受罪。而现在的财富，或者被人看作是财富而且可以称之为财富者，是人人都可以拥有的，而且越来越以个人享乐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大部分人都可以沾点光，多少分享一点残羹剩饭。

其他方面也是如此。过去只能偷偷摸摸、躲躲闪闪地享乐的事情，现在只要有钱就可以办到，而且可以公开地纵情逸乐，这样，享乐对人们就更有吸引力，追求享乐的人也更多。过去那些可望而不可即的、渺茫遥远的、高不可攀以及为法律或至高无上的观念所禁止的东西，现在你只要有钱，或者有一套手段，往往就可以弄到手。过去许多情欲和需要只能采取陈仓暗渡，或者完全得不到满足，而现在人们可以公开大胆地去寻求全部或者至少部分的满足。实际上，在这方面也有许多限制和法律上的阻碍；不道德的事情要受到惩罚，享乐的事情要比以往付出更加重大的代价，不过法律和方法跟过去不同，现在，在这方面和其他方面，给人留下一种错觉，似乎生活忽然比过去更加宽阔、奢华和自由。

真正的享乐玩意儿并没有比过去增加多少，尤其是不比以往更幸福多少，但是毫无疑问，追求享乐的目的比过去容易达到，个人的幸福似乎比比皆是。维舍格列人本来就喜欢逍遥享乐，现在外国人带来的新的生活方式和经商营利方式进一步刺激了维舍格列人的这种固习，而且给了它以实现的可能性。携家带眷迁居到这里的波兰籍犹太人，把他们的经营范围完全放在

这方面。例如，石来伯开设一家食品杂货店，戈当布朗为士兵开设一个饭店，察勒开一个酒家，斯伯林兄弟经营一个贼厂和一个照相馆，迟维赫则是钟表兼首饰商。

在石头旅舍的原址建立了兵营以后，又利用剩余的石料盖了一座地方政府办公楼和法院。除了这两座建筑物，城里最大的楼房就是察勒所开设的酒家。这座酒家位于桥边的河岸上。这里的河岸是垂直的，有加固的护墙，这道护墙支撑大桥两侧的河岸，是和大桥同时建造的。所以在大桥的左右两侧伸出两块平地，好象是两个水上阳台。城市的人把这宽敞的阳台叫做跑马厅，一代代小孩就在上面玩耍。地方当局占据了桥左的那块平地，周围圈上栅栏，里面种植果树和小树，成了这座城市的植物园。

在桥右边的那块平地上，就是盖了那座酒家。在这以前，要进入商业区首先要经过扎里亚所开设的小酒店。这座小酒店的地势很好，因为从大桥进城的旅客总是又渴又累，都少不了要去光顾。现在这座小酒店让新酒家的高大建筑完全遮住了。这座矮小的旧酒店显得日益矮小，相形见绌，仿佛要陷入地里似的。

新酒家建在桥旁，正式命名为“大桥酒家”。但城市居民从不叫它“大桥酒家”，而称它为“罗蒂卡酒家”；他们对任何东西都有自己的叫法，完全按照自己的特殊逻辑以及事物的真实含义给它们另起别号。察勒开设的酒楼上面的招牌“大桥酒家”这几个字是由一个擅长油漆的士兵用彩色刷成直体字，很快就褪了颜色，而“罗蒂卡酒家”这个名称却一直保留下来。因为这个酒家虽然是犹太人察勒开设的，但他是个庸庸碌碌的大胖子，妻子体弱多病，两个女儿米娜和伊兰娜，年纪还小，所以这座酒楼的真正老板和灵魂却是察勒的小姨子罗蒂卡，她是个既年轻又非常美

貌的寡妇，说话直爽，而且还具有男人的魄力。

酒家的楼上有六个房间，收拾得很干净整齐，楼下有两个厅，一间小厅，一间大厅。常到大厅里来的是些职位低微的顾客，普通居民、下级军官和手艺人等。小厅和大厅隔开，榻断上装有两扇不透明的玻璃门，一扇玻璃门上写着“雅”字，另一扇写着“座”字。这里成了官吏、军官和这个城市有钱人的社会生活中心。在罗蒂卡酒馆可以喝酒，打牌，唱歌，跳舞，谈论正经事情，进行交易活动，可以吃得很好，也可以在干净的床上睡个觉。那些贝伊、商人和官吏经常夜以继日地在里面喝酒，尽情欢乐，直到酒醉困倦不能支持为止，有时打牌打得筋疲力尽，视而不见(现在人们不再在乌斯达莫维奇小酒店的那间又黑又闷的小房间里偷偷摸摸地打牌了)。罗蒂卡很有礼貌地把那些喝得酩酊大醉或者输得精光的顾客送走，然后就接待那些还没喝够，急于要到这里来喝酒赌钱的顾客。

没有一个人知道，也没有一个人想过，这个寡妇什么时候休息，睡觉，吃饭，什么时候去梳妆打扮，而且还打扮得象个仙女一般美丽。因为她总是在那里(至少似乎总是在那里)伺候着每一个人，对任何人都很和蔼，一视同仁，胆大机智。

她的身材优美，体态丰满，皮肤白润，头发漆黑，一双热情的眼睛；对那些在酒家花了许多钱，醉后失态，动手动脚的顾客，她总是泰然自若，应付自如。她和任何人谈话都很亲昵、大胆、机智、锐利、讨人喜欢、令人心旷神怡。她的声音有点沙哑，高低不均，但有时候又成了喁喁细语，十分动听。她的句法往往有些毛病，语格乱套，名词的阴阳性也有错误，因为她从来没有好好学习过塞尔维亚文，但她说的话很有味道，非常形象化，语调和词义都完全符合当地的语言习惯。

每一个顾客都瞩目于她，为了得到她的青睐和满足自己的私欲，在酒家花了不少钱，费了不少时间。当然费钱费时这一点是肯定的，除此而外，可能得到一点好处，但是很难肯定。两代的纨绔子弟都把罗蒂卡当作一个仙女，她光艳夺目，令人神魂颠倒，但又冷若冰霜，千金难买她的欢心。根据当地的奇闻轶事，很少几个人博得她的垂青，而且这些人自己也说不清楚到底得到了什么甜头，同她的关系到了什么程度。

那些有钱的醉汉确是很不好对付，因为这些人常常会出其不意地兽性大发。但罗蒂卡是一个机智灵活、情欲冷淡、铁石心肠又不怕厌烦的女人，她能够巧妙地运用她那完美的身躯、非常狡猾的手段以及相当大的胆量，把每一个欲火难忍的人镇住，使每一个纵情肉欲的人收敛起来，而且她总能使他们每一个人和她保持必要的距离，从而使这些人的欲火烧得更旺，而她的身价也抬得更高。当这些放荡不羁的人发起酒疯，粗野狂暴到难以遏制的时候，她就使出斗牛士对付公牛的手段，因为她对这些人很快熟悉了，因此对他们表面上看起来挺复杂的种种欲念很容易找出对付的诀窍。她深知这些感情和肉欲冲动的残忍男性的种种弱点。她对他们百般殷勤，许的愿很多，但兑现的很少，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点也不给，因为这些人的欲望，根本上是难以满足的，所以到头来他们能够尝到一点甜头也就心满意足了。她对待大多数顾客就象对待病人，对待时常发病、神经错乱的人一样。总而言之，尽管她所干的行当不是那么高尚，甚至还要卖弄一点色相，但是应该说她是一个理智贤慧、心地善良、性格温柔的女人，她善于安慰和帮助那些喝酒花钱太多或者打牌输钱太多的顾客。她使他们疯疯癫癫，因为他们本来就疯疯癫癫，她愚弄他们，因为他们甘心受愚弄，她从他们身上赚来的钱本来就

是他们准备花掉和输掉的钱。她的确赚了不少钱，而且又善于守财，所以一开始那几年就积蓄了一大笔财产，同时她又能慷慨大方，一声不吭地把一笔欠账一笔勾销或者把一笔亏损置于九霄云外。她救济乞丐和病人，而且还小心谨慎，不声不响，机智灵巧地接济那些破落户，接济那些富贵人家的孤儿寡妇，因为这些可怜的衰微人家，从来不知道乞食度日，因此对于别人的施舍，总是碍于面子，不大好意思接受。

她治理酒家也同样巧妙灵活，对于那些沉湎酒色的浪荡顾客，她总是保持一定距离，对他们尽量取之，而毫不与之，但是也不把他们永远拒于千里之外。

对于人情世故有些阅历而且了解她的历史的人常常哀叹造物者竟给这个女人安排这样一个狭小平凡的天地，为她感到十分惋惜。如果她不是那样一个人，不是处在那种天地，谁知道这个女人，深谋远虑，通达人情，不为自己着想，既贪得无厌，又慷慨无私，美丽动人，而且又洁身自好，冷若冰霜，经营一个地方上的酒家，把城市中浪荡子弟的钱财榨取一空，她会成了什么人物，干出一番什么事业来。她也许会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巾帼英雄，掌握着大家族、宫廷和国家的命运，把一切事情都处理得很好。

一八八五年前后，正是罗蒂卡精力旺盛的时代，一些富家子弟在酒家的那间装有乳白色不透明的玻璃门的雅座里度过了日日夜夜。虽然天已破晓，他们还在那个房间里坐在火炉旁边打瞌睡，醉意未消，睡意正浓，神思恍惚，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还在等待什么。罗蒂卡趁这个安静的时刻，退到楼上原来预备给女仆用的一个小房间里，后来她把它改为自己的办公室，不让任何人进去。这个小房间里摆满了各种各样家具、照

片、金器、银器和水晶器皿。帘子后面放着绿色的钢制保险柜以及一张小办公桌，桌子上堆满了纸张、请帖、发票、账单、德文报纸，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交易所行情表和彩券中奖的号码表。

这个拥塞闷气的小房间，只有一个小窗户，紧紧对着大桥的第一个桥孔，也是最小的桥孔。罗蒂卡在这个小房间里度过她的闲暇时光和属于她个人的这段秘密生活。

罗蒂卡利用这段偷闲的自由时间在这个小房间里翻阅交易所的消息，研究各种说明书，整理账目，答复银行的信件，作出某些决定，给一些指示，支配银行存款和存入新款。楼下那些人和大家都不知道罗蒂卡的这一部分工作，不知道她这部分真正的生活。这时候，她丢开了笑咪咪的假面具，神情严峻，目光锐利阴沉。她在这个房间里给家里许许多多亲属写信。她家姓阿菲尔麦叶，原籍达尔诺伏，有许多已婚的兄弟姊妹，还有许多侄男侄女，他们都是东加里西亚的穷苦犹太人，分散在加里西亚、奥地利和匈牙利等地。她指导自己这十二家犹太亲属，过问他们的生活琐事，安排他们的婚事，让他们的小孩去读书或者学手艺，让病人去治疗，告诫和责备那些懒汉和挥霍浪费的亲人，表彰勤俭和苦干的美德。她解决家庭间的争吵，对不和睦与纠纷提出劝告，促使大家生活得更加融洽、美好、光彩，同时，也为他们实现这种生活提供物质条件。她每一封信里总是附着一张汇票，其数目足以使对方听从她的劝告，遵守她的指示，满足物质上或精神上的需要，避免一场苦难。

她把提高全家的生活水平，特别是帮助每一个成员能够自立这种事情看作是她唯一的真正乐趣，从中感到她生活中的一切承担和牺牲得到了奖赏。每逢阿菲尔麦叶家里任何一个男女成员，在社会地位方面，哪怕只提高了一步，罗蒂卡都觉得自己

也随着提高了，并且觉得自己的沉重劳动得到了奖励，干起来劲头也更大了。

有时候她从雅座出来走到楼上，身体极度疲乏，心里十分厌烦，没有力气写信，也没有精力去翻阅书信和账目；这时，她就走到小窗前，深深吸着河里传来的新鲜空气，这种空气和楼下的恶浊气味完全不同。她的目光自然地落在石头桥孔上，桥孔雄伟多姿，下面水深流急；桥孔挡住她的视线，无法再往前远眺。无论是烈日当空，黄昏薄暮或者天色微明，无论是冬天的月夜还是满天星斗，桥孔始终如此多娇。桥孔的两壁面面相对，上面汇成尖顶，两边互相支撑，力量完全平衡，始终稳如泰山。多少年来，这个桥孔一直是她唯一熟悉的景色，成为她的无声证人，它亲眼目睹这个两副面孔的犹太女人如何休息，呼吸新鲜空气，如何独自一人在处理商务问题和家庭烦恼，面且有时候也遇到难关，束手无策。

但是，她的休息时间总是不长的，因为楼下咖啡间里经常传来的吵吵嚷嚷声音，打断了她的休息。或者是新来的顾客要求罗蒂卡去陪他，或者是某个醉汉酒醒以后又要喝酒，要人点灯，要乐队来演奏，要召唤罗蒂卡。于是她离开休息室，用一把特制的钥匙把门仔细锁上，下楼去接待顾客，笑嘻嘻地好言安慰醉汉，就象对一个惊醒的小孩那样哄他，设法让他在桌子上坐下来，重新再花天酒地，说说唱唱，纸醉金迷一番。

她不在的时候，楼下就出问题，顾客们互相争吵起来。有一个赤伦恰地方的贝伊，白面青年，样子很凶，他把送来的酒都洒在地上，对什么都不满意，向仆人和顾客寻衅。最近一个时期，他除了短短的中间休息以外，整天沉湎在酒家里喝酒，追求罗蒂卡。这位达尔诺伏的犹太美女使他垂涎千尺，醋意大发，他狂喝

滥饮，结果是借酒消愁愁更愁，只好无端寻衅，发泄内心的痛苦。

罗蒂卡毫不畏惧，她轻轻而又自然地向他走过去。

“怎么回事，艾伊乌伯？你，我的亲爱的，你干么嚷嚷？”

“你在哪儿呀？我要知道你刚才到哪里去了，”醉汉眨巴着眼睛，结结巴巴地说，声音已经平静下来了，并且把她当作仙女那样望着她。“这些人给我喝毒药。他们要把我毒死，但是他们不知道如果我……”

“你安静地坐下吧，”罗蒂卡边说边凑近贝伊，在他面前舞弄她那双雪白喷香的手使他安静下来，“坐下吧，我会尽力面为，我去给你找一种酒来。”

她把侍者叫来，用德语向他交代一番。

“不要在我面前说土话，什么胡言乱语，因为我……你是知道我的。”

“我知道你，艾伊乌伯，我知道你，我还没有见过比你更好的人，你，我当然是知道的……”

“嗯！告诉我，你刚才同谁在一起？”

一个醉汉，一个醒者，两个人就这样在胡搅蛮缠，也没有谈出个结果，他们旁边放着一瓶贵重的酒和两只玻璃杯：罗蒂卡的那只杯子总是满满的，另外一只，艾伊乌伯的酒杯，满了又干，干了又满。

这个浪荡青年满口酒气，在那里结结巴巴，嘀嘀咕咕，胡扯了一大套什么爱啊，死啊，无法医治的相思病啊，以及诸如此类的话，罗蒂卡对这些都能背诵出来，因为当地每个酒鬼说的都是这一套，内容词句都一样。这时候，她乘机站起来到别的桌子去，因为那些桌子还有别的顾客，他们经常在傍晚时候到酒家来消遣。

在一张桌子上有些富家子弟，他们刚学会到咖啡馆来喝酒，这些地方上的花花公子觉得扎里亚小酒店太简单无聊了，但他们在这个大酒家也还不敢放肆。在另一张桌子上坐着一些官吏、外国人和一个军官，这个军官今天不在军人食堂就餐，而到民用酒家用膳，原来他是要向罗蒂卡借一笔急需的用款。在第三张桌子上是一些工程师，他们正在森林区造一条铁路，以便把木材运出来。

角落上坐着两个人，正在那里计算什么东西，一个是巴夫雷·朗科维奇，他是在座最年轻又是最有钱的财主；另一个是奥地利人，是铁路的承包商。巴夫雷穿着土耳其服装，戴着一顶土耳其红帽子，在咖啡馆里也不摘下来。他长着一张白脸，一双小眼睛象两道黑色的细缝，炯炯发光，偶尔遇上快活得意的时候，这双眼睛也能睁得特别大，而且露出怪笑的神气。那个承包商身穿灰色运动服、黄色高统靴，鞋带一直结到膝盖。他手里拿着一支带银链的金黄色铅笔在写字，巴夫雷手里拿的是一支粗大的短铅笔，这支铅笔是五年前有一个军队里的木工在他的铺子里买钉子和合页的时候忘了拿走留下来的。他们正在签订铁路工人的伙食合同。他们全神贯注在那里加减乘除，写了许多数目字，这些数字写在纸上，是明的数字，好进行尔虞我诈，说服对方，另一些数字是暗的，放在脑子里面，双方都在激烈进行心算，暗中给自己留一手，多牟取一些利润。

罗蒂卡对每一个顾客都可以找出一句恰当的话来说，或者对他嫣然一笑，或者只是默默地看一眼。然后，她又回到那个年轻的贝伊身边，因为他又在胡闹寻衅。

每天夜晚，顾客们不是暴饮，就是吵嚷，狂欢，哭叫，说下流话，这些她已经司空见惯，因此，她总可以找到一个安静的时刻

缩回她的房间，在乳白色瓷灯罩的灯光下继续休息或写信，直到楼下又爆发争吵把她叫下去为止。

第二天还是照样那一套，还是那个酒醉胡闹的浪荡贝伊或者另一个什么人，而罗蒂卡还是照样操很多心，对顾客照样赔着笑脸，甚至作出近乎轻佻放荡的举态。

罗蒂卡每天要应付这么多复杂的事情，这些事情几乎占据了她的全部白天和黑夜时间，需要她使出一个女人所难以使出的狡诈手段，拿出一个男人所难以拿出来的力量，而她竟能对付过去，这简直不可理解，无法解释。可是，她样样办到，毫无怨言，而且她做了什么，准备去做什么，总是一声不响，从来不对任何人说过一句。尽管事情这么多，她每天竟然还能抽出一小时时间用在阿里贝伊·巴希奇身上。

据城里的人说，阿里贝伊·巴希奇是唯一博得罗蒂卡真正垂青的男子，罗蒂卡对他钟情，既不是图名，也不是图利。他是全城最拘谨，最沉默寡言的人。巴希奇家有四兄弟，他是老大，还没有结婚（城里的人都认为是为了罗蒂卡），他不干什么事，也不参与城市中的公共生活。他不喝酒，不同那些和他同年的朋友吃喝玩乐。他总是那样脾气，对谁都很和蔼可亲、谨慎小心。他虽然拘谨寡言，但是并不避免社交，可是谁也记不得他发表过什么意见，谁也没有传播过他一句话。他对自己很感自足，对自己的状况和别人眼里对他的看法都十分满意。他不需要装模作样，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别人也不希望他装腔作势，因为他的出身本来就很不低微，生来就相当体面、相当显赫、并有令人尊敬的贵族头衔，这种头衔似乎是命中注定，天经地义，使他受用终身，别人无须多加解释，既否认不了，也无法效仿。

罗蒂卡不太照管大厅的顾客，因为那是女仆马尔奇卡和男

侍者瞿斯达夫的事。全城的人都知道马尔奇卡是一个机灵的匈牙利女人，象一个驯兽女郎，至于瞿斯达夫是波希米亚人，赭红色头发，身材矮小，性情暴躁，眼睛通红，撇着两条腿，扁平脚。他们不仅熟识每个顾客，而且对一般居民也都熟识；他们知道哪个人从来不赖账，知道每一个人酒醉以后的脾气，知道对谁应当冷淡，对谁应当热情招待，对哪些人甚至不应当让他们进来，因为这些人"不配到酒家来"。他们既要让顾客尽量喝酒，又要让他们按规矩付账，同时又要圆满收场，因为这是罗蒂卡的原则：千万不要出事。当然，有时候也出意料之外，突然有某一个顾客大发酒疯，或者某一个人在二等酒馆里喝醉以后，强行闯进这个酒家来，这时候那个身材高大、肩膀宽阔、骨瘦如柴的侍者就出现了。他是里卡地方的人，名叫米兰，力气很大，很少说话，但什么都干。他完全是酒馆侍者的一副打扮(因为罗蒂卡要求如此)。他总是不穿上衣，白衬衣外面罩着一件棕色背心，腰里围着一条绿呢长围巾，无论冬夏，总是把衣袖挽到胳膊肘，露出两只又黑又粗，毛茸茸，象两把大刷子似的下膊。他留着两撇细长的小胡子，头发又硬又黑，还涂着军人用的香膏。米兰是一个善于制止一切坏事发生的侍者。

为了制止发生不愉快的事情，这个酒家早已想出一条专门对付的策略：如果某个醉鬼想闹事，通常由瞿斯达夫先敷衍一番，等到米兰走到他的背后，他就忽然闪开，于是米兰一手抓住醉汉的腰带，一手抓住他的衣领，而且迅速灵活，谁也看不出米兰如何"攫住"对方。于是任何醉汉，哪怕是城里的大力士，也象一个稻草人那样被飞也似地带到大门口，马尔奇卡及时打开大门，醉汉就从门口一直被抛到大街。同时，瞿斯达夫也跟着把那个醉汉的帽子、手杖或其他遗留下的东西全都扔了出去，米兰冲

了过去，用尽全身力气把大门的铁栏拉下来。这一切动作配合得很好，一刹那工夫就可了事，顾客还没有转过身来，那个不受欢迎的人已经到街上了；如果这个人真是发疯了，他也只能用刀子或石块砸烂铁栏，因为铁栏上还留有痕迹就可以证明。这样一来，酒家里面安然无事，闹事是在大街上，自有警察去收拾，因为酒家旁边日夜都有警察。

别的酒馆的侍者对这样的顾客往往没有办法，因为这些顾客死赖着不走，把桌椅都踢翻了，用手脚死拉住大门，即使有九牛二虎之力也拖不动，而来兰对这样的顾客却从来不在话下。他每次解决这类事情，并不是出于头脑发热，也不是想出气，更不是生性好斗，或者出于个人虚荣心的驱使，因此他总是完成得很出色利落。一分钟以后，米兰已经若无其事地回到厨房或餐具间，继续干他的活了。

这时，只有瞿斯达夫一个人，而且装作无意似的从雅座走过，罗蒂卡正在那里陪着比较高贵的顾客，瞿斯达夫向她望了一眼，突然双眼一闭，意思是表示刚才发生了一件事，但是已经解决了。而罗蒂卡仍然笑容可掬地在同顾客谈话，只是两只眼眨了几下，别人根本觉察不出来，意思是："首先，感谢你们，不过还要小心注意。"

最后只剩下被撵走的顾客所喝的酒和摔碎的东西这笔账的处理问题。到了深夜，当他们在红色屏风后面结账的时候，罗蒂卡让瞿斯达夫把这笔账一笔勾销了。

第十五章

这个捣乱的顾客挨了一顿没趣，让人家毅然决然地逐出酒家以后，如果没有被拉进监狱的话，他还有几个去处可以使自己慢慢清醒过来。他或者踉踉跄跄地走到加比亚台，让河水和附近山林送来的凉风吹拂一下，使他自己清醒过来。他也可以换个地方，到离此不远的市府广场，那里有扎里亚所开设的小酒店，在这个小酒店里，他可以对那只凶狠毒辣、铁面无情地把他从酒家拉出来的魔手进行咬牙切齿、气势汹汹的威吓和辱骂。这家小酒店没有也不可能发生动手把顾客拉出酒馆的事，因为上这个小酒店来的都是有子女的家长和劳动人民，他们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随意小酌，言论举止可以自由随便一些，一到天黑，他们就散席回家。再者，这个酒店要求不同，它并不要求主顾花钱喝酒，醉后也和常人那样规规矩矩。即使有人喝酒过量，这个酒店的扎里亚，可是个身材魁梧的汉子，他不爱说话，脾气也很不好，所以他只要一翻脸，那些醉汉和想捣乱的顾客就老实下来，不敢放肆。他缓缓举起粗壮的胳膊，声调低沉地说：

“嘿！行了，不要自讨没趣！别胡闹了！”

象这样的老酒店，里面既没有单间，也没有象其他咖啡馆里那样的侍者，只有几个桑甲克地方招来的小伙子，农民打扮，在酒店里充当侍役，这完全是古今合璧，土洋混合。

缩在阴暗角落的是那些人所共知、专喝拉基酒的顾客，他

们不喜欢乱吵乱闹，一声不响地在那里喝酒。他们喜欢这个角落，因为既阴暗又清静，面前摆着拉基酒，就象面对着什么宝贝似的，十分悠然自得。这些嗜酒如命的人，胡子不刮，衣冠不整，对世界上的一切都无动于衷，对自己也觉得百无聊赖，他们就这样坐在那里借酒消愁，直到血液沸腾，肺腑燃烧，神志迷离恍惚。他们希望醉后看见某种奇异的光彩，然后顺着这道异光下去，即使跌进万丈深渊，一命呜呼也心甘情愿。可惜，随着岁月的推移，这种幻景越来越难得，越来越渺茫。

那些初学喝酒的人，尤其是那些富家子弟，血气方刚，容易惹是生非的年轻人，喝酒时才喜欢大吵大嚷。一切纵酒逸乐的人都得付出代价，这些刚染上这种恶习的年轻人自然也不例外，不过有些人经过一个时期就回头了，另一些人，时间则长一些。但大多数人不会长期停留在这条路上，他们另走它途，例如成立家庭，寻找职业，从事谋生，过一般市民生活，或者多少染上别的恶习和嗜好。只有极少数天生的酒鬼才永不回头，他们在这昙花一现、虚无飘渺的生命过程中，不是好好生活，而是沉湎烧酒，追求这种最短暂、最虚无飘渺的乐趣。他们为烧酒而活着，把自己的精力全都消耗在这上面，自己也总象那些坐在酒店角落里的人那样，愁眉苦脸，呆若木鸡，肥头胖耳。

城里有一个吉卜赛人①，名叫宋巴，三十年来，他总是带着一支原始笛子，在酒宴中替人演奏。自从这个城市的生活方式发生新的变化——花天酒地，放荡无羁，商业繁荣，财源茂盛以来，除了宋巴，现在又多了一个叫法朗士·福拉纳的人，他也

① 原为印度北部的居民，十九世纪开始向外迁移，流浪在西亚、北非、欧美等地，多以占卜、歌舞为业。也叫茨冈人。

经常带着手风琴到扎里亚的小酒店里来。法朗士身材瘦小，棕色头发，右耳朵还戴着一只金耳环。他是个木匠，但酷爱音乐，也是嗜酒如命，外国士兵和工人都喜欢听他演奏。

酒店里经常有一个用单弦伴唱的民间歌手，他是一个门的内哥罗人，形容干瘪，象个苦行者；衣衫褴褛，但傲骨飘然，双目炯炯有神；经常挨饿，但能克制；样子很清高自傲，但不得不依靠别人布施度日。他故意在角落里坐了一会，什么吃喝的东西都不要，眼睛朝前望着，好象什么也不懂，什么感觉也没有。然而，可以看出他有心事，他的内心和表情完全不一样。他的内心充满着种种矛盾和不可调和的心情，尤其是他一方面有伟大抱负，另一方面外表上又让人看出他穷极潦倒。所以他在人们面前总是显得自惭形秽，局促不安。他的神情高傲，耐心等待别人来请他唱一支歌曲，而且，就是在这种时候，他也是迟迟才把他的单弦琴从布袋里拿出来，对着琴呵一口气，试一试弓子是否因为受潮而松弛了，然后调一调音，尽量避免使人注意他这一套准备工作。当他开始用弓子在琴上试音的时候，只听到一种颤抖面带抑扬的声音，就象雨点落地的淅沥声。随后他闭上嘴，用鼻子轻轻哼了几声，再调调弦，吊吊嗓子。等到琴声和嗓音配合均匀，发出哀怨的音调以便演唱悲曲的时候为止。这个可怜人就象着了魔似的，忽然变了模样：他的愁苦顿时消失了，内心的种种矛盾烟消云散，穷苦辛酸相，也一下子忘掉了。

这个民间歌手忽然抬起头来，索性抛开他那畏缩的假面具，似乎用不着再那样装模作样了。他开始唱起来，声音大得吓人，简直是在喊叫，一开头是歌曲的引子：

小小的藿香草如泣如诉：

可爱的甘露，

为何不在我身上降落？

那些若无其事在互相交谈的顾客忽然都沉默下来，一听到开始这两句歌词，无论土耳其人或基督教徒，都不约而同地打了一个寒战，因为歌词中提到的甘露，也正是他们所无限向往和渴望的，歌词打动了他们的心弦。

那个卖唱的又紧接着低声唱道：

这并非小小的藿香草……

随后他揭示了藿香草和甘露的隐喻，历数隐藏在土耳其人和塞尔维亚人心里的种种真实愿望和他们的实际遭遇，这时候听众们根据自己的感触、愿望和体会，各有各的感情，各有各的想法。不过，每个人都遵循着一种无形的规章，一直安安静静地把歌曲听完为止，而且表现出忍耐和涵养，丝毫没有流露出他们的真实心情。他们只是望着面前的小酒杯，从那清亮的拉基酒里面，他们隐约看到了他们所期望的胜利，看到了世上罕见的战斗、英雄、荣耀和光辉。

那些公子哥儿喝酒的时间越长，酒店里就越热闹。而在这种时候，宋巴、法朗士·福拉纳、独眼龙和吉卜赛女人沙卡就越有事儿干。

沙卡是一个斜眼的吉卜赛姑娘，她大胆泼辣，大有男子气概，谁肯出钱她就同谁一起喝酒，自己从不喝醉。每次热闹的酒宴总少不了她，而且每次总可以听到她那些放荡不羁的玩笑。

同独眼龙、宋巴和沙卡在一起欢乐的人常有变动，但是他们三个人总是在场。他们整天拉拉唱唱，开开玩笑，喝拉基酒。他们

供人娱乐，靠别人的挥霍度日。他们过的是夜生活，也就是当健康幸福的人们熟睡的时刻，他们正在那里花天酒地，纵情欢乐；这时候，拉基酒刺激了官能，产生一种冲动、兴奋的情绪，这种情绪其实始终如一，但又似乎每次不同，花样翻新，一次比一次带劲。在他们面前，每个人都敢赤裸裸地暴露自己的本性（塞尔维亚有一句俗语："连皮下血都暴露无遗"），事后既不悔恨，也不感到羞愧；这些事情，他们都亲眼目睹，但是由于得到人家的小恩小惠，所以也就不敢声张。有些事情，在公众面前可能要遭到责难，在自己家里可能成为罪过，或者根本做不出来，但是在他们面前，却都是容许的。那些出身富贵人家的阔老阔少，利用他们供人玩乐的名义，一时之间放浪形骸、毫无顾忌地暴露出在任何人面前不敢暴露的本性，至少暴露出一部分真正的本性。凶狠的人可能嘲弄，殴打他们，胆小的人可能咒骂他们，挥金如土的人可能送他们一些礼物；爱虚荣的人想博得他们的谄媚，心情郁闷或任性的人喜欢他们的诙谐和放荡言行，花花公子则喜欢他们的大胆和殷勤。在这个缺乏健康的精神生活的城市，他们成了市民的需要，不管承认与否，事实上人们永远离不开他们。他们好象是不知艺术为何物的社会里的一些艺术家。这一类男女歌手、滑稽者、怪人和丑角，一般城市里总是有的。当他们某一个人精力衰竭或者离开人世的时候，另一个就取而代之，因为除了这些人所共知、甚至负有盛名的人以外，还有一些无名新手也在发展成长，供后代的人消遣取乐。不过，要出现象独眼龙沙尔科那样的人，却是需要经过很长时间。

占领以后，城里第一次见到了杂技团，独眼龙爱上了那个走钢丝的姑娘，为了她，独眼龙干了不少荒唐越轨的事，不但自己进了监牢，挨了打，连那些不道德的富家子弟，由于怂恿他去胡

闹，也因此付出了巨额罚款。

过了若干年以后，大家见识多了，很多东西都习以为常了，所以后来外国来了音乐家、杂技演员、魔术师时，就不象第一次见到杂技团那样，全城轰动，人人围观，可是独眼龙爱上那个走钢丝女郎的事，却一直在让人们传诵。

长期以来，白天时间，独眼龙为大家服务，而且什么事情都干，晚上时间，就陪那批阔人和贝伊喝酒胡闹，供他们开心，他就这样伺候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有些人到一定时候，浪子回头，成家立业，过正经生活，这时候，新的一批年轻人又接上来，走那些人的老路。现在独眼龙已经身心疲惫，未老先衰；他现在干活不多，大部分时间都耗在酒店里，因此收入微薄，主要靠富人施舍和赏他一些残羹剩饭过活。

秋雨绵绵的夜晚，人们聚集在扎里亚的小酒店里，感到愁闷无聊。有一张桌子坐着几个纨绔子弟。这些人的思想迟缓，老是在想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他们的谈话气氛沉闷，声音刺耳，内容空洞，表现出神情冷淡，心不在焉，坐立不安。拉基酒都不能把他们的兴致提起来。小酒店的角落里坐着独眼龙，他今天替人运送东西到奥克里德去，回来已经成了落汤鸡；他浑身湿热，人困马乏，加上喝了几杯拉基酒，这时候正在一条板凳上打瞌睡。

富家子弟席上的顾客，一个个愁眉不展，其中有一个人偶然讲起了独眼龙过去的恋爱哀史以及杂技团的那个走钢丝女郎，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那个角落里，而独眼龙却一动也不动，装作还在那里继续睡觉。“让他们说去吧”，这是昨天夜里他喝得酩酊大醉，今天早上头痛欲裂时作出的决定。他下定决心，不去理会他们的讽刺和辛辣的嘲笑，不能再象昨天晚上在这小酒店里

让那些阔少爷那样恶毒嘲弄了。

有一个人说："我看他们两人之间还在继续通信。"

另一个接着说："这个婊子养的，他这边给一个女人写情书，那边还有一个女人在等着他呢。"

独眼龙极力装作不动声色，但是这种触及到他本身的闲话，就象阳光刺激了他的脸庞，他感到有些坐不住。他极力睁开一只眼睛，脸上的肌肉一松，现出了高兴的微笑。他也不能再沉默不动了。他先把手一扬，表示不足一提的样子，然后说了一句：

"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

"哦！过去了，真的吗？喂！你们看，独眼龙这家伙真是罪大恶极。远方一个女人在为他憔悴，这里又有一个女人爱他爱得发疯。一个女人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另一个将要过去，以后还有第三个。你把女人一个个搞疯了，死后灵魂还能上天吗？"

独眼龙已经站起来向他们的桌子走过去。他忘记了困倦和疲劳，也忘记了今天早上所作的不参与别人闲谈的决心。他拍着胸膛向那些富家子弟保证，他绝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谈情说爱者，不是勾引女人的浪荡汉。他的衣服还是潮湿的，脸上又湿又脏（因为他的红毡帽质量不好，一见水就掉色，雨水和颜色都流到脸上），但是他满脸堆着兴奋快乐的笑容，在富家子弟的桌边坐了下来。

"给独眼龙一瓶罗姆酒。"商多·巴波嚷道，他是一个肥胖而机灵的犹太人，是有名的五金商人孟多的儿子，莫尔铎·巴波的孙子。

因为最近一个时期，独眼龙每次尽可能喝罗姆酒，而不喝拉基酒。罗姆酒是一种新产品，似乎是专为独眼龙这种人造的，这

种酒比拉基酒的度数高，劲头大，味道美。这种酒装在小瓶里，每瓶只二公升，酒瓶上的商标是一个黑白混血女郎，嘴唇很厚，眼睛火红，头上戴着一顶大草帽，耳朵戴着大金耳环，头像下面印有红字“牙买加”①(这种外来酒是斯拉冯斯基—波洛德地方的埃斯莱、西罗瓦卡等厂生产的，波斯尼亚那些嗜酒成性、已经到了酒精中毒的后期，再发展下去就要得抖颤性酒疯的酒鬼最爱喝这种酒)。独眼龙只要一看到那个混血女郎头像，就已经感到这种新酒的烈性，闻到它的芳香，他立刻联想到：如果他一年以前就死去，那他这一辈子就没有福气尝到人世间这种珍品(“其实，世界上象这样的美品不知道有多少呀！”)。这样一想，感到自己真是三生有幸，所以他每次开饮以前，总是沉思片刻，先得到一点精神上的乐趣，然后才开始领略佳酒本身的美味。

这次他也是手捧小酒瓶，先端详一番，似乎对它喁喁私语，百般温存。那个首先逗他说话的阔少爷，这时候一本正经地问他：“我的可怜虫，你对那个姑娘怎么打算呢？是娶她为妻呢，还是象对待别的女人那样玩弄玩弄就完了？”

他所说的那个姑娘，指的是杜切地方的一个名叫巴莎的少女。她是全城最美丽的姑娘，父亲已经逝世，同她母亲一样从事刺绣。

去年夏天，一帮年轻人经常出去郊游、欢宴，在吃喝玩乐之余，他们为巴莎和她那可望而不可即的姿色发了不少议论，编了不少赞歌。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独眼龙渐渐不知不觉地和他们情投意合起来，所以，他们也开始同他开起玩笑。

---

① 牙买加，加勒比海的一个岛国，原为英属殖民地，一九六二年独立。

一个星期五，那些年轻人为了玩乐，把独眼龙带到了一个郊区，那里有一座庭院，从大门和栅栏后面隐隐约约地传来了一阵少女的笑声和窃窃私语声。巴莎和她的女伴正在这个院子里，这时候，从院子里扔出一束艾菊花，正好落在独眼龙的脚下。他又惊又喜，立刻收住脚步，怕把花踩坏了，但又不敢把它拾起来。那些带他来的青年拍拍他的肩膀，向他恭贺，说他艳福不浅，因为这么多人里面，巴莎偏偏看中了他，而且对他这种表示，还从来没有对任何人作出过。

当天夜里，他们在梅扎兰附近河畔的核桃树下面喝酒，一直喝到天色微明。独眼龙挺着身子，一本正经地坐在火堆旁边，他一会儿得意忘形，一会儿若有所思。这天夜里，大家都不要他伺候，不让他照管咖啡和食品。

他们里面有一个人对他说："我的可怜虫，你知道一个姑娘扔给你一把花是什么意思吗？它的意思就是巴莎在向你暗示：'我象这支落花一样在为你憔悴；而你呢，你既不向我求婚，又不让我嫁给别人。'她的意思就是这样。"

大家都向他介绍巴莎，说这位绝世佳人贞洁无瑕，雪白肌肤，走起路来婀娜多姿，好象探出墙外的一棵成熟的葡萄，等待有人用手去采摘，而她所等待的人就是独眼龙。

有些富家子弟装作生气的样子，而且痛心疾首地叫嚷，她怎么会看上他呢？另一些人替他辩护。而独眼龙只管喝酒，他对这件奇迹，一会儿信以为真，一会儿又不敢相信，认为是不可能的。在谈话中，他针对那些公子哥儿的嘲笑，尽量为自己辩解，向他们解释，说明巴莎不可能向他表示爱情，因为他只不过是个穷光蛋，不但老了，而且又毫无动人之处，但是，当他静默的时候，他又陷入幻想，满脑子在想巴莎和她的美貌以及她可能给他

的幸福，而不想想自己是不是配得上她。然而，在这迷人的夏夜，对酒当歌，草地上火光熊熊，景色无限幽美，一切似乎都是可能的，至少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很清楚那些富家子弟在同他开玩笑，拿他开心。那些先生们离开玩笑就活不下去，他们总得找个人，把他当小丑来耍弄，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当然，这些人说的全是玩笑，但是，他过去一直梦寐以求、今天仍然还在向往那个美妙少女以及她那可望而不可即的爱情，这总不能说是开玩笑。歌词说的爱情似真非真，歌词说的少女既近在咫尺，又远在天涯，犹如想象中的事，这些歌词也不能说是玩笑。在那些纨绔子弟看来，一切都是逢场作戏，包括这方面也是如此；而他却看成是真实的，而且捧为圣物，不管富家子弟的欺弄，不管酒前醉后，不管歌词如何，甚至巴莎如何，这个圣物一直放在他的心坎上。

这一切他都知道，但是，也很容易忘记，因为他现在已经心猿意马，精神分散，记忆不佳。

三年前，独眼龙爱上了那个走钢丝的德国女郎，闹得满城风雨，事情刚过去不久，现在他又堕入了情网。这下子，那些闲极无聊的有钱子弟又找到一种可以兴奋神经的恶作剧，足以使他们开心逗乐一阵子。

时值仲夏，然后秋去冬来，在这些日子里，独眼龙迷恋美丽巴莎的事满城风雨，作为笑谈，整天整夜，议论不休。他们管独眼龙叫作"新郎"或者"情郎"。白天时间，独眼龙虽然醉意未消，昏昏欲睡，但是每天照样得在铺子里给人打零工，当杂役，搬东西，再听到人家叫他这种外号，自然按捺不住，火冒三丈，但也无可奈何，只好耸耸肩膀而已。可是一到晚上，情形就不同了，扎里亚的酒店是灯火辉煌，有人嚷道："给独眼龙一瓶罗姆酒，"另

一个人好象无意似的在那里低声歌唱起来：

> 晚祷时刻，夕阳西下；而你的脸
> 也失去了金光闪闪……

在这种时刻，顿时完全是另一副心肠。什么替人打零扛活，耸耸肩膀，什么城市和酒店，他把一切都丢到九霄云外，甚至连他自己那副模样，冻得发僵，胡子不刮，衣衫褴褛，而且还是捡了别人的破烂，这些他都不放在心上了。唯一存在的只有那座高高的阳台，夕阳斜照，上有葡萄树架，那里正站着一位少女，她眼巴巴在等待着那个男子，准备向他投以艾菊花。这时候，在他的周围，可能有人在哄堂大笑，有人在恣意议论，还有人在开些粗俗的玩笑，但是这一切都好象离他很远，犹如在云雾之中，他觉得身旁只有那个唱歌的人，这个人就在他耳边低唱：

> 如果我能沐浴着阳光，
> 偎依着你，来把人间的温暖共享……

于是他在这已经夕阳西下之时，想享受一下温暖，正如他在真正太阳每天出没下面，从来没有得到过温暖似的。

"给独眼龙来一瓶罗姆酒！"

冬天的夜晚就这样度过了。巴莎在冬末的时候结了婚。这个杜切地方的刺绣女工，年纪还不足十九岁，家境贫寒，但由于天生丽质，花容月貌，竟然嫁给一个已经五十五岁的老头作偏房，这个老头名叫哈吉欧麦，住在城堡里面，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富翁。

哈吉欧麦三十年前已经结了婚。他的妻子出身于名门望族，以贤慧能干而闻名。他们在城堡后面的庄园，真是一片繁荣

富足的村落。他们在城里还开设一些铺子，建筑十分坚固，收入相当可观。但是这一切不能归功于这位态度安详、举止缓慢的哈吉欧麦，他每天只是骑着马，从城堡到城里来回转两次；这些产业主要是靠他那位机智、聪明而且总是笑容可掬的妻子在那里一手经营。她的意见在城里城外的土耳其妇女中是举足轻重的，许多事情最后都是她说了算。

不管从哪一方面说，这个家庭都是最美满、最体面的人家，但是这两位年事已大的夫妇仍然膝下无嗣。多少年来，他们还一直抱着希望，哈吉欧麦甚至到麦加圣地求过神；他的妻子周济穷人，给清真寺院许多布施。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他们的家业越来越兴旺发达，他们的财富也日增月累，可是上天一直没有降福，以遂他们的主要心愿。哈吉欧麦和他贤慧的妻子老老实实耐心忍受着他们不幸的命运。他们的后嗣已经完全绝望，因为妻子已年满四十五岁了。

哈吉欧麦将来身后这么一大笔遗产怎么办呢？不仅他的内亲和外戚为此操心，甚至几乎全城的人都在关心这个问题。有些人希望这一对夫妇终身无子，另一些人却为这样一个人后继无人，财产将分散落入几个亲属手中而感到惋惜。这些人试图劝他再娶一个年轻的妻子，因为他还为时不晚，后嗣有望。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这个城市的土耳其人意见不一，分成两派。

最后，还是哈吉欧麦那位没有生育的妻子亲自解决了这个问题。她象处理别的事情一样，态度坚决而诚恳，公开向她那位犹豫不决的丈夫提出：

“仁慈的真主把一切都赐给我们——和睦、健康和财富，我们要感谢和赞美真主；只有一件，连每个穷人都拥有，而真主却没有赏赐给我们，那就是我们没有自己的孩子，不知道我们身后

应该把这一切财物留给谁。我没有生儿育女，这是真主的意旨，我命该如此，可是你，你不应当膝下无子。我看全城的人都在替我们操心，准备为你另谋良人。既然如此，与其让他们为你觅亲，不如我自己去承担此事，因为我是你最好的伴侣。”

接着，她提出自己的方案：既然他们两人再也没有希望生男育女，那么他应当再另娶一个比较年轻的妻子，这样，后嗣还有希望。根据法律，他完全可以这样作。至于她自己，以后就作为家庭的老主妇，继续留在家里，管好家业。

哈吉欧麦考虑很久，拒不答应，说他不愿意再找一个比她更好的伴侣，也不需要另娶一个比她更年轻的妻子。但是哈吉欧麦夫人不但坚持她的计划，而且还告诉他，她已经为他挑选怎么样一个女人。既然娶亲是为了生儿育女，那当然最好是挑选一个年轻、健康、美貌，但家境贫寒的姑娘，这样的姑娘既可以为他生几个身体强壮的孩子，另一方面，她自己也会感到幸运，真心感激。她所挑选的正是杜切地方的刺绣女工的闺女，美丽的巴莎。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哈吉欧麦按照他老伴的旨意，并且在她的张罗下，同美丽的巴莎结了婚。婚后十一个月，巴莎果然生了一个胖娃娃。这样，哈吉欧麦的后嗣问题解决了，他的内外亲属的各种指望破灭了，城里的人也闭口无言了。巴莎感到幸福，老主妇也心满意足，她们两人象母女一样和睦相处。

这个幸福的结局对独眼龙却是极大痛苦的开始。这一年冬天，巴莎结婚给独眼龙带来的痛苦，成了扎里亚酒店里那些游手好闲者谈笑的主题。这个情场失意的人现在更加嗜酒如命；那些富家子弟乐于出钱请他喝酒，因为可以从中取乐，让自己笑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他们编造鬼话，恣意拿他开心，说什么巴莎昼

夜哭泣不已，为了他而忧伤憔悴，但又从来不肯向任何人透露她内心痛苦的真实原因。独眼龙听了以后，竟然疯疯癫癫，时而歌唱，时而哭泣，一本正经地详细回答别人对他提出的一切问题，哀叹自己命运不济，相貌不扬，贫穷如洗。

有一个富家子弟问他："嗨！独眼龙，你知道你比哈吉欧麦小多少岁吗？"

独眼龙愤懑地回答："我不知道，年轻又管什么用呢！"

"唉！如果单从爱情方面考虑，哈吉欧麦是不可能得到她的，我们的独眼龙也不至于落到这种地步。"有一个人在旁边脱口而出说。

对独眼龙用不着费多少口舌就可以把他弄得晕头转向。他们向他进罗姆酒，一杯接着一杯。他们不但说他比哈吉欧麦年轻英俊，更能得到巴莎的欢心，而且还说他实际上根本不是个穷苦人家。在那漫长的黑夜里，那些游手好闲的人一面喝拉基酒，一面编造历史，说什么独眼龙的父亲是一个他从未见过面的、不知名的土耳其军官。他的父亲在阿那都里地方有许多产业，原来准备留给他在维舍格列的私生子，作为唯一的继承人，承继全部产业，但是那里的亲属出面阻止履行这个遗嘱。现在只要独眼龙亲自到那个遥远富饶的布鲁士城去一趟，就可以粉碎那些假继承人的阴谋诡计，从而把他那些应得的财产夺过来。到那时候，只要把地里的草卖出去，就足以收买哈吉欧麦本人和他所有的财富。

独眼龙一边听一边喝酒，不时唉声叹气。他听了这些话心里难受，同时，他也觉得很有意思，因他在这座城市受人欺弄，而在他不认识的父亲所在的那个美丽遥远的地方，他又被人窃取了大量财产。他周围这些人竟然要为他筹划，让他动身到布鲁

士[1]去。这些玩笑开得没完没了，恶毒已极，而且说得活龙活现。

有一天夜里，他们拿了一张为独眼龙准备好的所谓旅行护照，他们把他簇拥到酒店里，把他的身子拉过来，转过去，仔细察看，然后在护照上注上了他本人的特征，对他尽情耍弄，百般取笑。另一次，他们又替他计算到布鲁士需要多少旅费，如何旅行，在什么地方过夜。这个玩笑又让他们消磨了大半个夜晚时间。

独眼龙只要没有喝醉，就同他们争辩；他对他们的话半信半疑，但怀疑更多些。确切地说，当他喝酒适量，神智清醒的时候，他什么也不信。但是一喝醉了，他对他们所说的就信以为真了，分不清什么是真的，什么是玩笑或骗人的鬼话。事实上，开始喝第二瓶罗姆酒的时候，他就感到从遥远的布鲁士吹来了一阵香风，看到而且清楚地看到这个城市的绿色花园和白色房屋。他确是生来不幸，别人对他的一切，包括家庭、财产和爱情，都要愚弄一番。谁都欺侮他，而且欺侮得够惨的，因此，无论是真主，或者是世人，可以说都对不起他。其实，他不是这个样子，也不是别人所认为的那样一个人，这一点是肯定的。所以每次喝酒的时候，随着杯酒下肚，他越来越坐不住，觉得有必要向周围的人讲清这一点，他对这一点自己心里明白，但是要向别人讲清楚又是多么不容易啊，因为他的样子以及别人对他的看法偏偏同他过不去。然而他并不死心，第一杯拉基酒刚喝下去，他就开始向每个人解释，而且彻夜不休，语无伦次，丑态百出，眼睛里还闪烁着泪花。他越解释，周围的人越奚落他，嘲弄他，越发觉得好笑。这一笑就象传染病一样，个个情不自禁，人人捧腹大笑，笑得青筋发胀，牙齿格格作响，其乐无穷，其趣无穷，胜过山珍海味，强似美酒佳肴。他们靠这种笑来消磨冬夜的无聊，也只有和

[1] 布鲁士：土耳其西北部古城名，现名布尔萨。

独眼龙在一起，他们才能更加开怀痛饮。

"去自杀吧，"梅卡加·沙拉奇对独眼龙说。沙拉奇神情冷淡，表面严肃，最善于挑逗独眼龙。"既然你根本没本事从哈吉欧麦这个老废物手里把巴莎夺过来，你不配活着。自杀吧，独眼龙，这是我对你的忠告。"

"唉！自杀，自杀，你以为我没有想过吗？"独眼龙哭丧着脸说。"我不知道有多少次到加比亚台上想跳进德里纳河里，但每次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又折回来了。"

"什么原因使你折回来呢？是害怕，独眼龙，你算了吧！"

"不！我敢在真主面前发誓，不是害怕，决不是害怕！"

独眼龙在哄堂大笑声中跳起来，拍着胸膛，把面前的一块面包掰两半，然后把面包递到冷若冰霜、毫无表情的梅卡加面前说：

"你看见这个吗？我拿这块面包和我的幸福保证，决不是害怕，而是……"

这时忽然有一个人小声歌唱起来：

而你的脸
也失去了金光闪闪……

于是大家齐声跟着合唱起来，把梅卡加的声音掩盖住了，他正在对独眼龙嚷道：

"去自杀吧！"

他们本来想刺激这个不幸的人，借以活跃气氛，尽情狂欢，但是他们这样一唱，自己也就精神兴奋起来。

这是二月的一个夜晚，他们就这样一直闹到了天亮，他们象发疯似的，把人家要弄一夜，自己也陪了一宵。他们一同从酒店

里出来的时候，天色已经大亮。他们一个个喝得红头胀脸，醉醺醺的，疯疯癫癫来到结满薄冰、行人稀少的桥上。

他们吵吵嚷嚷，放声大笑，旁若无人。他们打赌：谁敢从这条狭窄而且上面还盖有薄冰的石栏杆上走过去？

“独眼龙敢走过去。”有一个醉汉嚷着。

“独眼龙？他一辈子也不敢走过去！”

“谁不敢？我？你瞧吧，我的可怜朋友，别人不敢做的事情我就敢做。”独眼龙使劲拍着胸膛嚷着说。

“你没有这种胆量！如果你敢，你就走过去。”

“我向真主发誓，我敢过去！”

“对，独眼龙敢过去！”

“他不敢，他在撒谎！”

这些醉汉尽管身在这样宽敞的桥上，走起路来还立脚不稳，你勾着我，我勾着你，踉踉跄跄，东歪西倒，然而却在那里死劲大吹大擂，一个赛过一个。

独眼龙什么时候爬上石栏杆，他们根本不知道。突然看见他已经在他们上面摇摇晃晃地走起来了，只见他带着醉态，袒着胸，竭力在保持身子的平衡，一步一步地沿着栏杆上的石面走过去。

石头栏杆总共只有两个巴掌宽，独眼龙就在上面左右摇摆地走着。他的左边是桥，桥上是一群醉鬼，在他脚下亦步亦趋地跟着，嘴里还高声叫嚷，不断起哄，独眼龙也听不清他们到底在叫些什么。

但是他的右边空空如也，下面就是深渊，看不见的河水就在他脚底下滚滚奔流。时值凌晨，寒气逼人，河里徐徐升起一股象白色烟雾似的浓密氤氲。

这时行人稀少，但都停下步来，目瞪口呆地观看这个醉汉，放着大桥不走，偏偏在既窄又滑、下面就是深渊的石栏杆上走，而且拚命摆动两臂以保持平衡。在这群醉鬼里面，有些人不是酩酊大醉，神智多少比较清醒，这时犹如大梦初醒，脸色发青，呆呆地站在那里，凝望着这种危险的把戏；另一些则意识不到危险，他们沿着栏杆，跟在独眼龙后面，边走边嚷。为了保持平衡，独眼龙不停地左右摇摆，看上去就象在深渊上面表演舞蹈。

由于置身险地，独眼龙忽然感到自己正在离开这些同伴。他现在就象高踞在他们上面的一个庞然大物。开始时，他小心翼翼，慢步向前。笨重的鞋子在盖满薄冰的石面上不断打滑。他觉得两腿不听使唤，下面的深渊在拉着他下去，无法抵抗，眼看就要掉下去，似乎已经掉下去。

可是，情急智生，狗急跳墙，独眼龙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顿时产生了新的力量，变得从未有过的灵巧。为了极力保持平衡，他越来越弯腰屈膝，小步疾跳。这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好象不是在盖有薄冰的狭窄栏杆上小心翼翼地走着，而是在一片绿油油的草地上翩翩起舞。他忽然觉得自己置身于神虚幻境，变得轻盈灵巧起来，笨重而又疲乏的躯体似乎已经失去了重量。醉后的独眼龙仿佛长了翅膀，在深渊上面跳跃飞舞。他觉得自己的身体随着伴舞的旋律产生了一种快感，保证了他的平衡与安全。跳舞竟然比寻常走路有其更大的妙处。因此，他现在不再顾虑危险，不怕失足下水，放开脚地跳起来，一边跳，一边唱，两臂张开，象是在打鼓伴奏。

“哒啦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啦哒啦啦……”

独眼龙唱着自编的音律，随着旋律，跳啊蹦啊，十拿九稳地在通过这条险途。他弯着腿，斜着头，一会往左摇，一会往右扭。

“哒啦啦，哒啦啦……哈，哈！……”

他身居这种特殊危险的境地，高踞于众人之上，他已经不是这个城市和酒店中任人嘲笑的那个独眼龙了。他曾经千百次在这座有名的桥上嚼着面包，想跳到河里，一死了事，每次想啊想啊，最后在加比亚台的阴凉处睡着了；然而现在，这条狭窄易滑的石栏杆已经让他踩在脚下，犹如闲庭信步。

不，每天晚上在酒店里，人家冷嘲热讽地向他谈起的那个无法实现的长途旅行，他现在已经开始走上征途了。这是他实现大业的一条光明大道，道路尽头就是布鲁士古城，那里有他的真正财富和合法遗产，可以在夕阳斜照下伫立凝望他的妻儿，美丽的巴莎和孩子。

他就这样憧憬着未来，同时手舞足蹈地走过了环绕“沙发”台的那部分突出的桥栏杆，然后又走完了桥的另一半。到了桥头，他纵身跳到大道上，环顾前后左右，心情无比激动，这样惊险的历程竟然走过来了，现在已经安然无恙地站在自己熟悉的维舍格列城的大道上，自己也不禁惊讶不已。一直跟在他后面喊叫、鼓动、说笑的那一群人，这时候立刻迎上前去。那些惊恐发呆、站在原地不动的人，这时候也都跑了过来。大家都去拥抱他，拍他的肩膀和他头上那顶褪色的土耳其帽，齐声叫好，一片欢腾。

“了不起！独眼龙真是一只小雄鹰！”

“了不起啊，胜利者！”

商多·巴波以为还是在酒店里似的，他带着西班牙口音，声音嘶哑地嚷道：“给独眼龙来一瓶罗姆酒！”同时，他就象让人家钉在十字架上似的，张开两臂。

在大家这样前推后拥的时候，有人提议大家不要分散回家，而去继续痛饮，为独眼龙庆功。

这天清晨，有些八九岁的小孩，急急忙忙地从这座结有薄冰的桥上走过，准备到远处的学校去上课，他们也都停下步来，观看这种奇景。他们一个个张口结舌，嘴里呵出白色的水气。这么小的孩子，身上穿得十分暖和，腋下夹着石板和书本，对大人们的这种游戏莫名其妙，但是这种游戏，连同独眼龙的形象以及大桥的雄姿却永远留在他们的心坎中。他们一生都忘不了这个人所共知的独眼龙出奇地摇身一变，变得轻盈灵巧，竟敢在禁止行人，一般也无人攀登的地方雀跃疾走，而且若无 其事，面带喜色。

第 十 六 章

自从第一批奥国的黄色汽车驶过大桥到现在，已经是十来年了。占领下的二十年，那是漫长的岁月，无数的日日夜夜。如果从每一天、每一个月单独来看，似乎是短暂的，不说明什么。但是，如果这些日月加在一起，它却构成这个城市记忆中比较最长的安定时期和物质进步时期，占领时刚刚成年的这一代人，他们的大部分生命，也是在这个时期度过的。

这些年代，表面上是繁荣的，人们的收入往往不多，但却有保证。母亲们一谈到她们的儿子就说："但愿他健康地活着，并愿真主保佑，让他生活富裕！"那个照管城市路灯的高个子费尔卡，每月从市政府那里领得十二盾薪水，他的妻子逢人便说："感谢真主，我的费尔卡在市政府里做事。"

十九世纪最后的年代就这样过去了，这些年代风平浪静，

没有发生重大事件，如同一条平静的河水，滚滚而流一直到某处河口为止，没有出现波折。十九世纪最后那几年，欧洲各国人民生活中，似乎完全听不到发生什么悲剧，大桥旁边这座城市也同样听不见。当世界某地发生某种悲剧，或许会传到我们的耳朵，或许消息永远停留在遥远的地方，我们压根儿不知道。

经过这么多年，忽然在这一年夏天，有一天，加比亚台上又出现了一张白色的公告。公告非常简短，但周围镶着很宽的黑边，内容是宣告伊丽莎白皇后在日内瓦遭到意大利无政府党人吕舍尼暗杀，不幸身死。公告接着提到奥匈帝国各族人民对这件事情的愤慨和沉痛，要求他们作为忠实的臣民，加紧团结在皇室的周围，这对于遭受命运沉重打击的君主将是极大的安慰。

这张公告象当年菲利普维奇将军宣布占领的文告那样，也是贴在刻有土耳其文的白色石碑下面，人们多少怀着激动的心情来读这张公告，但是，由于死者不过是一位皇后，一位女人，所以大家并没有真正寄予同情和感到沉痛。

接连几个夜晚，加比亚台上听不见歌声和欢乐的声音，因为当局命令禁止一切娱乐。

城里只有一个人，对这个噩耗感到严重震惊，这就是毕特罗·索拉，他是维舍格列唯一的意大利人，既是承包工又是瓦匠、石匠兼油漆匠，总之，是这个城市的能工巧匠。全城的人都称呼他为伯罗师傅。他是在占领的时候来这里安家落户的，娶了一个妻子，名叫斯达娜。她是一个年轻的穷姑娘，但是名声不佳，褐色头发，身体粗壮，个子比他的男人高一倍，大家都知道她的嘴巴厉害，拳头也厉害，最好不要同她干架。而伯罗师傅身材瘦小，弯腰驼背，性情和善，长着一双温和的蓝眼睛，留着两撇下垂的胡子。他干活很出色，钱也赚得很多。由于天长日久，他已

经成了道地的维含格列市民；不过他象罗蒂卡一样，总是学不好当地的语言和口音。城里人都喜欢他，因为他有一双巧手，性情又温和；他的妻子身体强壮，看上去象个田径运动员，生活上对他管得很严，就象管自己的孩子一样。

那天，伯罗师傅干完活儿，身上沾满了石头的粉末和颜料的斑点，当他路过加比亚台，读完那张公告以后，他把帽子一直拉到眼睛上面，拚命咬着那根老是叼在嘴上的小烟斗。每次遇见一个正人君子时，他就向对方表白一番，说他虽然是个意大利人，但是和这个吕舍尼及其滔天罪行毫无关系。人家听了以后，总是对他进行安慰，相信他绝不会干这种事，而且谁也不会这样去想。尽管如此，他还是见了人就要自我表白一下，说什么感到活着有愧，说他一生从来没有杀过一只鸡，更不用说是杀一个人了，尤其是一个女人，而且还是这样一位大人物。

最后，他的害怕变成了真正的精神病。他那种庸人自扰的无谓担心，那些表白自己与罪犯及无政府党人风马牛不相及的多余废话，城市居民都深感可笑，对他进行嘲弄。城里的小孩马上想出一个恶作剧：他们藏在一些栏杆后面，在他经过的时候，就大声叫喊："吕舍尼！"这个胆小鬼害怕听见这些喊叫，把帽子拉到眼睛上面，好象后面有一群看不见的马蜂在追他，拚命跑回家里，一头栽进他妻子的宽阔的怀抱，呜呜咽咽地诉起苦来。

"我真惭愧，我真惭愧，我对任何人都不敢正眼相看。"这个小矮人哭着说。

"喂，傻瓜，你有什么可惭愧的？因为一个意大利人杀害了皇后吗？那应当是意大利国王感到惭愧。而你是谁，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感到惭愧？"

"我就是活着都感到惭愧。"伯罗师傅向他的妻子诉苦说。他

的妻子晃动他的身子，竭力让他鼓起勇气，抱定决心，叫他经过城里的商业区时，要昂首挺胸，不管见了谁，要目光正视，不要不敢看人。

当时，在加比亚台上，有些上了年岁的人坐在那里，毫无表情，眼皮低垂，正在倾听报纸上有关奥国皇后被刺的消息。他们借此机会来畅谈帝王们和大人物的命运。维舍格列的神学院院长于赛恩埃芬蒂正在对商业区的一群好奇而愚昧的阔人解释什么叫做无政府党人，以及哪些人是无政府党人。

这位神学院院长同二十年前在加比亚台欢迎第一批德国佬的时候一模一样，还是那样挺着身子，神色庄严，修饰得很干净考究。当时和他一起欢迎德国佬的，还有穆拉·伊布拉伊姆和正教教士尼古拉，这两位老教士早已在各自的坟墓中安息了。

他的须髯已经白了，但始终还是精心修剪，成椭圆形状；他的脸庞还是那样安详、光滑，因为思想感情顽固的人不容易衰老。他那自命不凡的劲头，二十年来有增无减。就拿他那一箱子书籍和他所撰写的大事记来说吧。他之所以赢得学问渊博的美誉，主要是靠他拥有这么一箱子藏书，可是，他一直搁在那里，也不阅读。至于他所写的本城大事记，二十年来，一共才增写了四页。因为，随着他的年事增高，他对他本人和大事记本身看得越来越高，而他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却越来越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这时候，他正低声地、慢条斯理地在发表意见，听起来象是在读一篇看不清楚的手稿似的，而且态度庄重严肃，一本正经。他只是把这位“异教徒”皇后的不幸遭遇作为高谈阔论的资料，丝毫没有把他那一套高论和这个不幸事件真正联系起来。按照他的见解(实际上不是他自己的，而是从他过去的老师，有名的阿拉普霍扎遗留给他的旧书中找出来的)，所谓无政府党人，不

但过去始终存在，而且将来一直到世界末日，也还有无政府党人。这是至尊无上的真主给人类生活所作的安排，因为一分福总是包含着两分祸，在这个世界上，乐善好施，不可能不引起怨恨，飞黄腾达，不能不招来妒忌，正如没有一样东西，无论多么细小，不会没有阴影似的。那些特别伟大、虔诚和著名的人物，尤其是如此。这样的人物，当他们正在显赫一时，这时候，就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有时候刽子手下手早一些，有时候下手晚一些。

神学院院长指着白色公告上面的石碑说："例如我们的同胞穆罕默德巴夏，他侍奉过三位苏丹，比阿沙夫①还要聪明。由于他的权力和他的善心，建立了我们脚下的这座石头建筑，可是他早已升天了。他也是死于无政府党人的刀下。他的权力和智慧，也没能使他避免这一时刻。因为那些遭到大丞相的反对，无法实施自己计划的人们，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党派，他们想办法收买一个疯癫的托钵僧，给他凶器，叫他刺杀大丞相，事情正是发生在星期五中午，大丞相出来祈祷的时候。那个托钵僧披着一件旧外衣，手里拿着念珠，挡住大丞相的随从，然后装出一副可怜样，向大丞相乞求布施。当大丞相把手伸进口袋里，准备周济他的时候，他把大丞相一刀刺死。穆罕默德巴夏就这样成为殉教者。"

大家一边听他说，一边从嘴里喷出雪茄烟雾，一会看看刻有土耳其文的石碑，一会望着镶有黑边的公告。他们虽然不能句句理解，但是都聚精会神在听。他们的目光随着雪茄烟雾，越过石碑和公告，向远处眺望，脑子却在想象世界上遥远的地方还有另一种和他们完全不同的生活，这种生活既有青云直上，又有一

---

① 伊斯兰教传说中的一位宰相。

落千丈，既有飞黄腾达，又有悲惨结局。这种生活，得失相抵，同他们在加比亚台这种平静单调的生活正好平衡。

光阴易逝，这些日子终于过去了。加比亚台又恢复往常的情景，谈笑风生，纵情歌唱。关于无政府党人的问题也不谈了。那张宣布一位陌生外国皇后死讯的公告，由于日晒雨淋，沾染尘埃，已经褪了颜色，随后，一阵风把它撕成几块，纸片随风飘扬，散落在河岸一带。

在一个相当时期内，那些小无赖一直跟在伯罗师傅背后喊"吕舍尼！"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样喊叫，他们完全是出于小孩作弄心理的驱使，欺侮那些软弱可欺、神经衰弱的人。他们嚷了一阵，到后来也不嚷了，因为他们找到了别的游戏。另一方面美以当山上的斯达娜也起了作用，她把两个喊得最凶的淘气鬼狠狠地揍了一顿。

一两个月以后，没有人再提起皇后之死和无政府党人的事。十九世纪末叶，生活的狂澜似乎永远被制服住了，它成了宽阔平静的河流，正在沐浴着整个大地，人们感到已经进人了安居乐业的新纪元，这个纪元将千秋万代，永无尽期。

外国统治者所作的坚持不懈的努力，虽然给我们的人民在收人和福利方面带来好处，但是，对他们的这一套做法，总是格格不人。二十年来，他们大大改变了这个城市的市容、装束和风气；当然，他们对那座永不改观的古老大桥，自然也不放过。

一九〇〇年，幸福的世纪结束，新的世纪即将开始，许多人想象并感到这个新世纪会更幸福。就在这一年，又来了一些工程师，他们对这座大桥进行考察。大人们对这样一些人已经司空见惯了，小孩子也知道这些身穿皮外套，外衣口袋装满各种颜色铅笔的人，在山前山后或建筑物周围转来转去是什么意思，那

总是有些东西要拆除、兴建、挖掘或改造。不过，谁也无法估计这些人对这座大桥准备怎么搞，因为在全城所有的人看来，这座大桥是永恒不变的东西，它和脚下的大地以及头上的青天一样，都是永不改变的。

工程师们在桥上转来转去，进行测量，做些记录，然后走了，人们对这件事情慢慢地忘记了。可是到了仲夏，这是水位最低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些承包工和工人，他们开始盖一些临时工棚，准备存放工具。大桥整修的消息刚传开来，桥墩的周围就已经搭起了脚手架，桥上安装了绞盘；工人们借助这些设备，沿着桥墩来回穿梭，就象在一个狭窄的木头阳台上走动一样，他们见到裂缝或者长出野草的石缝就停下步来。

工人们把裂缝补上，把野草拔掉，把鸟窝拆掉，然后，就开始修理受到河水侵蚀的桥基。由于河流改道，河水断流，所以，可以看到受到侵蚀并且发黑的石块和几根陈旧的橡木桩，这些木桩在水里泡了三百三十年，已经都变成化石了。那些不知疲倦的吊车，把水泥和石子一箱一箱往桥下送，把桥中那三个遭受急流冲击最大的桥墩下面的桥基都填满了，就好象把坏牙的牙根堵住一样。

这个夏天，人们不能到加比亚台上去闲坐，大桥周围的一切正常活动也停止了，因为这些地方都让运输水泥与沙子的马匹和车辆占满了。到处可以听到工人们的叫喊声和工头们发号施令的声音。此外，加比亚台上还到处堆放了许多木板。

城市居民看了大桥的修缮工程，显出惊讶、困惑的样子。有些人乘机开几句玩笑，另一些人只是把手一挥，继续走他们的路，不过，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认为这些外国人不管进行什么工程，都只是因为他们须干点事情，这是他们的一种需

要，否则，就活不下去。大家心里都有这种想法，但是，谁也不加评论。

过去经常在加比亚台上消磨时光的人，现在都去光顾罗蒂卡酒家或扎里亚小酒店，或者就坐在大桥附近商店的木头门窗前面。他们在那里喝咖啡，瞎聊天，等待攻打大桥的战役结束，加比亚台重新解放出来，就象等待阵雨或其他麻烦事情过去一样。

阿里霍扎的商店是介于石头旅舍和扎里亚酒店之间，从这个商店可以看到大桥侧面。这天大清早，有两个没有事干的土耳其人在他的店铺前面闲聊，主要在谈论这座大桥。

阿里霍扎听他们谈话，自己一声不吭，心里很不愉快，另一方面，他若有所思地望着桥上那些工人象蚂蚁般在那里忙碌不停。

二十年来，阿里霍扎结了三次婚。现在的妻子比他年轻得多，商业区里好说闲话的人说，怪不得他上午总是脾气烦躁。三个妻子所生的孩子，现在还活的就有十四个。这些孩子整天在家里吵闹，简直把他的耳朵震聋了。商业区的人开玩笑说，阿里霍扎连自己有些孩子的名字都叫不出来；他们甚至还编出一段故事，说他有一次在一条小巷里遇见他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拿起他的手来要吻它，而这位霍扎竟然抚摸这个孩子的头说："早安！孩子，你是谁家的孩子啊？"

阿里霍扎外表上没有太多改变，只不过比过去胖了些，脸上没有以前那样红润。现在走起路来也不象以前那样矫健轻捷，每次回家，走上美以当山坡的时候，步子也比过去慢了，因为，最近一个时期，他的胸口常有压抑的感觉，甚至睡觉的时候，也感到心慌气闷。为此，他去请教城里的一位医生，这位医生叫马罗

夫斯基，是占领后的外乡人，在所有外乡人里面，阿里只认识他一个人，并且对他很尊敬。马罗夫斯基大夫给他一点药水，这种药水不能把病治好，只能使病痛和缓。他从这位大夫那里还学到了他的拉丁文病名，叫做 angina pectoris①。

城里有几个土耳其人，对外乡人带来的任何新事物，以及他们进行的任何改革，都丝毫不肯接受，阿里霍扎也是其中之一，无论在服装、思想、语言方面，还是在商业事务方面，他都丝毫不肯改变。他过去曾经强烈而顽固地起来反对毫无希望的抵抗，这些年来，他也以同样的劲头，竭力反对任何德国的或其他外国的东西，反对周围日新月异的种种事物。因此，他有时候就同人家干起架来，最后让警察局罚了款。他现在已经身体渐衰，精力不足了。实际上，他的性格还是同当年在加比亚台和卡拉芒利亚进行辩论的时候一样，也就是说，他一直是头脑顽固，对任何问题都有偏见。所不同的就是他过去那种说话直爽的性格已经发展到出口伤人的程度了，过去那种斗争性已经变成忧郁沉闷了，因为任何大胆粗鲁的语言都无法表达，只有孤独沉默才能使自己平静下来。

阿里霍扎越来越经常陷于沉思，在这种时刻，他什么人也不需要，如果有人在他面前，无论是商业区的闲人，顾客，还是他那个年轻的妻子，或者是他那一大帮闹翻了天的孩子，他都感到厌烦，难以忍受。每天日出以前，他就离开家里，上他的铺子，因此他的店门比哪一家商店都开得早。他在自己的店里做祈祷，午饭也让人家给送去。当他对闲聊、行人和生意感到厌烦的时候，他就关上店门，退到店后，躲在他那个所谓"棺材"的小房间里。

① 心绞痛。

这个小房间又低又暗，狭小僻静，阿里霍扎一个人进去，就等于把这个小房间装满了。房间里面有一个木板座位，上面铺着毯子，一个人可以盘腿坐着；里面还放了几个货架、空盒、旧砝码以及铺子里面搁不下的一些小东西。从这个狭小阴暗的地方，他可以透过店里的薄墙，听到商业区里各种熙熙攘攘的声音、马蹄声和小贩的叫卖声。在他听起来，这些声音就象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似的。他甚至可以听得见某些行人停在他关闭的铺子门前，在对他尖刻议论，冷嘲热讽。他听了以后，也无动于衷，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人已经都是死人，只不过还没有完全寿终正寝罢了，因此他一面听，一面就忘记了。四周的板壁把他与外界隔绝，使他完全不受外界生活的影响，因为，按照他的观念，这种生活早已腐化变质，走上邪路了。这位阿里霍扎在这里面悠然自得，可以独自一人去思考世界的命运和人间世事的变迁，而把其他都置之脑后，什么商业区，什么欠债，那些欠账不还的坏佃农，他的那位年轻的妻子（她的青春和美貌忽然使她变得脾气很坏，蛮不讲理），还有那一大群孩子，即使有苏丹皇帝的家产，也感到是个沉重负担，使他一想，就不寒而慄，如此等等，他都不去想它了。

阿里霍扎休息一会，脑子清醒过来以后，他又放下铺子的百叶窗，开了店门，仿佛他刚从别处回来似的。

这时候，他开始倾听旁边那两个土耳其人的空洞无聊的对话。

其中一个人是商业区里最有名的大闲人，他一面喝着阿里霍扎的咖啡，一面发表高论："你现在可以看到时间和上帝的恩赐，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时间把石头都腐蚀了，正如鞋子把袜子磨坏一样。然而，德国佬不允许这样下去，而及时地对损坏的

东西进行维修。”

另一个人和第一个人一样，也对这些事情操心，他说：“管他呢，我可怜的朋友，只要德里纳河还是德里纳河，大桥也还是大桥。就是他们不去修补这座桥，它注定要存在到什么时候，照样会存在到什么时候。这完全是劳民伤财，毫无用处。”

如果阿里霍扎不打断他们的谈话，这些无聊的争论还会无尽无休地继续下去。

“至于我，我可以对你们说，他们触犯这座桥是不好的；这种修缮工程没有任何好处，不信你们走着瞧吧。因为他们今天既然可以动手修桥，明天同样也可以动手拆桥。已故的穆拉·伊布拉伊姆对我讲过，他从书本里知道，惊动活水使它改道，哪怕只是一天一个小时，也是一桩很大的罪过。那些德国佬如果不对一些东西敲敲打打，挖挖凿凿，他们就觉得活不下去。他们甚至对眼睛都要敲动敲动。如果他们做得到，甚至会把整个大地都翻过来。”

这两个闲人中有一个说，总而言之，那些德国佬进行修桥，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无论如何，即使这样做不能延长大桥的寿命，至少对它也没有坏处。

“你怎么知道他们这样做不会给大桥带来不好的后果呢？”阿里霍扎气冲冲地插嘴说，“谁对你这样说的？你知道不知道，一句话就可以使整个城市成为废墟，何况这样大兴土木呢？真主创造的这个世界是完全建立在他的圣体上的。如果你是个有教养、有学问的人——可惜你不是——那么，你就会知道这座建筑物和别的不一样，它是出于对真主的爱和按照真主的意旨而兴建起来的。某一个时期，某一些人把它建造起来，换一个时期，换一些人也可能把它拆毁。你知道老人们关于石头旅舍是怎么

说的吗？整个帝国就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旅舍，可是，谁把它毁掉了呢？从坚固程度和建筑技术来看，它本来可以存在一千年，然而，它竟象蜡做的那样化为乌有，在它的原址上，如今却是那些蠢猪在哼哼叫，德国佬的军号在哒哒响。”

“可是，我认为……”另一个人答辩说。

“你错了，”阿里霍扎打断他的话。“按照你的说法，那就无所谓建设，无所谓破坏了。你是不懂得这里面的道理的。不过，我要告诉你，现在这一切无论对这座大桥，还是对这个城市，对我们这些亲眼目睹的人，都是个不好的预兆，都没有任何好处。”

“是的，说得很对。阿里霍扎对大桥的了解，比任何人都清楚。”另一个人不耐烦地插了一句，这一句是在挖苦他，暗指霍扎当年在加比亚台遭受过种种痛苦。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阿里霍扎很自信地说，接着，他开始心平气和地讲述他常讲的一个故事。城市居民对他的故事虽然都不当一回事，但总是屡听不厌。

“从前，我的先父听舍克·德狄埃讲过，我小的时候，他又讲给我听，因此我知道世界上的桥梁是怎么来的，第一座桥梁又是怎样建成的。当万能的真主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大地平整光亮，象一个雕刻精美的盘子一样。可是魔鬼心里不高兴，它妒忌真主对人类如此恩赐，因此，当整个大地刚刚从真主手里塑造出来，又湿又软的时候，魔鬼就偷偷地跑到这个世界上来，在真主所创造的地面上，死劲用它的爪子抓了许多道很深的痕迹。这样就形成了许多江河和深谷，把大地分割成好几块地方，把人也分隔开来，使他们无法到别的地方去，那些地方本来是真主赐给他们的生活园地。真主看到他的造物让该死的魔鬼糟蹋成这个样子，虽然也感到痛惜，但是也不可能再重新创造，只好派遣他

的天使来帮助人类，给人类提供方便条件。当那些天使看到可怜的人类无法通过这些江河深谷去完成他们需要做的事，而只是隔岸相望，互相呼唤，心急如焚，毫无办法，于是天使展开翅膀，搭在江河深谷上面，让人类从她们的翅膀上面走过。这样，人类就从真主的天使那里学会了如何造桥。除了开凿泉水之外，造桥可以说是最大的天福，而随便去触动桥梁就是极大的罪过，因为任何一座桥，无论是山沟急流上面的一根简单的独木桥，还是穆罕默德巴夏的这座壮丽的工程，都有一位天使在守卫维护着，只要真主决定让它存在多长时间，它就会巍然屹立多长时间。”

“啊，我的真主，我的真主！”这两个人毕恭毕敬地赞叹一句。

他们这边在这样闲聊度日，那边桥头的工程也与日俱增地在进展，桥上不断传来小车的吱吱声和机器搅拌水泥与沙土的咯咯声。

在这一类争辩中，最后总是这位阿里霍扎有理，因为谁都不愿意、也不可能同他争论到底，何况这两个游手好闲的大草包，他们喝的又是这位阿里霍扎的咖啡，而且心想明天还要到他店里来消磨消磨时间。

阿里霍扎对每一个上他铺子来的人都是这样大谈一通，不管是来作买卖还是偶然路过。表面上，人家都聚精会神在听他讲，其实是出于好奇，拿他开心；城里没有一个人同意他的意见，对于他的悲观论调和阴暗的预感，谁也无法理解，因为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也拿不出根据。大家早已知道阿里霍扎是个头脑顽固的怪人，加上这些年来的艰苦环境和年轻妻子对他的刺激，现在他对一切都看得一团漆黑，对任何东西都感到神秘莫测，凶多

吉少。

城市大部分居民对于这些年来，外国人在城里和郊外所进行的一切改造，表现得漠不关心，同样，对这次大桥的工程，他们也没有放在心上。许多居民还为大桥运送沙子、木料或者替修桥工人送饭，从中挣点钱来维持生活。只有那些小孩感到失望，因为他们看见工人们从架设的木架，穿过中央桥墩的阴暗洞口，钻进了那个“暗室”里去，孩子们都普遍相信那里面住了一个阿拉伯黑人。只见工人们从这个暗室出来，把一筐筐鸟粪扔到河里，别的什么也没有，那个黑人也始终没有出现。这些孩子们因此而经常上课迟到。他们在河岸上等了好几个钟头，希望看到那个黑人从黑洞里跑出来，对准首先遇到的工人的胸膛，狠揍一拳，使这个工人从活动的脚手架上一个觔斗掉进河里。可是，并没有这回事，希望都落空了，所以孩子们非常扫兴。有些较小的孩子编出一套，瞎说真有其事，但漏洞百出，使人难以置信。大的小孩故意逗弄他们，他们还赌咒发誓，最后也没有人相信。

大桥的维修工程刚告结束，又着手进行引水工程。到目前为止，城市用水都是依靠木制水槽，其中只有两个是在美以当山上，提供泉水，其他水源都在城里的低洼地方，有的水源与德里纳河相通，有的和撒夫河相通。只要有一条河的水突然上涨，水源就变浑浊；每当夏季盛暑，河水低落，水源就枯竭。工程师们认为这个城市的饮用水很不卫生。现在开辟了新水源，它是从德里纳河对岸很远的卡贝尔尼克山峰下面的高山引过来的，水管必须穿过大桥，然后才进入城市。

桥上又开始一片沸腾。桥上的石板一块块掀起来，正在挖掘一条自来水管道。同时，还燃起火堆，把沥青加热，把铅熔化。城市居民带着怀疑和好奇心站在旁边观看；阿里霍扎看到烟雾

穿过广场，吹进他的铺子，他皱起眉头，带着轻蔑的口吻在谈论这种用铁管子输送的"异教徒的"新水，说这种水既不能用来喝，也不能用来行洗礼，如果他还象以前有几匹良种马的话，那么，连这些马也不会喝这种水。他嘲笑罗蒂卡，因为她的酒家安装了这种自来水管。他对所有愿意听他的人竭力说明这个引水工程只是各种灾祸降临的一个先兆，这个城市势必在劫难逃，不过时间早晚而已。

第二年的夏天，水管安装好了，这件工程同以前其他工程一样，也是胜利完工，按期实现。铁制龙头哗哗流水，而且干净清洁，不受任何水旱灾害的影响。许多居民的院子里都装上新自来水管，有些人甚至在自己房间里面也装上水管。

同年秋天，开始建造铁路。这是个时间较长的大工程。老实说，乍一看这条铁路和大桥没有什么关系。其实，这种看法是很表面的。

报纸和官方文件都把这条窄轨铁路称为"东方铁路"，它将把萨拉热窝和塞尔维亚边境上的瓦尔狄士德以及从土耳其桑甲克边境上的诺维巴扎尔到乌瓦一带连接起来。维舍格列城将是这条铁路的必经之地和最重要的车站。

当时，世界上已经有许多文章或谈话，提到这条铁路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提到奥匈帝国急于要吞并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准备将来通过桑甲克伸展到萨罗尼加，此外，还提到与此有关的其他各种复杂问题。可是，在这座城市里，仍然还披着一张善良甚至迷人的画皮：新来了好多承包商，新增加了大批工人，给许多人提供了新的赚钱机会。

这一次，工程的规模巨大。这条一百六十六公里长的铁路，造了一百来座大桥连带铁道桥，大约一百三十条隧道，耗费了七

千四百万克朗，工程进行了四年之久。人们一面叨念这个惊人的数字，一面眺望远方，似乎想要看到这笔无法计算、无法想象的巨款在远处堆积成山。"七千四百万！"许多维舍格列人假充内行，老是念叨着这个数字，好象这些钱都是他们经手似的。因为，这个三分之二生活方式还完全在东方式的穷乡僻壤的小城里，人们已经开始迷信数字，崇拜统计了。"七千四百万，那就是每公里将近五十万，精确地说，每公里四四五，七八二．一二克朗。"他们就这样口口声声叨咕这庞大的数字，可是他们的生活也并不因面更富裕一些，提高一些。

在修建铁路期间，人们开始感到挣钱已经不象占领后那几年那样方便牢靠，不用发愁了。最近这几年，物价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已经猛涨过几次了。而且物价一经上涨，就再也落不下来，这还不算，过一个相当时期，它还再往上猛涨。当然，钱照样没有少挣，但是收入比实际需要至少低百分之二十。这是一套阴险毒辣的手段，它正在坑害越来越多的人，不过，人们对此也毫无办法，因为它的根子是在遥远生疏、鞭长莫及的地方，与占领初期出现的一片兴旺景象，都是出于同一源流。那些占领以后十五至二十年以前的暴发户，现在许多都成了破落户，他们的子弟都到别的人家去干活。当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暴发户，但是他们手里的金钱就象水银那样滑走了，到头来，犹如一场春梦，两手空空，声名狼藉。

第四年的夏季，第一列装饰着绿叶和彩旗的火车通过了这座城市。全民一片欢腾，个个兴高采烈。当局还招待工人们大吃一顿，大喝啤酒。工程师们在第一个火车头旁边照了像。这一天，大家可以免费乘车。"一天免费，终身要钱。"阿里霍扎讽刺那些免费乘坐第一次列车的人说。

铁路建成，开始通车以后，这时候，大家才看出这条铁路对这座大桥本身，对大桥在城市生活中的作用以及对大桥的命运发生了什么影响。这条铁路沿德里纳河而上，顺着美以当山下的险坡，穿山而过，绕过城市，直下平原。在撒夫河畔，在城市最边远的那几座房屋旁边，就是火车站。所有运往萨拉热窝和通过萨拉热窝运往西方各地的旅客与货物都从德里纳河右岸出发。左岸和连接左岸的大桥则完全陷于瘫痪状态。现在，只有从左岸乡村来的人才走这座大桥，他们都是些乡下人，拉着超载的小马，赶着牛车或马车，把森林里的木材运到火车站去。

从大桥穿过利埃斯卡山地通往塞麦奇，再从塞麦奇，经过哥拉西那与鲁马尼直到萨拉热窝的路上，以前可以听到马车夫的歌声和马匹的铃铛声，现在开始长了野草和一层薄薄的青苔，这是废弃的道路或建筑物的必然现象。现在旅行时已经不走这座大桥了，因而，也看不见有人在桥上向人告别，看不见有人骑马过桥，在马上喝饯别酒了。

马车夫、马匹、带棚骡车以及过去到萨拉热窝时乘坐的旧式小马车，现在都没有事干了。这一段路，以前旅行一趟，整整需要两天时间，中途还要在罗加蒂扎过夜，现在只要四个小时就够了。这些数字，发人深思。大家兴奋地计算这个速度给人们带来了多少好处，节省了多少钱。他们看到第一批维舍格列人到萨拉热窝去料理些事情，当天晚上就回到家里，感到惊奇不已。

只有这位阿里霍扎例外，任何时候，对任何问题，他都抱有怀疑，固执己见，直言不讳，意见与众不同。一般人对于这种速度加快都感到高兴，而且还计算实际上可以节省多少时间、人力和费用，可是阿里霍扎却很不高兴地对他们说：关键不在于节省多少时间，而是如何利用这些节省下来的时间；如果一个人

利用时间去干坏事，还不如没有这份时间。他竭力说明一个人主要不是在乎走得快，问题在于到哪里去，去做什么，因此快并不一定就是好。

“如果你是上地狱去，那还不如慢一点好。”他用挖苦的口气对一个年轻商人说。“如果你以为德国佬花这么多钱，送来了火车，只是为了你旅行和做生意时可以跑得快些，那你是太愚蠢了。你只是着眼于自己旅行方便，而不想想火车除了运送你以及象你这样的人以外，它还运走了什么，运进了什么。你是不会去考虑这些的。旅行吧，老兄，你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不过，总有一天，恐怕你会后悔莫及。到时候，德国佬会用火车把你送到你不愿意去、而且根本想不到的地方去。”

每次听到火车要绕开石头旅舍那边的山坡时所发出的汽笛声，阿里霍扎就双眉紧锁，嘴里唠叨几句，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然后通过门窗，侧面望着这座石桥，脑子里反复在想：一句话可以使巨大的工程建立起来，那么，一声汽笛也可能决定整个城市和居民的安危存亡。这个身体疲惫、心事万千、突然衰老的人，对于眼前这些事物，至少会产生这样的感想。

不管什么问题，阿里霍扎的想法总是与众不同，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一样，人家把他看成一个怪人，一个想入非非的人。老实说，那些乡下人对铁路也不很习惯。尽管他们也在利用铁路，但对它还很不熟悉，不知道铁路运输的特点和规律。天色微明，他们就从山上下来，太阳升起时，他们就到城里了，一看见店铺，他们就着急地向店里的人打听：

“机车开走了吗？”

“你昏了，我的老兄，机车早已开走了。”那些撒谎不脸红的无聊商人对老乡这样回答。

"你能对真主发誓吗？"

"明天还会有一趟车呢。"

这些老乡又急急忙忙往前走，看到前面慢慢在走的妇女和孩子，他们疾步追上，边走边向人家大声喊问。

他们就这样飞也似地奔到车站，车站的职员叫他们放心，说人家在骗他们，离开车时间还有三个多小时呢。于是他们喘了口气，在车站的墙边坐了下来，把身上背的袋子放下来，就在那里吃饭，聊天或者打盹，但始终不敢熟睡，只要听见什么地方有一列货车发出汽笛声，他们就一个个跑了起来，拉着他们的东西边跑边嚷：

"快起来，车子开了！"

站台上的职员拉住他们，把他们都推了出来。

"我不是对你们说过吗，离开车时间还有三个多钟头呢。你们往哪儿跑？你们都疯啦？"

他们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重新坐下来，但心里总在那里嘀咕。一听到汽笛声，或者有一点风吹草动，他们又一个个跳了起来，一起拥向站台，然后又让人给推出来，叫他们耐心等候，注意听通知。尽管人家向他们保证，他们还是不放心，因为在他们想象中，德国佬创造发明的这种"机车"简直是一种神速、奥秘、令人捉摸不定的玩意儿，只要稍不留神，一眨眼工夫就无影无踪了。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骗人的把戏：人家只想如何骗过这些乡下旅客，让火车开走，把他们甩下。

乡下人的愚昧无知，阿里霍扎的满腹牢骚，都仅仅是一些细小的插曲，事后作为笑谈而已，人们对铁路那一套很快就习惯下来，正如对其他新颖、方便、舒适的设备也很快就适应一样。至于大桥，人们还一如既往，继续上那里去蹓跶，逍遥自在地坐在

加比亚台上；平时有事，需要过桥，还照样从大桥走，但是，外出远行，人们则接受新时代所赋予的旅行路线和交通工具。过去经过大桥的那一条路，已经不再通往世界各地，大桥本身，也已经不是当年衔接东西方的枢纽了，这种情况，人们很快又很自然地习以为常，更确切地说，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点。

然而，大桥始终巍然不动，永葆青春，因为它是人类精心设计的完美杰作，永远不会衰败或褪色，至少不象世上昙花一现之物那样匆促夭逝。

第十七章

在大桥旁边，与大桥休戚相关的这座城市里，新时代的果实已经成熟。一九〇八年来到了，随之而来的是形势出现了动荡不安，一种阴霾的气氛开始不断威胁着这座城市。

事实上，这种变化，早在本世纪初，在修建铁路那个时期，就已经开始了。由于物价上涨，纸币、股息和硬币忽涨忽跌，人们对此虽然不知其所以然，然而不能没有感觉，所以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起政治来。

在这以前，这个城市的居民只是关心自己眼前切身利益，例如挣钱养家、消遣娱乐之类，总而言之，只是关心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区乡、自己的城市、自己的教会，而且还只限于与自己直接有关的问题，对于过去想得不多，对于将来也看得不远。而现在，他们谈论的问题，越来越超出过去所关心的范围，眼界越来越开阔。萨拉热窝建立了一些塞尔维亚的民族党派以及穆斯林

的宗教组织，接着，维舍格列很快成立了这些党派组织的分支。最初是塞尔维亚人建立组织，其次是伊斯兰教徒，最后是犹太人。萨拉热窝还创办报刊，这些报刊也运送到维舍格列。书报阅览室和宗教合唱团纷纷建立起来。到维也纳和布拉格上学的大中学生回家度假，他们带来许多新的书籍、小册子，发表了新的言论。他们用自己的行动教育这个城市的年轻人，不要象长辈那样，老是把自己的想法放在心里，保持沉默，不敢说话。新的组织名称不断出现，有宗教组织，也有民族组织，组织范围越来越广泛，提出的目标越来越大胆明确，最后出现了工人组织。这时候，城里第一次听到了“罢工”这个词。那些年轻人的表情都很严肃，每天晚上，他们都上加比亚台，在一起交谈问题，谈话内容别人也无法听懂。他们还互相交换阅读小册子，这些小册子都是些活页，未经装订，上面的标题有“何谓社会主义？”“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学习”，“世界无产阶级的目标和道路”等。

他们对乡民谈了土地问题，谈到农奴和封建主的关系以及贝伊的土地等问题。那些乡民竖着耳朵听，眼睛斜视，胡子微动，皱眉蹙额，样子象是要把他们讲的全部记在心里，以便过后再思考一番，再向别人转述。

还有不少人，仍然表现得小心谨慎，不敢说话，甚至对这些新事物，对那些大胆的思想和言论拒于千里之外。但是，大部分人接受这些新思想，尤其是那些年轻人、穷人和无所事事的人，他们把这些新思想当作福音，因为这些思想符合他们埋藏在内心深处的各种要求，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一股从未有过的巨大鼓舞力量。他们读了宗教组织或政党发表的报告、文章、抗议书和备忘录以后，每个人都感到身上的枷锁解脱了，眼界开阔

了，思想解放了，自己的力量和别人的力量，甚至和过去从未想过的远方力量已经联系在一起了。他们现在相互之间的看法，也与过去完全不同。总之，他们从此感到生活内容比过去丰富广阔；过去认为非法的、作不到的事情，现在，这个界限已经向前大大推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远大前景和巨大的可能性。

事实上，他们没有得到任何新的东西，也没有看到出现什么美好的变化，但是他们现在的眼光已经超出了这座城市日常生活的圈子，憧憬着远大而充满力量的未来。他们原来的习惯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彼此间的关系仍然和过去一样；不过，当他们按照传统习惯，悠闲地坐在一起喝咖啡、抽烟、喝拉基酒的时候，谈话中却带有思想性、激烈的言词和新颖的内容。人们的离合、亲疏，除了受旧仇宿怨和传统习性的支配外，现在还加上新的准则、新的基础。

现在，边界以外发生的事情也传到这个城市来了。一九〇三年，塞尔维亚的王位突然发生更迭，随后土耳其的政权也起了变易①。这座城市正好靠近塞尔维亚边境，距离土耳其边界也不远，同这两个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这个城市的人对这些政局变化有直接感觉、切身体会；尽管他们没有公开明确表示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但是，实际上却心潮起伏，思虑万千。

当局对这座城市越来越加紧采取行动，实行高压手段，先是

---

① 奥伯勒诺维奇皇族出身的国王亚历山大及王后德拉加，于一九〇三年六月十日在贝尔格莱德被一群军官暗杀后，塞尔维亚的王位落入了卡拉乔治家族的手中， 彼得一世当了国王。 一九〇八年七月，青年土耳其党发动一场革命，推翻了哈米德政权。“统一 进步 委员会” 领导下的青年土耳其党，把萨洛尼卡驻军的军官争取过来，举行武装起义，迫使苏丹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退位。青年土耳其党企图恢复奥斯曼帝国，以便更有力地与欧洲相抗衡。

行政手段，继而是军事手段，而且方式上与过去完全不同：过去只是注意观察人们的行动，而现在却进一步调查人们的思想和言论。驻扎在边界一带村庄的宪兵，不断在增员。在里卡地方，有一个当地出身的特务军官被派到当地驻军司令部。警察当局对那些出言不慎，或者唱塞尔维亚禁歌的年轻人加以逮捕关押，或者处以罚款。形迹可疑的外国人被驱逐出境。本国人里面，由于彼此意见分歧，经常互相吵架，斗殴。

随着铁路的修造，不但旅行迅速，货运方便，而且，几乎与此同时，形势的发展也加快了。这个城市的居民根本没有注意到，因为速度是逐渐加快，而且，每个人都身临其境，因而感觉不出来。现在，吸引人的事情屡见不鲜，人们已经司空见惯；吸引人的消息已经不是什么凤毛麟角，而是成了稻麦黍粱，不可须臾离开。整个生活，由于某个地方推动一下，突然加速运转起来，就象山中急流，冲过悬崖，急转直泻，汇成瀑布。

自从第一列火车驶过这座城市到现在不过四年，突然，十月的一个早晨，加比亚台上，正好在土耳其碑文下面，出现了一张白色大布告。这张布告是市政府的职员德拉果张贴的。起先看这张布告的是小孩和无所事事的人，后来，别的人也去看了。读书识字的人在那里高声朗读，遇到外国辞句和生僻术语，他们就停住，只读拼音，其他的人垂着眼皮默默地听，听完以后，呆了一会儿，头也不抬地走了，有的用手捋捋胡子，好象要抹去一句几乎脱口而出的话。

阿里霍扎做完午祷，放上门闩，表示铺子已关，然后也跑来看布告。这次的布告上面没有土耳其文，阿里霍扎又不懂塞尔维亚文。有一个小伙子在那里朗读，他好象刚刚识字，读得很不流利：

诏　书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周知

“朕，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奥地利皇帝，波希米亚等地国王，兼领匈牙利教王，晓谕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全体居民周知：

“大约卅年前，当本军越过你们边界的时候……”

阿里霍扎感到他那只右耳，在白色头巾下面，犹如针刺一般，往事记忆犹新：他和卡拉芒利亚的争吵，当年对他身上施加的暴行，他泪眼中看到的红十字，那个德国兵小心地拔掉他耳朵上的钉子，以及当年的白色安民告示等，又重新出现在他的眼前。

那个青年继续往下念：

“……曾经向你们保证，我们决不是作为敌人，而是作为朋友来到你们国土，并且决心根除你们祖国多年来遭受的一切祸……祸……祸害。

“在当时那种关……关键时刻对你们所作的诺……诺……诺言……”

这个人念得结结巴巴，引起大家齐声叫喊，他羞愧满面，低着头钻到人群里面。一个穿皮革上衣的陌生人挺身而出，取而代之，似乎他早就在等待这一着。他读得连贯流畅，就象是在念一篇倒背如流的祷告词似的：

“在当时那种关键时刻对你们所作的诺言，现已忠实地履行。本政府为实现和平与安定，为贵邦走向康庄大道而竭诚努力，始终不渝。

“朕深感欣慰，敢于直言：在贵邦遍地荆棘的田垅中所播下

的种子，业已生根发芽，枝茂叶盛。秩序与安全已经代替了暴力和专制，人民安居乐业，生活蒸蒸日上，文化繁荣昌盛，人人身受政府庇护，享受劳动果实，凡此等等，均系福泽天恩。

“今后沿此道路继续前进，是每个人的光荣职责。

“根据这个目标，朕认为现在应该在政治上对这两个地区的居民予以新的信任。为了进一步提高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政治生活水平，决定在这两个地区实行宪政，它将符合这两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共同利益，从而在合法基础上代表这两个地区的要求和利益。

“这样，将来对有关贵邦问题作出决定时，可以听到你们的意见；将来贵邦和现在一样，也有自己独立的行政机构。

“实施这种国民宪法，首要和必不可少的条件是明确规定这两个地区的法律地位。从这个原则出发，并为了继续保持匈牙利皇室的光荣先辈和这两个地区之间历史上建立的亲密关系，本皇室特将君权扩展至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并愿本皇权在这两个地区世代延续。

“如果上述传统关系能够持久巩固，这两个地区的居民将受益不浅，贵邦的文明昌盛将有可靠保证。

“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人民！

“朕日理万机，忧国忧民，对于丰富你们的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将备加关心。你们可以充分享有一切重大权益，例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参加制定法律，管理国家事务；不分信仰、语言及民族特性，人人均受保护。

“个人自由及集体利益，将是本政府治理这两个地区的指路明灯……”

阿里霍扎歪着头，目瞪口呆地在倾听，他感到大多数语汇都

很陌生费解，有些语汇虽不陌生，但凑成句子，就显得古怪难懂。譬如："遍地荆棘的田垅中所播下的种子"，"实施这种国民宪法，首要和必不可少的条件是明确规定这两个地区的法律地位……""本政府的指路明灯……"等等。是啊！这又是"皇帝的语言"！他每听到一个字，冥冥中忽而出现了一片遥远、奇异而又危险的视野，忽而出现了一张铅黑色的帐幕，遮住了他的眼珠。所以，他一会儿两眼漆黑，视而不见，一会儿看到了莫名其妙的东西，看到了不祥之兆。生活中，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发生的，任何怪事都有可能出现。可能有某个人，他聚精会神地听，对具体细小的地方毫不理解，但是对总的方面，他却融会贯通，了如指掌。所谓"种子"，"明灯"，"朕忧国忧民"，这些词句，也许外国语言完全可以这样说，而阿里霍扎似乎也可以理解这些词句的含义，以及使用这些词句的用意所在。三十多年来，帝王们的呼吁号召满天飞，遍及各国和城市，根本不顾本国人民的呼声。每个帝王的每个诏书中所用的每个字都会招致严重的后果，因为帝王的话可以使国家支离破碎，人头落地。所谓"种子……指路明灯……朕忧国忧民"这些字眼，都是冠冕堂皇的话，有意回避现实，而现实是一些国家、省份、人民及家园，象货币一样，从这个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个人的手里；一个善良的老百姓在土地上得不到安宁，甚至在他短暂的生命中，得不到起码的安宁；他的财产地位几经变迁，完全不由自主，与个人的希冀愿望背道而驰。

阿里霍扎越听越觉得这些语言同他三十年前所听到的一模一样，他的心上同样象压了一块铅那样沉重，这篇诏书同样是在向人们宣称：土耳其统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土耳其的火炬已经烧成灰烬"，这一点有必要向土耳其人再一次指出，因为他们既不愿意理解，也不愿意正视现实，而是自欺欺人，装聋

作哑。

“……为此，你们切勿辜负朕对你们的信任，愿君民始终同心同德，共同努力，此乃国家发达之最可贵保证。

“于帝京布达佩斯皇宫。

弗朗茨·约瑟夫手谕。”

那个穿皮革上衣的人读完了诏书以后，忽然出其不意地拚命高呼：

“皇帝陛下万岁！”

“万岁！”掌管路灯的高个子费尔卡，好象奉命似的，也喊了一声。

其余的人一声不响，都同时走开。

当天傍晚，那一大张诏书就让人撕掉，扔进德里纳河里去了。第二天，有几个塞尔维亚青年，被怀疑撕毁诏书而被逮捕。加比亚台上重新贴了一张白色诏书，旁边还有一个市政府卫兵在看守。

当一个政府认为有必要通过布告对被统治者许下和平繁荣的宏愿时，你就应当警惕，预计到结果将与许下的诺言完全相反。果不其然，十月底，军队就开进来了，不仅通过铁路运送军队，连久已废弃的旧道路也利用上了。同三十年前一样，军队取道通往萨拉热窝的大路，然后顺着山坡的小道下来，从大桥进入城市，并且还携带各种工具，配备后勤队伍。除骑兵以外，各兵种应有尽有。所有兵营都住满了，有些队伍只好安顿在临时帐篷里。新的队伍源源不断地开来，这些队伍先在城里歇息几天，然后驻扎到靠近塞尔维亚边界一带的村庄。大部分士兵都是出身不同民族的后备兵，他们身上有的是钱。他们上店铺里买些零碎东西，到街头买些水果或糖果。物价因而日趋上涨，草料和

精饲料完全短缺。城市周围的高地上，开始构筑碉堡。大桥也在开始进行一项奇异工程。从城里出来，通过大桥，要到德里纳河左岸，刚过加比亚台的桥中地方，有些特地派来的工人正在那里的一个桥墩上挖掘一个一米见方的口子。施工的地方搭了一座绿色帐篷，里面不断传出挖凿的声音，从声音听起来，似乎越凿越深。挖掘出来的石块立刻从桥栏杆上扔到河里。尽管工程进行十分隐蔽，城里的人还是不难看出这是在准备炸桥，具体地说，他们正在挖掘一个很深的洞，穿过桥墩，直达桥基，然后在洞底放上炸药，准备一旦打起仗来，必要时把桥炸毁。洞里还安装了很长的铁梯，一切工程就绪，洞口用一块铁板盖上。几天以后，尘土覆盖，铁板和石板已经分不清了。车马行人，川流不息，都从铁板上走过，并没有想到地雷或炸药。只有那些上学的小孩才在这个地方停下来，怀着好奇心，在这块铁门上面轻轻地敲几下，想知道铁门下面到底藏有什么东西，甚至猜想里面可能有一个黑人。他们还对什么是炸药，威力多大，这样大的桥能否炸平等问题争论了一番。

在成年人里面，只有阿里霍扎·穆德维利奇在这块地方的周围徘徊过，他带着怀疑忧虑的神气，先是在施工时仔细察看绿色帐篷，后来施工完毕，他又仔细端详桥上的铁板。他从别人的谈论和私议中知道，桥墩挖了一个象井那样的洞，里面装了炸药，有一根电线一直接到岸上，无论在白天或夜里，指挥官只要一声令下，这座桥就会象糖做的，而不是石头造的那样，从桥正中心顷刻炸平。阿里霍扎仔细听讲，频频摇头，白天钻进他那个"棺材"小房间时，他就想这个问题，晚上躺在床上，还是想这个问题。有时候他认为炸桥是可能的，有时候他又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行动简直是发疯，触犯神明；但是，由于他脑子里老

在想这个问题，连做梦都在想，所以常常梦见他的先辈，穆罕默德巴夏所创立的"瓦科夫"基金会的各任理事，严肃地向他询问大桥的变迁以及这一次的遭遇。这个问题使他心烦意乱，但也不愿去找那些绅士们共同商议，因为他早就认为一个明白事理的人不须请教任何人，再说，这个城市里没有一个人通达情理，可以同他谈得投机，在他看来，其他的人，不是鲜廉寡耻，就是同他一样，既义愤填膺，又束手无策。

有一天，他突然遇到了打听这件事的机会。赤伦恰地方布朗科维奇家的一个后裔穆哈梅曾在维也纳军中服役，后来，留在那里，超期服役，被提升为军士长（他就是占领后一直隐居在赤伦恰地方，最后忧郁而死的那位申西贝克的孙子，上了岁数的土耳其人至今还提到他，称他是一个道德高尚，具有彻底精神的英明典范）。穆哈梅这一年恰好休假回来。他是一个棕色皮肤、身材高大的胖子，穿着一身标准的蓝色军服，黄色袖章，红色带穗的肩章，领子上钉着几个小银星，手上戴着雪白的皮手套，头上戴着一顶红色的土耳其帽。他的态度彬彬有礼，面带笑容，穿戴十分干净整齐，在商业区里散步，长军刀轻轻碰着地，他对每一个人都表示和蔼可亲，信任不疑，因为他是个吃皇粮的人，所以不但对自己颇为自信，对别人也毫无顾忌。

这位穆哈梅贝伊到阿里霍扎的铺子来探望他，向他问了安，然后坐下来喝咖啡。阿里霍扎心想穆哈梅是从离开维舍格列很远的皇帝那边来的，又是皇帝的手下人，所以他借此机会，请穆哈梅替他解决心中的沉重疑团和隐忧。他向穆哈梅说明事情的经过，桥上所看到的以及城里所听到的，最后问他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情，即有计划地准备破坏象大桥这种公益设施的事情是否会发生。

这位军士长听完以后，突然严肃起来。他收起笑容，板起那张刮得很干净的红润面孔，就象在阅兵时听到"立正！"的口令一样。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沉吟了半晌，随后才低声回答说：

"你所说的倒是有几分道理。不过，如果你想知道我的想法，那就是最好不要问，也不要谈这件事情，因为这个问题牵涉到战争准备、军事秘密，如此等等。"

阿里霍扎对这些新的措辞非常反感，特别是"如此等等"。这不仅是因为这个词刺激了他的神经，而且是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在外国人的谈话中，这个词意味着无可奉告，同时表示前面所谈的问题毫无意义。

"天啊，别对我使用'如此等等'这种词了，这种词让他们去用吧；我只是希望你，如果可能的话，给我解释一下，他们在桥上干什么。这总不算是个什么秘密。我倒要问你，连可兰经学校的学生都知道的事情，算是一种什么秘密呢？"阿里霍扎气冲冲地说。"天啊，大桥和他们的战争又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怎么会没有关系！"布朗科维奇回答说，这时他又恢复笑咪咪的神气。

布朗科维奇向阿里霍扎作了一番解释，态度显得和蔼可亲，但又带有一点教训小孩的口气，他说，这一切在军事教程中都提到了，因此，军队里面有土方工兵和桥梁工兵，在皇家军队里，每个人只知道自己应该干的事情，别的事情就不要过问，也不去介人。

阿里霍扎看着他，听他讲，可是听不懂多少，感到有些忍不住。

"好啦，这些都讲得很好听，我的老朋友，可是，这座大桥是大丞相的慈善基业，是为了他的灵魂得救，为了赞美真主而建造

的，哪怕起了桥上一块石头，那就已经是罪过，他们知道吗？”

这位军士长，伸开胳膊，耸耸肩膀，闭上嘴唇，合上眼睛，一句话也不说，脸上露出狡猾而又有礼貌、无动于衷、装聋作哑的神气，这种神情只有在腐朽的旧衙门混过多年的人才装得出来，因为在那里面，受了长期熏染，谨慎小心早已变成麻木不仁，俯首听命早已变成胆小如鼠。一张洁净的白纸还比这张谨慎缄默的面孔更能说明问题呢。这位皇帝手下的人立刻又睁开了眼睛，放下胳膊，脸上的肌肉放松，恢复它的常态，显出那种放心、开朗、笑咪咪的神气，这种神气是维也纳人的谦恭与土耳其人的礼貌结合而成的。这位军士长改变了话题，用漂亮词句对阿里霍扎恭维一番，夸他身体很健康，还保持着年轻的英姿，然后向他告别，态度和来的时候一样，无限和蔼。阿里霍扎独自一人，心乱如麻，忐忑不安，心中的疑虑并没有比以前消释。他愁绪满怀地坐在铺子面前，凝望着三月初春的美丽景色。在他面前，斜着看过去，屹立着那座永恒不变的大桥；从白色桥孔可以看到德里纳河碧波荡漾的清澈水面，桥孔映入水中，在阳光下，形成一条双色的奇异项链。

第十八章

这一次紧张局势，世界上称之为“吞併危机”，在大桥和濒临大桥的这座城市之上，布下凶兆的阴影，突然一下子缓和下来了。通过外交途径和有关国家之间进行谈判，这一次紧张局势终于得到和平解决。

这条边界经常漫天烽火，随时都有一触即发之势，这一次却没有引起战火。部署在边界一带城市和村庄的重兵，于初春开始陆续撤退，逐渐减少。不过，洪水已退，残迹犹存，这次危机所引起的变化并没有完全失去原状。这座城市的长期驻军甚至比过去还多。大桥仍然放着炸药，不过除了阿里霍扎以外，没有人再去想它了。大桥左边，旧坝墙上面的那一块平地，后来作为当地的种植场，现在却让军事当局占用了。种植场上的果树都被砍光，盖上了一座漂亮的二层楼房。这就是新的军人俱乐部，因为以前只有比加瓦山一个俱乐部，而且是一座小平房，随着军官日益增多，这座俱乐部已经显得太小了。

这样，桥的右边是罗蒂卡酒家，左边是军人俱乐部，这两座都是白色楼房，互相仿佛，中间是集市广场，广场周围都是商店，广场上面的高地是那座大兵营，当年穆罕默德巴夏建造的旅舍就在这里，但是早已无影无踪，老百姓为了纪念它，都把兵营叫做石头旅舍。

去年秋天，由于军队骤增，物价因而上涨，以后没有再发生波动，但目前又有上涨的趋势，很难再下跌到原来的水平。这一年，开设了两家银行，一家是塞尔维亚银行，一家是穆斯林银行。银行汇票成了治病药方；现在，每个人动不动就借贷。当然，钱越多，用得越多。不过，对那些人不敷出的人来说，生活倒是可以过得宽裕舒适些。发愁的是那些大小商人，因为贷款偿付期限越来越短。可以指望的好主顾越来越少。由于价格提高，大多数人的购买力下降，商品数量越积压越多。人们都是小量零星地购买，而且总想买便宜货。只有一些来路不明的顾客才比较大手大脚地买。唯一稳拿的好生意是做军队和某些政府机关的买卖，可是这些买卖并不是大家都能够轮得上。国家和市政府

征收的捐税越来越重，名目越来越多，手段越来越厉害。人们感到远处证券行情的浮动很不正常，幕后操纵的人物从中得利，恶果波及到帝国境内最边远的地区，吃亏的是那些小商人，包括小商贩和消费者在内。

这个小城市的普遍心情并没有比过去更开朗，更平静。紧张局势的突然缓和，没有给这座城市的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带来真正的安慰；某些人暗暗感到失望，另一些人则感到不安，瞻望前途，不寒而慄。不知为什么，既没有明显理由，也没有直接原因，希望发生大变的心情又重新产生。人民希望发生变化，也害怕发生变化（确切地说，有人希望，有人害怕），对任何事物都本着这种希望和害怕的眼光去看待。总而言之，普遍都处于惶恐不安的状态，甚至那些目不识丁、愚昧无知、头脑简单的人也是如此，特别是那些年轻人更是如此。没有一个人对多年来不死不活的单调生活感到满意。每一个人都要求得到更多些，希望过得更好些，或者担心情况变得更坏些。那些老年人还在念念不忘土耳其时代的那种"悠哉游哉的生活"，这种生活当时被认为是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最终目标和理想境界，在奥国统治下的最初一二十年内还依然存在。不过这些老年人为数不多。其他的人都愿意过生动活泼、熙熙攘攘、令人振奋、激昂慷慨的生活，他们需要激情，或者是别人产生激情，自己从中受到感染，或者至少是一种喧哗热闹的生活，可以引起自己兴奋冲动。这种愿望不但改变了人们的思想状况，同时也改变了城市的气氛。昔日加比亚台有规律的生活，置身于山水与蓝天之间，从容不迫的谈心，安安详详地沉思，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唱些柔和缠绵的情歌，这种生活，现在也开始改变了。

咖啡店的老板弄了一个留声机，是个很重的木盒，上面还带

了一支白铁的大喇叭，形状就象一朵浅蓝色的花。他的儿子负责换唱片和唱针，不停地在上弦，留声机不停地发出响亮的歌声，声音响彻加比亚台，并在两岸发出了回声。咖啡店老板买这台留声机，完全是不甘落后，因为现在不仅公共场所和阅览室可以听到留声机的声音，就连郊外最简陋的小酒店也有留声机，过去顾客到这种小酒店里，只是坐在菩提树下的草地上，或者坐在阳光普照的平地上，在那里低声交谈，而且谈的也不多。留声机到处在播送各种歌曲，根据顾客的口味，或者播唱土耳其进行曲，塞尔维亚的爱国歌曲，或者是维也纳歌舞剧中的插曲。因为哪里最热闹，哪里就最吸引人和顾客。

人们很喜欢读报，但都是走马观花。每个人光是找第一版上有没有耸人听闻的大字标题的报纸来看。报纸角上用小字排印的消息就没有人阅读。所以，为了吸引读者，事无大小，都绘声绘色，大事渲染。那些青年人在白天听到和看到的事情，到了晚上睡觉以前，如果不感到余音袅袅，历历在目，那么，他们就觉得这一天是白过了。

城市中那些阿迦和贝伊神情严肃，表面上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到加比亚台上来听人讲述报纸上有关意大利和土耳其两国在"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战争消息。他们很注意地听报纸上报道关于英勇的土耳其青年指挥官昂凡尔贝伊如何抗击意大利人，象苏科罗维奇和朱普利里奇的后裔那样保卫苏丹的国土。他们听到留声机发出的那种令人心烦的响亮音乐声而皱起眉头；他们虽然没有流露出来，但内心深处却为土耳其在非洲这块遥远地方的前途感到忧心忡忡。

那个被称为伯罗师傅的意大利人毕特罗，衣服上满是白色的石头粉末和颜料的斑点以及松节油的油渍，这时候正好下班

回家，从桥上经过。他已经老了，背更驼了，样子更加卑恭胆怯。同吕舍尼刺杀皇后的时候一样，他按照自己那种莫名其妙的逻辑，这一次又认为自己有罪，其实那是他的意大利同胞在世界上某个地方所犯的罪恶，况且他和他们早已丝毫没有关系。有几个土耳其青年对他嚷道：

"你想要'的黎波里'吗，狗杂种？喏，拿去吧！"

这些青年一面嚷着，一面跟在他背后品头论足，并且做出各种侮辱性的动作。

伯罗师傅无精打采，低头弯腰，腋下夹着工具，他把帽子拉到眼睛，死劲咬着烟斗，加快步伐，朝着美以当山坡上的家跑去。

他的斯达娜在山坡上等他，她也衰老了，气力也不如以前了，但还是喜欢吵架，嘴巴还是很厉害。他向他妻子诉苦说，那些青年对他出言不逊，还向他讨还"的黎波里"，其实，几天以前，他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呢。斯达娜的脾气还是和以往一样，既不愿理会他，也不愿安慰他，而是说他自己不对，让人家骂活该。

"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可惜你不是——你只要用你的剪子或锤子打他们的臭脑袋，这班下流的家伙就不敢再骂你了，而且会在你过桥的时候，乖乖地站起来。"

"啊，斯达娜，斯达娜，"伯罗师傅心平气和而略带愁容回答说，"一个人怎么能拿锤子去打别人的头呢？"

这几年，人们经常需要刺激和冲动，而且多少也经历了一些使人冲动的事情。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一九一二年秋天到了，接着是一九一三年，它带来了巴尔干战争和塞尔维亚人的胜利。非常奇怪的是，对这座大桥、城市以及全体居民的命运关系重大的事情，竟然是悄悄地、不知不觉地发生了。

这座城市的十月天气，早晚红霞，中午是金黄色的阳光；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人们正在等待收割玉米和新烧酒上市。下午时间，在阳光底下，坐在加比亚台上，那还是很美的。这些日子，城市上空，万里无风，但事情却正好发生在这个时候。

当读者对报纸上相互矛盾的消息还没有弄清楚以前，土耳其和四个巴尔干国家之间的战争就打起来了，战争是在巴尔干的旧公路沿线进行着。而且当世界上还来不及估计这场战争的意义和规模，战争实际上就已经以塞尔维亚和基督教军队的胜利而告终。这一切都是发生在距离这里很远的地方，边界上没有听到枪炮的声音，加比亚台也没有看到杀头的事情。这一切重大事件就象交易所的买卖，也是在远处进行，而且神速成交。世界上某个遥远的地方，那里彩票抽了签，或者打了一场战争，它就决定了这个城市每个人的命运。

当然，表面上看来，这个城市仍然平平静静，毫无变化，然而，这次事件在人们心里却掀起了轩然大波，有些人欢喜若狂，有些人大失所望。同这些年来世界上发生其他事情时一样，这次事件，在本城的塞尔维亚人和伊斯兰教徒的心里，也引起了完全相反的情绪；这些情绪只有强烈程度和深刻程度也许是一样的。因为，这次事件，对某些人来说，超过了他们的希望，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的恐惧也似乎是有根据的。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跑在历史进程前面的各种愿望，现在已经赶不上历史前进的步伐了，尤其是今天世上风云骤变，历史的步伐突飞猛进，因而更加望尘莫及了。

这个城市在这场决定命运的战争中所能看到和感觉到的一切事情，都如箭一般飞逝，而且事情经过是异常简单。奥匈帝国与土耳其的边界，沿着小乌瓦河，经过乌瓦这个地方，在这

里，奥国兵营和土耳其边防哨所之间只相隔一座木桥，有一个土耳其军官率领一小队哨兵，跑到奥国那边。这位军官带着戏剧性动作，对着桥栏杆，把他的军刀摔断，向奥国宪兵投降。就在这个时刻，穿着灰色军装的塞尔维亚步兵队伍从山上下来，这支军队接替了驻防在波斯尼亚和桑甲克边界一带装备过时的土耳其正规军。奥地利、土耳其和塞尔维亚三国边界的交点从此消失了。土耳其的边界，昨天还在距离维舍格列十五公里的地方，现在忽然后退了一千多公里，跑到安德利诺堡的那一边去了。

在这么短的时间，发生了这么多重大的变化，使全城都感到震动。

这些变化对德里纳河上的这座大桥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由于修建了通往萨拉热窝这条铁路，这座大桥完全失去了沟通西方的作用，而现在，一眨眼工夫，它和东方的联系也完了。这个东方，它创造了这座大桥，昨天还依然存在，而现在，它却象幽灵一样，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今后，这座大桥只是连接这个城市的东西两部和德里纳河两侧的二十来个村庄。

按照苏科罗维契出生的大丞相的意愿和虔心，这座石头大桥，一方面为了把土耳其帝国的两部分地区连接起来，一方面为了赞美真主，便利东西方之间的交通往来，然而现在它象一条沉没的大船，或者一座被遗弃的教堂，它既不通往东方，又同西方隔绝。三个世纪来，它经历了世事的变迁，经受了各种考验，丝毫没有变化，忠诚地尽了自己的职责，但是，人类的需要转移了，世界上的事物改变了，使它无法再继续忠于职守。这座大桥既长又宽，结构坚固，外观壮丽，本来还可以让军队和车马畅行几百年，但是，由于世事变幻，出人意料，大丞相的公益设施，突遭

厄运，被抛到生活主流之外。大桥目前的地位，同它那永葆青春的外貌，巍峨雄伟的气魄毫不相称。尽管风云突变，沧海桑田，然而大桥始终巍然屹立，永远保持大丞相冥冥中所想象的、建筑师所塑造的形象：气势磅礴，壮丽多姿，坚固如山。

这个城市的居民要完全理解这里寥寥几行所写的和这几个月所发生的事情，那是需要很多时间，费很大力气的。因为人们做梦也想不到边界会移动得那样快，后撤得那样远。

过去一直隐藏在人们心中的一切感情，这些感情象大桥那样古老、沉静，现在一下子甦醒过来，开始在支配日常的生活、普遍的思想和每一个人的命运。

一九一三年夏初，天气多雨温和。有一些伊斯兰教徒，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地坐在加比亚台上。其中有十来个老人围着一个青年人，听他读报，他还给他们翻译一些外国的词语，解释一些特别的名词和有关地理。这些老人一声不响地吸着烟，直着眼睛向前看，无法掩饰内心的忧虑和不安。他们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俯身观看地图，上面标志着巴尔干半岛将来划分的情况。他们望着这张地图，虽然不懂得这些弯弯曲曲的线条，但是他们心里都很清楚，因为他们生来就熟悉本国的地理，脑子里有一张世界地图。

"斯科普里将属于谁？"一个老年人冷冷地问读报的青年。

"属于塞尔维亚。"

"噢！"

"萨洛尼卡呢？"

"属于希腊。"

"噢，噢！"

"还有安德利诺堡呢?"

"大概属保加利亚。"

"噢,噢,噢!"

他们并不象妇女或感情脆弱的人那样悲泣痛哭，而是长吁短叹，这些叹息随着烟雾穿过浓密的胡须，消失在夏日的空气中。这些老人,有许多已经年过七旬。在他们的童年时代,土耳其的版图是起自里卡和库尔敦[①]一直到斯坦布尔，又从斯坦布尔一直到辽阔而无法逾越的阿拉伯边境，中间是漫无边际的沙漠地带。(在土耳其统治时代,世界上这部分地区，整个都是不可分割、不可摧毁的伊斯兰教大家庭，到处都是清真寺，寺院的僧侣，登上高塔，召唤信徒们前往祈祷。)这些老人对这一切都记得很清楚,他们还记得,后来土耳其的疆界从塞尔维亚后退到波斯尼亚,随后又从波斯尼亚退到桑甲克。而现在,在他们的眼前,土耳其的边界象神奇的潮水一样,突然退落下去，退到了他们看不见的地方,自己却成了留在陆地上的水草，孤苦伶仃，受尽欺凌,任人宰割。这一切好象祸从天降,毫无疑问，都是真主安排的,当然,世人对此很难理解;因此，他们感到心情沉重，方寸已乱,脚下的大地象地毯似的被卷走;本来应该是持久固定的边界,如今成了一块活动板,可以随时移动,却象一江春水,滚滚东流不复回。

坐在加比亚台上听人读报的那些老人，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但都缄默不语,在他们看来，报纸上谈到这场战争中有关的帝国和国家的文章,用词不当,随心所欲,甚至狂言乱语;文章的整个基调是渎神的,不合乎天理人情,无异于粪土，为正人君子

① 里卡和库尔敦是亚德里亚海边的两个城市。

所不齿。他们的头上飘浮着团团烟雾；夏天多雨的天空，白云朵朵，翻滚向前；地上云影，倏忽而过。

一直到夜深人静，还有些塞尔维亚青年坐在加比亚台上。他们旁若无人，纵情高歌，赞颂塞尔维亚大炮，可是，没有人敢对他们罚款或惩处。他们中间，往往是些大学生和中学生，大部分脸色苍白，身体瘦削，头发很长，戴着宽边平顶的黑帽子。这一年秋天，学期虽然已经开始，他们还常常到这里来。他们带着介绍信和暗号，从萨拉热窝乘火车到这里，就在加比亚台上过夜；而不到城里去歇宿，因为维舍格列的青年会经过一定路线把他们送往塞尔维亚。

到了夏天，正是暑假期间，本地出生的大中学生都回来了，整个城市和加比亚台顿时热闹起来，影响了全城的生活。

六月底，萨拉热窝的中学生大批回来，七月上半月，维也纳、布拉格、格拉茨和萨格勒布各大学的法科、医科和文科的学生，也陆续回来了。他们的到来使城市变了样。无论在商业区还是加比亚台，都可以看到这些怪样的青年，他们的举止、言语和服装同这个城市老一套的旧风习俗迥然不同。他们身穿式样新颖的深色服装，所谓“钟式”服，这是中欧最时髦、最风雅的服装。他们戴的是巴拿马软草帽，帽边向下翻，配上一条有六种柔和颜色的帽带。他们穿着鞋尖隆起的美国式大皮鞋。大部分人都拿着很粗的竹手杖。每个人的上衣翻领上都佩带着学生会的徽章。

此外，这些大学生还带来了好些新名词、新的笑料、新的歌曲以及去年冬天舞会里流行的新式舞蹈，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带来许多新书和小册子，有塞尔维亚文、捷克文和德文等。

在奥国占领初期，这个城市也有些青年出外求学，但是人数

从来没有这样多，思想上所受的影响也没有这样大。占领后最初二十年内，有几个人毕业于萨拉热窝师范学校，有两三个人到维也纳学法律或文学，但都是有数的几个青年，而且都比较朴实，他们不声不响地通过考试，毕业以后就在国家机关服务，埋没在穿灰色制服的公务员的行列中。这几年来，这个城市的大学生人数突然猛增。在国家文化团体的资助下，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子弟也都上大学了。因而，大学生的思想和作风有很大变化。

现在这些大学生已经不是当年的大学生，不是占领初期的大学生了，那时候的学生都很腼腆、单纯，一心埋头读书。现在这些大学生既不是过去那些吃喝玩乐的花花公子，也不是那些无忧无虑的小财主，在加比亚台虚度了自己的年华，让家里的人说："快给他娶个媳妇，免得他再这样胡闹。"他们是一批新的青年，在各个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上学，受教育，接受了各种影响。他们从小在大城市求学的大学和中学里回来，由于得到了一鳞半爪的知识，因此尾巴翘到天上去，同时，对人民的自由权利、个人的享乐和尊严很感兴趣。每次暑假，他们都带来了关于社会和宗教问题的自由思想以及民族复兴主义的热烈情绪；一个时期以来，尤其是塞尔维亚取得了巴尔干战争的胜利以后，这种民族主义成了一种共同信仰，在许多青年人心里产生了一种强烈愿望：行动起来，牺牲个人。

加比亚台是他们的主要聚会场所。他们通常是晚饭后集合在那里。在夜色苍茫中，在繁星和月光下，万籁俱寂，惟闻潺潺流水，这时候，他们纵情歌唱，高声谈笑，同时进行新鲜活泼、坦率诚恳、大胆从容的辩论。

同这些大学生在一起的，往往还有他们童年时代的同学，这

些人曾经和他们在一起上小学，随后留在城里当学徒、店员、市政府的小职员或某些企业里的职员。这些人里面可以分为两类。有些人对自己的命运和这个城市的生活感到满意，准备永远留在这里。他们抱着好奇心理来看待这些受到高等教育的同学，满腔热情，羡慕他们，但从不和他们相比，丝毫没有嫉妒心，相反，还关心他们的进步和前途。另一些人由于环境所迫，屈居在这个城市而感到不甘心；他们希望远走高飞，但是机会已经错过，而且随着时光消逝，机会越来越渺茫，可望而不可即了。

这些年轻人虽然同这些大学生朝夕相处，但他们却时而冷嘲热讽，时而不理不睬，同这些大学生保持一定距离。他们自惭形秽，低人一等，不能在辩论中拿出象样的货色，同这些幸运的伙伴相比较，自己显得粗俗无知。有时候，他们在谈话中故意表现出粗俗不堪，愚昧之极；有时候，尽管自己无知，还处处挖苦，恣意嘲笑，不管哪一种表现形式，都使人明显感到他们心存妒忌。不过，这些年轻大学生对这些个人意气毫不介意，仍然同他们亲密无间，很好相处。

这个城市的上空，过去有过美丽的星夜、灿烂的繁星和皎洁的明月，将来还会有，然而，这样的青年，具有这样的思想和感情，彻夜在加比亚台上这样交谈，却是从未有过的，天晓得将来还有没有呢。这是一代敢闯的青年，他们精力充沛，得天独厚，满怀豪情，十分自负。这些子弟生于波斯尼亚的一个偏僻小城市，出身于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家庭，由于命好，并没有作出特殊的努力就开创了踏上社会的道路，对自由充满了伟大的幻想。这些青年子弟带着从小在小城市养成的特性，走上了社会；他们根据自己的爱好、当时的情绪或者一时心血来潮，基本上独立自主地选择他们的学科、娱乐的项目和交往的朋友。他们大部分

人都不会或者不善于抓住或利用他们所见识到的一切，但是他们谁都认为自己没有不能理解的东西，而且认为，一经理解的东西，就属于自己的了。生活（这个词在他们的谈话中经常提到，当时的政论和文坛也常常出现这个词，而且往往还用大写，以示重视。）在他们面前，生活就是一种目标，一个活动场所，任凭他们为所欲为，以满足他们精神上和感情上永无止境的需要。在他们面前，道路千万条，但大部分的路，他们将永不涉足。不过，生活有一种诱惑力，他们可以（至少理论上可以这样说）任意选择一条道路，也可以从这一条转到另一条。在他们看来，历史上，其他国家、种族和人民，经过世世代代、几个世纪的努力，付出了生命，甚至作出了比生命更伟大可贵的牺牲而创造出来或换取的一切，只是一笔命运赏赐的意外的遗产。看来好象是荒诞不经、难以相信的事情，事实上却是真实存在的：这些年来，在这个世界上，社会道德和个人道德一直到罪恶界限的准则，都遭到了破坏，每个团体或个人都可以任意解释，随便取舍，这些年轻人可以利用自己的青春，随心所欲，任意行事。他们可以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完全自由，毫无限制；他们想什么，就敢于说出来，而且，许多人拿言论代替行动，拿豪言壮语来显示他们的英雄气概、荣誉感、暴躁和喜欢破坏的天性，这些豪言壮语说过以后，可以不付诸行动，也不负有明显的责任。他们中间有天赋的人都瞧不起自己所学的东西，不愿干自己能干的事情，而对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却大吹大擂，热衷去做那些力不能及的事情。

很难想出一条更加危险的生活道路，他们走的道路，其结果肯定是：或者建立丰功，或者身败名裂。他们里面最优秀、最强干的人，带着苦行僧那种狂热，真正见诸行动，结果象一群小苍蝇那样烧死了，立刻让同辈誉为殉道者和圣者（因为每一代都有

自己的圣者）而捧上光辉典范的宝座。

每一代人对文明都有其想法，有些人认为他们促进了文明的飞跃发展，另一些人则认为亲眼看到了文明的衰落。实际上，一般说来，对文明火焰的燃烧、暗淡或熄灭的看法，都是随着各人不同的立场而定的。这时候，在星光底下，在河水上面，正在加比亚台上讨论哲学、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这一代青年，只是更加富于想象而已，否则，这一代在各方面同其他几代都没有什么区别了。这一代青年也有这样一个想法，认为他们燃起了新文明的火焰，同时扑灭了另一种行将熄灭的文明火焰。关于这一代，我们所能特别指出的就是：长久以来，没有一代人象他们这样大胆地追求和谈论生活、欢乐和自由，也没有一代人象他们这样艰苦奋斗。

一九一三年夏天出现的这一切，尽管是大胆果敢的行动，但是前途如何，尚难逆料。在这座古老大桥上呈现的这一切，应该说是激动人心的新气象。六月的夜晚，月色皎洁，这座古老的大桥依然显得那样年轻，不减当年，依然是那样白皙多姿，无比壮丽，无比坚固，任何时代的东西都无法同它比拟，任何人所能想象或创造出来的东西都不可能再超过它。

第 十 九 章

每年夏至的夜晚同夏天的其他夜晚总是一样炎热，没有多大区别，同样，这些中学生和大学生每次到了一起议论起来也总是那样热烈。

他们狼吞虎咽匆匆吃罢晚饭以后，先后来到加比亚台上(因为白天在河里游泳，在河边晒太阳，没有功夫上这儿来)。最先来到的是伊阳科·斯蒂可维奇，他出身美以当山上一个裁缝的家庭，在格拉茨专修自然科学，已经读了两年。小伙子身材瘦削，头发乌黑，他好虚荣、多愁善感，对自己的处境很不满意，对周围的一切也看不上眼。他读的书很多，经常用笔名在布拉格和萨格勒布出版的青年人办的革命刊物上发表文章，已经有点名气。同时，他还写点诗歌，用另一个笔名发表。这些诗，他已汇编成册，即将由“晨光”出版社(一家专出民族主义者书刊的出版社)出版。此外，他长于口才，在大学生的集会上是一个出名的演说家。在他之后走上加比亚台的是弗里米尔·斯德瓦诺维奇。他自己的家世不明，是由别人抚养长大的。他身体健壮，说话诙谐，平素讲究实际，注意节俭，读书也很勤奋。他在布拉格学医，即将毕业。此外还有亚可夫·克拉克，他父亲在维舍格列当邮递员，因为性情和善，人缘很好。他本人学的是法律，同时还是一个社会党人，他身材矮小，棕色的头发，目光敏锐，口齿伶俐，生性好争论，他总嫌自己的心肠太软，所以轻易不流露自己的真实感情。还有朗哥·米爱罗维奇，他和蔼可亲，沉默寡言；在萨格勒布读法律，想当一个政府职员。他对大家在私下谈论的关于爱情、政治以及人生和社会等问题，没有多大兴趣，很少参加意见。他是维舍格列前主教米爱罗的重外孙，若干年前，主教的头颅就插在一根木桩上在加比亚台示众，嘴里还被人塞了一支烟卷。

来到加比亚台的还有几个从萨拉热窝回来的中学生，那些大哥哥们所介绍的关于大城市的见闻，他们听得如痴如醉，在他们年少无知的心灵中激起了许多遐想，把那里的一切都想象得

无比壮丽，无比美好，大大超过了实际情况。这些中学生中有尼古拉·哥拉辛恰宁，他面色苍白，表情呆滞，由于家境不好，身体弱不禁风，学习成绩总是名落孙山。他在中学读了四年，便怎么也读不下去了，不得不中途辍学，回到维舍格列，在一家德国人办的木材出口公司里抄抄写写。他是奥克里德人，家中原来很富有，后来衰败了。祖父米兰·哥拉辛恰宁，年轻时候在赌场上几乎把全部家财败得精光，后来进了萨拉热窝的疯人收容所，当地被占领后不久，他死于该所。他父亲皮埃尔·哥拉辛恰宁，是个病包子，没有一点志气，也没有一点刚性，大家都瞧不起他，他也在祖父去世那年离开了人间。如今，尼古拉整天守在河岸上，同那些工人混在一起，搬运笨重的松木，把木材编成木筏；他的任务是把大量好的木材堆做上记号，然后回到办公室登记造册。他觉得干这种工作，整天同社会下层呆在一起，单调乏味，半死不活，前途非常渺茫，又有损于自己的身份，实在有点忍受不了。他的这种境遇看来根本没有希望改变，甚至稍加改善也不太可能。他本来就多愁善感，由于心境不佳，他变得更加未老先衰，肝火很盛，沉默寡言了。他利用闲暇看了不少书，但这种精神食粮于事无补，并不能使他从中得到一点安慰，由此振作起来。相反，他心灰意懒，觉得任何东西都枯涩难耐。由于他孤苦伶仃，身世凄凉，精神上受到无端的折磨，因而在许多问题上眼界大开，感觉敏锐，更加看破了红尘，即使最美妙的警句，最通达的人生哲理也只能使他更加萎靡不振，倍觉悲凉。因为这些东西不看则已，看了之后反而使他对自己在维舍格列小城的颠沛流离和前途黯淡，益发伤感。

在这群中学生中，还有一个叫做弗拉多·马利奇的锁匠。他长得虎头虎脑，头上戴着一顶锁匠常戴的便帽，性格开朗，为人

正直。比他大的同学都喜欢他，常邀他一起来玩，因为他说起话来一口悦耳的男中音，而且又平易近人，心地善良。他是这样一种人：依靠自己的双手维持生计，安于现状，不同别人比这比那，一心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这群人中，还有两个女教员，一个叫左尔卡，另一个叫查高尔卡。她们两人都在当地土生土长。青年后生个个都想赢得她们的青睐。他们争风吃醋，展开了一场场天真烂漫、曲折离奇的情场风波，有的人得意洋洋，有的人丧魂落魄。只要她们一出现，他们便你来我往，掀起了一场唇枪舌战，恰如古代的骑士为了博取美人的欢心，在她们面前比试高低一样。随后，他们有的人无精打采坐在加比亚台上，在黑暗中喷着烟圈，借以消愁解闷，有的人则同刚从别处喝了酒来的人一起纵情歌唱。这样，为了她们俩，大家彼此虽然是同学，内心却产生了难以掩饰的怨恨和嫉妒，甚至公开动武也是在所难免的了。十点左右两位女教师离开了加比亚台。那些年轻人仍然呆在那里，久久不愿离去，但加比亚台上的热烈气氛也转瞬之间一落千丈，大家忽然泄了气，再也打不起刚才那种互不相让的劲头了。

斯蒂可维奇平常在这种场合是扮演主角的，可是今天晚上他落落寡欢，不停地抽着烟。他心绪不宁，内心很不高兴，他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极力不流露出来，但做不到，他从来也不能把自己的真实感情完全掩饰起来。今天下午，他同左尔卡进行了初次幽会，这个少女体态丰满，皮肤白皙，两只水汪汪的眼睛含情脉脉，令人为之倾倒。事情是这样的：在斯蒂可维奇的一再要求下，他们两人做了一件青年男女在维舍格列小城很难做到的事：找一个僻静的场所见了面，而没有被人发觉。他们会面的地方是她教书的学校。因为正值暑假，学校里空无一人。斯

蒂可维奇是从后街进入校园的，左尔卡则是从前街正门进去的。他们走进一间幽暗的房间，里面布满了尘土，小学生上课用的桌椅一直堆到天花板。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炽烈的爱情常使年轻的恋人不得不选择一些龌龊不堪、不为人所注意的地方去相会。他们俩连坐的地方也没有，更不用说躺下来了。由于万分激动，他们的举止有点失常，不知如何是好。随着情欲的冲动，无以自制，他们情不自禁地紧紧拥抱在一起，倒在一条左尔卡所熟悉的旧板凳上，完全忘却了周围的一切……。过后，斯蒂可维奇感到如愿以偿，他对左尔卡一句温存话也没有——这是年轻人常有的事——只是粗鲁地整了整衣服，打算离开。左尔卡现在才知道他原来是这样一个人，伤心得哭了起来。他按捺着性子好歹安慰她两句，便从学校的后门溜走了。

他回到家里，正碰上邮递员送来一份青年杂志，上面登了他一篇文章，题为：«巴尔干，塞尔维亚与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他把刚才的幽会丢在一边，细心读了一下，发现里面印错的地方太多，有些观点也写得很不理想，本来可以说得更透彻，更简明扼要一点，可是，现在要改也来不及了，这使他大为光火。

到了晚上，年轻人都来到加比亚台上，左尔卡也来了。整个晚上大家都在谈论斯蒂可维奇的文章。斯蒂可维奇的主要对手是那个能说会道、咄咄逼人的克拉克，他从正统社会党人的观点出发，对他的文章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评论。其他人说话不多，只是偶尔插一两句嘴。两位女教师对他们俩的争论也一直保持沉默，但心中却在暗自盘算，谁要是得胜，应该用什么话去夸奖一番。斯蒂可维奇斗志不佳，因为首先，他自己现在也觉得那篇文章漏洞很多，立论不严谨，不过，他无论如何也不愿当众承认这一点。其次，他一想起今天下午在那个到处是灰尘、喘不过气

来的教室里发生的事情，便感到烦躁不安。他觉得那件事实在做得粗鄙不堪，十分荒唐，可是，他为了实现这一步，多少天来，茶饭无心，神魂颠倒，在美丽的左尔卡面前不知说了多少娓娓动听的好话。（现在，夜幕笼罩了一切，她正坐在这里，一双明眸深情地望着他。）他觉得自己犯了弥天大罪，深深懊悔今天下午不该到学校去干那件见不得人的事，现在他看到她坐在自己面前，更感到无地自容。

由于他心绪缭乱，克拉克的进攻向他劈头盖脸而来，使他毫无招架之功。他觉得，为了捍卫自己的文章，也为了今天下午在学校里发生的事情，他应当进行还击。可是，他对于舌战提不起一点兴趣，宁愿远离此地，找一个幽静的去处，坐下来冷静考虑一下别的问题，把那篇文章和左尔卡的事全部丢开。但由于受自尊心驱使，他还是打消这个念头起来应战了。他们两人都引经据典，斯蒂可维奇引证的是茨维伊奇和斯特罗斯麦耶① 的理论，克拉克则引用了考茨基和倍倍尔的理论。

“你的文章本末倒置，”克拉克叫道。“只要灾难深重的巴尔干农民继续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你就别想在任何地方建立一个能长久维持下去的巩固的政治实体。只有当各民族的绝大多数——农民和工人这两个被剥削的阶级，在经济上首先获得解放时，人们才有可能创造实实在在的条件，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是事物的自然发展过程，必须循此做去而不能把先后关系颠倒过来。所以，民族的解放和统一应当以社会的解放和革

① 伊欧万·茨维伊奇，塞尔维亚的一位伟大地理学家和人种学家。早在一九一四年以前，他就已坚定地认为南斯拉夫是一个国家。斯特罗斯麦耶，克罗地亚人，甲克伏地方的主教。他也竭力主张南斯拉夫民族统一起来，并主张建立泛斯拉夫联盟。

新为前提。否则，农民、工人和小资产阶级会把他们习以为常的贫困生活习惯和当惯了奴隶的劣根性带到刚诞生的政治实体中来，象致命的瘟疫一样使之夭折，同时，一小撮剥削者也会从他们反社会主义的本性出发，以不劳而获等反动思想来瓦解它。因此，这就根本不可能建立一个巩固的国家和健康的社会。”

“我亲爱的，你这一套是从外国人的书本上抄来的，”斯蒂可维奇答道，“我们应当看到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爱国力量正在觉醒。在这些爱国力量蓬勃兴起，正在向同一目标前进的今天，你这一套不中用了。形势的发展不会象那两位德国理论家所预料的那样去进行，相反，它将离不开我国历史的根本特性和我国人民的独创精神。自从卡拉乔治号召‘每个人杀死身旁的土耳其宪兵’以来，巴尔干地区的社会问题一直在以民族解放战争的方式寻求解决。一切都是按照这样一个规律进行的：由小而大，由地区、部落而发展到整个民族和国家。我们在古马诺伏①和布勒加尔尼扎河畔②的两次大捷，难道不正是进步思想和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吗？”

“这还要看一看，”克拉克大声说道。

“谁现在要是看不到这一点，将来就永远不会明白。我们相信……”

“你们靠的是‘相信’，我们则什么也不信，我们靠的是真凭实据和确凿的事实，”克拉克反驳他。

“现在土耳其人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奥匈帝国也一天不如一天，走上了衰亡的道路，这难道不正是爱好民主的弱小

① 一九一二年塞尔维亚人在此地战胜了土耳其人。

② 一九一三年塞尔维亚在该河附近打败了保加利亚人。

民族和被奴役的阶级为恢复自己的正当权利而进行不懈斗争的结果吗？”斯蒂可维奇没有管他继续说道。

“如果说国家独立后，社会主义能随之实现，那么在已经圆满实现独立的大多数西欧国家就不应当再有未经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不应当再有什么运动和冲突了，可是，我们看到那里的情况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我向你再说一遍，”斯蒂可维奇答道，他有点不耐烦了，“国家的独立必须以国内各民族的统一为前提，必须实现近代关于人身自由和社会自由的各种思想，否则，‘社会的解放’是谈不上的。一个法国人说过，首先是政治……”

“首先是我的肚子。”克拉克插进来打断他的话。

在场的其他人紧接着一哄而起，乱叫乱嚷，两个文弱书生的空泛争论顷刻之间发展成为一场乱嚷嚷的闹剧，大家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语，互不相让，后来有人说了句俏皮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这场唧唧喳喳的争吵也就无声中停息下来。

斯蒂可维奇乘机缩身退步，退出了论战。机会来得这样巧，谁也不感到他这样做是吃了败仗，退出阵来。

十点左右，左尔卡和查高尔卡分别由弗里米尔和朗哥伴送回家去了，其他人也跟着陆续散去。最后只剩下斯蒂可维奇和尼古拉·哥拉辛恰宁还留在那里。

他们俩同岁，中学时代都在萨拉热窝求学，是同窗学友。他们彼此都很了解，也正因为这一点双方都有点互相瞧不起，不能真正做到互敬互爱。日子久了，两人之间的隔阂便越来越深，越来越难以消除了。每年假期，斯蒂可维奇回到维舍格列小城来度假时，他们碰到一起，彼此都用猜疑的眼光打量对方，简直成了冤家对头。如今，两人之间又插进了一个朝三暮四的、美

丽的女教师左尔卡。去年冬天，哥拉辛恰宁爱上了她，两人搞得很热乎，他对此并不回避，逢人便说，他爱她爱得发疯。由于他身世凄凉，处处不遂心，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倾注到她身上。可是到了夏天，大学生们回来后，左尔卡同斯蒂可维奇眉来眼去，这一点，敏感的哥拉辛恰宁当然不会看不出来。因此，他同斯蒂可维奇之间久已存在的紧张关系，虽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未曾流露，却在最近几天加剧了。今年暑假以来他们还没有单独在一起谈过。

现在，由于偶然的机缘，他们面对面站在一起了。这时，双方最初的想法是赶紧走开，免得谈起那不痛快的话题。可是，由于他们年轻好胜，谁也没有就此走开。正在进退两难之际，一个意外的情况帮了他们很大的忙，至少暂时减轻了一点令人难忍的沉默之苦。这时传来了两个人漫步走来的脚步声，他们在离加比亚台不远的大桥栏杆的拐角处停了下来，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坐在"沙发"台上的斯蒂可维奇和哥拉辛恰宁根本看不见这两人是谁，对方也没有发现他们。可是这两人说的每一句话他们都听得很清楚，也很耳熟。他们是两个低年级的同学，一个叫杜马·加鲁，另一个叫费肯·巴克蒂阿雷维奇。他们很少参加维舍格列大多数大中学生以斯蒂可维奇和克拉克为中心在加比亚台的聚会，这是因为加鲁不喜欢斯蒂可维奇，觉得他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他虽然小小年纪，可是在写诗和发表关于国家独立的演说时所显示出来的才能已经可以同斯蒂可维奇相匹敌了，至于巴克蒂阿雷维奇，他一向沉默寡言，待人十分傲慢，因此不太合群，真不愧为贝伊的后裔。

杜马·加鲁身材高大，两颊绯红，一双蓝眼睛。他父亲阿尔班·加鲁是布尔根兰的一个世家子弟，维舍格列小城被占领不

久就被调到这里来负责“保护水源和森林”。他在这个岗位上供职，前后达二十年之久。他现在已经退休。他来到维舍格列不久，就娶了当地首富加吉·杜马·斯坦科维奇的女儿为妻。妻子长了一头棕色的头发，性情老实，意志坚强，为他生了一男两女，孩子生下来后都在塞尔维亚人的教堂里受过洗礼，后来受的教育与当地的孩子无异，完全承袭了加吉·杜马的作风。白发苍苍的老加鲁笑容可掬，身材高大，年轻时候还是个风度翩翩的美男子。他早已维舍格列化了。大家都叫他“阿尔伯先生”，青年人简直不敢相信他是从外地迁来落户的。他喜欢打猎和抽烟斗，这两种嗜好对任何人都不会有什么妨碍。因为常常外出打猎，他在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农民中交了不少好朋友。他仿佛是在当地土生土长，从小同他们休戚相关，具有他们身上的不少特性，这些特性主要是喜欢枯坐和海阔天空地闲聊，这都是爱抽烟斗和爱打猎、爱野外生活的人常有的脾性。

小加鲁今年在萨拉热窝中学毕业，他想在秋天到维也纳去深造。在他升学的问题上，家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老加鲁主张儿子去学工科或林业，可是小加鲁却想报考文科。他外表长得很象父亲，但内心的喜好生来与父亲截然不同。他属于这样一种人：他们学习成绩优良，谦虚好学，各方面都名列前茅，每次考试都轻而易举，毫不费力。他们求知欲很盛，但没有一定的计划，不论哪一方面知识都想探个究竟，远远超出了学校里正式课程所教授的范围。他们心地纯朴，清白如镜，但在钻研学问上好奇心很大，东奔西逐，不得安宁。青年人常因情场失意而弄得神魂颠倒，险些断送了性命的尴尬局面，他们还从未经历过，在这一方面还没有任何要求，他们一心一意要探求各种知识的奥秘，终身这也碰碰，那也碰碰，无一定的主次方向，直到临

死，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半吊子的百事通，简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小加鲁既已长大成人，虽然情窦未开，与风月情场无缘，却也免不了要象每个青年一样赶点时髦，跟上当代的思潮，做一些青年人中流行的风雅之事。所以他也学会了写几首歪诗，并积极参加了一个青年爱国革命组织。此外，他还花了五年的时间，选学法文，攻读文学，特别是哲学。他博览群书，废寝忘食，孜孜不倦。萨拉热窝中学的青年人当时读的外国名著，大多是一个德国人办的赫赫有名的大书店出售的，书店名叫"雷科拉姆斯环球书屋"。这些书，开本小，价钱便宜，印着黄色封面，字体很小，是当时的青年学生所能得到的主要精神食粮。通过阅读这些德文原著或德文译本，他们不但对德国文学知道了一个梗概，而且也大体了解了其他国家的文学名著。小加鲁正是从这些小册子中知道了一点德国近代哲学家，特别是尼采和施蒂纳的观点。他与同学们在米里阿茨卡河①畔散步时，常以冷静的头脑，同他们就书中提出的哲学论点展开过热情洋溢、不知疲倦的讨论，可是一旦把他学到的东西同自己的生活知识联系起来，那就驴唇不对马嘴，令人捧腹大笑了——这是青年人常犯的毛病。象他这种过于早熟，头脑里充斥五花八门的知识而未经消化的中学生，当时比比皆是。不过，加鲁仍然不失为情窦未开、勤奋好学的青年，他从来没有任何寻花问柳、放荡不羁的行为，只知一味思考问题，广学博览。

费肯·巴克蒂阿雷维奇完全是由于他母亲的关系才到维舍格列来的。他父亲是罗加蒂扎人，现在还在那里担任法官，母亲是维舍格列的名门望族——奥斯马那吉奇家的闺秀。他从小就

---

① 流经萨拉热窝的一条小河。

常随同母亲到维舍格列的外婆家来过暑假。他是一个身材颀长、丰姿秀逸的翩翩少年，骨架虽然不大，但很结实。他从不发火，无论碰到什么不遂心的事，举止总是很安详得体。他眉清目秀，一张瓜子脸好象给太阳晒过似的有点发黑，身上的皮肤也略呈红棕色，并露出一条条深蓝色的细长纹路。他动作敏捷，但不毛里毛躁。他的一双乌黑的大眼里嵌了两个外沿为蓝色的瞳仁。他目光炯炯，但不咄咄逼人。两条浓眉几乎联成一体，鲜红的嘴唇上方有一道黑糊糊的茸毛。这种美男子真是举世罕见，似乎只有在天方夜谭的故事中方可找到。

他也在今年夏天中学毕业，现正等待国家发给奖学金，到维也纳去学习东方语言。

加鲁和巴克蒂阿雷维奇还在继续他们的谈话，谈论的话题是巴克蒂阿雷维奇所选择的学科。加鲁认为他不应当学东方语言。一般说来，加鲁比巴克蒂阿雷维奇说的话要多得多，而且总是慷慨激昂，因为他已习惯于登台演说，一开口便是长篇大论，滔滔不绝。巴克蒂阿雷维奇则不爱说话，要说也只是简短几句，好象他对什么事都很自信，用不着去说服他人。加鲁同大多数受过教育的青年人一样，一打开话匣子，便口若悬河，似乎对自己用的词和别开生面的比喻颇为洋洋得意，他并喜欢把所谈的问题归纳一下，做出结论。他的同学巴克蒂阿雷维奇说起话来却很干脆，只是寥寥数语，似乎懒得多说。

斯蒂可维奇和哥拉辛恰宁呆在黑暗中，坐在石头椅子上一声不响，仿佛他们订了个默契，要偷听那两个同学在桥上的谈话。

加鲁就巴克蒂阿雷维奇所选择的学科问题发表了一通宏论，他说：

"你们这些穆斯林贝伊的子弟，在这个问题上常常看错。你们被新时代的潮流冲激得莫知所措，不能恰当地看清楚自己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你们对东方的一切所表现出来的热情，不过是你们想使自己强大起来的思想在新形势下的翻版。你们很明白东方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同构成你们千百年统治的那个社会秩序和法制密切相关，所以你们对东方的东西恋恋不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这决不意味着，东方语言作为一门科学，你们有掌握它的本领。你们是东方人，但如果因此而认为你们一定会成为东方语言学家，那就大错特错了。一般说来，你们对科学并没有多少兴趣，更谈不上有什么天赋。"

"是吗，是吗？"

"是的，你们同科学完全是风马牛。我这样说，决没有任何恶意，有意使你扫兴。不，我一点也没有这个意思。你们在这块土地上独霸天下，至少在过去你们是不可一世的。在过去几百年中，你们用剑和可兰经，扩大、巩固和捍卫了你们在法律、宗教和军事上的统治。你们也因而成为驰骋沙场的将士和国家行政的管理人员，你们这一帮人对纯理论的学科是不屑一顾的，只有那些身无一官半职，什么事也做不了的人，才去从事这种纯理论的研究。你们成天同事务打交道，所以学点法律和政治经济学也还可以。天下的统治者历来如此。"

"这样说来我们只好甘当文盲了。"

"不，我的意思是你们应当保持现在这个样子，说得更确切一点，保持你们原来的样子。你们应当这样做，因为谁也不能既是现在这样又不是现在这样，二者不可得兼。"

"可是我们今天不是统治阶级了，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巴克蒂阿雷维奇略带讥讽地说道，言语中流露出痛苦但又自豪的

心情。

“你们今天已经不是统治阶级，这是千真万确的。诚然，把你们变成今天这种样子的环境早已不存在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也能同样快地把自己改变过来。一个阶级失去了它赖以存在的基础以后也还原封不动地保持原样，这种事过去不乏其例，将来也还会再度出现。它的生存条件虽然消失了，但是作为一个阶级，它依然存在。只有保持原来的样子，它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因此，直到最后灭亡它也要保持原来的样子。”

巴克蒂阿雷维奇对他的话未置可否，两人的谈话因而停顿片刻。

六月的天空晴朗如洗，天边黑糊糊的山顶上升起了一弯新月，余下大半个月亮似乎是被什么东西吞没了。立在大桥栏杆上面，刻有土耳其文的那块白石碑，在微弱的月光下，恰如一扇黑洞洞的窗户被一线灯光照亮一样。

巴克蒂阿雷维奇接着又说了几句，但声音很低，只有几个首尾不相连贯的字传到斯蒂可维奇和哥拉辛恰宁的耳朵，无法听懂。青年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话题往往转得很快，嘴上说的是这件事，可是心里却想到了另外一件事。加鲁和巴克蒂阿雷维奇由东方语言的学习问题转而谈到立在他们面前的白石碑上所刻的土耳其文，谈到这座大桥和建桥的人。

加鲁嗓音洪亮，抑扬顿挫。他同意巴克蒂阿雷维奇对穆罕默德巴夏·苏科罗维奇以及当时建立这座大桥的土耳其政府所给予的赞颂之词，同时他又滔滔不绝地用他那民族主义者的观点对塞尔维亚人的过去和未来及其文化和历史，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这些大学生时时也忘不了发抒自己对各种问题的见解。）

“你说的对，”加鲁说道，“穆罕默德巴夏当然是一个天才人

物。但我们这个民族当中，在异族统治下干了许多光辉事业的，决不是他一个人。在斯坦布尔、罗马和维也纳时代，我们出了成百个象他那样了不起的人物，其中有政治家、军事家和艺术家。把我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的伟大意义就在于：这些人材今后将留在国内施展他们的才智，为人类的文明做出他们的贡献，而不再去仰靠那些外国强权的鼻息。”

“那末你认为过去那些强权是偶然建立起来的，因而今天只要我们愿意，便可以随便在什么地方再建立这样一些政权？”

“不管它是出于偶然，还是出于其他原因，这个问题今天已经不存在了。继续纠缠那些帝国是如何崛起的，已没有多大意义，重要的是，这些帝国今天正在消亡，正在分崩离析，一些新的强大政权必将取而代之。在这些政权中，正在登上历史舞台、完全享受自由权利的各族人民将可无拘无束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那末你以为穆罕默德巴夏·苏科罗维奇如果呆在苏科罗维契山上，终身做一个小农，他也会干出后来所干的那些惊天动地的事业吗？还有，我们现在在这儿闲聊的这座大桥也会建立起来吗？”

“在那个时代，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不过话说回来，土耳其政府当时从我国和其他被它奴役的国家不但掠夺了我们大量的财富和劳动果实，而且抢走了我们的菁华和我们的人材，因此，对斯坦布尔说来，造这样一座桥并不是太困难的事。同他们从我们手上夺去的大量财富比较起来，这种建筑物简直算不了什么。当我们一旦为我国人民赢得民族生存的自由和政治上的独立时，我国的财富和人材就将永远归我们自己所有了。那时，我们将调动一切力量来复兴我国的文化，使之保持我国自己的特

色，并为我国广大的人民谋幸福，谋利益。”

巴克蒂阿雷维奇一言不发，这充分说明他非常不同意对方的观点。看到这种情况，加鲁不由得提高了声音，语调也变得更为激烈了。他慷慨激昂，用了一些在当时民族主义者办的刊物中流行的语汇，向他详细阐述了革命青年的计划和任务。“已经觉醒的我国各民族的优秀儿女一定会行动起来。奥匈帝国这个各民族的人间地狱，必将在他们的打击下土崩瓦解，同土耳其帝国在欧洲建立的统治后来分崩离析一样，遭受覆灭的命运。今天妄图阻挠、分化和麻痹我们这些爱国力量的一切反对民族独立的反动势力，必将被他们打得落花流水。这一天肯定会到来，因为时代的战斗精神在激励我们前进，各被奴役的弱小民族也在向同一目标努力。当代的民族独立运动定会克服内部各种派系的分歧和腐朽成见，把人民从外国的压迫和剥削下解放出来。那时，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将会出现在世界上。”

加鲁接着描绘了一下这个新的多民族国家的优越性和美好未来，它将在尊重民族权利、承认宗教自由和公民一律平等的基础上，把欧洲南部的全部斯拉夫人团结在塞尔维亚周围，塞尔维亚所起的作用将和皮埃蒙特① 相仿。他的这些言论，有些是意思不太明确的大胆设想，有些则是正确地反映了当代现实生活的要求，反映了常常被人认为永远不会实现的各民族人民最殷切的期望，以及日常生活中完全可以做到的合理要求，他说的这些话是人们经过多少代才探索到的伟大真理，而由青年人首先感觉到大胆说了出来，同时，他说的这些话由于从来未能实现，被人认为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人们并不因此而罢休。它象希腊

① 皮埃蒙特，意大利地名，四周群山环抱，作者在这里用了一个比喻。

神话中的火炬一样在青年人中代代相传。当然，加鲁这些看法，有些地方未免过于肯定，经不起推敲，有些地方也只是一些假想，很难经得起实践的考验，不过，从中也可以感到一股清新的气息、一种可贵的精神，人类之所以能子孙万代繁衍不息，永葆青春，也正在于此。

巴克蒂阿雷维奇一言不发。

“你看吧，费肯，”加鲁兴致勃勃，再一次强调指出，他想说服他的同学立即同意他的观点，好象这件事今晚或明天就可实现，“你看吧，我们一定会建立这样一个国家，对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最宝贵贡献。在这个国家里，每一个人的劳动将受到人们的尊重，每一个为国牺牲的人将受到人们的怀念，每一种具有独创的发现将用我们自己的文字记载下来，每一件事将由我们自己去完成。因此，我们一定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作出一些成就来，这些成就将是我们取得自由后的劳动成果，将是我们全民族智慧的结晶。在这些成就面前，外国统治者几百年间在我国所建造的那些东西，将全都显得黯然失色。我们将在滔滔的江河和深邃的山涧上架起一座座桥来。我们将造一些更大更美的桥，但这并不是要把列强同被他们奴役的国家连接起来，而是要使我国国内四通八达，并为我国与世界各地的往来提供便利。总之，实现我们的父兄所梦寐以求的理想：建立一个自由、公正的国家，使上帝的意志在这块土地上得以实现，这个任务已经落到我们的肩上，将由我们去完成，这一点今天是毫无疑问了。”

巴克蒂阿雷维奇依旧默然无语。加鲁的声音也开始微弱了。他考虑的问题境界越高，说话的声音也就越低沉、沙哑，最后变成一连串模糊不清的喃喃自语，消失在万籁俱寂的黑夜中。

现在，他们两人无言，面面相觑。可是，巴克蒂阿雷维奇执拗地一声不吭，使得整个气氛甚为尴尬。他简直象一堵立在黑暗中不可逾越的高墙，呆在那里一动不动，用沉默来表示他坚决不同意加鲁所说的一切，他仍然坚持自己明确的不可动摇的信念。

“世界上的基本格局、生活的基调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经确立，便会稳定几百年。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方面，不会变更，不过同人的一生相比，那种变化微乎其微，难以觉察。为了说明二者之间关系，我们不妨来打个比方，好比一条河流，它的表面常常是白浪滔天，水流湍急，瞬息万变，但河床部分却安如泰山，变化非常缓慢，不是短时间可以觉察出来的。因此，认为我们可以去推翻那些强权统治，这个想法本身就非常危险，真是异想天开，谈何容易！这无异于想要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以武力去推翻那些强权统治，这只有神经不正常的人才想得出来，并往往以青年人为最甚。可惜的是，这些人完全打错了算盘，他们将一无所获，用不了多久，他们必将遭到脑袋搬家的下场。世界上的事不是凭主观愿望决定的，不是我们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所以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正如刮风一样，大风一起，尘土飞扬，遮天蔽日，天昏地暗，大风一停，世界依然如故。天下经久不衰的伟大业绩，都是根据真主的意志完成的，人不过是真主手中唯唯诺诺的驯服工具罢了。一件事如果单凭人的愿望去进行，其结果必然是要么根本完不成，要么即使完成也维持不了多久，总之不会使人如愿以偿。你们这些人趁着黑夜在加比亚台上想入非非口出狂言，充其量不过是秀才造反。你们根本摇撼不了世界上万古长存的伟大的业绩，最后只会摔得粉身碎骨，化为尘土。事实上，伟大的人物和壮丽的建筑物，今后必将在真主指定的地方继续出现，这是不以人们一时的异想

天开和虚荣心为转移的。”

巴克蒂阿雷维奇心里这样想，嘴上却并没有说出来。这个年轻的穆斯林生来有一套完整的人生哲学，而且坚定不移，至死不动摇，不过，他不善于用恰当的语言表达出来，也不感到有这种必要。斯蒂可维奇和哥拉辛恰宁看那两位同学在大桥栏杆后面静默了好一会儿，后来其中的一位向空中扔了一个烟头，烟头象一个飞迸的火星，在黑暗中形成一个弧圈，从桥上落到德里纳河里。此后，他们便一声不响慢慢地向城里商业区的方向走去，不久他们的脚步声便消失了。

现在，桥上只剩下斯蒂可维奇和哥拉辛恰宁两个人了，他们如梦初醒，互相你看我我看你，好象刚见面一样。

惨淡的月光照在他们的脸上若明若暗，有的地方轮廓分明，有的地方朦胧不清，这使他们显得苍老了许多。他们不断地抽着香烟，香烟的火光因而忽明忽暗。他们两人都很懊丧。懊丧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都有一桩心事在心头。他们非常想马上就站起身来走回家去，可是都枯坐在石椅上一动不动，石椅经白天阳光的曝晒，现在仍有余温。刚才没有想到来了两位同学，又偷听了他们一席谈话，这真帮了他们很大的忙，可以不用开口，互相摊牌。可是现在这种尴尬局面看来是无法避免了。

“你刚才听到克拉克的高论吗？”斯蒂可维奇首先开口，一下又谈到了今天晚上的那场争论，他随即意识到不该这样说，因为在今天争论的问题上，自己确实有一点被动。

哥拉辛恰宁没有马上回答他，他觉得自己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处于旁观的地位，这对他十分有利。

“你看看，”斯蒂可维奇急不可耐地继续说道，“现在连三岁小孩也知道，我们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用革命的手段来完成国

家的统一，实现国家的解放，可是今天居然有人大谈什么阶级斗争，叫人们干这种毫无意义的事，这岂非可笑之至！”

斯蒂可维奇的意思很清楚，他希望对方能接他的碴，把僵硬的沉默气氛缓和一下。可是哥拉辛恰宁根本不买账，他仍旧一言不发。由于他有报复和敌对的念头，拒不回答他的问话，两人之间出现了片刻的寂静，这时，从岸上的军人俱乐部里传来了小提琴的声音。俱乐部楼下的窗户大开，透出了明亮的灯光。一架小提琴正在钢琴的伴奏下奏着悠扬的乐曲。小提琴手是军医巴拉赫大夫，钢琴伴奏是司令官鲍尔上校的妻子。（他们正在练习舒伯特的一个小提琴钢琴谱奏曲的第二乐章。他们起先配合得还不错，可是演奏到乐章的一半时，钢琴弹得快了一点，小提琴只好停了下来。他们于是就难奏的部分彼此交换了一下意见，接着又演奏起来。）他们几乎每晚都在一起练习，一直奏到深夜，至于那位上校，他可对这玩意儿没有多大兴趣，他总是呆在另外一间房间里没完没了地斗牌取乐，有时实在闲得无聊就干脆喝点莫斯塔酒，或点上一支奥地利香烟，来消磨时光。这两个坠人情网的音乐爱好者成了年轻军官茶余饭后的谈话资料。

几个月来，鲍尔夫人同年轻的军医确实发生了错综复杂、暧昧不明的关系，可是，其性质如何，连看问题最敏锐的人也拿不定。有人说，他们搞的完全是柏拉图式的爱情（当然，说过之后，便一笑置之，谁也不信以为真），有人则认为他们已经发生性的关系。但不管怎么说，他们俩是一对你贪我爱难舍难分的恋人，那位上校是个没有一点男子气的脓包，对他们百依百顺，何况他已两鬓斑白，又有公务在身，而且沉湎于烟酒，所以精力大不如前了，只好对他们听之任之。

维舍格列小城的居民都以为他们是一对夫妇，他们不可能

了解更多的内情。因为这些军官生活在独自的天地里，几乎与世隔绝，不但和当地的人老死不相往来，就是同本国的官员也很少接触。他们的花园里到处是一个个圆形的和星形的花圃，上面种了各种各样的奇花异草，花园入口处挂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市民与狗不得入内”的字样。可见，不但他们的事务别人不能过问，他们的娱乐活动别人也不能分享一点。他们自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完全过着与世隔绝的特权生活，以排场来显示其淫威。他们表面上赫赫扬扬，轻易不肯迁就，实际上也同别人在生活的旅途上所常遇到的那样，有凶有吉，有顺利的时候，也有倒楣的时候，不过他们对于这一点掩饰得很好，从不外露罢了。

可是有些事情是注定包不住的，即使手脚做得再干净，防范再严密，也还是要泄露出来的。（土耳其人说得好，有三件事是无法隐瞒的，这就是谈情说爱、咳嗽和生活劳苦。）军医同上校夫人的恋爱就是这种情况。维舍格列的居民，无论男女老幼，都碰到过他们在城外幽静的小道上散步，两个人总是唧唧咕咕，不知哪有那么多话好说，对周围的一切完全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牧羊人每次见到他们，总是卿卿我我地互相紧偎在一起，同五月间人们在路旁的树丛中常见的成双成对的昆虫没有两样。他们的足迹踏遍整个维舍格列，每天不论在什么时候，总可以在德里纳河畔和撒夫河畔，在古城堡的废墟下面，在城外的大道上或斯特拉伊士特周围遇见他们。这毫不足怪，因为他们每次幽会，总觉得时间过得太快，总觉得每一条新发现的通幽曲径匆促之间便走完了。他们有时骑马，有时驾上轻便马车，大多数时候是步行，两人走在路上互相全神贯注地倾诉衷情，把世界上的一切都抛到九霄云外，完全是一对水乳交融同生共死的情人。

军医是一个加入匈牙利籍的斯洛伐克人，父亲是公务员，家

境清寒，靠国家的资助读了几年书。他年轻好胜，雄心勃勃，音乐方面造诣很高。不过由于他出身卑微，比不上那些出身侯门的德国军官和匈牙利军官，总觉得低人一等，因而常常长吁短叹，多愁善感。上校夫人已经是四十开外的人了，比他大八岁。她身材苗条，黄色的头发，容颜虽已略逊当年，但那白里透红的皮肤和一对大大的明眸仍使她丰韵犹存。她的一颦一笑依然是那样迷人，不亚于人们在画片上常见的、姑娘们倾慕不已的皇后。

他们两人都各有各的原因而对现实生活深深地不满，这些原因有的是因为当前某些方面的不如意造成的，有的则是思想感情上的空虚引起的。此外，还有一个重大原因，他们俩都为自己漂泊异乡、同一群秉性轻浮、无知无识的军官厮混在一起而感到十分苦恼。所以，沦落天涯的共同命运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彼此相依为命，如胶似漆。这样，喁喁的情话和他们现在正在拨弄的琴声便成了他们思想上的唯一寄托。

斯蒂可维奇和哥拉辛恰宁这两个青年在桥上正沉默难挨时听到的琴声就是他们演奏的。

悠扬的琴声在宁静的夜空中荡漾，后来由于小提琴和钢琴配合不协调，乱了一阵，演奏便戛然中断了。琴声一停，周围又恢复了一片寂静，哥拉辛恰宁开始用一种生硬的语气接着斯蒂可维奇刚才的话说下去。

“可笑？说句公道话，要说可笑的话，那么在今天晚上这场辩论中，可笑的地方倒真不少！”

斯蒂可维奇突然把嘴上的香烟取下来等他说下去，哥拉辛恰宁则继续慢条斯理地、一字一句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显然，他的这些看法并不是今天晚上油然而生的，而是早已闷在心里了。

“你们两人的争论以及城里其他青年学生的争论，我都留意

听了一下。报纸上和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我也注意看了看。可是，你们的观点我越听就越感到你们的舌战和笔战，大部分同现实生活格格不入，根本没有考虑到现实生活的要求和实际存在的问题。生活，实实在在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我每天都接触到，我可以从别人身上看出来，也可以从自己身上体会到。我的想法不一定对，也可能说得不清楚。不过我总认为，世界上的技术进步和相对稳定造成了一个暂时的平静时期，建立了一种人为的并不真实的特殊气氛，使得一帮人，即所谓知识分子，可以自由自在地'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进行一些毫无意义、书生气十足的探讨。他们所发表的见解是温房里的思想园地培育出来的，或是从远方移来的花草，同广大人民活跃其间的坚实的土壤没有任何关系。你们以为你们的讨论是为广大群众着想，是为了让他们去参加斗争，实现你们给他们规定的崇高目标，可是事实上，你们根本没有看到人民大众的实际生活，也没有看到一般的现实生活。因此你们这样作对于别人，对于你们自己都是十分危险的，至少可以说，这种危险是存在的。"

哥拉辛恰宁停住了话头。斯蒂可维奇听了他这一席经过深思熟虑的长篇大论，殊为惊讶，所以并没有打断他，马上进行反驳。不过他听他说到"危险"两字时做了一个很不以为然的手势。这可惹恼了哥拉辛恰宁，他继续大声说道：

"我的上帝，照你们的说法，似乎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一切危险都已永远排除，条条大路都畅通无阻，只须行动起来就可以了。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况且也不是轻易可以解决的，更不能指望会得以圆满解决。一切是那样错综复杂，要想解决谈何容易？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冒巨大的风险。克拉克所抱负的大胆希望以及你所描绘的壮丽远景，现在连个

影儿也没有。人们一辈子省吃俭用尚且不能满足生活上的必需，要想彻底改变现状那就更难了。你们那套理论只能永远使人们想入非非，只能迎合人们的虚荣心，最后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事实就是如此，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

"不，只要把各个历史时期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人类斗争的进步意义，从中找出指导现实斗争的理论。"

哥拉辛恰宁立刻想到他这句话是讥笑他中途辍学，心头不由地一惊，他对于这个问题的反应总是很敏锐的。

"我没有研究历史，"他说道。

"你看，如果你学点历史的话，你就会明白……"

"你呢，你也没有学呀？"

"怎么说呢？……不，我正在学！"

"除了自然科学你还在学历史？"

哥拉辛恰宁气得声音都颤抖了。斯蒂可维奇心里慌乱了一会儿，接着阴阳怪气地说道：

"既然你一定要知道，那就告诉你吧，是的，除了自然科学，我还研究政治、历史和社会问题。"

"你同时学这么多东西，那敢情好。据我所知，你还是个演说家、宣传鼓动家、诗人和谈情说爱的能手。"

斯蒂可维奇的嘴角上掠过一丝微笑。今天下午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发生的那一幕，他早已抛到九霄云外，现在，经他一激励又想了起来，他有点局促不安。这时，他想起来，在他回到维舍格列之前哥拉辛恰宁和左尔卡已经很要好了。一个在爱情上玩世不恭的人，对于他人纯真的爱情和强烈的嫉妒心以及其中所孕育的危险后果，是根本觉察不出来的。

两人的谈话于是急转直下，变为发泄一场个人义愤的争吵，

其实这种剑拔弩张的气氛从谈话一开始就已存在。他们谁也不去迴避，相反，由于年轻人的好胜逞强，他们互不相让，随时准备大吵大闹一番。

“我是怎样一个人，我做哪些事，天经地义，谁也管不着。我也不去管你那数木材堆的活计。”

哥拉辛恰宁最受不了的，是人家影射他的工作低人一等。听了斯蒂可维奇的话，他感到非常痛苦。

“请你不要在我的工作上大作文章。我靠木材为生，但我并不以此沽名钓誉，我不欺骗人家，也不引诱人家。”

“那末我引诱过谁啦？”

“一切甘愿受你拨弄的男人和女人。”

“你胡说！”

“不，就是这么回事，你自己心里也很清楚。你既然向我挑衅，那就恕我不客气了，我就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和盘托出。”

“我对此不感兴趣。”

“可是我还是要说出来。你知道，尽管我整天同木材打交道，可是什么东西也逃不脱我的两眼。我要告诉你，我对你干的那些五花八门的事，你大胆提出的那些理论，以及你的诗作和恋爱有哪些想法。”

斯蒂可维奇挪动了一下身子打算站起来，但仍旧坐下了。军人俱乐部里小提琴和钢琴的演奏早已重新开始（现在演奏的是协奏曲的第三乐章，曲调明快、活泼）。琴声同流水声交融在一起，在夜空中迴荡。

“谢谢你的好意，比你说的更恳切的话我也不知听了多少了。”

“不，不。那些人有的并不了解你，有的是对你一味恭维，还

有一些人想法同我一样，但不愿说出来。你所鼓吹的那套理论，你干的那些五花八门的事以及你的恋爱观和交友之道，都同你的雄心勃勃有关，可是你的雄心并不是以可靠的现实为依据的，是不健康的，所以如此，完全是由于你好虚荣的结果。”

“哦！哦！”

“是的，你现在所竭力鼓吹的民族主义思想正是你的虚荣心的突出表现。你连自己的母亲和兄弟姐妹都视为若有若无，对于某种信念从来莫衷一是。假若你将来能显示出非凡的气量，对某项事业忠贞不贰，做点好事，那纯粹是你爱虚荣的结果。你的虚荣心是推动你前进的唯一动力，是你内心深处最尊贵的东西，你爱它胜于爱自己的生命。一个人如果不了解你，看到你的工作劲头和战斗热诚，看到你对民族主义的理想，对科学、诗词或其他超越你的为人的崇高目的的献身精神时，很容易被假象所迷惑。你不可能为某项事业服务到底，不可能在某人身边长期战斗，这是你的好虚荣所决定的。因为一旦你的虚荣心得不到满足时，你会把这一切扔到九霄云外，同它一刀两断，而不再愿意为它做一点最起码的事情。你深深地沉湎于自己的虚荣心中，久久不能自拔，你将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而背叛自己的誓言。你已病入膏肓，可是你自己还蒙在鼓里，没有觉察一二。我对你深为了解，只有我知道你是一个多么好虚荣的怪物。”

斯蒂可维奇一声不吭。他的老同学说的这一席话，经过深思熟虑，铿锵有力，一开始就使他深为惊异，他对他倾心吐胆，来得这样突然，话语又是那样新颖，是他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哥拉辛恰宁说话的语气虽然心平气和，但用辞辛辣，他起初有点受不了，但渐渐觉得其中寓意深长，饶有兴味了。有些话打中了他的要害，使他感到有切肤之痛，但总的说来，听了哥拉辛恰宁对他

的个性的深刻尖锐的分析，他的心情多少是愉快的。因为，当他这样一个青年的面，说他是一个怪物，这正好投合了他的傲慢心理和自尊心，而使他感到有点飘飘然。因此，他倒希望哥拉辛恰宁对他的内心世界进一步加以深刻的剖析，把他身上那些隐秘的东西全部揭示出来，他觉得，这将进一步说明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出类拔萃的人。他冷漠地看着对面栏杆上的白色石碑，石碑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分明。

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那宛如天书一样的土耳其碑文，仿佛要从那上面弄清楚可恶的哥拉辛恰宁刚才对他的尖锐分析所包含的深刻的真正含义。

"你对什么事都无动于衷，事实上，你不懂得什么叫爱，也不懂得什么叫恨，而要做到这两点，起码要能跳出个人的圈子，勇于承担风险，忘掉自己，摆脱自我，克服虚荣心。可是你做不到，退一步说，即使你能做到，也没有一件事你能循此做去。对于别人的痛苦，你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更不会产生恻隐之心；除非你的虚荣心受到打击，你对待自己的痛苦何尝不也是这样？你没有任何爱好，也没有任何欢乐。你不懂得什么叫嫉妒，但这并不是因为你心地善良，而是由于你个人主义太强烈，他人的幸福或不幸，你是根本看不见的。你对什么都漠然视之，提不起一点劲头。你做什么事都无所顾忌，但这并不说你很勇敢，相反，这只能说明你的善良的天性全给磨光了。你心里只有你那虚荣心，除此而外，什么父母兄弟、手足之情，什么上帝、世界、家庭、同学通通不放在你的眼里。你甚至对自己的才华也看得不太重。只有你的虚荣心，而不是你的良心，受到触犯时，你才会认真对待，总之，你的一切言行都是受虚荣心支配的。"

"你这一大套话是不是指我同左尔卡的关系？"斯莱可维奇

突然说道。

“完全对，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不妨来谈谈 这个问题。是的，我指的就是左尔卡。你并不爱她，一点也不爱。这件事足以说明，不管什么事，哪怕你是偶然碰到的，只要投合你的虚荣心，你就心血来潮，一头栽进去，完全不计其他。你玩弄可怜的左尔卡，把这个缺乏生活经验的小学教员弄得神魂颠倒，你对待她的态度同你作文、吟诗和发表演说一样，一件事还没有办完你就不耐烦了，就觉得腻烦了，你那贪婪的目光便转而他顾。你做什么事总是虎头蛇尾，贪得无厌，永远不能满足，这是你最大的不幸。因此，你的行动准则是你的虚荣心，你是它的俘虏，是它的最大的牺牲品。你将来或许能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比你欺骗意志薄弱的妇女取得更大的成功，可是任何成就都不会使你心满意足。由于虚荣心作祟，你注定要见异思迁，从这山看那山高。因此，强烈的虚荣心将毁掉你的一切，包括你一生中最大的成就，使之顷刻之间便默默无闻，化为乌有。你的每一个挫折，每一个失败，哪怕是最微小的失败，都将永远带着它的烙印。当你的虚荣心把你周围的一切都糟蹋、玷污、吞噬、砸烂、赶走和消灭干净而只剩下一片荒漠时，伴随你的便只有虚荣心了，那时，你再也拿不出什么东西可以满足它，便只好把你自己的躯体供它食用，但这一点儿也不顶事，因为它已经习惯于‘佳肴美酒’，对你的躯体根本不感兴趣，连闻也不愿闻。你就是这样一个人。虽然大多数人并不这样看，你自己也很不以为然，可是我已经把你看透了。”

说到这里，哥拉辛恰宁忽然不再说下去了。

夜深了，加比亚台上已经是凉风习习。岸上传来的琴声不知在什么时候停息了，除了永无休止的流水声，四周万籁俱寂。

两个青年各有一番心事在心头，完全忘记了他们在什么地方，忘记了他们在做什么，象他们这样专心致志地沉思默想，是青年人常有的事。不幸的哥拉辛恰宁受不了嫉妒的煎熬，终于把心里话和盘托出，这些话他不知费了多少心血，翻来复去考虑了多少遍，但总没有找到恰当的用词来很好地表这他的思想。可是刚才，他却很顺当地把自己的想法掏了出来，心中很不是滋味，既感到苦涩，也感到激愤。斯蒂可维奇动也不动，眼睛老盯着刻有土耳其文的白石碑，好象坐在电影院里注视着银幕一样。哥拉辛恰宁说的每一句话都很有分量，他听了很觉神伤，他觉得哥拉辛恰宁的话没有丝毫侮辱他的意思，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相反，他越听越觉得自己更加高大，似乎长了两个翅膀，带着不平静的心情悄悄地、迅速地、大胆地直冲云霄，远离了地面上的凡夫俗子，摆脱了他们的羁绊，不再受他们的纪纲和情感的束缚，他悠然自得，自命为时代的骄子、命运的宠儿（或类似的感觉），远远超越于一切人之上。他觉得他的情敌哥拉辛恰宁的说话声，同桥下黑魆魆的流水发出的声音完全是一码事。他身体下面是怎样一个世界，那里的人想些什么，说些什么，他可管不着，这不是他的事，因为他象鸟儿一样在空中翱翔。

在哥拉辛恰宁停止说话的当儿，他们两人都冷静了一点，但他们互相仍不敢正视。这时从桥头空场上来了几个醉汉，他们一面大喊大叫，一面哼着小调，歌词支离破碎，互不衔接，要不是他们突然闯来，天知道哥拉辛恰宁和斯蒂可维奇的争吵会怎样收场。一个高嗓门的醉汉压倒了其他人的声音，他尖声尖气，没头没尾唱了一支古老歌曲中的两句词：

俊俏的花妲阿夫达吉娜，

你是多么聪明，你是多么美丽呀！

桥上的两个年轻人从他们的说话声中辨认出这几个醉鬼是城里的纨绔子弟。他们有的步履整齐，一直慢慢地向前走，有的歪歪斜斜，跌跌撞撞。那放肆的笑语声告诉人们，他们是刚从一家名叫“白杨树下”的妓院出来的。

我在上一章忘了交待一下，维舍格列小城新近开设了一家妓院。(读者想必已经注意到我所不愿意写的东西是很容易从我的笔下漏掉的。)

大约十五年前，铁路还没有动工，一个匈牙利人带了他的妻子来到维舍格列定居。他姓戴尔迪克。他的妻子叫伊乌尔卡，她是诺维萨德人，会说塞尔维亚语。大家很快就听说他们打算在城里开一家妓院，老百姓当时还不知道“妓院”两字是什么意思。过不多久，妓院真的开张了，地点就在城郊斯特拉伊士特山脚下，那里长了几株高大的白杨树，妓院便因此而得名。妓院的房屋是一个前贝伊住过的，已经陈旧不堪，他们来后把它重新布置了一番。

这是城中名声最臭的地方。窗户整天紧闭，而且还拉上窗帘。一到晚上门口就点起一盏矿工用的灯，透出惨澹的白光，彻夜不灭。楼下的歌声和洋琴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戴尔迪克所带来的姑娘们的芳名在沉湎声色的年轻人和成年人中辗转相传。这些姑娘开始共有四人，她们是：伊尔玛、伊罗娜、弗丽妲和阿郎卡。

每星期五，鸨母伊乌尔卡的姑娘们便分乘两辆马车到医院去进行每周的例行检查。她们穿着白色和红色的衣服，帽子上插了花，手里举着长把阳伞，阳伞外沿的花边随风飘荡。一看到她们的马车过来，城里的妇女便赶紧让自己的女孩躲开，一面怀

着厌恶、害羞和怜悯的心情扭过头去。

铁路开工后，随着钱财的大量流入和外地工人的急剧增加，妓女的人数也增加了。戴尔迪克在那所陈旧的土耳其式的房屋旁边又盖了一所新房，屋顶用的是红瓦，远远就能看到。新房分三大间：一间是供一般人用的通间，一间是雅座，再一间是专给军官准备的。每个房间价格不同，分别接待身分高下的嫖客。城里的人说得好，过去人们顶多只能在扎里亚和罗蒂卡的小酒馆里破费两个钱，可是现在，他们的子孙却在"白杨树下"把自己挣来的钱或祖辈留下的遗产尽情挥霍掉。那里的欢声笑语，下流之至，不堪人耳，斗殴酗酒，因争风吃醋而造成的悲剧更是不胜枚举。因此，"白杨树下"是给许多人、许多家带来不幸的祸根。

前而提到的那群醉汉就是在"白杨树下"消磨了大半夜，现在他们到加比亚台上纳凉来了。他们的中心人物是一个名叫伯奇科扎的年轻人，他其实是个傻子。那些富家子弟看他老实可欺，把他灌醉了，让他出洋相。

这些花天酒地的公子哥儿走上加比亚台前，在靠近大桥栏杆的地方停了一会儿。在一片吵吵嚷嚷的喧闹声中，尼古拉·伯奇科扎以两升酒为代价同人打赌，说他可以在大桥栏杆上从这头走到那头。条件谈妥后，他便爬上栏杆，伸开两臂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往前走，恰似一个得了梦游症的人。他走到加比亚台时，发现了迟迟未归的斯蒂可维奇和哥拉辛恰宁；他没有同他们搭话，一而哼着小调，一而继续摇摇晃晃冒着危险向前走去，那一群酒肉朋友则跟在后而起哄。在惨淡的月光下，他的身体在桥面上留下了一个颀长的影子，他在栏杆上走走停停，东摇西摆，影子也跟着他在桥面上移动，同时，越过桥面的那部分影子，

一碰到对面的栏杆，便折断了。看着这些醉汉狂呼乱叫走了过去，斯蒂可维奇和哥拉辛恰宁站起身来，招呼也没打，便踏上了各自的归途。

哥拉辛恰宁向德里纳河左岸走去，他家就在河那边的奥克里德山上。斯蒂可维奇则向右岸的桥头空场走去，他走得很慢，是否马上回家，他拿不定主意。他不想离开这儿，因为这儿空气清新宜人，比城里好得多。他在大桥栏杆旁停了下来，他觉得有点疲乏，想找个地方靠一靠。

月亮已经落到维德瓦山后去了。年轻人倚在桥头的栏杆上久久凝视着哺育他的城市，好象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整个城市已进入梦乡，到处是一片茫茫的黑影，只有星星点点的灯光，尚未熄灭，闪烁夺目。军人俱乐部还有两个窗户亮着。琴声早已停息。军医和上校夫人那一对不幸的情侣 或许 正在谈论音乐、爱情，也可能哀叹各自的身世，他们现在已到了无法分手的地步，可是又不能结合。

斯蒂可维奇从他所在的桥头看去，罗蒂卡酒馆也有一扇窗户亮着灯光。他注视着大桥两侧的这几个窗户，久久不愿把视线移开，仿佛他在期待着什么。他疲惫不堪，神情沮丧。傻瓜伯奇科扎在大桥栏杆上的冒险表演，忽然使他回想起童年时代所见到的类似一幕。那是一个冬天的早晨，他正上学去，晨雾很大，他看到肥胖的独眼龙也在栏杆上做了一番表演。说来也怪，每次回忆起童年时代的事，他心里总要产生一股悲哀、凄凉的滋味。哥拉辛恰宁刚才严厉批评他时，他心里所激起的那种自命不凡、目空一切的想法已经不存在了。他觉得自己仿佛突然从高处跌落下来，同别人一样在黑暗的世界上艰难地摸索。他又想起了下面三件事，心里很不是味儿；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会

同那位女教师干那件见不得人的事，好象那是别人以他的名义干的；他也不敢相信自己竟会写出那样拙劣的文章，好象那也是别人写好后，不征得他的同意用他的名义发表的；他还想到了同哥拉辛恰宁刚才进行的长时间谈话，现在忽然觉得哥拉辛恰宁的话对他充满恶意和仇恨，完全是血口喷人和挑衅。

他想到这里，不由得心里一惊。这时河面吹来了一阵凉风，他禁不住打了几个寒战，从沉思中清醒过来，发现军人俱乐部那两个窗户里的灯光已经熄灭了。最后离开的几个军人从俱乐部走了出来，穿过黑暗的广场，身上的军刀发出的铿锵声和他们的说话声在夜空中迴荡。整个城市已进入梦乡，只有那个小酒馆的窗户还亮着灯光，斯蒂可维奇朝那儿瞟了最后一眼，怀着惋惜的心情离开了大桥，缓步向美以当山上他那可怜的家中走去。

第 二 十 章

这天夜里，城里唯一亮着灯光的窗户是酒馆楼上罗蒂卡的卧室。房间里放了一张小桌，上面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入夜之后，她就坐在小桌前休息。二十几年来，每当自己感到慵倦，想要摆脱一下酒馆里乱哄哄的嘈杂声时，她便躲到这里来清静一会儿。现在客人都散了，楼下一片寂静，死气沉沉。

她是十点左右回到卧室中来准备就寝的。临睡之前她走到窗前，呼吸了一下从河边送来的新鲜空气，朝紧靠岸边的那个桥孔望了一眼，虽然月光惨淡，桥孔依稀可辨，这是从她的卧室唯

一能看到的常年不变的景色。这时，她忽然想起一笔陈年旧账，便坐到桌前去寻找。她在账单里翻呀翻呀，不知不觉忘记了时间，打消了睡意，一直翻了两个多小时。

午夜早已过了，可她还在那里精神抖擞地核对账目，翻阅账本。

她渐渐感到体力不支了。每天白天同顾客谈话，做生意，她倒挺精力充沛，唧唧喳喳，应付自如，可是年岁不饶人，一到夜里客人散尽时，她就感到累得不行了。她老了，当年的美貌已经随着时光流逝。她现在面黄肌瘦，头发失去了光泽，头顶心已现出稀稀拉拉的样子。她的牙齿过去是那样洁白、坚硬，现在也开始发黄、脱落。她的一双乌黑的眼睛还是那样亮晶晶，但目光已变得呆滞无神，有时显出神情忧郁。

她现在感到疲乏，同当年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那时劳累了一天，身体尽管很累，但赚了很多钱，心里是甜滋滋的，跑到自己的房间里休息一会儿也就可以了。现在这一切已成过去，她已进入暮年，日子也变得艰难起来。

这一切，假如有人问起来，她简直不知如何回答，因为她自己也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她只是越来越感到时代变了，想赚点钱把家里搞得好好的，那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三十年前，她到波斯尼亚来开业的时候，一切是那样令人称心如意。大家都象她一样一个劲地往前奔，工作和家庭没有什么叫人不顺心的地方。每个人都兢兢业业，各得其所。社会秩序安定，法纪严明，人人都得遵守。罗蒂卡觉得那的确是一个清明的社会，可是现在一切都倒了个个儿，弄得乱七八糟。有些人莫名其妙地离开了正常轨道。每做一件事必须考虑得失，这本来是支配人们日常活动行之有效的法则，可是现在这个法则似乎已不再受

人重视，因为许多人每天做事、说话、写文章竟然是随心所欲，漫无目的，其结果只能是自讨苦吃。总之，社会生活正在分化、解体，年轻人所关心的不再是当前的现实生活，而是生活应当如何如何。因此，生活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人们在清谈中任凭大好时光悄然流逝，一点也不感到痛心。这太荒唐了，叫人根本无法理解，然而事实正是如此。罗蒂卡对此看得一清二楚，也无时无刻不感觉到。

她的酒馆从前总是顾客盈门，生意做得象欢腾的小羔羊一样富有生气，如今却是门可罗雀，同犹太人的基地一样死气沉沉。这种情况已非一日，十多年来一直如此。那时人们在城关砍伐森林，现在伐木声已逐渐远去，这使罗蒂卡酒馆失去了一大批常客，损失了一大笔收人。后来，卑鄙龌龊、寡廉鲜耻的戴尔迪克在白杨树下开了一家妓院，又夺走了罗蒂卡的许多顾客，因为他对他们殷勤备至，满足了他们在罗蒂卡酒馆无论如何所不能得到的东西。罗蒂卡对于这种为了赚钱不惜伤天害理的行为早已深恶痛绝。她不住地叹息世道完全变了，什么社会秩序，什么法纪全都不存在了，要想规规矩矩地挣钱谋生已不再可能。有一次，那还是在妓院刚开张不久，她实在气愤不过，便骂了戴尔迪克一句，说他是“老鸨”。戴尔迪克告了她一状，她被判犯了诽谤罪，并罚了款。今天，她还是骂他老鸨，不过不是当着什么样的人都这样骂，而是看谈话的对象。

从外国来的地位高贵的客人，都在新建的军人俱乐部里下榻，那儿有客房、餐厅，藏了许多陈年老窖，罗蒂卡从他们身上是什么钱也捞不到的。她的掌柜瞿斯达夫平时很少说话，但心眼灵活，办事敏捷，一向忠心耿耿，是她的得力助手。他跟她干了多年后，现在也离开了她，在繁华的闹市区开了一个咖啡馆，不

择手段地招徕顾客，同她竞争。此外，上面提到过，最近几年，城里还成立了几个歌咏团，建了几个书刊阅览室，那里备有咖啡招待，这也使罗蒂卡失掉了不少顾客。

总之，酒馆大厅当年那种人来人往一派兴旺的景象不见了，到雅座来小憩的客人更是寥寥无几，只有几个尚未婚娶的公务员在这儿用餐、读报、喝咖啡。罗蒂卡年轻时候的男朋友阿里贝伊·巴希奇依然是沉默寡言，但对她不改初衷，每天下午都到酒馆来小坐，他待人接物是那样稳重得体；虽然已到了花甲之年，手脚也不怎么灵便了，可是他的起居还是那样刻板成章，很有规律，衣着也很讲究。几年前，他得了严重的糖尿病，至今未愈，所以给他准备咖啡时只放糖精而不放糖。他一言不发呆在一边，一面抽着烟，一面静听罗蒂卡唠叨她的一桩桩琐事。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他便安详地悄悄站起身来，回到他的赤伦恰的家中去。

罗蒂卡的近邻、富翁巴夫雷·郎可维奇也是每天必到的。他早已脱去当地的民族服装，穿上了一套合身的便服，不过还戴着那顶红色的平顶穆斯林帽。他常年穿着一件浆过的衬衣，领子是硬的，袖头是圆的，偶尔碰到什么账目他便在袖头上记几个数字。他早已成为维舍格列商界首屈一指的大亨，地位很稳固，但也不是万事如意，心里没有一点疙瘩。

同所有生活富裕的老人一样，他也被新的时代，被纷至沓来的新思潮、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思想方法和各种新名词弄得莫知所措。在他看来，一切不遂心的事都是“政治”两字造成的。否则，他是不会忧虑重重，心绪不佳的。他经过多年的辛劳，省吃俭用，从不敢乱来一点，日子才过得比较顺心，可是如今完全由于“政治”的关系，使他晚景不得安宁，不能享几年清福。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趋炎附势，和大部分同胞分道扬镳，但也不愿意得

罪政府，希望至少能在表面上同当局相安无事。可是要做到这两点非常困难，几乎没有一点可能。他甚至同自己的亲生儿子也谈不拢。

他觉得自己的儿子也和其他青年人一样简直令人捉摸不透。（然而也有许多老年人对他们的孩子言听计从，其原因，有的是迫于某种需要，有的是意志薄弱不敢顶住。）在他看来，这些青年的一言一行形同叛逆，因为他们不愿意在现在的社会上安分守已地过日子，似乎只有上山为寇才称心。他们说话、做事总是心血来潮，说到哪儿做到那儿，完全不计其他。他们花钱如流水，干起活来吊儿郎当，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压根儿不知道银钱来之不易，总是在那里说呀，说呀，说呀，用巴夫雷训儿子的话说，这是“对着星辰狂吠，顶个屁用”。

他一生不管做什么事都是谨小慎微，从不马虎一点，可是现在他的儿子却在那里没完没了地考虑不着边际的问题，整天夸夸其谈，过着浪荡公子的生活。看到这些，他不禁怒从心起，心胆俱寒。更使他不能安心的是他们的轻率言行所触及到的正是生活的根本，正是他认为最珍贵最神圣的东西。当他叫他们作出令人信服、令人放心的说明时，他们总是以一种不屑置辩的神情傲慢地唱几句空空洞洞的高调，什么自由、未来、历史、科学、荣誉、尊严，不一而足，他一听到这些抽象的名词，身上就起鸡皮疙瘩。

不过，他同罗蒂卡倒合得来，常到她的酒馆来小坐一会儿，一面喝着咖啡，一面同她交谈生意的情况和市场的行情，并举出两人都认为确实可靠的数字作为佐证。“政治”及其他空洞无物、危言耸听的新名词，他们当然是矢口不谈的。巴夫雷还一边说一边掏出一个小得可怜、磨得发亮的铅笔头——这已不是他二

十五年前用的那支铅笔了——把数字记下来认认真真地核算一下，验明是否有讹。他们还常提起过去商业场中传为佳话的某些往事，那些事所涉及到的人大多已不在人世了。谈完之后，巴夫雷便弯着腰拖着沉重的步伐，穿过马路向集市广场他的店铺走去，罗蒂卡仍独自一人继续在那里想心事，审察账目。

罗蒂卡做的股票交易也不比她的酒馆生意好多少。维舍格列被占领后头几年，不管哪个公司发行的股票都很可靠，购买者所关心的只是所得利润大小。那时候酒馆刚刚开张，罗蒂卡手头剩余的现款不多，而且还没有得到后来所得到的信贷，所以对于这种一本万利的事只好望洋兴叹。等她手头灵活，又得到信贷后，行市却大变了，因为在十九世纪末叶到二十世纪初年，奥匈帝国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危机影响所及，罗蒂卡手里的股票天天看跌，她每个星期天看到新到的«维也纳行情周报»时都要失声痛哭一场。当时酒馆的生意还不错，可是全部进项也弥补不了股票的普遍下跌给她造成的损失。过度的悲伤使她忧思成疾，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经过两年方才治愈。她痛苦万状，几乎象疯了一样，同别人谈话总是心不在焉，前言不搭后语，同时两只眼睛木然地看着对方，但在她眼前晃动的却是«行情周报»上一个个能给她带来祸福的小标题。她想，既然一切都靠碰运气，那就一不做二不休，坚决干到底，于是又买起彩票来。当时各国发行的彩票，只要有办法她就一定弄到手，她还买到了四分之一张西班牙“圣诞”彩票，其头奖可得一千五百万比塞塔①。每次临近抽签，她就激动不已，坐立不安。一看到中签号码中没有她购买的彩票就嚎啕大哭，不能自禁。她祈祷

① 比塞塔，西班牙币名。

上帝给她一个意外的喜讯，让她的彩票得个头奖，但从未如愿以偿。

七年前，她的姐夫察勒同两个退休的富翁合股在城里办了一个"现代奶制品合作社"，创办资金由罗蒂卡分担五分之三。他们对这个合作社所抱的希望很大，心想它一定会开张大吉，从而把维舍格列以外，甚至波斯尼亚以外的资金都吸引过来。然而正当合作社处于初具规模的重要关头，突然发生了所谓"吞併事件"，吸收投资的美梦顿然化为泡影。不但如此，由于边境地区形势不稳，已在社内的资金也纷纷提取外逃。两年后合作社宣告关闭，当初投入的资本全部赔得干干净净。为了弥补损失，罗蒂卡不得不把她手上最稳妥可靠的股票拿出来卖掉，其中有萨拉热窝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和设在都茨拉的萨尔维碱厂的股票。

与此同时，罗蒂卡家里也发生了一些伤脑筋的事情，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察勒的一个女儿伊兰娜意想不到结了一门好亲事（妆奁是罗蒂卡送的）。可是察勒的长女尚未婚嫁，她的婚姻几经周折也未谈成，妹妹的喜事对她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她成天怏怏不乐，说话象老处女一样尖酸刻薄，使得家里和酒馆的气氛非常别扭，令人难以忍受。察勒本来就不是一个心眼灵活办事敏捷的人，现在则变得更加反应迟钝没有主见，没有一点做父亲的威严。他的妻子德保拉虽然长期多病，过了中年还给他生了一个男孩。孩子先天残废，发育不良，长到十岁还不会说话，腿也站不直，只会咿咿呀地乱叫，满地爬来爬去。不过，可怜的小家伙非常招人疼爱，他爱姨母罗蒂卡胜于爱自己的母亲，经常缠住她不放，罗蒂卡虽然诸事繁忙，心里乱糟糟的，但每天总要分出一部分精力来照料他，喂他吃饭，替他穿衣，哄他睡觉。她

一看到这个病孩心里就不是滋味，心想现在酒馆生意不好，没有钱把他送到维也纳去找名医治疗或送到疗养院去疗养一下。不过，也未必会有什么灵丹妙药能把孩子的残疾治好，既然这是上帝的安排，那就不是人们的善心和祈祷可以奏效的。

在酒馆生意兴隆的年代，罗蒂卡曾经在经济上接济过几个原籍加里西亚的侄女，资助她们上学，为她们置办妆奁，在她们身上费了不少心血。现在她们当中好几个人已经成家立业，生意做得不错，小日子过得满好。她们经常给罗蒂卡寄来问候信，信中洋溢着对罗蒂卡的敬意和感激，并报告了她们的近况。阿非尔麦叶家的人虽然也得到过她的好处，全靠她的资助才上了学，成了家，可是他们对于加里西亚穷亲戚的下一代却毫无同情心，不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去提携他们一把。他们住在外国城市里，除了自己那个小天地，其他什么也不闻不问。他们似乎认为尽快地把那个贫穷狭小的故乡达尔诺伏——他们总算万幸离开了那里，摆脱了困境——永远忘得一干二净是他们平生最大的能耐。罗蒂卡现在孤掌难鸣，再也不能象往年那样积下一点钱去搭救达尔诺伏的穷亲戚了。每天从早到晚，她一想到那些人将永久过着贫穷愚昧的生活时，心中便如刀绞，因为那种被人瞧不起的贫困生活她深有体会，并与之奋斗了终身。

她所接济的人中发生了不少令人不胜欷歔的事。尤其叫人痛心的是，那些学习成绩出众、最有希望的人后来忽然急转直下走上了歧途。罗蒂卡的一个侄女，钢琴的天分很高，她在罗蒂卡的支持和鼓励下上了维也纳音乐学院，顺利地毕了业。几年前正当她在乐坛初露头角的时候突然服毒自杀，谁也不知道究竟为的是什么。

她的侄儿阿尔贝尔是全家的希望，也是罗蒂卡的骄傲。他

在中学和大学名列前茅。罗蒂卡内心一直希望他能得到皇家颁发的毕业证书和御赐金环，可是什么也没有得到，其原因纯粹由于他是犹太人。罗蒂卡觉得既然犹太人注定不能担任政府高级官员，他至少可以在维也纳或乌克兰的利沃夫市做一个有名望的律师，从而了却她一桩心事，使她为把他抚养成人而在他身上所花费的心血得到某种精神上的报偿，结果大失所望。她的堂堂正正的法学博士竟然做了一个东跑西颠的新闻记者，成了一名社会党人，尤有甚者，他还是一九〇六年在维也纳发动总罢工、闹得名声很臭的该党极右翼的一员。罗蒂卡从维也纳出版的报纸上亲眼看到，维也纳当局后来采取了措施，把那些图谋不轨的外国人驱逐出境，她的博士阿尔贝尔·阿菲尔麦叶，出名的犹太人煽动者，也在其中。他在监狱里过了二十天的铁窗生活后，被奥地利当局驱逐出了国境。用维舍格列人的话说来，他已沦为强盗了。几个月后，罗蒂卡接到她所宠爱的阿尔贝尔给她的一封信，信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寄来的，告诉她他已流亡到那里。

不幸的消息传来，她悲痛已极，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再也坐不住了，于是拿着阿尔贝尔来的信去找她的姐姐和姐夫。由于过度失望，她失去了常态，一把搂住泣不成声的德保拉的脖子，歇斯底里地喊着："这可怎么好？你说，这可怎么好？一个人在那里人地两生，举目无亲，怎么能重新站起来？你一放开他，让他独自去闯，他就摔倒。往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完了，全完了！"

"上帝，上帝，上帝，"可怜的德保拉泣不成声，连连地叹道，她当然无法回答罗蒂卡的问题。罗蒂卡自己也找不到答案，但她不象德保拉那样无声饮泣，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合上双手，眼睛向上，愤怒地绝望地叫道：

"他成了社会党人。社——会——党——人！当个犹太人

还不够瞧的，还要去干那劳什子。啊，伟大的上帝，至尊无上的上帝，我哪儿得罪了你，你要这样惩罚我？好一个社会党人！”

她为阿尔贝尔的遭遇悲痛欲绝，但事情一过也就不再提及了。

三年后，罗蒂卡的另一个侄女，也就是阿尔贝尔的妹妹，在佩斯找了一个称心如意的配偶。罗蒂卡为姑娘准备了嫁妆，并在说服她的父母同意这场婚事上起了决定性作用。原籍达尔诺伏的阿菲尔麦叶一家子女很多，一向把孩子和一尘不染的犹太教传统视为珍宝。罗蒂卡这个侄女要嫁的男人是证券交易场中的大亨。他是个基督教徒，属加尔文教派。他提出女方必须改信基督教，他方能同她结婚。姑娘的双亲坚决不同意，罗蒂卡则认为此事可行，她觉得必须从全家的整体利益去考虑问题，反复给他们打了个比方：她说好比一条船，载客过多，航行不便，易出危险，为使大家都得免于难，只有一个办法：把船上的一部分货物扔到海里去以减轻船的负担。她的话最后说服了姑娘的父母。姑娘于是受了基督教洗礼，举行了婚礼。罗蒂卡本想借助侄女婿之力，把已经长大成人的侄儿，哪怕是一个也行，送到佩斯去做点生意。可是意想不到佩斯这位姻亲婚后不到一年就不幸亡故了。极大的悲痛给年轻的妻子造成了神经上的错乱，几个月后还是那样一蹶不振。如今，她她到佩斯已经四年了，但她那病态的精神创伤依然如故，出言行事一直半疯半傻。她硬要把那富丽堂皇的房间挂上了黑色的帐幔，每天都要到公墓去走一趟，坐在丈夫的坟头用柔和的声音认真地把当天交易所的行情表从头到尾读一遍。人们为了使她恢复常态，多次劝告她，叫她不要这样做，她却不紧不慢地答道：这是死者生前最喜欢、也是他曾听到过的一支最美妙的乐曲。

日积月累，罗蒂卡的这间小房间里存放着许多同各种人有关的单据，有许多账单，许多不知还了没有的借条，以及一大本分类账簿，其中不少细目已经结清而被划掉了。罗蒂卡在生意上所遵循的准则依旧未变。她虽然精力不济，但并不灰心。每当生意遭到损失，或受到什么挫折时，她从不气馁而是集中全力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她最近几年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怎样使自己守住现在这个摊子，但即便在这时，她所追求的目的仍同过去一样，是一目了然的，而她所表现出来的坚强毅力也与往年家道兴旺时一样。在酒馆里她是一家之主，在城里大家都叫她"罗蒂卡大婶"。维舍格列和其他各地还有许多人等待着她的周济，等待着她去出主意或安慰两句，他们根本不知道，也不会想到罗蒂卡现在的精力是一年不如一年了，然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其严重程度超过了人们的想象，也超过了她自己的感觉。

墙上的木制小挂钟敲了一点。罗蒂卡双手扶着腰艰难地站起来，轻轻地吹熄木头小圆桌上的绿罩大煤油灯，踏着碎步来回踱了一会儿，然后上床就寝。临睡之前她总要在房间里来回走几步。

这样，已经进入梦乡的城市便全部陷入一片黑暗了。

第二十一章

一九一四年来到了，这是德里纳河上的大桥最后存在的一年。同以往各年一样，这一年来得很慢，但各种事件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波涛汹涌之势，已隐约可见。

大桥附近的维舍格列已经历了许多个春秋，今后也还会继续存在下去。虽然已经过去和即将到来的每一年都各有特点，但一九一四年仍是最不平凡的一年。这至少是从这一年过来的人所得到的印象。他们认为，尽管人们已经对这一年发生的事情发表了大量的见解，写了大量的文章，可是谁都不会夸口，也不敢夸口，说他已经把当时见到的人类所经历的这场遭遇全部揭示出来，何况由于时间的关系，许多事情至今仍然真相不明。比如(这至少是他们的看法)，这场大规模的敌对行动一夜之间就把成千成万的人卷了进去，不但生灵遭到泯灭，连人们的家园也不能幸免，可是曾几何时谁把这一切说清楚了？还有，在这场大混战中，有的人提心吊胆，惶惶不安，有的人对于这种无异于自杀的行动却表现出了疯狂的劲头；有的人巧取豪夺，杀戮成性，丧尽天良，有的人情操高尚，视死如归，他们摆脱了自我，一度达到了崇高的理想境界，可是凡此种种又有谁能解释清楚？况且这些事永远也不会再有人去津津乐道，因为当时的目击者有的已经呜呼哀哉，有的虽然健在，但也已耳聋眼花，昏聩老朽，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来了。总之，这些旧事人们只会把它忘掉，谁也不会去重提，否则过了若干年后，这些事怎么会又再度重演呢？

一九一四年夏，当掌握人类命运的那些人把欧洲的居民从享受普选权的舞台转移到事先准备好的义务征兵的舞台时，维舍格列这个弹丸之地已经充分显示出一场大难的初步迹象，后来这场大难席卷了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人类历史当时正处于两个阶段的交替时期，一个正在结束，一个刚刚开始，人们对于前者的认识要比后者清楚得多。那时，人们还在寻找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为暴力辩护，还在从古往今来的历史文献中寻找为野蛮行径开脱的现存依据。总之，一切都掩盖在堂而皇之的名

目下，具有一种新奇的魅力，不过，这种难以描述的惊人魅力，是那样地昙花一现，转瞬之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使得那些觉得它妙不可言的人后来竟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这种事我们只想在这儿稍带一笔，还是让未来的诗人和学者去研究和阐明吧！那时他们采用的方法一定非常高明，是我们今天所无法想象的。他们那种宽阔的情怀、自由的争论空气和大胆的想象力，也是我们今天望尘莫及的。因此，他们一定会对不平凡的一九一四年作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使之在世界历史和人类发展史上得到应有的地位。本书所要谈的，主要是德里纳河上的大桥在这一年所经历的不幸遭遇。

一九一四年维舍格列的夏天，是人们一生中所能想得起来的最明朗、最美丽的夏天，所以如此，是因为大家都意识到在广阔的地平线上已经出现大片大片的乌云，预示着一场灾难即将来临。

这年夏天也确实好得出奇，胜过以往任何一年。李子长得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五谷也丰收在望。经过十来年的动荡之后，大家都一心向往着能有一个安定的时期，能有一个丰收的年景，以便弥补前几年在各方面遭到的损失。（人们最大的弱点，无疑是压根儿不善于预测未来，这同人们在许多事情上所表现出来的天赋、所拥有的广博的知识和巧夺天工的技能恰成鲜明的对照。）

今年的年成真叫好，阳光充足，风调雨顺，维舍格列整个山谷万类争荣，一派生机勃勃。由于土地墒情好，不管种什么都能发芽开花，枝叶繁茂，简直可以感到一股旺盛的生命气息如同一团团淡蓝的、缥缈的水气在田垅之间飘荡。奶牛和母羊乳房胀得鼓鼓的，走起路来岔开两条后腿，显得很是艰难。每年初夏

沿撒夫河顺流而下到河口产卵的鱼群今年来得特别多，孩子们在水浅的地方就可以用桶直接捕捞，然后把捞到的鱼扔到岸上。甚至大桥的轻质石料也好象成了有生命的东西，在维舍格列整个大地一派热气腾腾、欣欣向荣的感染下显得更轻了。

类似这样的好年成在维舍格列并不多见，可是只要遇上一个，人们就立即把过去的艰难岁月一股脑儿忘得干干净净，根本不考虑今后还可能出现灾年，他们依据着丰收在望而在生活上大手大脚，很少想到这个好年景主要是天时地利造成的，他们的劳动汗水不过起了很小的作用。

那些总感到不满足的农民现在也不得不承认今年的年成实在好，每逢有人赞不绝口时，他们还要说上一句："但愿年年如此……"。商业区的人也在埋头苦干，那种劲头同蜜蜂采蜜不相上下，一天到晚忙个不停。虽然庄稼还在抽穗，李树花还未落，他们便争先恐后到四乡去预购了。老乡们有的站在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枝头的李树下，有的蹲在麦浪起伏的田头，陶醉于眼前一派丰收美景，他们看到唯利是图的商人蜂拥而来，不禁对他们长途跋涉的来意产生了一种戒心。他们心里这样想，脸上也流露出紧张不安的神色，同他们在荒年时整天累月愁眉苦脸的样子没有多少差别。

至于那些实力比较雄厚的富商大贾，他们是不会长途跋涉亲自到乡间来张罗的，因为农民会自动找上门来。每逢赶集，巴夫雷·朗科维奇的店里就挤满了需要钱花的农民。维舍格列最富的犹太人商多·巴波的店里也是如此。（虽然维舍格列早已开了几家银行，可以从那儿得到贷款，但四乡农民，特别是年纪大的，由于祖祖辈辈一向在大商店买东西，借钱，所以至今仍改变不了祖上遗留下来的习惯。）

商多的店铺是用大石块砌的，墙很厚，地上铺了石板，造得既高又结实，在维舍格列商业区首屈一指。店铺的大门和百叶窗则是铁制的，窗户既高又小并且装了密密的铁窗栏。

店铺的前半部是门市部。靠墙立着高大的木头货架，货架上放满了搪瓷器皿。顶棚很高，光线暗淡，那儿悬挂着成串的小商品，如大小不等的油灯、土耳其式的咖啡壶、鸟笼、捕鼠器以及编筐之类的什物。一条长桌旁放着一桶桶铁钉、水泥、石膏和各种颜料以及用铁丝串在一起的没有安把的铁铲、铁镐和铁锨。各个角落由于夏天阴凉，白天光线暗淡，堆放了不少用白铁桶装的煤油、松节油和各种油漆。

大部分货物都放在店铺后面的一间房间里，与一个小铁门相通，里面堆着一些大家具，如铁制炉灶、枕木、犁头、滑轮以及铁镐等等。货物码得很高，各堆之间有一条狭窄的通道，走在其间好象处身于两道高墙之间。这里常年不见阳光，进去必须点灯。

店铺由于是用大石块砌的，又是石板地面，到处堆放着铁器，所以一年四季阴冷潮湿，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消除。新来的学徒面色红润，浑身充满活力，但过不了几年就变成沉默寡言、面黄肌瘦的小老头了。他们终身在这儿辛勤劳动，一个小子儿也不敢乱花。这种环境对于一代一代的店老板说来，当然也是难以忍受，并有害于健康的，可是当他们想到自己之所以能发财，赚大钱，正是亏得这爿店时，便反倒喜爱这种环境了。

商多这时坐在一张小桌前，桌旁放了一个凡尔登牌保险柜，他已经不是三十年前的商多了，那时他浑身是劲，爱热闹，常可听到他大声喊道："给独眼龙来一瓶罗姆酒。"由于多年的操劳和年事已高，他的身体已大大不如当年。他现在虚胖臃肿，面容

憔悴，两个黑眼圈一直扩张到两颊。他的视力衰退了，鼻梁上架着一副金边眼镜，镜片非常厚，一双黑眼睁得很大，不时露出胆怯严肃的神情。他总戴一顶樱桃红的穆斯林帽，这是他穿旧日的土耳其服装始终保留未变的式样。他父亲孟多·巴波是一个满头银发的八旬老人，性情还是那样好强，但眼睛已经不行了。遇上天气晴朗，他便到店里来走走。两只老眼带了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眼内因昏花而泪水汪汪，好象就要嚎啕大哭一样，他看了看坐在保险柜旁的儿子和站在柜台里的孙子，在店里兜了一圈，然后用右手扶着十岁的重孙慢慢走回家去。

商多有五男六女，大都已经结婚。长子拉福协助他管理店务。他自己的孩子也很大了，其中一个沿用祖父的名字，现在在萨拉热窝中学读书。他是个细高条，面色苍白，眼睛近视，八岁时就能在学校举行的晚会上登台朗诵兹马伊①的诗歌。他学习成绩优良，但不愿上犹太人教堂，假期里也不愿到店里去给祖父帮帮忙。他想当一个演员或做其他了不起的大事，使自己一举成名。

商多在翻阅一本按字母顺序编排、满是油污的大账簿，一个来自乌扎尼沙地方，名叫伊伯罗·捷马罗维奇的乡下人伏在他旁边的一个装铁钉的空桶上看着他。他在核算伊伯罗欠他多少钱，几成利息。“Sinquenta, sinquenta i ocho, sinquenta i ocho, sesienta i tres……”②商多小声用西班牙语数着。

伊伯罗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似乎他在变魔术而不是在结算他欠他的那一笔账，这笔账他自己心中十分了然，连做梦都想

---

① 伊万·伊万诺维奇·兹马伊（1833—1904），塞尔维亚著名爱国诗人，写过各种体裁的诗歌，尤其擅长儿童诗歌。

② 西班牙语：“五十，五十八，六十三……”

着。商多算完后说出了所欠款项和利息的总数，伊伯罗低声说道："是这个数吗？"同时迅速地把自己心中装的那个数和商多报的数核对了一下。

"就是这个数，伊伯罗，没错儿。"商多说了一句在类似场合常说的一句口头禅。

后来他们还是客客气气地把这笔债的准确数目弄清楚了，伊伯罗接着表示要再借一笔钱，商多提出了新的条件和他所能借出的数目。这种事不是轻易便可达成协议的。两人之间于是展开了一场对话，对话的内容，包括最微小的细节，与五十年前伊伯罗的父亲因为青黄不接向商多的父亲孟多借钱时所进行的谈话简直不差分毫。他们把该谈的主要问题撇在一边，先来一大套空空洞洞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不了解内情的局外人听到他们的谈话，根本想不到他们是在借钱的问题上兜圈子。这至少是人们常有的印象。

"今年我们这儿的李子比任何地方都长得好，"商多说道，"真是多年没有见过的好年成。"

"是的，感谢真主，今年一定是个丰收年。要是真主帮忙，往后不出岔子，那么今年的李子和面包是有得吃的。这个意见恐怕谁也不会反对。可是天晓得你们会出什么样的价钱呢。"伊伯罗偷偷地看着商多，心事重重地说道，一面用大拇指抚摸那件绿粗布裤子的裤缝。

"价钱嘛，现在还说不上，等你把东西运到城里来，那时自然会清楚的。你应当知道，常言说得好，'价钱掌握在卖主手里。'"

"一点不错，愿真主保佑，收割前不出意外，"伊伯罗答道，他对今年丰收在望的庄稼能否全部拿到手仍有点把握不准。

"当然啦，真主如果不愿意你们拿到眼看到手的东西，那你

们将颗粒无收。失去真主的保佑，你们在播种之后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将是白费劲。"商多一面说，一面用手指向上指，意思是真主的保佑来自天上，可是他指的地方却是又高又暗的顶棚，那儿挂着许多大小不等的白铁油灯及其他成捆的小商品。

"你说的完全对，白费劲，"伊伯罗叹道，"我们不管干什么，如果没有伟大的、至高无上的真主保佑，那将一事无成。什么铲土、除草、修枝、选种全是白费劲！要是真主不让你搞，你就别想得到任何好处，可是假如真主要我们有个好收成，那我们谁都不愁吃不愁穿，而且可以把多年积压的债务全部还清，可是真主还得保佑我们身体健康！"

"是啊，身体第一，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强。人就是这样可怜；你如果什么都给他就是不让他有个好身体，那就等于什么也没有给他。"商多的话越来越空泛无聊。

伊伯罗跟着也说了一些他对于健康的看法，这些看法同商多的看法一样，纯属老生常谈，毫无新鲜之处。他们就是这样在鸡零狗碎的琐事和陈词滥调上兜圈子，浪费时间。到一定的时候，等这种陈腐的客套话说得差不多了，他们的谈话才回到正题上来。于是他们俩又就伊伯罗打算再借一笔钱的数目、利息、归还日期和归还办法，重新讨价还价。他们谈了很久，时而声色俱厉，时而平心静气，双方都有点快快不乐，但最后还是克服了分歧，达成了协议。这时，商多站起身来，从衣袋里取出一串钥匙，钥匙由一根链子系在腰间，他并没有把钥匙串从身上解下来，而是把保险柜的钥匙直接往上面一插，同所有大保险柜一样，柜门发出一阵吱呀的响声，接着便慢慢地庄重地打开了，后来关上时又发出一声很好听的铁器碰撞声。商多把钱一文不差地点交给伊伯罗，态度认真、仔细，非常严肃。随后，他马上换了一个腔调

大声说道：

“这回便宜了你，你总该满意了吧，伊伯罗？”

“是的，谢谢。”伊伯罗若有所思地低声答道。

“愿真主给你降福。愿我们大家都太太平平，往后的生意还有得做的。”商多现在是神采奕奕、笑声琅琅，刚才那种愁眉不展、局促不安的样子一丝儿也没有了。他还打发小孙子到对面的咖啡馆去要两杯咖啡，“一杯要糖，一杯不要糖。”

一个农民已经在店铺门前等待着，来意与伊伯罗相同：结清前账并再借一笔钱。

这些带着今年大丰收的喜讯的乡下人川流不息地到来，使商多常年阴凉的店铺里出现了一股罕见的热气。热气在保险柜上留下了一层非常细小的水珠，商多的眼镜也蒙上了一层灰蒙蒙的水气，他把肥硕焦黄的脖颈上的衬领解开一点，用手帕擦了擦眼镜片上的水气。

维舍格列这一年的夏天就是这样开始的。

可是正当人们兴冲冲地谈论今年的丰收年景时，维舍格列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事情是这样的，今年年初离维舍格列不远的乌瓦小镇发生了一种传染病，小镇位于边界上（以前称为土耳其一奥地利边界，现在称为塞尔维亚一奥地利边界）。那里有一个兵营，兵营里发现两个人得了传染病，维舍格列的军医巴拉赫大夫闻讯后立即带了一个护士和必需的药品赶去。办事敏捷、果断的军医一到乌瓦便采取了种种措施，他首先把病人隔离开来并亲自给病人治疗、护理。在他的精心治疗下，十五个病人只有两人没有抢救过来，所以传染病很快就被控制住而没有向周围地区蔓延。可是等到绝大部分人都痊愈后，他自己却病倒了。他是个医生，怎么也给传染上了，这真叫人没法理解，他的

病情发展很快，短短几天便一命呜呼，这一切都带有一种浓厚的悲剧色彩。

为了防止传染病蔓延，人们不得不把年轻的军医在乌瓦就地安葬。他的相好鲍尔夫人同她的丈夫及其他几个军官参加了葬礼。她并花了几个钱在军医的墓前立了一块简陋的墓碑。葬礼一完她便离开维舍格列和她的丈夫永别了。维舍格列人传说她到维也纳附近的一所疗养院去了。实际上，这种说法不过是青年姑娘中流传的一种无稽之谈，年纪较大的人才不管这种闲事呢，传染的危险刚过去，预防措施一取消，他们就把军医和上校夫人忘得一干二净。这些年轻姑娘既缺乏生活经验又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根本不懂“疗养院”是什么意思。不过，军医和上校夫人前不久在山间羊肠小道散步时所流露出来的卿卿我我的样子，意味着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不用人指点，这些年轻姑娘一看就会知道的。因此，当她们在闲聊中谈到这一对不幸的情人时，一提到“疗养院”这个陌生的词儿，心中便以为所谓疗养院乃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既遥远又凄凉，失节的漂亮女人都在那里洗刷她们的前愆。

在维舍格列四郊的田野里和山坡上，一望无垠的庄稼和李子长势喜人，日趋黄熟。到了夜间，大桥附近的军人俱乐部里灯火辉煌，面向德里纳河的窗户全都敞开着，不过，去年夏天从窗户里传出来的悦耳的小提琴声和钢琴声，今年再也听不到了。鲍尔上校同一群中年军官正坐在一张桌旁饮酒，脸上显露着憨厚的微笑，由于天气闷热，又喝了不少红葡萄酒，他全身都汗湿了。

青年人坐在加比亚台上纳凉，他们的歌声笑语在夜空中荡漾。六月底快到了，大家都在等待在外地读书的大中学生回来过暑假。每天晚上，大家在加比亚台上说说笑笑，感到时间过得

很慢，生活是这样朝气蓬勃，丰富多采，永远如故，没有任何让人发愁的地方，谁也不知道这个好光景还能继续多久。

天黑之后，城里的主要街道路灯齐明，但已不是昔日的油灯，而是电灯了，这还是今年春天才改装的。一年前，离城两公里远的河边兴建了一座电动锯木厂，锯木厂还附设了一个从松木碎片里提取松节油和松脂的车间。后来市政府和该厂商定，让它的小发电厂为城里的街道提供照明用电。这样一来，原来装着绿色灯罩的煤油灯和每天负责点燃和擦洗灯罩的大个子费尔卡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消声敛迹了。横贯全城、从大桥一直延伸到新市区的那条大街装的是用毛玻璃制的大灯泡，大街两侧蜿蜒于比加瓦、美以当和奥克里德山坡上的小胡同则装的是普通灯泡。每晚路灯一亮，在一排排灯光后面便留下了大块不规则的暗影，那是分布在山坡上的庭院和花园。

一天晚上，小学教员左尔卡和尼古拉·哥拉辛恰宁，坐在一个黑黝黝的花园里窃窃私语。

去年夏天，斯蒂可维奇回来度假时，在他们两人中掀起的一场轩然大波，延续很久，直到今年春天方才平息。事情是这样的，去年冬天，为迎接一年一度的圣萨瓦节①，大家在“塞尔维亚之家”排练节目，有器乐合奏和话剧。左尔卡和哥拉辛恰宁也参加了排练，一天排演完毕走在回家的路上，两人碰到一起便交谈起来，从而打破了他们从去年夏天闹翻以来所形成的僵局，不过只是寥寥数语，态度矜持，语气生硬。从此之后，他们的见面机会就日渐增多，虽然每次总免不了要争吵几句，青年人就是这个脾气，他们宁愿忍受同自己的情人争吵所带来的痛苦，哪怕这些

① 萨瓦主教在十三世纪创立了一个独立的、不受土耳其当局控制的塞尔维亚教。圣萨瓦节是当时塞尔维亚人带有宗教色彩的民间节日，庆祝规模在教育界特别宏大，因此也是一个文化节日。

争吵常使他们感到尴尬难耐，灰心失望，也不愿过一种平淡无奇没有爱情寄托的孤独无聊的生活。左尔卡和哥拉辛恰宁正是在没完没了的吵闹中言归于好的，所以他们自己也说不上究竟在什么时候又怎么重新和好了。这几天天热不可耐，每夜纳凉正是他们见面的好机会。虽然斯蒂可维奇的影子还不时浮现在他们的脑海中，在两人之间爆发一场无休止的争吵，但这并不会使他们感情疏远，从此分道扬镳，相反，每次吵过之后他们反倒更加亲近了。

现在四周笼罩着一片黑暗，他们坐在一根砍倒的核桃树干上，对着山下沿河一带的灯光出神，清风吹过送来德里纳河的单调流水声。哥拉辛恰宁刚才说了很多，现在口干舌燥便停住了。左尔卡整个晚上一直没有开口，这是女人的特点，她们视爱情为生活中最重要、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事情，整日价考虑来考虑去，无心同别人攀谈。

去年这个时候，斯蒂可维奇突然闯进她的心中，在她的脑海里唤起了种种无比美好，无比幸福的遐想，以为他们俩情投意合，是一对美满姻缘，婚后生活一定会非常甜蜜，可以白头偕老。可是好景不长，这种想法很快就破灭了。尽管她年少无知，在爱情的罗网中陷得很深，但她很快就发现斯蒂可维奇这个人忽冷忽热，感情容易增进也容易降落下去，他不论遇到什么事总是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全不考虑她左尔卡，更不去精心培育两人之间的共同感情，而她却认为这正是超于他们两人之上的更重要更崇高的东西。后来，他走了，行前连招呼也没打一声。她陷入极度的迷惘和痛苦之中，心如刀绞一般难受。不久她收到他一封来信，信的文字华丽，看上去真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但字斟句酌，毫无真实感情，同律师的讼词没有多少差别，总之通篇空空

洞洞，言之无物。信中确实也谈到了他们的关系，不过用词虚浮，大言不惭，那种口气简直让人认为他们是一对感情和睦的名人，安息黄泉之下已经一百来年了。她直率地给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复信，可是接到的回信却是一张明信片，明信片上写了简短两行："我现在工作繁杂，整天忙得晕头转向，无暇动笔，但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也想念和你一起在维舍格列度过的宁静的夏夜，以及德里纳河的潺潺流水和随着阵阵晚风飘来的花草的芳香。"除此而外，便什么话也没有了。她搜索枯肠，想看一看自己当时是否听到过潺潺的流水声和闻到过花草的芳香，但怎么也记不起来。这不过是他一时在兴头上随意写上的两句话罢了。当然，这一点细节也许是自己忘记了，他不也就是这样一个健忘的人吗？除了流水声和花草的香味，他还能记得起什么来呢？她感到自己看错了人，受他欺骗了。一想到这里她就五内俱裂，几乎气得昏厥过去，但她还是以一种自己也不清楚是从哪里产生的顽强毅力，奇迹般地克制了自己痛不欲生的心情。"这个人真叫人捉摸不透，"她想，"他是那样自私，又有怪僻，孤芳自赏，冷若冰霜，恐怕才智出众的人都是这个德性吧！"总之，她和他的交往与其说是谈情说爱，毋宁说是自寻烦恼，活受罪。不过，不管她怎样暗自落泪，肝肠欲断，她在感情上总不能同他一刀两断，把对他产生的好感从自己的心头一笔勾销。她也不明白自己为何竟是这样一个女人如此痴情，不能当机立断。其实，大凡一个少女，一旦坠入情网，即便自己很清楚成功的希望十分渺茫，也还是痴心地热恋着自己的情人，那种感情同她们后来生儿育女时对孩子的疼爱几乎完全一样。她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才克制住自己，没有给他回信。过了两个月，他又寄来一张明信片。明信片是从阿尔卑斯山寄来的。上面写道："我同一群来自世界

各地、操各种语言的游客一起，登上了拔海两千米的高山，从这里放眼远眺浩瀚的寰宇，心中想的是你以及去年和你一起度过的美好的夏天。"她虽然年少无知，缺乏生活经验，但这寥寥数语说明什么也不至于一点看不出来。要是他直接写明："我并没有爱过你，今后也不会爱你，"那也不会比这两句话更能说明问题，更使她伤心不已。因为说穿了，要是他真的爱她的话，他是不会用这些轻描淡写的回忆，更不会随便找点话题，什么高山呀，什么操各种语言的游人呀，来敷衍她的。因此，从这张明信片上一眼就可看出他根本不爱她。

左尔卡原来是一个穷苦的孤儿，由维舍格列的一家远房亲戚抚养成人，后来进了萨拉热窝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在维舍格列找了一个小学教员的工作，于是又回到曾经收养她的那家亲戚家中。他们的日子过得还不错，心地也很纯朴，不过她同他们总不太合得来。

左尔卡突然变得面黄肌瘦起来，一腔心事郁积在心头，从不向任何人吐露。圣诞节前夕，她收到斯蒂可维奇一张明信片，向她致以节日的祝贺。明信片仍然是寥寥数语，不痛不痒，文笔当然还是那样华丽，无可挑剔。她看过之后，便搁在一边，未给复信。她决心痛改前非，洗刷耻辱，但不打算借助任何人的帮助，也不想得到任何人的安慰。由于她生性懦弱，精神萎靡，又年轻无知，缺少经验，她渐渐沉浸于一桩桩往事的回忆中，整天苦思冥想，心焦如焚，想从中弄清楚自己怎样中了圈套，为什么斯蒂可维奇对她这样不负责任，干那种极不道德的行为。结果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更加痛苦。要是她能同别人谈谈，听听人家的意见，她肯定会减少许多痛苦，但她羞愧难言，不便开口。此外，她总觉得城里的人似乎都知道她的事，每次走在大街上，四

周扫视的目光总是呈出幸灾乐祸的样子，使她感到无地自容。因此，她的问题既然左邻右舍都帮不上忙，她便到书本上去寻找答案，但也无济于事。她怎么也不明白，既然他真的不爱她，去年夏天他为什么要做那么一番表演，向她说那些娓娓动听的言词，一个劲儿地追求她呢？如果他爱她，那天在学校教室里发生的事倒也情有可原，否则便是存心玩弄她，这是她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世界上难道有这样一种人，可以厚颜无耻地胡作非为吗？他干那件事如果不是出于爱则将何以解释？那一天，他两眼露出急不可待的神情，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拚命地狂吻她，这一切如果不是出于爱又将何以解释？总之，如果不是出于爱，他怎么能表演得那样淋漓尽致？然而事实却是他并不爱她，这一点她看得很清楚，虽然她内心很不愿意相信。眼看自己清白的身子遭到玷污，她再也忍受不下去了。(试想谁能对这种遭遇处之泰然呢？)内心斗争的结果，她自然而然地想到死，事实上每当人们忘乎所以沉浸于欢乐之中时，死神便在那里窥伺了。左尔卡决心坚强地死去，事前不向人吐露任何实情，不留下任何字迹，装做不慎失足落水的样子，从加比亚台上投入德里纳河里。每天早晨从睡梦中醒来，晚上就寝之后将要合眼时，或是同别人谈话谈得最起劲，为某一件事无意间发出琅琅的笑声时，自杀的念头便蓦然浮上她的心头，总之无时无刻不在她的脑际萦绕。但她并没有去死，她仍活在世上，不过自杀的念头并未打消，相反，一直在折磨她，使她不得安宁。

她万万没有想到后来把她从这个逆境中挽救出来的却是哥拉辛恰宁。快到圣诞节时，她内心的痛苦达到了顶点。她的思想越来越糊涂，她的那些问题一个也解决不了，这使她身心俱伤，比得病还要厉害。她的亲友和上司——一个有许多孩子、成

天乐呵呵的小学校长——都发现她近来一天天消瘦下去，大家都为她焦急，劝她去找大夫看一看。

恰巧在这时候，城里为了迎接圣萨瓦节开始准备文艺节目，她和哥拉辛恰宁都参加了排练，这样，两人便又碰到一起了。几个月来哥拉辛恰宁一直迴避她，不同她讲话。由于参加器乐合奏和演戏的人都是一些天真无邪的青少年，大家常在一起打打闹闹，气氛活跃、和谐。排演完毕，赶上月白风清的夜晚，左尔卡和哥拉辛恰宁便一起走回家去。这些都促使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逐渐缓和下来。两人互相接近的目的各不相同，左尔卡为的是减轻自己的痛苦，哥拉辛恰宁则是受爱的驱使。他原谅了她，早已把那些不痛快的往事丢到九霄云外，仍旧真诚地、深深地爱着她。

不言而喻，他们最初的谈话气氛比较生硬，彼此之间还不太信任，所谈的内容不过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但一触及往事，双方便争执不下了。可是尽管如此，这对左尔卡说来也还是一个很大的宽慰。因为这是她很多天来第一次同别人谈自己的内心痛苦，虽然她没有必要把那些最见不得人的伤心事全部吐露出来，可是一谈到过去那些事她便感到羞愧难言。哥拉辛恰宁对于她的谈话发表了许多感想，他谈的既热烈又生动，同时很注意分寸，不致于伤她的自尊心。他也谈到了斯蒂可维奇，用词辛辣，但并不过分。他对斯蒂可维奇的批评和上一次同他本人在加比亚台上讲的差不多，既简单又击中要害，毫不留情。他认为斯蒂可维奇自私古怪、玩世不恭。他将终身潦倒，事事不如意，同时，也会使受他蒙骗和同他接近的人跟着他受罪。哥拉辛恰宁很少直接向她表白，但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神态、每一个动作，都流露出他很爱她。他说话时左尔卡常常听得人神，因为听

了他的话，她感到十分舒坦，长久郁结在心中的愁闷顿时冰消瓦解。这是她几个月来第一次眉开眼笑恢复了平静，第一次不再把自己看成一个多余的人。哥拉辛恰宁的话对她充满爱慕和敬意，他反复指出她并不是无可救药的，现在的灰心失望同今年夏天爱上斯蒂可维奇后的想入非非都是毫无道理的。一席话说得她茅塞顿开，闷闷不乐的心情豁然开朗，重新回到了生动活泼的现实生活中来。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所有的问题或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圣萨瓦节以后，他们仍时常就这些问题交换看法。不久，残冬逝去，春回人间，他们的接触更加频繁，几乎无日不见面。左尔卡的体力和精力也逐渐康复，由于她正当年轻，那种精神萎靡，病恹恹的样子很快消失。接着便迎来了丰收在望的繁忙的夏天。这时，人们对左尔卡和哥拉辛恰宁两人的形影不离已习以为常了。

不久之前，左尔卡听哥拉辛恰宁的话是那样顺耳，总是按照他的意思悉心做去，可是现在，老实说，她开始觉得他唠唠叨叨，索然无味了。两人一见面就要谈一些心里话，她对这种做法有时简直感到受不了。她不明白自己怎么同他建立了这样密切的关系，心里不禁感到惧怕和惊奇。她想起来，去年冬天是他挽救了她，心里不由得对他十分感激。她觉得自己欠他的情，所以从此之后，他说话时，她便努力克制不耐烦的情绪，尽量耐心听他讲。

这天晚上，他把自己的手放在她的手上(这对他这样一个规矩的人来说是最大胆的举动了)。一股暖流直通到他的心房，浑身热乎乎的。这时，他清楚地感到他多么需要这个女人，要是他们真的能好起来，他在生活中所经历的痛苦和不得志将可化为巨大的力量，足以把他们两人都引上远大的前程。

坐在黑暗中憧憬美好未来的哥拉辛恰宁，这时似乎已不再是白天在一家大公司干活的小职员，他简直成了一个很有魄力、对自己信心十足、生活上举措裕如、眼光远大的人了。道理很简单，谁要是爱上一个人，感情真挚高尚，毫无私心，那末即使他是单相思，他也总觉得自己的前程似锦，道路宽广，充满信心，可是那些诡计多端、野心大、私心重的人就决不会有这种感觉。

他对身旁的左尔卡说：

"我相信我爱你不是看错了人，同样，我也不会欺骗你。我注意到这儿的人不是夸夸其谈，胡言乱语，就是财迷心窍，整天盘算着如何多赚钱，同时，我也越来越感到这里不是久留之地，要想正正经经在这儿做点事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很快将会出现一个长期的动荡不安的局面。对于这种情况，无论是斯蒂可维奇之流还是克拉克之流都是毫无办法的。相反，如果他们插手的话，事情将会变得更糟。因此，事不宜迟，我们应当赶快离开此地。你看现在忧国忧民的救世主多如牛毛，这正是大祸临头的预兆。既然我们没有任何办法阻止这场大祸降临，那只好以走为上策。"

左尔卡对他的话毫无表示。

"这些话我从来没有对你说过，可是我已经进行了周密的考虑，并做了一点准备。你知道，我的奥克里德的同乡鲍克唐·米罗维奇三年前到了美洲。他去年给我来了封信，自那时以来我们一直保持通信联系。我还把他寄来的照片给你看过。他叫我到他那里去，并答应给我找一个收入丰厚的稳当工作。我知道这件事不是轻而易举的，但我想也不是绝对办不到。我已经考虑再三，并作了周密的盘算。我将把奥克里德家中的东西全部变卖。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就赶紧结婚，然后不露一点风声，

悄悄到萨格勒布去，因为那里有一个代办处负责把移民运往美洲。我们在那儿可能要住上一两个月等鲍克唐给我寄一份入境证来。我们可以趁这个时候学点英文。由于我没有服过兵役，倘若人家不让我们通行的话，我们就改道塞尔维亚，从那里出去。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好，不让你遇到一点麻烦。到了美洲，我们两人都会找到工作。那里有教塞尔维亚语的学校，教员很缺。我的工作也很好找，因为那边各行各业的大门向一切人敞开，谁都可以进去。这样我们将过着自由自在的幸福生活。总之，一切都好办，就看你愿意不愿意……”

说到这儿，哥拉辛恰宁没有再说下去。左尔卡没有马上答复他，只是把双手放在他的手中，表示她非常感激。但她对他的建议未置可否。她对他的真心实意的表示，对他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深情厚谊表示由衷的感谢。由于盛情难却，她希望给她一个月的时间，等这一学期结束以后再给他一个肯定的答复。

“谢谢你，尼古拉，谢谢。你真好。”她紧握他的双手低声说道。

这时，从加比亚台上传来了嘹亮的歌声。这是一群青年人唱的，他们也许就是从萨拉热窝回来度假期的中学生。再过半个月大学生也都回来了。在他们回来之前，她是不能作出任何决定的。现在她感到十分为难，特别是哥拉辛恰宁的建议不便答复。即使他强行逼她接受，她无论如何也不能贸然表示同意。她没有什么奢望，只是想和那个玩世不恭的斯蒂可维奇再见一面。见面以后能否破镜重圆，那就听天由命了。她知道尼古拉会等她的。

他们手拉着手，站起身来沿着崎岖的小道直奔山下，向歌声嘹亮的桥上走去。

第二十二章

一年一度的圣一琦节来到了。塞尔维亚人在梅扎兰，即德里纳河和撤夫河汇流的地方，举行了一个露天庆祝会。他们在绿草如茵、核桃树茂密的平地上支起了帐篷，在帐篷里出售饮料，用微火烤小羊。随身带了饭来的人阖家坐在树荫下就餐。密林深处传来了震耳欲聋的音乐。

一大早人们就在一块平整的空地上跳起了“科罗”舞。跳舞的人都是一些整天闲得无聊的年轻人，他们在祈祷仪式一结束便从教堂直接来到这里。正式庆祝活动要到午后才开始。已经跳起来的“科罗”舞正在进入高潮。人们婆娑起舞，舞姿优美动人。可是当已婚妇女、不甘寂寞的寡妇和小孩等大批人群来到后都参加进来时，那场面就大为逊色了。那时，舞蹈的队形将被切成几段，变成一长串互不协调的欢乐的舞圈。现在，由于大队人马未到，这人数不多的舞圈——其中小伙子多于姑娘们——象牧马人扔出去的套马索一样飞快地旋转着。他们四周的一切——枝叶繁茂的树冠、天空的白云、德里纳河和撤夫河的清澈流水，脚下的大地，好象都在旋转，运动，连空气也在随着琴声波动，结果是，他们的激烈旋转似乎只是为了使自己的身躯同四周物体的运动保持平衡。从大道上跑来的小伙子马上就参加到这场旋涡中去了，姑娘们则没有马上卷进去，她们呆在一旁观看，一面还默默地打着拍子。等到心中出现了一股跃跃欲试的劲头，她们便低下头，躬起身，象跳水一样一下冲进去。舞圈里的人手

忙脚乱，动作那样迅速，似乎有一股烫人的气流从地上传到他们的脚上、手上。整个舞圈仿佛象一个人，在同一个节奏下运动一样。小伙子们头往后仰，脸色煞白，鼻孔的两翼不住地翕动。姑娘们两颊绯红，羞答答地垂着眼皮，惟恐流露出洋溢于内心的欢乐。

正式庆祝活动刚要开始，梅扎兰平地的边沿出现了一些穿着黑色制服的宪兵，他们身上的肩章和枪支在午后的阳光下发出闪烁夺目光芒。他们人数不少，比平素赶集和郊游时的例行巡逻要多得多。他们直奔绿树丛中的乐队所在地。不久，各种乐器便陆续停止了演奏。跳舞的人迟疑了一下，也停了下来。几个青年人发出了骂骂咧咧的喊声。大家都还手拉着手站在那里。有的人舞兴正浓，耳际犹迴荡着音乐的节奏，禁不住在原地轻轻踏步，等待乐声再起。可是乐队里的人都已站起身来急忙收拾家具，把喇叭和小提琴装进漆布口袋里。随后，宪兵又走到一个个帐篷里和坐着一家家游人的草坪上。每到一处，宪兵队长便低声向大家说两句令人目瞪口呆的话，他的话也真有一种神奇的效力，广场上欢乐的喧闹声立刻停了下来，不但舞蹈停止，连说话声也听不见了。宪兵队长每走到一处咕哝两句，人们就神色大变，立即丢下手头的活计，收拾家具准备离开。跳舞的男女青年直到最后才离开。他们都觉得犹未尽兴，现在就散去未免太煞风景，所以都有点恋恋不舍。可是一看到宪兵队长满脸杀气，两眼凶横的样子，即便瘾头最大的人也不得不望而生畏。

人们带着大为扫兴的心情慌里慌张沿着白色的大道踏上了归途。进入城里，他们听到惊慌不安的窃窃议论越来越多，议论的话题是，奥国皇太子弗兰茨·斐迪南和他的妻子今天上午在萨拉热窝被刺，现在正到处搜捕塞尔维亚人。在司令部门前，他

们看到了首先被抓的人，其中有年轻的正教教士米兰。宪兵正把这些五花大绑的人送往监狱。

这天下午，一个好端端的欢乐的节日就这样被彻底破坏。人们的心头充满焦急不安的情绪，胆怯地注视着即将发生的不幸事件。

加比亚台上死一般静寂，平素的热闹场面早已无影无踪，那里现在设了一个岗哨。一个挎着崭新步枪的士兵缓缓地在“沙发”台到盖有铁板的洞口之间来回走动，洞口下面是桥墩，桥墩里放了炸药。他在这不足五六米长的地方不停地走来走去，每次转过身来，身上的刺刀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第二天清晨，在刻有土耳其碑文的石碑上方贴了一张用白纸印的布告，字很大并加了宽宽的黑边，上面公布了关于皇太子被刺的消息，并对这种行为表示极大的愤慨。可是过往行人谁也不停下来看一看，大家都低着头从布告前面和哨兵身旁匆匆而过。

从这一天起，桥上一直有哨兵站岗。全城的正常生活顿时陷于瘫痪，同那天在梅扎兰举行的庆祝会的遭遇一样。

此后一些天，真不是人过的日子。整个维舍格列笼罩着一片恐怖的气氛，边境地区加强了警戒措施，每天都有一些塞尔维亚人和游客押进监牢。人们紧张地注视着报上的新闻，一句话也不敢乱说，至多只能在私下嘀咕两句。光阴一天天地流逝，每当夜幕降临后，加比亚台上再也听不到歌声，再也看不到青年人的聚会和一对对情侣。城里的大兵触目皆是。每晚九点，当比加瓦和大桥附近的兵营吹响凄厉的奥地利熄灯号时，大街上就已经空无一人了。对于那些希望悄悄地在夜晚相会的情人来说，这种日子真是度日如年。每天晚上哥拉辛恰宁都要特意从

左尔卡的门前走过。左尔卡总站在地基很高的楼下窗前接待他。不过他们只能简短地交谈几句，因为哥拉辛恰宁必须在天黑之前通过大桥，赶回奥克里德家中。

今天傍晚，他照例来了。他脸色苍白，手里拿着帽子，叫左尔卡到大门口来一下，因为他有要紧的话对她讲。她犹豫了一下走了出来。她站在院门的门槛上正好同哥拉辛恰宁一般高，哥拉辛恰宁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在她耳边以极低的声音说了两句。

"我决定今天晚上同弗拉多·马利奇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逃走。一切都准备得很好，我想不会出问题。不过万一……万一发生什么意外，左尔卡……"

小伙子激动得说不下去了。左尔卡眼睛瞪得很大，惊愕不定，面有难色。哥拉辛恰宁也不知如何是好，似乎有点后悔不该把这件事告诉她，不该来向她辞行。

"我觉得应当把这件事告诉你。"

"谢谢你想到我，那末我们的……美洲之行只好吹了。"

"你还是不要这样说吧。一个月以前，我曾提议我们先结婚，然后离开这儿，要是你当时同意的话，我们说不定早已远走高飞。不过，不去美洲或许更好。现在的局势你也很清楚，我不得不和同学们赶紧离开。战争已经迫在眉睫，我的岗位在塞尔维亚，我应当回到那儿去，左尔卡，我应当回去，这是我责无旁贷的责任。假如我这一次大难不死，假如我们的国家因此而得到解放，恐怕我们就不必远涉重洋到美洲去了，因为我们的国家那时将同美洲一样，大家都可以在国内正正经经地埋头工作，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就在国内建立我们的家庭，不知你的意思如何。我事事总考虑到你，可你……有时

候……”

说到这儿，年轻人再也找不出恰当的字眼来表达他对她的爱慕，他突然举起手来想去抚摸左尔卡浓密的栗色头发。这是他早就隐藏在心底的最大心愿，看来他这个一向不走运的人这次总可如愿以偿了。想不到左尔卡吃了一惊，往后退了一步，他的夙愿仍旧成了泡影。随后大门轻轻关上，不一会儿左尔卡出现在窗口。她面色苍白，惊愕不定，十个手指紧捏在一起。哥拉辛恰宁紧挨窗前走过，头往后仰，左尔卡看到他脸上笑嘻嘻的，没有一点忧虑和悲伤的样子。她担心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便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这时，天已黑下来了。她坐在床上低着头情不自禁地哭起来。

她起初不过是无声地抽泣，后来一想到自己的终身大事，至今还是茫无头绪，心头感到一种难言的重压，便索性放声痛哭起来，越哭越伤心，越哭越感到一切都完了。她知道，她的事不可能解决，她不可能对哥拉辛恰宁的建议表示同意，因为小伙子虽然为人厚道，对她一片忠心，可是这有什么用？她并不爱他。现在，他要走了。同时，她也不可能指望那个铁石心肠的斯蒂可维奇有朝一日会回心转意，同她结成良缘。去年夏天大家在一起谈笑风生的美好时光，如今已成过眼云烟，一去不复返了。象她这样的人根本甭想离开这个穷乡僻壤，去见识那令人向往的美洲，这里也不可能建成一个人间乐园，使人人都有工作做，过着自由美好的生活。永远不可能！

第二天，大家就听到了关于弗拉多·马利奇、哥拉辛恰宁和其他几个青年逃往塞尔维亚的消息。其他留在维舍格列的人及其妻儿老小，成天惶惶不安如坐针毡。局势一天比一天吃紧。七月末的一天，边界那边终于爆发了一场暴风雨，后来这场暴风

雨席卷了全世界，使许多国家和城市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德里纳河上的大桥也被全部摧毁。

这场暴风雨影响所及，维舍格列掀起了一股迫害塞尔维亚人，抢劫他们的财产的浪潮。全城的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迫害者，一类是被迫害者。人身上所固有的作恶的本性，过去由于受良好的社会风尚和法律的约束一直不敢公开暴露，现在则可肆无忌惮地发泄了。信号既已发出，一切障碍便自行排除了。于是，只要是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去进行，对少数德高望重、有一定政治信仰的人所施加的迫害行径，包括抢劫和谋杀，都不会有人干预，甚至会得到官方的默许，这种事在人类历史上也不乏先例。一个人如果头脑清醒、不盲目跟着跑，便可亲眼目睹这种暴力行径如何在一天之内把整个社会变成一座人间地狱。在维舍格列商业区，几百年来人们相互之间免不了会引起一些私仇、嫉妒，产生宗教上的冲突，出现粗暴和凶残的事情，但是占压倒地位的却是仗义勇为、扶困济贫以及对现存秩序的自觉遵守，使得那些为非作歹、侵犯他人的邪气无法上升，不得不服从集体生活的准则。可是现在，就是这个有悠久历史的商业区，却在短短几天之内被那些歹徒尽行捣毁，成了一片瓦砾。四十年来，在这儿享有很高声望的著名人士，忽然在一夜之间消声敛迹，他们所代表的一些良好习俗、思想和组织机构也不复存在了。

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的第二天，保卫团开始在城里到处抢劫。他们虽然武器简陋，却是当局迫害塞尔维亚人的得力助手。他们大多由茨冈人、酒鬼和其他游手好闲的人组成，这些人早就对秩序井然的社会和严明的法律心怀不满。有一个名叫胡苏·寇寇萨尔的茨冈人一向没有固定的职业，又声名狼藉，年轻时由于胡闹，得了花柳病，烂掉了鼻子。他现在领了十来个流氓

占领了商业区的各个要隘口，他们挎着“温德尔”旧式步枪，枪支上了很长的刺刀，那种神气简直不可一世。

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巴夫雷·朗科维奇不得不以教区学校塞尔维亚人董事会会长的名义带了四个知名人士去拜访萨布利阿克副市长。这人是克罗地亚人，面色苍白、虚胖秃顶，不久前才在维舍格列担任副市长。他患有神经衰弱症，因夜来没有睡好，两眼通红，嘴唇干裂，缺少血色。他脚上穿了一双大皮靴，身上套了一件打猎穿的绿色上衣，领子上别了一个黄黑两色的证章。他站着同他们说了几句话，也没有请他们坐下。由于过度紧张，巴夫雷·朗科维奇吓得面色蜡黄，两只眼睛眯成了一道缝。他用一种失常的声音轻轻地说道：

“市长先生，这两天的情况您已经看到了，事情还在发展，您想必知道，我们都是祖祖辈辈生活在维舍格列的塞尔维亚人，我们希望这种事不要再发生。”

“我什么也不知道，先生，”副市长气冲冲地打断他的话，“而且我什么也不想知道。我现在还有急事要办，没有工夫同你们闲扯。我能对你们说的话就是这些。”

“市长先生，”朗科维奇不动声色地继续说道，似乎想以自己的沉着态度使这个盛气凌人、暴跳如雷的家伙安静下来，“我们此次前来是想知道我们可以在哪些方面为您效点劳，为您提供……”

“我不需要你们帮忙，请不必多此一举。你们的同胞在萨拉热窝干得好啊！”

“市长先生，”朗科维奇毫不谦逊地说道，语气还是那样沉着，“我们希望法律能够在起码的程度上……”

“好啊！你们居然还会想起法律来！你们指望靠什么法律为

你们帮忙?”

“国家颁布的法律,市长先生,这是对一切人都适用的。”

这位副市长突然哑口无言了,刚才的盛怒似乎稍有平息。巴夫雷·朗科维奇乘此机会继续说道:

“市长先生,我们要斗胆向您提一个问题:我们的身家性命和财产的安全是否有保障?如果没有保障,我们应当怎么办?”

他只是伸直两臂,手心对着朗科维奇耸耸肩,然后合上两眼,闭紧那两片毫无血色的薄嘴唇。

巴夫雷·朗科维奇知道每当事情比较棘手时,这些官僚便摆出一副装聋作哑、无动于衷的表情。很清楚,再谈下去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副市长放下两臂后,抬起头来用比较温和的语气说了一句:

“军事当局会告诉你们该怎么办的。”

朗科维奇听了他的话,不禁哑然失笑,也伸开两臂,闭上两眼,耸了耸肩膀,作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表示,随后一本正经地说道:

“谢谢,市长先生!”

同来的四位知名人士于是向主人鞠躬告退,他们的身子是那样挺直、不自然。大家如同犯了弥天大罪一样,小心翼翼地退了出来。

这时商业区的几个人正在秘密进行紧急磋商。

在阿里霍扎的店里坐了几位维舍格列的穆斯林名流,他们是:那义尔贝伊·特弗尔科维奇,奥斯马阿迦·萨巴诺维奇,苏里阿迦·梅奇尔吉奇。他们面色惨白,忧心忡忡,脸上流露出在遇到意外事件或面临重大损失时人常现出那种沉重而呆滞的表情。当局已邀请他们出来担任保卫团的首领。为了不引起

人们的注意，他们装作偶然走到一起的样子，在这里协商一个共同的对策。对于这项差事，他们有的主张接受，有的主张推脱。两只老眼昏花、一激动就面红耳赤的阿里霍扎就坚决不同意搞任何形式的保卫团。可是那义尔贝伊却异想天开，竟然提出拿起武器，建立一支由他们领导的穆斯林义勇队来取而代之现在的保卫团，这个意见遭到阿里霍扎的极力反对。

“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决不参与这种事。稍微有点理智的人都不会这样做。你难道还看不出来，基督教徒想利用我们去打塞尔维亚人，到头来，一切责任都会落到我们身上。”

他从穆斯林的观点出发竭力说服大家，他们把自己卷进去，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只会有百害而无一利，他那滔滔不绝的辩才仍不减当年在加比亚台上同奥斯曼·卡拉芒利亚埃芬蒂的辩论。

“多年以来，在任何事情上，谁都不再把我们放在眼里，听听我们的意见。比如德国佬占领波斯尼亚，无论是苏丹还是奥皇都没有问一问我们：穆斯林贝伊和绅士先生们，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后来，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的异教徒举行了大规模的起义，夺取了土耳其的大片疆土，那时他们连看也没看我们一眼。现在，奥皇在攻打塞尔维亚，事前谁也没有来问一问我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可是却要发给我们几支枪和几套军服，让我们去为德国佬卖命，充当他们迫害塞尔维亚人的打手，让他们坐收渔人之利。你这个糊涂虫，怎么连这一点也看不出来？多少年来，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人们一直对我们目空一切，现在给你一点小小的甜头就把你乐得这个样子！实际上，哪有许多便宜让你去占？告诉你，他们那些想法不过是机关算尽的如意算盘罢了，你别去管它，只会有百益而无一害。现在边界那边已是战火纷飞，

可是谁晓得这场战争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塞尔维亚背后肯定有人撑腰。不信你等着瞧！你那个家门口被山挡着，你哪能看到山那边的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少管闲事，别去搞什么保卫团，也别怂恿别人去参加。你倒不如兢兢业业把自己的田庄管好，这比什么都强。”

大家听了他的话都一动不动，表情很严肃，谁也没有表示异议。那义尔贝伊嘴上虽然没再说什么，内心显然很不舒服，他脸色铁青，对他那个想法仍不忍放弃。除他而外，其他人都有所动摇，劲头没有先前那样足了。他们一面抽着烟，一面默默地望着满载的车辆和马匹在桥上南来北往，络绎不绝。随后，大家陆续起身告辞。最后离开的是那义尔贝伊。阿里霍扎见他同他告别时，神情不太开朗；便盯着他看了一眼，不胜感慨地说道：

“我看你已打定主意去干。看来你有点活得不耐烦，想拿自己的性命去开玩笑。不过，希望你不要忘记老人们常说的一句话：现在是各显本事的时候，而不是白白地去送死。这句话对我们大家都适用。”

阿里霍扎的店铺同大桥只隔一个集市广场，广场上挤满了车辆、马匹、属于各个军种的士兵以及到警察局来报到的预备役军人。间或可以看到几个宪兵押了一群五花大绑的塞尔维亚人从广场上走过，他们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市民。广场上尘土飞扬，人声嘈杂，熙熙攘攘，一张张红润的脸上汗流如雨。人们操着各种各样的语言，骂人声不绝于耳。由于一场大难迫在眉睫，人心惶惶，借酒浇愁，夜不成眠，在所难免，有的人眼睛都熬红了。

正对着大桥的广场中央，几个穿着崭新制服的匈牙利预备役军人正在加工木头，有的抡斧，有的拉锯。大家都说他们在立

一个绞刑架。他们的四周挤满了看热闹的儿童。阿里霍扎站在店门口放眼看去，他们先立了两根柱子，后来由一个大胡子的军人爬上去在两根柱子之间架了一根横梁。

看热闹的人纷纷赶来，把绞刑架四周围得水泄不通，似乎这里有什么好东西在等着分给他们。这些人大多是士兵，但也有贫苦的穆斯林农民和住在城里的茨冈人。这时，人群中闪开了一条道，有人搬来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这是给掌刑官及其助手准备的。随后，保卫团的几个人带来两个老乡和一个城里人。老乡是离边境不远的波斯德切秋和卡莫尼扎两个村庄的村长。那个城里人是个承包商，名叫瓦犹，里卡人。他来维舍格列定居并在这里成家立业已有年头。他们三人都被捆绑着，满身尘土，面无人色。这时鼓声已擂得震天响，可是由于人声鼎沸，听来似乎是远方传来的隆隆雷鸣。鼓声一停，绞刑架周围顿时鸦雀无声。掌刑官是匈牙利后备军的一个上尉，他尖着嗓子用德语宣读了他们的判决书。一个军士长立即把他的话翻译出来。他们已被军事委员会判处死刑，因为有人向当局揭发，说亲眼看见他们夜间在边境上向塞尔维亚那边发火光信号。军事委员会并且规定他们的死刑必须在大桥附近的广场上当众执行。两个老乡心慌意乱，眨巴着眼睛，一言不发。瓦犹一面擦去脸上的汗水，一面倭楚地低声争辩说他没有罪。他瞪大眼睛，疯也似地用目光向四周搜寻，看这件冤案可以向谁哭诉。

行刑刚要开始，一个长了褐色头发、身材矮小的士兵从人群后面挤了进来，两条腿前后交叉站在那里。他就是罗蒂卡酒馆过去的伙计翟斯达夫，他现在是商业区一家咖啡馆的老板。他穿了一身崭新的制服，身上佩带着下士军衔的肩章。他脸色铁青，两眼通红。他一出现便马上同军士长吵了起来。军士长叫

他立刻离开，可是寸步不让的瞿斯达夫拒不服从。

“十五年来，我一直是最高军事当局派驻这儿的谍报员，是他们最信任的人，”喝得醉醺醺的瞿斯达夫用德语大声嚷道，“两年前我去维也纳时，他们就答应过我，遇到一定的机会，我可以亲手吊死两个塞尔维亚人。你们也不看看我是谁！我完全有权利这样做。可是你居然……”

人群里象开了锅一样议论纷纷。军士长被他抢白得张口结舌。瞿斯达夫越闹越凶，一定要军士长把两个判处死刑的犯人交给他行刑。这时，身材瘦削、皮肤微黑、大有绅士派头的掌刑官已被他气得面色煞白。他实在忍无可忍，霍地一下站了起来。瞿斯达夫虽然醉醺醺的，但一见上尉走来，马上来了个立正，不过他的修剪得很讲究的褐色胡须还在颤动，两只眼睛也在左顾右盼地转个不停。上尉凑近他那紫酱色的脸膛，好象要唾他一口似的。

“你要是再不滚开，我就下令把你捆起来，送到牢房里去，明天再同你算账。听懂了没有？快给我滚开！滚！”

上尉说的是德语，不过匈牙利口音很重。他声音很低，但斩钉截铁，怒不可遏，吓得瞿斯达夫耷拉着脑袋，溜出了人群，一面还不停地向上尉敬礼，嘴上叽哩咕噜地表示道歉，可是谁也听不清楚。

大家的注意力于是又转到那三个判处死刑的人身上。两个老乡都是几个孩子的父亲了，他们除了战栗还是战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由于骄阳似火，围观的人挤了一层又一层，散发出一股股令人难耐的热浪，他们眨巴着眼睛，皱着眉头，感到十分焦躁烦闷。瓦犹则还在有气无力地替自己申辩，说这是天大的冤枉，是他在生意上竞争的对手对他诬告的结果。他还说他根本

没服过兵役，从来不知道火光可以用来打信号。

他稍能说几句德语。他声泪俱下，几乎是一字一顿地在那儿哭诉，极力想打动人们的心弦，阻止从昨天晚上以来想把他这个无辜的商人从这个世界上卷走的怒潮。

"Herr Leutnant, Herr Leutnant, um Gottes willen…Ich, unschuldiger Mensch … viele Kinder … Kinder … Unschuldig. Lüge! alles Lüge."①他结结巴巴，似乎在仔细斟酌，看怎样说才能更好地表达他的意思，说服大家。

行刑的士兵已经走到一个乡下人身旁。乡下人立即摘下头上的皮帽，面向美以当山上的教堂划了两个十字。上尉这时用目光示意行刑的士兵，叫他们先解决瓦犹。瓦犹眼看自己已经绝无幸存的希望，便举起双臂声嘶力竭地苦苦哀求道：

"Nein! Nein! Nicht, um Gottes willen! Herr Leutnant Sie wissen…alles ist Lüge…Gott…alles Lüge!"②行刑的士兵不容他分辩，七手八脚抱住他的两腿和上身，把他抬到绞索下面的一个木头支架上。

刑场上的人群屏声静气，好奇地注视着上尉会不会对这个可怜的承包商作点让步。

站在店门口了望的阿里霍扎虽然听到了挤得水泄不通的绞刑架下传来的片言只语，但不可能了解事情的全部经过。他一看到在那黑压压的人群之上出现了一张令人毛骨悚然的面孔，便急忙回身关上了店门，虽然军事当局曾经有令在先不让商店

---

① 德语："上尉先生，上尉先生，上帝知道……我是无罪的……我有许多孩子……孩子……无罪的。他们说的全都是凭空捏造。"

② 德语："你们不能！你们不能！上帝，上尉先生，您要知道……那都是诬告……上帝……那都是诬告！"

关门。

这些天不断有部队带了辎重给养来到维舍格列。由于火车已经超员，所以有一部分是经过罗加蒂扎从一条历史悠久的大路走来的。桥上日夜车水马龙，人们一走过桥进入市区，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广场上吊着的三个受绞刑的人。队伍的前锋常因街道拥挤不能顺利通过，后续部队只好在桥上或广场上停一个时候才能继续前进。

一些下级军官满脸风尘，皮肤黝黑，因为经常动肝火，嗓子都喊哑了。他们骑着马在满载的车辆和马匹之间穿来穿去，对这种乱糟糟的局面现出一筹莫展的神情，嘴上不停地骂许多不堪入耳的肮脏话。由于他们来自奥匈帝国的各个地区，所以这些骂人的话各种语言应有尽有。

三四天以后的一天清晨，一大列队伍正从大桥向狭窄的市区蠕动时，空中突然传来了尖锐的、令人胆战心惊的呼啸声，接着便是一颗炮弹落到大桥中央加比亚台对面的石头栏杆上。弹片和碎石块打伤了不少人和马，于是出现了一场混乱，惊马仰起前蹄在空中乱踢，大兵们则夺路而逃。有的奔向城里，有的忙向后撤。这时又飞来三颗炮弹，两颗落在水中，一颗落在桥上，又打伤了不少人和马。一刹那间，能逃走的人，全逃之夭夭了，只剩下一些打翻在地的马车和死伤枕藉的士兵和 驮 马 还 留在那里。这几发炮弹是塞尔维亚的炮兵从巴诺山射来的，他们现在正向大桥两头溃不成军的奥军进行射击。与此同时，设在布哥岭的奥地利野战炮群也开始瞄准塞尔维亚的炮位进行还击。

从这天起，巴诺山的塞尔维亚野战炮每天都要向大桥和桥旁的兵营发来几发炮弹。几天之后的一个早上，从东边的高勒士也飞来了炮弹。发炮的地方虽远，但炮弹划破城市上空时发

出的震耳欲聋的响声，为巴诺山野战炮的炮声所望尘莫及。这是榴弹炮，那里总共只有两门。最初几发炮弹落在德里纳河里，后来落在桥前的平地上，给附近的房屋，包括罗蒂卡酒馆和军人俱乐部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很清楚，这些榴弹炮的目标是大桥和兵营。不到一小时，兵营开始起火。大兵们纷纷扑上去抢救，但很快便被巴诺山射来的开花弹炸得血肉横飞，后来不得不放弃这种无谓的努力，任凭兵营夷为一片火海。由于时值夏令，天气炎热，凡能燃烧的木器之类的东西顷刻化为灰烬，与此同时，炮弹仍不断飞来，因此，转瞬之间这座石头建筑物便成了一堆乱石。

此后高勒士的那两门榴弹炮又转而轰击大桥，特别是大桥的中央桥墩。炮弹时而落在大桥左右两边的河水里，时而落在庞大的石头桥墩上，时而落在桥上，但没有一颗落在埋着炸药的中央桥墩顶端的铁盖上。

这次炮击前后进行了十天，但并没有给大桥造成重大的毁坏。因为榴弹炮的炮弹一碰到桥墩的光滑石壁和弧度很大的桥孔，便弹回来在空中爆炸了，顶多只能在石壁上留下不太显眼的白印。开花弹的威力更小得可怜，弹片打在坚固光滑的桥面上就同下冰雹差不多，不起丝毫作用。榴弹炮的炮弹只会在大桥的石板路面上留下一些不太深的小洞。不从桥上经过这些洞是发现不了的。

因此，这一次对维舍格列的炮击虽然打破了人们的陈规旧习，丧了几条人命，毁坏了几幢房屋，但根本摇撼不了德里纳河上的大桥，它依然象过去一样洁白无瑕，坚不可损。

第二十三章

由于炮火的不断袭击，桥上白天不再能通过大队人马。老百姓过桥一般都是三三两两，不会有多大问题，部队过桥则须排成单行跑步通过，因为只要一出现较大的人群，巴诺山上便向大桥射来开花弹。几天之后炮击的时间有了一定的规律性。人们根据每天炮火什么时候较密，什么时候较疏，什么时候完全停止这个规律来通过大桥（当然这还得在奥军巡逻队许可的情况下）处理紧急事务。

为了切断桥上南来北往的部队调动和物资运输，塞尔维亚人白天从巴诺山射来开花弹，夜间则从高勒士方面射来榴弹炮。

住在大桥附近和公路两旁的城区居民，为躲避炮火的袭击，都到美以当山区或其他离大桥较远、比较安全的地方投亲靠友去了。他们扶老携幼，带着细软匆匆离开家门，与当年洪水为害的维舍格列的风雨之夜情况相仿。不过，这一次大家没有不分宗教信仰，彼此打成一片，团结互助，同舟共济，也没有象从前那样促膝谈心，互相鼓励，互相安慰。穆斯林都住在与自己信仰相同的亲友家里，塞尔维亚人则象得了瘟疫一样，哪儿也不能去，只能住在本民族的同胞家里。大家虽然各奔东西，但逃难的生活基本上是相同的。大家都身在客中，漫长的时间不知如何打发，无穷的忧虑和烦恼也不知跟谁诉说。他们整天闲得无聊，一筹莫展，既害怕身家性命遭到不测，又担心家里的财产受到损失。对于战争双方谁胜谁负，各人心里都怀抱着不同的希望，只是彼此

不说出来罢了。

同从前发大水时所见到的情形一样，穆斯林和塞尔维亚的老年人也强作镇静，不动声色地给自己的儿孙讲一些趣闻逸事来为他们消愁解闷。可是时过境迁，从前那种强打起精神说说笑笑的做法，在战祸蔓延的今天，对于人们起不到任何安慰的作用，无论讲什么逗乐的故事，都不再能打动人们的心弦，把人们从当前的烦恼中转移开。然而除此之外，谁又能在短时间内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夜里，大家虽然躺在床上，但辗转反侧，难以成眠。平时谈话总是屏声静气，连大气也不敢出，可是在塞尔维亚和奥地利的大炮不断轰鸣的情况下，谁也不知道这样小心谨慎的做法究竟有什么意思。虽然大家并不知道什么叫发信号以及怎样发法，可是谁都怕给自己安上"给敌人发信号"的罪名，整天惶惶不安，连一根火柴也不敢擦。想吸烟的时候，便躲到没有窗户、四周密闭的耳房里，或者用被子把头蒙起来抽上几口。天气热得要命，动不动就一身汗，可是仍不得不把所有的门窗都关起来，而且还要用别的东西堵上。整个城市恰如一个人遭到殴打无力还击时，用双手蒙上眼睛希图幸免一样。各家都大门紧闭，死气沉沉，为了求生不得忍辱含垢，可是即使这样也未见得顶用。

穆斯林家里气氛多少活跃一些，轻松一些。许多老人曾经久经沙场，如今听到枪声都有点跃跃欲试，可是很不是时候，因为现在在那儿决一死战的，双方都是基督教徒，他们自己的天下早已成为过去，再也没有人领着他们起来干了。因此，这场战争虽然与他们无关，但心中却也有许多难言的烦闷和痛苦无法摆脱。

阿里霍扎的家位于古城堡下面，家里的孩子多得简直可以

开一个学校。他自己的孩子本来就够多了，现在穆义阿迦·穆达吉奇又带来九个，其中稍大的只有三个，其余都还小，一个个高矮相间，依次递减，十分整齐。他们总喜欢跑到院子里去玩，为了不老是跟在后面看着他们，阿里霍扎出了个主意：把他们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关在一间凉爽的大厅里，遇到他们在里面打闹起来大喊大叫时，他们的母亲和姐姐便去把他们拉开。

这位穆义阿迦·穆达吉奇，说是乌吉寨人，实际上是维舍格列的老居民。（这有一番来历，下文即将谈到。）他身材高大，五十开外，可是已经是满头白发。他那长了一个鹰钩鼻子的脸上，到处是皱纹，说起话来嗓音低沉。此外，他动作很麻利，大有军人作风。他比阿里霍扎小十岁，但比他苍老得多。他同阿里霍扎整天呆在家里，可是一天也说不了几句话，总是不停地抽烟。他面部表情呆滞，若有所思，一看便知心中有许多难言的苦衷。他坐立不安，经常站起身来走出房间，到花园里去凝视环抱全城的群山和德里纳河两岸的悬崖峭壁。他长时间地举头仰望天空，好象天空阴霾，他要看一看什么时候可以放晴。阿里霍扎看他这样心神不宁，经常想尽办法安慰他，同时还注意他的行动，不让他单独出去，所以他一走到花园里，他便也跟了出来。

花园坐落在山坡上，坡势很陡，但面积很大，由于时值盛夏，花木扶疏，一片幽静。成熟了的大葱已被割下，摊在地上。向日葵正在开花，蜜蜂在已经发黑的、沉甸甸的圆盘上飞来飞去。田埂上的野花已开始结籽。从这里居高临下，极目远眺，脚下的维舍格列象一把叉子出现在德里纳河和撒夫河汇流的沙质土地上，四周山峰林立，参差不齐，千奇百态。在城市四郊的田野里和比较陡峭的山坡地上，已经黄熟的大麦和绿油油的玉米互相交错，截然分明。山下的白色屋顶，在山顶郁郁葱葱的树木衬托

下，更显得耀人眼目。因此，每当黎明之后天空晴朗如洗，站在阿里霍扎的花园远眺，天空和大地是这样辽阔，那已经变得稀落的炮声传到这儿来时简直同节目的礼炮一样，不给人以任何恐怖之感。

满腹心事的穆义阿迦终于开口说话了。为了感谢阿里霍扎对他的无微不至的关心，他向他谈了自己的不幸身世。他这样作并不是因为阿里霍扎不知道那些事，而是因为感觉天气这样好，自己心头的郁闷如骨鲠在喉，非说不可，况且，此时此刻，战争双方的每一炮都会决定他的命运。

他不满五岁那一年，土耳其人开始从塞尔维亚撤离。穆斯林纷纷跟着他们回到土耳其去，他父亲苏里阿迦·穆达吉奇当时年纪还轻，但已很有名望，是乌吉寨土耳其人中的头面人物。他决定回到老家波斯尼亚去。他把自己的田亩和房屋三文不值二文全部卖掉，带了孩子永远告别了乌吉寨。这样，他便同几百个从当地逃出来的人一起来到了仍由土耳其政府管辖的波斯尼亚，在维舍格列定居下来，因为他这一族的人中，早已有一支从乌吉寨迁来这里居住。十余年后，他在维舍格列的商业区刚刚站住脚时，奥地利突然占领了波斯尼亚全境。他生性倔强，轻易不肯屈就，决不甘心在逃离了基督教徒的统治之后，又落入另一些基督教徒的手中。一年以后，他又带了全家同另外几家，不愿在异教徒的势力之下苟且偷生的穆斯林一起离开了波斯尼亚，来到桑甲克的诺瓦—瓦罗士安了家。（他的儿子小穆义阿迦那时才十五岁出头。）到诺瓦—瓦罗士后，他又重操旧业做起生意来，其他几个孩子便是在这里生的。可是，他对桑甲克地区的风俗人情怎么也适应不了，日夜思念故乡乌吉寨的山山水水，久而久之便忧思成疾，一病不起，过早地离开人间。他的女儿一个个

长得花容月貌，而且很守本分，所以都得到了理想的归宿。几个儿子也很有出息，把父亲遗留下来的一点点家业越盘越大。一九一二年，他们已陆续成亲，在异乡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不想这一年突然爆发了巴尔干战争。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联军长驱直入，土耳其军队在诺瓦一瓦罗土附近奋勇抵抗，穆义阿迦也参加了战斗。战斗没有进行多久便退了下来，不过，这并不能说他们的抵抗软弱无力，吃了败仗，因为战争的命运并不掌握在成千上万的抵抗将士手中，而是由遥远的某地决定的；土耳其当局根本不考虑如何组织抵抗，把军队从桑甲克全部撤走了。真是冤家路窄，穆义阿迦小时候随父逃离乌吉寨时碰到的敌人，正是他现在战而未胜的那些人，他当然不能坐等他们到来，束手就擒，可是又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所以只好下定决心回到波斯尼亚来，在他父亲切齿痛恨的政权下忍辱求生。这样，他又带领全家踏上了逃亡的道路——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回到他度过童年时代的维舍格列。

两年来，他靠手头仅有的一点现款和土耳其人中的亲友给予他的周济，做了一点生意。可是局面总也打不开，因为世道艰难，动荡不定，即使经营多年的商店想要赚点钱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了。他只好靠手头仅有的一点钱延宕度日，盼望局势能早日安定下来，日子过得顺当一些。不想他在维舍格列过了两年艰苦的流亡生活之后，现在又遇到这场战祸，把他逼得一筹莫展，除了心焦如焚地注视着战争的发展，看它如何结束外，没有一点办法摆脱当前的困境。

穆义阿迦和阿里霍扎刚才低声交谈的就是这些事情，他们东拉西扯，无一定的主题，因为所谈的问题两人都了如指掌，不管谈哪件事，无论是从开头谈起，还是采取倒叙的办法，再或是

单刀直入，谁都能一听就懂，接上话碴。阿里霍扎对于穆义阿迦的为人推崇备至，所以一见如故，他又说了许多话来安慰他，叫他不要过于伤心，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自己能解决他的痛苦，而是因为穆义阿迦横遭不幸后的表现令人敬佩，不愧为一个道地的穆斯林，因此，对于他的凄凉身世表示一点同情，便是他阿里霍扎义不容辞的事了。穆义阿迦坐在那里默默地抽烟，全然是一副被命运压垮了的神态。一粒粒汗珠出现在他的额头和太阳穴上，越来越大，在阳光下晶莹发亮，最后流在布满皱纹的面颊上。他自己对此毫无知觉，因而也没有擦一擦。他茫然若失地看着眼前的小草，完全沉浸于无穷的忧虑中，别人安慰他的话无论怎样感人也不能打动他，头顶上的炮声无论怎样尖利也不能惊扰他。有时候，他至多不过轻轻地摆一摆手，嘴上叽哩咕噜说上两句，可是这与其说是他答复阿里霍扎对他的劝慰和他对周围事态的反映，倒不如说是他内心的独白。

"亲爱的阿里霍扎，我现在已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先父和我不惜一切保持我们在遵守伊斯兰教教义和穆斯林风俗上的纯洁性，寸心惟真主明鉴。我的祖父归天之后就安葬在乌吉寨，他的坟墓恐怕现在已经荡然无存，片瓦不留了。我父亲在诺瓦—瓦罗士逝世后也是就地安葬的，我担心他的坟墓已被那些混账基督教徒糟蹋得不成样子了。在维舍格列笃信伊斯兰教的人还大有人在，我想我自己至少可以在这里得到归宿，但我们的下一代能否守得住这个摊子，我看就不一定了，谁也不认识自家的祖坟的那一天很快就会到来。可是这难道不是真主有意安排的吗？我感到我们这个好端端的伊斯兰教现在已到了山穷水尽濒于绝境的时候，除了自行消亡没有任何出路。因此，我能做什么呢？去和那义尔贝伊之辈同流合污，参加保卫团，拿着德国佬的武器

去送死，使自己无面目见家乡父老，也无法在地下告慰故去的亲人？还是什么也不干，坐等塞尔维亚人到来，甘心接受五十年来我们东奔西跑想要逃避的那种局面？”

阿里霍扎正要说几句话鼓励鼓励他，使他感到事情还没有到达如此绝望的地步，但忽然被一阵炮声打断，布哥岭和巴诺山两边的炮击又开始了。高勒士方面也响起了炮声。这些大小不同的炮弹飞得相当低，正好从他们的头顶上呼啸而过，形成密集的炮火网，声音十分凄厉，听了令人心碎，肝胆俱裂。阿里霍扎站起身来提议到房檐底下去躲避一下，穆义阿迦木然地跟在他后面。

可是，这种对过去不堪回首、对未来忧虑重重的心情，住在美以当教堂附近的塞尔维亚人却没有，他们唯一的烦恼是眼下的战火给他们造成的家破人亡。他们的亲人无缘无故地被逮捕，被杀害，使他们经受了一场难以言喻的打击，脸上笼罩着惊慌不安而又不敢声张的紧张神色。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下，便产生了历来都会出现的心理状态：悄悄地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一百多年前，当巴诺山点燃了起义的烽火时，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也象现在这样，人们虽然面临绝境，但不灰心失望，既然没有别的出路，那就小心谨慎，忍受一切，但坚信光明的一天最后必然会到来。

那时候，人们把自己关在美以当山上的家里，侧耳倾听卡拉乔治的炮兵从佛勒都伏山发射出来的微弱炮声，心中忐忑不安，激动不已，如今他们的子孙也在闷热的夏夜听那榴弹炮发出来的炮弹从自己的头顶上呼啸而过，并且根据声音的大小和远近来判断哪些炮是塞尔维亚人放的，哪些炮是德国人放的，如果是前者就连声叫好，赞不绝口，如果是后者则轻轻骂上两句难听的

话。不过，只有当大炮向维舍格列四郊的高地射击时，他们才这样做，因为他们感到，同时也确信无疑地认为，这里没有什么动静，地方又是那样大，炮弹飞到这里来无非表明是在有意向他们射击，可是等到大炮向大桥和城里射击时，他们就一声不响，不愿评论了。而对于在山上落下的炮弹的评论，他们也是在爆炸声完全停息下来以后，才用惊慌失措的声音说起来，互相在那里比较每一颗炮弹离他们多远，具有怎样的危险性。

商业区的大部分塞尔维亚人都在利斯蒂奇老爹家避难。他那幢傍山而建的房屋就在主教家上面，住房宽敞，构造讲究，为后者所不及，而且房前屋后都是李树园，正可防避炮火的袭击。到他家来避难的人中男人很少，大多是拖儿带女的妇女，她们的丈夫有的被逮捕，有的被抓去作人质了。

米爱罗·利斯蒂奇家虽然房子宽敞，陈设华丽，但只住了老夫妻俩和一个儿媳妇，儿子早已夭亡，所以媳妇是孀居，但她不愿改嫁，也不愿回到娘家去，宁愿留在这里守着两位老人，把自己的孩子抚养成人。她的大儿子如果还在世的话，今年刚满十八岁。两年前，他逃到塞尔维亚去当了义勇军，后来在布雷加尔尼扎河畔的一场战斗中阵亡。

米爱罗老爹一家对于这些不同寻常的来客招待十分殷勤，好象过节一样。特别是米爱罗本人待人格外热情，虽然年近古稀，仍整天忙个不停。他光着头，这是很少见的，因为他平时总戴着那顶红毡帽。他已经白发苍苍，但还是那样浓密，一直垂到耳根。一把白花花的大胡子——由于抽烟的关系，胡子的根部已被熏黄——使他显得分外和蔼可亲。他一看到某人显出格外沮丧，就走上前去劝慰一番，递上一杯酒、一杯咖啡或一支香烟。

“我不行，米爱罗老爹，谢谢，你待我真象父亲一样，可是我喉咙有点受不了，”一个还很年轻的妇女用手指着自己肥硕白嫩的脖子推辞说。

她是皮埃尔·加达尔的妻子，住在奥克里德村。皮埃尔前几天因为一件事到萨拉热窝去了，恰好遇上战争爆发，至今杳无音信。军队把她和孩子从家里赶了出来，她只好带了他们投奔到米爱罗老爹家，因为米爱罗老爹是她丈夫的世交。她现在为丈夫在外不知是凶是吉，家里的房子也不能回去看看而十分苦恼，捏着手指，一会儿泣不成声，一会儿长吁短叹。

米爱罗很关心她，一直呆在她身旁。今天早上听说她丈夫皮埃尔从萨拉热窝回来时在火车上被抓去当人质，后来被送往瓦尔底德，到瓦尔底德后，当局由于误听了关于被抓来的人质想造反的谣言，十分惊慌，便不分青红皂白枪毙了许多人，皮埃尔也在其中。大家现在还不敢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她，米爱罗一刻也不离开她的左右，就是因为怕有人冒冒失失地说出来。年轻的女人不时站起身来想到院子里去瞭望奥克里德那边的情况，每当此时，米爱罗总想尽一切办法劝她不要出去，因为她家的房子现在正是一片熊熊大火。他不希望这可怜的女人再看到这个场面，受到更大的打击。他谈笑风生，笑容可掬，又递给她一杯饮料：

“喝吧，我的小斯达诺伊卡，喝吧，我的小羔羊。就来这一小杯。这不是拉基酒，劲儿不大，既香甜可口又消愁解闷。”

年轻的女人顺从地把他递过来的酒一饮而尽。米爱罗于是又转过身来给大家斟了一巡，不厌其烦地以无法推却的盛情，一定要每个人把手上的酒喝干。随后，他又向年轻的女人走过来。她现在安静多了，只是发怔地向前看着。不过米爱罗仍寸

步不离开她。他又满面笑容地抚慰她，说一切都会过去的，她的丈夫皮埃尔定会从萨拉热窝平安归来，一家人准会安然无恙地回到奥克里德家中。

“我很了解你的皮埃尔，他行洗礼时我还在场。那次洗礼大家后来一直谈了很久，我到现在还觉得象在目前。先父曾是伊昂科·加达尔的孩子的教父，我同他到奥克里德参加你的皮埃尔的洗礼时，我已经是一个快要结婚的小伙子了。”

他于是又把皮埃尔·加达尔当时行洗礼的情况向大家复述了一遍，虽然这件事大家都很了解，但今天晚上场合不同，大家听了仍觉新鲜。

当米爱罗开讲时，在他家避难的男男女女都围拢来听他讲，由于凝神谛听，大家都忘掉了隆隆的炮声，忘掉了危险。

很久以前，那还是名闻四方的正教教士尼古拉担任维舍格列主教的时候，婚后多年无子的伊昂科·加达尔忽然得了一个男孩。一星期后，他欢天喜地把孩子抱到教堂去行洗礼。陪同孩子的生父和教父前往的是几个亲戚和邻居。他们还没有从奥克里德山下来便停下来几次就着教父带在身边的大扁酒壶喝了一通拉基酒。经过大桥时，他们又到加比亚台上坐下来喝上一口。由于时值秋冬之交，天已转凉，加比亚台上人迹杳无，不但卖咖啡的人早已他去，连平素在这儿休憩的土耳其人也不见踪影。这些从奥克里德山上下来的人便大摇大摇地坐下来，打开食品袋和酒瓶，开怀畅饮起来。他们兴致勃勃互致祝词，祝词娓娓动听，一片诚恳之心。这样一来，也就把孩子和原定在教堂祈祷结束后给他举行洗礼的那个教士置于脑后了。由于那时，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教堂里还不时兴，也不许可打钟，这些人只顾沉醉于欢乐之中，很本没有发觉时间过得很快，祈祷早已结

束。他们谈得很投机，既谈到了孩子的父母亲过去的经历，也对孩子的未来作了种种大胆的预言，因此时间便不知不觉溜走了，谁也没去注意。孩子的教父倒有好几次想到这一点，提醒大家不要在这儿耽搁太久，可是他的话马上被人顶了回去。

"怎么样，我说朋友们，咱们还是赶紧去把我们的正经事办了吧！"教父低声说道。

"我说你怎么啦？干吗这样逼命？你看我们教区的人谁没有受过洗礼。"大家异口同声回答他，一面用酒堵他的嘴。

孩子的生父也好几次急于要走，但不论是他也好，还是教父也好，终于拗不过拉基酒的魅力，不得不先喝个痛快。孩子的妈妈一直把孩子搂在怀里，两只手冻得发青，只好把他放在石凳上，用一条花花绿绿的毛毯裹好。他一点也不闹，时而酣睡，时而睁开两眼，好奇地东张西望，似乎他也在分享大家的欢乐。"我看这小东西生来就有我们这些维舍格列人的脾性，"教父说道，"他也喜欢人多热闹。"

"祝你身体健康，伊昂科，"一位邻居嚷道，"也祝你的公子万事如意长命百岁；愿上帝保佑他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受到全体塞尔维亚人的敬佩，给你做父亲的带来无上荣光。但愿上帝保佑……"

"我们现在就去举行洗礼，你们看好不好？"孩子的生父打断他的话。

"你怎么三句不离洗礼？"大家的酒兴丝毫未减，一个个抢着嚷道。

"拉巨伯·鲍罗瓦埃芬蒂并未受过洗礼，可是你看他长得多壮，骑在马上简直可以把马压垮，"一位邻居在哄堂大笑中插嘴凑趣。

他们在加比亚台上豪饮，久久不愿离去，教士尼古拉可等得不耐烦了。他在教堂前等大家，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气得火冒三丈，急忙套了件狐皮袄从美以当山上来到城里。城里有人告诉他，那帮人正带了孩子在加比亚台上贪杯，于是又向大桥走来，准备拿出他一贯训人的本领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可是他一出现，人们又惊又喜，又是道歉，又是问寒问暖，那股热乎劲儿使得这位铁面无情的教士尼古拉不能不当场软了下来，因为他终究具有维舍格列人的善良天性，他原谅了他们，接过他们递来的拉基酒一饮而尽，吃了一块肉。随后他俯下身去看看小家伙，亲昵地与他逗乐，孩子目不转睛地望着他那张大脸以及那双大蓝眼睛和一把黄胡子，动也不动。

后来有人说，孩子是在加比亚台上受洗礼的，这话实在有点言过其实，不过大家在加比亚台上杯酒言欢，流连忘返，那倒是确有其事的。直到傍晚，他们这一帮人才喜气洋洋离开加比亚台，到美以当山上去办他们的正事，他们叫开了教堂的大门，为孩子匆匆举行洗礼。在洗礼过程中，教父吞吞吐吐地低声说道，他从今以后要舍弃世俗的享受，以便这个维舍格列小公民万事如意，茁壮成长。

“我们就这样为我们的小宝贝皮埃尔举行了洗礼，他现在已经是四十出头的人了，从那时以来，他总是一帆风顺，什么挫折也没有遇到过，这一次也一定会化险为夷，平安归来。”米爱罗讲完上面的故事最后说道。

大家于是又站起身来轮番把盏，互相祝酒，不知不觉忘记了当前的烦恼，谈话的气氛也为之一变，顿时轻松活跃起来，因此，他们深深感到，虽然身陷隆隆炮声之中，四周一片黑暗，令人担惊受怕，但生活之中仍有许多合乎情理、兹趣横生的事，足以供

他们排遣忧愁。

他们就这样度过了一夜，其实，他们的一生，可以说也是这样过来的。诚然，各种各样的灾难常把他们弄得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但他们毫不动摇，依旧循规蹈矩，对光明的未来怀抱乐观的信念。所以如此，主要是他们代代相传，把自己的经历分为若干片断，按照某一时期的急需从中寻求思想上的寄托，因为只有寄托往事，从往事中汲取力量，方可克服眼下的困难，顺利地度过当前的危机，以待美好的明天到来。

不久，天亮了，预示着双方的炮战将变得更加激烈，这场不可理解的、无休止的屠杀并不会因为太阳普照人间而有所收敛。对于战争双方说来，白天和黑夜已没有什么区别，时间失去了实在意义。人们只能在焦虑不安中等待战争结束，无论做什么事都心不在焉，宛如木头人。

在美以当山上的古城堡下，逃难的人就是这样生活的。

在山下面的市中心，人们已经逃之夭夭。战争爆发那一天，当局就命令各家店铺不许关门，以便过往军队能买到日用必需品，但主要目的是在于让大家看到敌人还远得很，不用惊慌失措。可是，如今已是炮声隆隆，兵临城下，这道命令不知为什么仍未撤销。在此情况下，各家店铺只好采取随机应变的办法，寻找各种借口每天只开门一会儿来搪塞一下。但紧靠大桥和石头旅舍的店铺，如巴夫雷·朗科维奇和阿里霍扎的店铺，整天都关着门，因为这里随时都可能有炮弹飞来。罗蒂卡酒馆的房顶已被一颗炮弹炸穿，四周的墙壁更是弹痕累累，所以也整天大门紧闭。

阿里霍扎每天只下山一两次到店里看一看，然后又回到山上。

大桥遭到炮击的那一天，罗蒂卡就带了全家离开酒馆，到德里纳河左岸的一家土耳其人家里暂时躲避一下，这家人全到乡下去了，房子刚造好不久，很是宽敞，坐落在离大道只有一箭之遥的一个小山沟里，四周林木茂密，万绿丛中只露出一个红色的屋顶。

他们那天是在天黑之后，待一切都恢复宁静时才离开旅馆的。所有的伙计当中只剩下米兰还跟着他们，他对他们忠心耿耿，始终不渝。他虽已是一把年纪，但仍是一个光棍，可是每天却要打扮得衣冠楚楚。大部分伙计早已遣散，剩下来的，维舍格列上空炮声一响，便东奔西逃，在这种非常时期，这往往是难免的。同历来不论遇到什么情况时一样，整个逃难事宜都由罗蒂卡一人安排，她说怎么干大家便怎么干，谁也没有表示异议。哪些东西是当前急需或贵重细软必须全部带走，哪些东西可以留下，每人穿什么衣服，德保拉的孩子——一个四肢发育不健全的白痴——由谁抱着，以及病病恹恹、哭哭啼啼的德保拉本人和吓得疯疯癫癫的胖姑娘米娜由谁照管，这些事皆由她一人指定。这样，罗蒂卡、察勒、德保拉和米娜便在那闷热的夏夜，趁着夜色走上了大桥，他们手里提着箱子和包袱，此外还有一辆手推车，车上坐着病孩子，并放了一些行李。三十年来，这是他们的酒馆第一次走得空无一人，大门紧闭。炮火一开始轰击，就把它打得七零八落，显出残垣断壁的破败景象。这些犹太人，无论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是下肢有残疾或身体虚胖而不便行走的，还是长了罗圈腿不宜长途跋涉的，一踏上大桥便立即显示出他们是一群历来在世界各地萍踪浪迹，漂泊不定，过着孤苦伶仃生活的流浪汉。

他们就这样走过大桥，在对岸那家宽敞的土耳其人家里找

了一个栖身之所。一到那里，罗蒂卡就把全家的人及带来的全部行李安排得井井有条。可是等到她自己去就寝时，她发现房间里空空荡荡，已不是她住了多年的那间卧室，她整整一生与之打交道的文具和账簿都不见了，这使她悲从中来，伤心不已。她从懂事以来第一次感到，全身突然瘫软无力，不禁失声痛哭起来，哭声在空廓的房间里回荡，显得格外凄惨。她压制不住心头的悲伤，象男人一样，呜呜咽咽，哀恸欲绝，气噎喉堵。她这样痛哭，别人还从来没有见到过，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所以全家都感到大为惊诧，惶恐万状，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是怎么回事，随后也都跟着抽搐，放声大哭起来。对他们说来，罗蒂卡身衰力竭比战争、逃难以及酒馆被炮火毁坏给他们的打击还要沉重，因为她是一家的主心骨，有她在，什么事都好办，什么困难都能迎刃而解，可是万一她有个三长两短，全家将一筹莫展，只好喝西北风。

第二天黎明，霞光万丈，天空飘浮着朵朵五色缤纷的云彩，大地洒满了晶莹的露珠，鸟儿在林间歌唱。直到昨天晚上还在为全家操劳的罗蒂卡，这时躺在地板上显出一副虚弱的老相，连自己也不能照管自己，只知道伤心痛哭，但身上究竟哪儿不舒服，心里哪儿难受，自己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不过这时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如今已是老态龙钟，反应迟钝，成天迷迷糊糊的察勒，即使在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不太刚强，没有主见，象家里的其他人一样，一切全听罗蒂卡裁夺，总之实在是个脓包。不想他这时却一反常态，成了一家之主，表现出很大的智慧和毅力，遇事能当机立断，而且很有办法。他对小姨子好言抚慰，悉心护理，真是体贴入微。家里的事他也安排得有条不紊，不亚于罗蒂卡病倒之前对全家的照料。他利用炮

火的间歇，走到城里，从空荡无人的酒馆里取回一些急需的食物、用具和衣服。他还不辞劳苦找到一位大夫，把他请来为病人诊治。大夫认为罗蒂卡的病症乃急痛心迷所致，嘱咐让她赶快离开这战火纷飞的地方，并且开了一张处方。察勒随即同当局商量好弄到一辆车子，决定绕道罗加蒂扎，把全家送往萨拉热窝。不过还得等一两天，待罗蒂卡的精神稍加恢复才可启程，因为罗蒂卡仍整天躺着，行走不便，她时常嚎啕大哭，说话前言不搭后语，虽然口齿还是那样伶俐，夹杂着各地的方言，但流露出极度的失望、恐惧和厌世的心情。德保拉的病孩围着她在没有铺地毯的地板上爬来爬去，两只小眼睛好奇地望着姨母的脸庞，喉咙里发出怪里怪气的声音，罗蒂卡很明白这是在叫她，但不愿答应。她什么都不吃，也不想见人。由于身体不舒服，离奇古怪的恶梦接连不断，使她痛苦不堪。有时候，她梦见身体下面的两块木板仿佛象陷阱的机关一样忽然裂开，下面出现一个万丈深渊，她坠落下去，除了喊叫，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摆脱，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抓住。有时候，她又觉得自己好象变成一个其大无比、身轻如燕的庞然大物，腿长得很长很长，背上还长了两个很大的翅膀，走起路来象神鸟一样迅疾如飞，一步就跨过了比从维舍格列到萨拉热窝还要远的距离。因此江河湖海在她的脚下简直成了小小的溪流和池沼，城市和村庄也被她踩得粉碎。由于走得很快，她气喘吁吁，心跳很快。她这样飞跑究竟要到哪里去，自己也不十分明白，她只知道尽快逃离身体下面那两块伪装得很巧妙、随时都可能打开的木板。她只知道脚下渐渐远去的地方不是久留之地，因为那些城市和村庄都是藏污纳垢之所。那里的人巧言令色，尔虞我诈，一旦自己的西洋景被人戳穿，利益受到触犯，他们便不管自己说过那些娓娓动听的言词，出乎人们的意

料突然象魔术师一样改变手法，气势汹汹地搬出大炮、步枪和其他杀人武器，没有一点和解妥协的余地。他们的大举进攻打破了她的美梦，她发现自己不再是那只疾走如飞的神鸟，而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躺在坚硬的木板地上呻吟的可怜的老妪。这些人成千上万，蜂拥而来，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残暴蛮横地毁灭一切。她发现有个人俯在她的身上，看不清他的面孔，但清晰地感到他的刺刀的刀尖顶着她的胸部，正要往她的心脏刺去。

"啊！救命啊！救命啊！"罗蒂卡叫喊着，已经惊醒过来，一面把盖在身上的灰色薄披肩扔在一边。

那个小傻子靠着墙蹲在地上，张着乌黑的两眼望着她，露出好奇的神色，他并不感到害怕，也没有什么怜悯之情。米娜闻声急忙从另一个房间跑来安慰一番，替她擦去脸上的冷汗，给她喝了点水，水里她事先细心滴了几滴镇静剂。

在这一片葱绿的乡间，夏天的白昼显得特别长，人们简直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天亮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天黑。天气虽然很热，但并不感到骄阳似火。房间里响起了脚步声。几个村坊走了进来，间或还有一个士兵或一个军官。桌上堆满了食物和水果。米兰忙着给大家煮咖啡。假使没有罗蒂卡不时发出绝望的哭喊声和传到山谷里来的震耳欲聋的炮声，这情景多么具有田舍风味，因为那隆隆的炮声象是有人在疯也似地吼叫，说明世界并不太平，一场大的灾难已迫在眉睫，决不象明朗的夏天所显示那样宁静。

以上就是罗蒂卡一家及其酒馆在这场战争中的遭遇。

巴夫雷·朗科维奇的店铺也关了门。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巴夫雷和其他几个知名的塞尔维亚人被抓去作人质。他们有些

人被拘押在车站，车站的秩序如果发生混乱，列车不能正常运行，就要把他们处死。其他的人被拘押在离大桥不远、位于广场尽头的一个小木棚里。每逢赶集，木棚里备有公用磅秤供大家使用，人们还在这里缴纳通行税。大桥如果遭到毁坏，押在木棚里的人质也将被处死。

巴夫雷坐在木棚里的一张咖啡色的椅子上。他低着头双手放在膝盖上，很象一个干重活的人用尽了力气，瘫坐在那里喘一口气。他动也不动，一连几小时不变换姿势。靠近木棚的门口放了一堆空麻袋，上面坐了两个后备队的士兵。木棚的门关着，里面又暗又热。每当一颗炮弹呼啸着从巴诺山或高勒士方面飞过来时，巴夫雷便胆战心惊，紧张地听着它落在什么地方。因为他知道大桥的一个桥墩里埋了炸药，所以他老是想着这个问题，不知道炮弹会不会穿透桥面打在桥墩上引起炸药爆炸。看守他的士兵每逢换岗时，那个下级军官总要给上岗的人交待几句，他最后也总以这样两句话来结尾："只要一发现有人想破坏大桥，哪怕是露一点苗头，你们就立刻把这个人打死。" 这些话巴夫雷不知道已经听了多少遍，几乎有点麻木不仁了。他所担心的倒是不断飞来的炮弹，因为这些炮弹有时就落在离木棚很近的地方爆炸，弹片和炸起的石子打在板壁上咚咚作响。不过他最感到难受的还是觉得时间过得太慢，此外，他一想到自己眼下的境遇，心中便十分恼恨。

他想到他自己的身世，想到他的家庭和财产，越想越觉得这真是一场恶梦。否则的话，他家这些天怎么会遭到飞来横祸呢？战争爆发那一天，他的两个在大学读书的儿子就被宪兵抓走了，家里现在只剩下老伴和几个女儿在看家。他那设在奥索伊尼察地方、专门制造酒桶的工厂已被炮弹引起的大火烧得精光。他

那些分布在四郊的佃农恐怕也已死的死逃的逃。他在城里放的债一文也收不回来了。离他只有几步远的那爿店是城里最大的铺子，现在也关闭了，说不定哪一天会被洗劫一空，或者中弹起火。他本人作为人质坐在这个昏暗的木棚里，大桥万一遭到破坏，他就要掉脑袋。但大桥能否保住是丝毫由不得他的。

他思绪万千，心潮起伏，难以平静。他一生安分守己，是个老实的生意人，把炸药放在桥墩里的并不是他，现在用炮火轰击大桥的也不是他，他同大桥能有什么关系？即使在结婚之前，他还是个小伙计的时候，他也从未象维舍格列那些游手好闲的青年那样整天坐在加比亚台上唱歌，说笑。往事一幕幕展现在眼前，许多细节他早已忘记，今天又全都想起来了。

他回想起自己是怎样从桑甲克来的，那时候他只有十四岁，身无分文，衣裳褴褛。后来同一个名叫皮埃尔的老板讲妥，到他店里去帮工，老板每年给他一身衣服、两双鞋，并且管他的伙食。他抱孩子，在店里做杂活，打井水给马洗刷，无所不干。睡的地方是楼梯下面一个没有窗户、非常昏暗而又极小极小的屋子，连腿都伸不直。这非人的待遇，他还是咬着牙熬过来了。到十八岁，老板又雇了一个从桑甲克来的年纪很小的乡下人，他才转到柜台上，正式拿薪金。这时他才知道把钱积攒起来的好处，才感到攒钱能给人无比的快乐和巨大的力量。这时，他已搬到店铺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睡觉，在这里过了五年之久。这五年中，他从来没有生过火炉，也从来没有点过一支蜡烛。二十三岁那一年，老板皮埃尔作主，让他同来自察依尼切地方的一个姑娘结了婚，姑娘很贤慧，父亲也是个商人，家境还不错。婚后，小两口的生活仍过得很节俭。不久，奥地利占领波斯尼亚，此后，生意反倒更兴旺，赚钱更容易，日常开销却大为减少。他把自己赚来的钱

用来生息，一面仍继续省吃俭用。这样，羽毛日渐丰满，不久便开了一爿店，家业越来越大。那时候赚钱并不难。许多人不费多大劲就赚了不少钱，可是花起来也很厉害，可见要把赚到的钱保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他却能做到，手头有了方便之后，依然分文不敢乱花。最近几年，局势发生动荡，出现了新的谈论政治的潮流，他虽然已经是一把年纪，仍想方设法多了解一些新的东西，使自己尽量跟上新的形势，不致于经不住冲击，因此他不但安然无恙地过来了，威信反而比以前更高。就是由于这一点，他曾担任过副市长、基督教徒的头领、塞尔维亚人"协和"合唱团团长，此外，他还是塞尔维亚银行的大股东，地区银行董事会的董事。当时奥地利人和塞尔维亚人的对立日趋尖锐，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恪守商业区的信条，竭力不卷入任何一方，想法克服各种困难的局面，结果不但没有得罪政府当局，在老百姓面前也不失体面。因此，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处世有方、小心谨慎的了不起的表率。

他在大半生当中，拚死拚活，省吃俭用，历尽千辛万苦，连一个蚂蚁也不敢伤害，逢人笑脸相迎，彬彬有礼，一心走自己的路，努力发家致富。谁会想到竟落到现在这般境地，象一个作恶多端的大盗被两个士兵看管着，除了等待一颗炮弹或其他罪恶的东西把大桥摧毁，自己因而被掐死、被枪决外，没有任何办法可想。他觉得万万没有想到（这也是他最感到痛苦的地方），自己累死累活苦熬了一辈子却一无所得，到头来，自己反倒全错了，他的孩子和其他青年人却做得很对。这个世道，简直没有是非标准，再不然就是有别的是非标准，不过他不知道罢了。但不管怎么说，他的是非标准已经证明是错误的，他太鼠目寸光了。

"就是这么回事，"巴夫雷自言自语道，"就是这么回事，无论

是教会，还是当局，还是你自己，都让你刻苦耐劳，努力经营。你也真听话，循规蹈矩，一步一个脚印，不敢越雷池一步，说得更清楚一点，你披星戴月，忍饥挨饿，整天累得要死，一个子儿也不敢乱花，把心都操碎了，一生饱尝了人间的辛酸。可是突然之间，这个人生真谛不时兴了，世道变了，大家都藐视这一套，教会的威望一落千丈，无声无息，官府衙门也是强权当道。那些规行矩步、辛辛苦苦发了家的人眼看自己的财产被人洗劫一空，一生的辛劳转眼付之东流，那些强暴之徒则到处作威作福，逍遥法外。更有甚者，谁也不会因为你好不容易才挣起一点家业而对你寄予同情，向你伸出援助之手，给你出主意，教你怎样保护你克勤克俭所积累起来的财富。这怎么可能呢？天下哪有这种咄咄怪事？"这些问题，巴夫雷实在不明白，可是自己又不能解答，所以总是翻来复去在他的脑际盘桓，无法摆脱。

他极力想想一些别的事情，把自己的思路引开，但做不到，那些问题赶也赶不开。时间过得很慢，真急煞人。他感到，这座大桥他过去走过无数次，从来也没有仔细看一看，现在却不知为什么沉重地压在他的肩上，宛如一场永无止境的恶梦。

他精神萎靡，低着头，弯了腰坐在那里，感到全身——在衬衣里面，领子里面，浆得很硬的袖口里面——的毛孔汗流如雨，脸上也是一样。但他并不去擦，任凭大粒大粒的汗珠滴在地板上，他仿佛觉得自己快到了终年，就要离开人间了。

看守他的两个士兵已过中年，都是来自匈牙利的农村，他们正在吃面包和撒上了辣椒末的肥肉。他们慢条斯理地拿一把小刀一会儿切一块面包，一会儿切一块肥肉，好象是坐在自己的田头吃午餐一样。吃完之后便就着小白铁壶喝了口酒，点着烟斗抽起烟来。一个士兵喷了一口烟低声说道：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谁汗出得这样多。"然后又继续默默地抽他的烟。

象巴夫雷这样汗流如雨，被恶梦缠得不能摆脱的人并不是他一个。这些日子来，在德里纳河和寸草不生的边界之间的那一长条土地上，无论是城里，还是乡下，是大路上，还是丛林里，到处都有人汗流浃背地在找死和把别人弄死，同时他们又千方百计、集中全力与死神搏斗，逃避死亡的威胁。人类这种奇怪的活动，就是所谓战争，现在战争在扩大，战火在蔓延，遭到威胁的生命财产也越来越多。

这天早上，在离市政府设的那个木棚不远的地方出现了一队不常见的士兵。他们穿着白色制服，戴着白色的太阳帽。他们是德军的一个连队，人们称之为斯库台里小分队。战争爆发之前他们被派到斯库台里同其他国家派遣的军队一起，作为国际部队在那里维持治安。战争爆发后，他们奉命离开斯库台里，接受离塞尔维亚边界最近的奥军指挥。他们昨天夜里才开到这里，现在正在商业区和集市广场之间的一块平地上休息，挤在一个拐角里等待出击的命令。他们有一百二十来人。连长是个胖子，长了褐色的头发，他受不了这样闷热的天气，这时正在对宪兵班长达尼罗·勒巴大发脾气。他装腔作势，大声呵斥，毫不留情，这种事在德军上下级之间是司空见惯的。连长抱怨说，他和他的士兵渴得要命，食品也很缺乏，四周的商店货架上恐怕都是满满的，但都关着门，虽然有过命令叫他们照常开门营业。

"你们在这儿是干什么吃的？是宪兵还是废物？难道要把我们饿死在这里吗？难道要我到商店里去抢吗？你马上派人去把那些店铺的老板找来，叫他们给我们弄一点吃的和清凉饮料来。马上！听明白没有？马上！"

他由于语调激烈，满脸胀得发紫。那剃得光光的脑袋也由于盛怒，在一身白制服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红，简直象一把燃烧着的火炬。

勒巴手足无措，眨巴着眼睛，只知道连声答应：

"是，连长先生。就去办，马上去办。"

说着，他便一反刚才那呆若木鸡的尴尬相，慌里慌张，脚后跟向后一转，向商业区跑去。他跑得飞快，连长的盛怒象一把大火向他席卷过来，逼得他拚命地狂奔，嘴上骂骂咧咧，很想找个人来发泄一下。

第一个倒霉碰上他的是阿里霍扎。他刚从家里出来，准备到店里看看。看到这个全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勒巴一脸凶相，向他冲上来，他一下懵了，不知道这个平素文质彬彬、平易近人的宪兵班长为什么这样怒气冲冲。勒巴满脸杀气地盯着他，由于一股窝囊气无处发泄，什么情面也不顾了，他大声训斥他，那场面同几分钟前德军连长训他时一模一样。

"他妈的，我要把你们统统吊死。不是叫你们继续开门营业吗？你们为什么不开门？都是由于你们我才……"

吓得惊魂不定的阿里霍扎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勒巴就在他右边的脸颊上给了他一个耳光，把他的缠头巾从右边一下打到了左边。

随后，他又赶忙跑向别的店铺，叫人开门营业。阿里霍扎重新戴正了自己的缠头巾，放下店门板，坐在门板上，心里很不是滋味。店里顿时挤满了样子很怪、穿着白军装的士兵，这种装束他还从未见过。他感到自己仿佛在梦中一样，但他并不觉得奇怪，而为现在这个世道，遭到飞来横祸是家常便饭。

整整一个月就这样过去了，这期间大炮断断续续轰击大桥，

炮声震动着周围的山岭，人们受到的痛苦和打击难以言喻，而且还有更大的灾难在后头。战争一开始，大部分居民就撤出了夹在双方炮火之间的维舍格列城。到了九月末，全部居民几乎都走光了。最后一批撤出的行政官员，是在夜间经过大桥从那条大路上走的，因为铁路已经被切断。接着，军队也逐渐从德里纳河右岸撤退。只有很少的几支工兵和巡逻队还在等待最后撤离。

谁也顾不上大桥了，可是经过这次炮火的考验，它依然完整无恙地屹立在那里。

第二十四章

到了夜晚，天空布满浮云，大有秋天景象；云雾飘浮在高山之巅，萦回于山谷之间。奥国人趁着黑夜，撤退他们最后的一批队伍。黎明以前，所有的队伍不但都撤到德里纳河的彼岸，而且已经到达了里斯德山后的高坡，才不在敌人视野之内，处于塞尔维亚大炮的射程之外。

天色微明时，开始下起绵绵秋雨来。最后留下来的巡逻队，冒雨在巡视大桥附近的房屋和商店，查看是否有人还没有走。军官俱乐部、罗蒂卡酒家、被击毁的兵营、市场边上的三四家店铺，杳无人影，一片死寂，巡逻队只发现阿里霍扎还在他的店铺门前，他是刚从家里来，正要打开店门。宪兵知道阿里霍扎是个怪人，所以竭力劝说他立刻关上店门，离开集市广场，因为，大桥附近禁止停留，否则，将有生命危险。

阿里霍扎把他们看成一些醉鬼在那里胡言乱语，他本来准备回答他们说，我们的生命早就一直处在危险之中，可以说我们早都死了，只是挨个等待人家来埋葬就是了。但是，由于前几天的惨痛教训，他最后改了口，很自然平静地对他们说，他只是到店里来取一点东西，马上就回家去。那些宪兵显出匆忙的样子，一再嘱咐他尽快离开这个地方，然后，他们穿过集市广场，向大桥走去。阿里霍扎目送他们，但听不见脚步声，因为下了一场雨，路上的尘土成了一块又湿又厚的地毯。他还看着他们走上大桥，石头栏杆挡住他们的身影，只能看见他们的肩膀、头部和枪上的长刺刀。这时候，布哥岭山顶上已经露出了太阳的光芒。

阿里霍扎心里想，这一切措施都是很严重的，但根本上是毫无意义的；他象一个孩子骗过了老师似的，心里暗暗感到好笑。他提起了门板，刚够让身子钻进去，随后让门板自己落下，从外面看起来，店铺仿佛还是关闭着的。店里黑洞洞的，他一个人钻到店后那个小房间里，不知道有多少次，他躲在里面，逃避那些冒失鬼，令人厌烦的谈话，以及家庭和内心的烦恼。他盘着腿，坐在一张又硬又矮的椅子上，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他的思想受到外界各种事情的刺激，这时象一具天秤，先是起伏几下，然后，逐步平稳下来，最后完全恢复了平衡。这个窄小的斗室很快充满了他身上的热气，使他感到孤寂、安静、万念俱空的温暖滋味，使这个阴暗窄小、充满灰尘的斗室，忽然变成了神虚幻境，一望无际，中间流水潺潺，两岸郁郁葱葱。

在这个窄小黑暗的地方，他呼吸到清晨雨后红日初升时的新鲜空气。外面也笼罩着一种异常静寂的气氛，很奇怪的是没有一点枪炮声、人声或脚步声。阿里霍扎满怀欢悦和感激的心情。他心里想，应该感谢真主，这几块木板真象一条方舟，足以

庇护一个虔诚的信徒，把他从一切苦难中拯救出来，使他摆脱无法解决的烦恼，躲避了在他头上交战的两个敌人的炮火，这两个敌人都是异教徒，都不是好东西。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就从来没有过这样安静的时刻，而这种安静是多么美好啊，阿里霍扎这样一想，不由感到心满意足。这些年来，生命的火花早已日趋暗淡，特别是在基督教的炮火下，它已完全熄灭；现在出现的安静气氛，使人感到至少可以暂时度过真正的余生。祈祷需要安静，安静本身就等于祈祷。

正在这个时刻，阿里霍扎突然感到他身子底下的小椅子飞起来了，他自己也象玩具似的往上弹，那种"美好"的寂静打破了，顿时变成一阵震耳欲聋的声音，接着，空气中响起了一片碎裂声，声音传遍四面八方，震耳欲聋。他对面墙壁上的货架噼噼啪啪地响，货物向他飞过来，他自己也被抛到货架那边去。哎哟！阿里霍扎呻吟了一声。更准确地说，他的思想在呻吟，因为他已经听不见，也发不出声音，已经不省人事了。在震耳欲聋的响声中，一切都被窒息，压垮，连根拔掉，或者象一块石头被扔了出去。两条河流之间、这个城市所在的这一条沙嘴，就象脱离了大地，发出一种可怕的吼声，被抛到空中，而且不停地在空中盘旋着；两条河流也好象离开了河床，朝天竖起，成了两道没有中断的瀑布，由于河水重量的压力，这两条河流又从空中掉落下来。这是否就是《圣经》和有学问的人所说的最后审判日，即世界末日的时辰已经到来呢？这个虚伪的世界，是否一刹那工夫，就将会全部焚毁，就象星火那样一闪即灭呢？上帝在顷刻之间缔造乾坤而又把它毁灭，造成混沌，又有什么意思呢？不，上帝不会这样做。那么，人的手怎么会这样神通广大呢？这种飞来的横祸，要把阿里霍扎整个人，包括他的思想，一举粉碎，消灭，

埋葬，使他感到非常惊奇、失望和痛心，他对这样一个问题又如何回答呢？他不知道把他蓦地卷起的这股力量到底是什么，也不知道他自己会飞到什么地方，掉落到什么地方，他只知道他自己，阿里霍扎始终是对的，任何事情都是对的。——哎哟！他又一次呻吟起来，这一次却是真正的痛苦，因为把他抛起的这股力量，又把他猛然地摔下去，但不是落在原来的地方，而是在板壁和倒翻的椅子之间。他感到头部猛磕了一下，膝盖和背上也感到疼痛。在这震天巨响中，他的耳朵只分辨出有一种猛烈撞击他的店铺屋顶的声音，隔着板壁有一种金属或木头发出的玎玲当郎的声音，好象店铺中所有货物都变成了活的东西，腾空飞起，互相碰撞。随着这种撞击声，小石块象雨点似的纷纷落在房顶和街道上。不过，阿里霍扎已经不省人事，一动不动地躺在他那间无异于棺材的斗室。

外面天已大亮。他说不出自己已经躺了多少时间。一道亮光和人声使他从昏迷状态中苏醒过来，他慢慢有一点知觉。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是坐在一个漆黑的地方，现在，通过一个很窄的过道，从店铺里透过来了亮光。他回想起整个世界充满了一片巨响，震耳欲聋，五脏欲裂。而现在却是寂静无声，这种寂静丝毫不使人感到甜意，不象刚才发生浩劫把他摔在地上以前那种寂静，而是一种恐怖的、死亡的沉寂。他仿佛听到从远处传来了一阵叫唤他名字的微弱声音，从这个声音听来，他更加感到这种寂静是多么深沉啊。

阿里霍扎意识到自己还活着，而且仍然躺在自己的斗室里，于是，他把倒塌在他头上的一堆货物推开，然后站起来；疼痛使他发出了呻吟，连声叫喊着“哎哟！哎哟！”现在他很清楚地听到从街道上传来的人声和呼唤声。他弯下身来穿过窄小的过道，

到了他的营业部。在强烈的光线下，他看到店铺里尽是翻倒和破碎的东西。店门已经大开，因为虚掩的门板由于震动而倒在地上。在这一大堆杂乱无章、东倒西歪的货物和被震碎了的东西中间，他发现有一块人头大小的石头掉在店铺的中部。阿里霍扎举目一望，看见房顶上射进了日光。很明显，这块石头把他那单薄的屋顶和木头的天花板打穿一个洞。随后他又看了一下石头，发现这是一块白色的轻质石料。两面琢磨得很光滑，其余各面都是既粗糙又锋利，这是从一整块大石头中分裂出来的一小块。——啊，大桥！阿里霍扎恍然大悟，这时从街上传来呼喊他的声音越来越大，不容他再想下去。

有五六个年轻人出现在受了伤、还没有完全清醒的阿里霍扎面前，这些人满面胡子，浑身尘土，穿着灰军服和粗布鞋，戴着军便帽，带着武器，胸前十字交叉着子弹袋，袋里装满了闪闪发亮的小子弹。锁匠弗拉多·马利奇也在这些人里面，但是他没有戴军帽，只戴了一顶皮帽，胸前也交叉着子弹带。其中一个年轻人，显然是领头的，立刻向阿里霍扎走去。这是个五官端正的英俊小伙子，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两撇胡子又黑又细，他象猎人那样把枪挑在肩上，右手拿着一根核桃木的细手杖。他开始怒骂，嗓门也马上提高起来："喂，你怎么啦？有象你这样把店门敞开的吗？回头你少了东西，你要说是我的士兵抢劫了你的铺子。难道要我来替你看守货物吗？"

这个人并没有吹胡子瞪眼睛，只是声音有些怒气冲冲，他举起手杖，有点吓唬人的样子。正在这个时候，弗拉多·马利奇走过来对那个人低声说了几句话。

"那好吧，但愿他老实听话，如果我再一次发现他的铺子敞开，无人照看的话，那可就没有这么便宜。"

这些士兵走了，阿里霍扎目送他们，心里想："这是另外一些人，他们一来就找到我头上。这个城市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都要轮到我的头上。"他就这样站在遭受破坏的店铺旁边，张着嘴，头沉沉的，整个身子疲惫不堪。面前的集市广场，在清晨的阳光下，好象是个战场，到处铺满了大小石块、瓦砾和折断的树枝。他把目光移到桥上。加比亚台依然存在，过了加比亚台那一段已经不翼而飞，大桥就在那里拦腰斩断。第七个桥墩已经不存在了；第六个和第八个桥墩之间，敞开着一个豁口，从侧面看过去，在这个豁口地方，可以看到碧绿的河水。从第八个桥墩起，断桥还接连着彼岸，依旧同昨天以前一样，洁白光亮，轮廓整齐。

阿里霍扎眨了几下眼睛，企图避开眼前的惨象，随后，他索性把眼睛完全闭上。五六年前的景象又重新浮现，他在冥冥中又看到那些士兵，在绿色帐篷的掩护下，就在这个桥墩上挖洞，放上炸药；看到了那个桥墩洞口上，多少年来一直盖着的那块铁板，还看到那个军士长布朗科维奇的那副莫测高深、装聋作哑、视而不见、但又意味深长的面孔。他感到心惊胆战，又把眼睛睁开，然而，在他的视野里，始终是这些东西：铺满了大小石块的集市广场，缺了一个桥墩的大桥和两个桥孔中间突然折断处的豁口。这样的场面只有在梦里才会出现，才能看见。是的，只有在梦里。当他转过头去，想避开这种叫人不敢相信的景象，他却又看到他的店铺，一块大石头，一块从第七个桥墩上飞来的石头，压在东倒西歪的货物堆上。如果这是一个梦的话，到处都是这种梦。这时，市中心响起了呼喊声，用塞尔维亚语高声发出的命令声和越来越近的脚步声。阿里霍扎赶快又上了门板，加上锁，向他家里走去。

他每次走上山坡的时候，常常感到气喘和心跳得厉害。他一过五十岁，就已经开始觉察他出生的这座山冈，越来越陡峭，通往他家里的路越来越漫长。但是他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想尽快地离开城市中心，并且尽快回到家里。他的心脏怦怦地跳得很厉害，气也喘不出来，只好停下步来。

他似乎听到下面有人在那里歌唱。在他下面，就是那座炸成两截、惨不忍睹的大桥。他不需要回去（他已心灰意懒，也不想再回去）。看这一幅景象：桥墩象一根硕大的树干那样连根拔掉了，成千上万的碎块散落在桥墩的周围，这个桥墩左右的桥孔截然被切断。桥孔之间有一个长达十五米的豁口，被切断的桥孔两面怅然相望，无法合拢。

不，他已心灰意懒，不想再回去。但是，他往前也走不动，爬坡也爬不上，因为他越来越觉得气闷，两腿也不听使唤了。他开始缓缓地、有节奏地进行深呼吸，而且一次比一次更使劲地吸气。过去，他这样做，效果很好，这一次也不例外，果不其然，他觉得胸口松快些了。有规律的呼吸使他的心脏跳动逐渐恢复了正常，加上他想到家庭和自己的床；更使他增添了力量。于是，他又继续上坡，但是，步履艰难迟缓，大桥炸毁的前后景象一幕一幕地浮现在他眼前。企图采取扭转身子的办法去摆脱某件东西对自己缠身折磨，那是办不到的，即使闭上眼睛，它也照样出现，无法摆脱。

这时，阿里霍扎已经能够呼吸比较自如，脑子也比较清醒一些，他想："是啊，现在总该明白他们那一大套装备和机械，他们那样忙迫，究竟是干吗。"（他总是对的，任何时候，任何事情，对任何人，他都是对的。这一次却认输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第一次对此置之度外。他太自以为是了！）这么多年来，他总是

看到他们在桥上忙忙碌碌：他们把大桥清扫得很干净，使大桥变得更美观；他们还维修桥基，安装水管，架设电灯，然后，突然有一天，他们竟把这一切都炸毁了，似乎炸的是山上的岩石，而不是有益而且壮丽的公益设施。现在可以看出他们究竟是一批什么样的人，究竟在寻求什么。这方面，他是早已看出，而现在是天字第一号大笨蛋都可以看出来。他们开始毁掉永世长存的东西，毁掉属于真主的东西。谁知道他们还要搞到什么地步为止呢。你看，大丞相的那座石桥也象一条珍珠项链那样开始被拆毁了，问题是事情只要一开始，那就谁也无法制止。

阿里霍扎又停下步来。他上气不接下气，面前的山坡突然显得更陡了。他又进行深呼吸，让心跳平稳下来。他感到气息和精神又缓过来了，于是，他更加快步走去。

他边走边想：嗨，算了，这里破坏，别处建设。也许别处还有平静的地方，还有些理智的人，他们可能会遵循真主的旨意。真主抛弃了德里纳河上这个可怜的城市，也许没有丢弃整个世界和天下所有的土地吧？这些人不会这样折腾到世界末日的。可是谁知道呢？（啊，他要是能够多吸点空气该多好！）谁知道呢？这些邪恶的异教徒对任何东西都进行整顿，清扫，维修，改善，然后又都毁于一旦，他们也许会扩展到全世界；他们疯狂建设，又疯狂破坏，也许会把真主所创造的整个世界弄成杳无人烟的荒野，或者弄成一个放牧场，以满足他们贪得无厌的胃口和无法理解的食欲吧？一切都是可能的，不过，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那些英明伟大、灵魂高尚的人物，为了真主的荣耀，创建了一些千古长存的建筑物，使大地变得更加壮丽，使人类生活得更加舒适美好，这样的人物将与天地日月共长存。如果这样的人物也完全消逝，那就等于世界上对真主的爱已经完全消失殆尽。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阿里霍扎思潮澎湃，步履越来越艰难，越来越缓慢。

城里有人在歌唱，现在越听越清楚。他要是能够多呼吸一点空气，这一条路要不是那么陡，让他回到家里，躺在他的长沙发上面，和家人见一面，谈一谈，那该多好啊！这就是他的全部愿望。可是，这已经是不可能了。他不能再使他的呼吸和心脏的跳动恢复正常状态，他的心脏完全喘不上气来，过去睡觉的时候，也感到过这种情况。不过这一次再也醒不过来了。

他张大着嘴，眼珠也好象凸出来了。山坡越来越大，越来越贴近他的脸。他眼睛里所看到的全是又硬又干的道路，随后变成一片漆黑，最后把他完全吞噬。

阿里霍扎躺在通往美以当山区的山坡上，他短促地抽搐几下，咽了最后一口气。

1942 年 7 月—1943 年 12 月，

于贝尔格莱德。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阿里霍扎思潮澎湃，步履越来越艰难，越来越缓慢。

城里有人在歌唱，现在越听越清楚。他要是能够多呼吸一点空气，这一条路要不是那么陡，让他回到家里，躺在他的长沙发上面，和家人见一面，谈一谈，那该多好啊！这就是他的全部愿望。可是，这已经是不可能了。他不能再使他的呼吸和心脏的跳动恢复正常状态，他的心脏完全喘不上气来，过去睡觉的时候，也感到过这种情况。不过这一次再也醒不过来了。

他张大着嘴，眼珠也好象凸出来了。山坡越来越大，越来越贴近他的脸。他眼睛里所看到的全是又硬又干的道路，随后变成一片漆黑，最后把他完全吞噬。

阿里霍扎躺在通往美以当山区的山坡上，他短促地抽搐几下，咽了最后一口气。

1942 年 7 月—1943 年 12 月，

于贝尔格莱德。